



列宁选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选集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列 宁 选 集

(第三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
列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60年4月第1版 1972年10月第2版

1977年8月北京第7次印刷

书号 1001·883 每册 2.05 元

目 录

1917—1919 年

远方来信（摘录）	1—12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1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13—18
提纲	13
论两个政权	19—22
论策略书	23—35
说明	23
第一封信 对时局的估计	24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 草案）	36—69
这次革命的阶级性	36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37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阶级意义	38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41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43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45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新型国家	46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49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51
社会主义国际的情况	52

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58
我们党究竟应当用什么名称,才在科学上是正确的, 在政治上是能帮助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62
跋	67
战争与革命 (1917年5月14日〔27日〕的演讲)	70—92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93—94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演说 (1917年6月4日〔17日〕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95—106
论口号	107—114
革命的教训	115—129
一	115
二	117
三	118
四	120
五	120
六	122
七	125
八	126
九	127
后记	128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130—170
饥荒逼近	130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131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134
银行国有化	136
辛迪加国有化	141
取消商业秘密	144

强迫合并成联合组织·····	148
调节消费·····	151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	154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158
害怕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前进呢? ·····	161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165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168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 在革命中的任务) ·····	171—276
初版序言·····	171
第二版序言·····	173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74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174
2. 特殊的武装队伍, 监狱等等 ·····	177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180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183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	189
1. 革命的前夜·····	189
2. 革命的总结·····	192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	198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200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	200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	204
3. 议会制的消灭·····	208
4. 组织民族的统一·····	214
5. 消灭寄生虫——国家·····	217
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219

1. “住宅问题”	219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222
3. 给倍倍尔的信	225
4.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228
5. 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	235
6. 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240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242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242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244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249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252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259
1. 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260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261
3. 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267
初版跋	276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277—283
革命的任务	284—293
同资本家妥协的危害性	286
政权归苏维埃	286
给各国人民以和平	287
土地归劳动者	289
防止饥荒和经济破坏	289
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290
革命的和平发展	292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294—341
再版序言	294

后记	336
局外人的意见	342—34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345
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	346—349
给中央委员的信	350—351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1917年10月25—26日〔11月7—8日〕)(摘录)	352—366
1 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352
2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 和平法令	354
3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结论(10月26日〔11月8日〕)	359
4 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 土地法令	362
土地法令	363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	367—36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 (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	369—373
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374—376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377—381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 的发言(1917年12月14日〔27日〕)记录	382—384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385—387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388—391
怎样组织竞赛?	392—401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	402—403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404—406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	407—408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	409—417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	409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918年1月11日〔24日〕 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418—435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436—437
奇谈与怪论	438—445
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	446—451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1918年3月7日在俄共(布) 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452—474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 (1918年3月 8日晚上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475—487
当前的主要任务	488—492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493—529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状况与社会主义革命的 基本任务	493
当前的总口号	497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498
为建立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506
提高劳动生产率	509
组织竞赛	512
“严整的组织”和专政	515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524
结论	527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530—559
—	530

二	534
三	538
四	544
五	548
六	556
论饥荒（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	560—567
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5月26日）	568—575
预言	576—581
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决战！	582—585
给美国工人的信	586—599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600—602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603—604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11月7日）	605—606
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607—615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616—709
序言	616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618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629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636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643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649
苏维埃宪法	657
什么是国际主义？	666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	679
附录一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703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703
论“民主”和专政·····	710—714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6日）·····	715—734
1 代表大会开幕词（3月2日）·····	715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3月4日）·····	717
3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733
4 大会闭幕词（3月6日）·····	734
俄共（布）党纲草案·····	735—771
1 俄共党纲草案草稿·····	735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741
2 俄共（布尔什维克）党纲草案·····	753
3 党纲政治部分的补充·····	758
4 党纲政治部分的摘录·····	759
5 党纲中关于民族关系方面的条文·····	760
6 党纲中关于民族问题条文的最后草案的补充·····	761
7 党纲中关于军事方面条文的引言·····	762
8 党纲中关于法院条文的第一段·····	764
9 党纲中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	765
10 党纲中关于宗教关系的条文·····	766
11 党纲中经济部分的条文·····	767
12 党纲中关于农村的条文·····	770
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在俄共（布）第八次 代表大会上）·····	772—791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1919年3月23日在俄共(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792—807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808—815
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1919年5月6日)	816—819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1919年5月19日在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820—855
一	821
二	826
三	831
四	837
五	849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856—860
注释	861—921
人名索引	922—933

远方来信¹(摘录)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经爆发了。这第一次革命大概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

这第一次革命即1917年3月1日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根据在瑞士所得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大概不会是我国革命最后一个阶段。

一个已经维持了许多世纪并且在1905—1907年这三年极其伟大的全民的阶级战斗中终于保持了下来的君主制度，竟在短短八天之内（这段日期是米留可夫先生在给俄国一切驻外使节的大吹大擂的电报中说的）就土崩瓦解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呢？

奇迹在自然界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双方斗争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庸人们看来，有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

为了使沙皇君主制度不消几天的功夫就能土崩瓦解，曾经需有许多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条件的配合。现在把其中几个主

要条件列举如下。

如果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三年间进行了极其伟大的阶级战斗和表现了革命的毅力，那末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也就是说这次革命的**开始阶段**就不会在几天以内完成。第一次(1905年)革命深深地翻松了泥土，根除了世代相传的偏见，唤醒了数百万工人和数千万农民去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使俄国社会中一切阶级(以及一切主要政党)彼此表明了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了它们真正的本质，表明了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力量、它们的行动方式以及它们的当前目的和将来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度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它的全部腐败和丑恶，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庭²为首的沙皇朝廷狐群狗党的全部无耻行为和荒淫无度的生活，揭露了罗曼诺夫皇室这班恶棍用犹太人、工人和革命家的鲜血洒遍了全国的全部兽行，揭露了这些占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地主“首脑人物”为了保全自己和自己阶级的“神圣财产”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任意荼毒公民的全部兽行。

如果没有1905—1907年的革命，没有1907—1914年的反革命，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境内其他民族中一切阶级的“自决”，这些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对沙皇君主制度所持态度的决定，就不可能象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八天内表现的那样明确。这八天的革命——如果可以这样譬喻的话——好象是经过十来次主要及次要预演后作的一次“表演”；各个“演员”对于彼此的面貌，对于自己所扮的角色，自己所站的位置以及自己所处的境遇，都极为熟悉，连一切政治倾向和行动手段上稍微有点意义的细微差别，都揣摩得非常透彻。

但是，如果说被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这班老爷及其走狗们贬斥为“大叛乱”的1905年第一次大革命，在十二年后引起了1917年“灿烂的”“光荣的”革命，——它所以被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赞扬为“光荣的”革命，是因为它(暂时)给了他们政权，——那就必须知道这里还需要有一个巨大的、强有力的、万能的“导演”，他一方面能大大加速全世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能产生空前严重的全世界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危机的危机。除了异常加速全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外，当时还需要有全世界历史中发生的特别急剧的转折，使得遍体血污的罗曼诺夫帝制的车子碰到这样一次转折就一下子颠覆下去。

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便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

现在说这次战争是全世界的战争，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因为美国和中国今天已经有一半卷入了这场战争，明天就会完全卷进去。

现在说这次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了。只有资本家及其走狗，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用一般批评性的定义，而是用大家熟悉的俄国政界人名来表示——就是一方面只有古契柯夫和李沃夫之流，米留可夫和盛加略夫之流，另一方面只有格沃兹迭夫，波特列索夫，契恒凯里，克伦斯基，齐赫泽之流等等，才能否认或抹杀这个事实。无论德国或英法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弱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金融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来挽救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战争由于它的客观的必然性，不能不异常加速和空

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不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

这一转变过程已由1917年的二三月革命开始了，这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首先向我们表明，当时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的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俄国全体资产阶级和地主连同他们所有不自觉的走卒，再加上他们所有自觉的领导者，即英法两国的大使和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已经开始在吸收兵士和农民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

有三个政治阵营，三个基本政治力量：（1）沙皇君主制政府——农奴主-地主的首脑，旧官吏和旧将军的首脑；（2）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十月党³-立宪民主党⁴，跟着他们跑的有小资产阶级（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克伦斯基和齐赫泽）；（3）在整个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中间寻找同盟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三个基本政治力量甚至在“第一阶段”的八天之内就把自己的面貌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甚至对于笔者这样一个离事变发生地点很远，只能看到外国报章所载简略电讯的观察者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在详细说明这点以前，我应该先回头说一说我这封信中论述头等重大因素，即论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那一部分。

战争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和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结在一起了。一团血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情景。

在战争开始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如德国的大卫和谢德曼之流，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之流，老早就在拚命骂革命家的“幻想”，骂巴塞尔宣言⁵的“幻想”，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口号的“梦想性”了。他们百般颂扬，认为资本主义似乎表现出了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正是

他们这班人帮助过资本家在各国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适应性”和驯服性，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阶级。

但是“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资产阶级没有能够把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危机长期推延下去。这一危机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在一切国家里日益增长起来，从正遭遇着“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用一位不久前访问过德国的观察家的话来说）的德国起，直至饥荒也已逼来而组织得远不及德国那样“高明”的英法两国止。

所以，在瓦解现象最严重而无产阶级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的品质，而是因为它有“1905年”的生动传统）的沙俄境内，革命的危机自然就最先爆发出来了。这一危机又因俄国及其盟国遭到多次最严重的失败而加速到来。这种失败动摇了全部旧的政府机构和全部旧制度，引起了全国所有各个阶级对它的仇恨，激起了军队方面的愤怒，大批地消灭了具有因循守旧的贵族和腐败透顶的官吏性质的旧军官，而代之以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多半是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那些公然对资产阶级摇尾乞怜或者是简直毫无气节的分子，曾经大吵大闹地反对“失败主义”，他们现在已经面临着一个事实，这就是最落后最野蛮的沙皇君主制度的失败同革命火焰的开始彼此有历史的联系。

但是，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失败起过加速爆发的消极因素的作用，那末英法两国金融资本即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同俄国十月党及立宪民主党的资本势力的联系，就是通过直接组织反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阴谋活动而加速了这一危机的因素。

对于事情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英法报刊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而极力抹杀，德国报刊则幸灾乐祸地强调说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冷静地面对现实，既不为一前一交战的帝国主义者集团

那些外交官和部长们的假仁假义的冠冕堂皇的外交谎言所惑，也不为后一交战的帝国主义集团那些在金融和军事方面同前者竞争的人的嘻笑和挤眉弄眼的伎俩所迷。二三月革命的全部事变进程很明显地表明，英法两国使馆以及它们的走狗和“内线”，为了阻止尼古拉二世（我们希望并且要设法使他成为末世）同威廉二世“单独”妥协和单独媾和，老早就在作疯狂的努力了，他们联合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一部分将军以及军队中特别是彼得堡卫戍部队中一部分军官，直接组织了以撤换尼古拉·罗曼诺夫为目的的阴谋活动。

我们决不要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决不要陷入某些人所犯的错误，这些人现在象一些动摇于格沃兹迭夫一波特列索夫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之间、动不动就堕入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的“组委会分子”⁶或“孟什维克”一样，准备歌颂工人党同立宪民主党“妥协”，歌颂前者“赞助”后者等等。这些人为了替他们自己那套陈旧的、背熟了的（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辩护，公然掩盖英法帝国主义者同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进行的阴谋活动，掩盖这一阴谋活动的目的是要使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主要打手”下台，另用几个比较强硬的、新鲜的、能干的打手来代替他。

革命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和这样——从表面上看来，骤然看来——彻底地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汇合起来、并且是十分“和衷共济地”汇合起来的，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潮流，两种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一方面是英法帝国主义者们的阴谋，他们曾推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夺取政权，以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以求更疯狂更顽强地进行这个战争，以求再摧残数百万俄国工农，好使古契柯夫之流获得君士坦丁堡……使法国资本家获得叙利亚……使英

国资本家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另一方面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城乡一切贫苦人民）争取面包、争取和平、争取真正自由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深入的运动。

谁要是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赞助了”由英国钞票“缝成的”、犹如沙皇帝国主义一样丑恶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帝国主义，那简直是愚蠢可笑的。革命工人曾经毁坏、在颇大程度上已经毁坏了、并且将要彻底毁坏可恶的沙皇君主制度，至于在一个时间短促和情形特殊的历史关头，曾经有过布卡南、古契柯夫及米留可夫一流人为了把一个君主换成另一个也是从罗曼诺夫皇室中抬出来的君主所进行的斗争来援助他们，那是既不会使他们感到欢喜，也不会使他们感到慌张的！

事情就是如此，并且也只是如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害怕真理，善于冷静地权衡革命中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善于在估计任何“形势”时不只看到它今天的特性，而且看到它更深远的底蕴，看到俄国和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更深远的相互关系，他就应当如此并且也只会如此观察问题。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全俄其他各地的工人，为反对沙皇君主制度，为争取自由，为农民争取土地，为和平，为反对帝国主义大屠杀，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英法帝国主义资本势力，为继续进行和加强这种大屠杀，制造宫廷倾轧，勾结近卫军军官策划阴谋活动，怂恿并鼓励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暗中布置了一个完全准备妥贴的新政府，这个政府在沙皇制度一受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初打击时就夺得了政权。

在这个新政府里，所有真正重要的位置、紧要的位置、决定性的位置，也就是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昨天还充当刽子手斯托雷平的帮凶的十月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⁷的手里，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

的手里，而米留可夫及其他立宪民主党人坐在那里多半是为了装饰门面，为了充当招牌，为了发表甜蜜的教授式的演说，“劳动派分子”⁸克伦斯基在这个政府里不过是当一个专用空话欺骗工农的丑角。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

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统治着我国，并且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在1907—1914年反革命时期，最后——而且是用特别大的速度——在1914—1917年战争时期，已经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组织起来，已经把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⁹等等抓在自己的手里。到1917年，这个新阶级已经“几乎完全”执掌了政权；所以沙皇制度一受到打击就立即倾覆，为资产阶级扫清了地盘。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各种力量极度紧张化，结果就使落后的俄国的发展进程大大加速，使我们“一下子”（其实是仿佛一下子）就赶上了意大利和英国，并且几乎赶上了法国，获得了所谓“联合的”、“民族的”（即同进行帝国主义大屠杀和愚弄人民相适应的）、“代议制的”政府。

从这次战争看来，这个政府实际上不过是拥有亿万资本的“英法”“公司”的伙计，除这个政府以外，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正在努力联系兵士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当然它更要特别努力地联系农业工人，首先联系农业工人，比联系农民更密切地联系农业工人。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

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沙皇君主制度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

想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的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政府，即资产阶级的政府，其实是“英法”金融公司的一个伙计，它不得不答应给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这种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碍这个政府保持其统治人民的权力并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屠杀为限度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的人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它在努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

这三种力量间的斗争决定了目前的形势，即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形势。

第一第二两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是不深刻的，暂时的，仅仅由一时的特殊情况引起的，即由帝国主义战争中事态的急剧转折引起的。整个新政府都是君主派，因为克伦斯基口头上的共和主义根本是不庄重的，是一个政治家所不齿的，客观上是玩弄政治手腕。新政府还没有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度，就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地主王朝勾搭上了。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需要君主制度来作为官僚和军队的首脑，保护资本对于劳动者的特权。

谁在那里说什么工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势力应该赞助新政府（这样说的显然有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和契恒凯里之流以及言语极为支吾的齐赫泽之流），那他就是工人的叛徒，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和平和自由事业的叛徒。因为实际上正是这个新政府已经被帝国主义资本，被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掠夺政策束缚住了手脚，已经开始勾结（并没有询问过人民！）王朝，已经在为恢复沙皇君主制度而工作，已经在迎请新君候选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

登极，已经在设法为他巩固宝座，废除世袭的（依靠旧法规维持的）君主制而代之以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式的（用伪造的人民表决办法维持的）君主制。

不，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制度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不只是在口头上，不是靠花言巧语的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口允诺，——那就不是工人应该赞助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赞助”工人！因为自由和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的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巩固、扩大和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

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话和谎言，都是自由派和激进派阵营中的政客们自欺欺人之谈，都是骗人的把戏。

只要对建立工人武装这一事业给以帮助或至少是不加阻挠，——那末俄国的自由就不可战胜了，君主制度就无法复辟了，共和制度就有保证了。

不然，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就会恢复君主制度，丝毫也不会实现，确实确实丝毫也不会实现他们所允诺的“自由”。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都是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如同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府，即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

流的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即使他们真心愿意这样做（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古契柯夫和李沃夫有诚意），也是办不到的。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因为它是主战的政府，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政府，是从事掠夺的政府，是想掠夺阿尔明尼亚、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重新侵占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边疆区等等的政府。这个政府被英法帝国主义资本束缚住了手脚。俄国资本只是操纵数千亿卢布资本的名叫“英法”环球“公司”的一个分公司。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面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能象德国那样给予人民“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可是人民是不愿意忍饥挨饿的。人民会知道，并且大概很快就会知道，面包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必须采取不崇拜资本与地产的神圣性的手段才能取得。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自由，因为它是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它畏惧人民，并且已经开始勾结罗曼诺夫王朝了。

关于我们最近对待这个政府的策略任务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谈。那里我们将指出，目前时期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口号，即“当前任务”应该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和全体人民的组织的奇迹，准备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取得胜利。

现在，当我们只限于分析革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时，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同盟者怎么样？

它有两个同盟者：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

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些群众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这些群众必然会受资产阶级、特别是按生活条件来说同它最为接近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定影响，会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战争的残酷教训，这些将因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这伙人愈坚决地进行战争而愈益残酷的教训，必然会把这些群众推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新制度下的相对自由，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用最大的努力首先启发和组织这些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成立农业工人苏维埃，——这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农业工人单独成立自己的苏维埃，而且要使穷困贫苦的农民离开富裕农民单独组织起来。关于现在所急需的这种组织工作的特殊任务和特殊形式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封信里去谈。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二个同盟者就是一切交战国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目前他们在颇大程度上受着战争的压制，而代表他们说话的往往是那些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格沃兹兹夫和波特列索夫一样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者。可是，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进行，无产阶级已在逐渐摆脱他们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又必然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

拥有这两个同盟者的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可能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完全胜利，来代替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度，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与备受战争痛苦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尼·列宁

写于1917年3月7日(20日)

载于1917年3月21日和22日

《真理报》第14和15号

按打字稿刊印并根据
《真理报》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3卷
第304—316页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¹⁰

4月3日夜里我才回到彼得格勒，我在4月4日的会议上做关于革命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时，当然只能用我个人的名义，并且预先声明没有充分准备。

为了使我自己和老实的反对者便于工作，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准备了书面提纲。我宣读了这份提纲，并把原文交给了策烈铁里同志。当时我读得非常慢，而且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后来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

我把个人这份提纲交去付印时，只加了一些极其简短的注释，而在报告里面，这些注释是发挥得更为详细的。

提 纲

1. 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即使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地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战争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

觉悟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同意进行真正证明革命护国主义正确的革命战争：（一）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二）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放弃一切

兼并；(三)真正同一切资本利益完全断绝关系。

革命护国主义群众的广大阶层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由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的，而不是为了侵略；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周详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证明，要用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平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

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

联欢。

2. 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

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尽量公开活动的可能（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最后，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对这个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

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在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极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时，必须善于适应这种特殊条件。

3. 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要不可容忍地“要求”这个资本家政府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因为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

4. 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我们党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只占少数，比起一切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盟——从人民社会党人¹¹、社

会革命党人¹²起直到组织委员会⁶（齐赫泽、策烈铁里等）、斯切克洛夫等等止——，暂时还只占微弱的少数。

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经常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发错误，同时宣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

5.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

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①

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6. 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心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

没收一切地主土地。

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农代表苏维埃。把每个大庄园（其面积约一百俄亩至三百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模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7. 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8.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

^① 即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9. 党的任务：

(一)立刻召开党代表大会；

(二)修改党纲，主要是：

(1)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2)对国家的态度以及我们关于“公社国家”^①的要求；

(3)修改已经陈旧的最低纲领；

(三)更改党的名称^②。

10. 革新国际。

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建立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对“中派”^③的国际。

为了使读者了解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老实的反对者这一“情况”是罕有的例外，我请读者把下面哥登别尔格先生的反对意见同这个提纲比较一下，他说：列宁“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竖起了内战的旗帜”（摘自普列汉诺夫先生的《统一报》¹³第5号）。

这岂不是奇谈吗？

我写的、宣读的和详细说明的是：“革命护国主义群众的广大阶层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周详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

① 就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

② 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护国派”和动摇的“考茨基派”）都背叛了社会主义，向资产阶级投降，所以我们应改名为共产党，来代替“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

③ 所谓“中派”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摇摆于沙文主义者（=“护国派”）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那个派别，即德国的考茨基之流，法国的龙格之流，俄国的齐赫泽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英国的麦克唐纳之流等等。

而资产阶级中那班既不属于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也不属于护国主义群众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先生们，公然把我的观点改变成“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①竖起了<!>内战的旗帜<!>”（无论在提纲或报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内战!）……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这同鼓吹屠杀有什么区别呢？这同《俄罗斯意志报》¹⁴有什么区别呢？

我写的、宣读的和详细说明的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经常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某些反对者却把我的观点说成是号召“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进行内战”!!

我攻击临时政府，是因为它没有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没有确定立即召开，也没有确定一个大概的日期，只是用许诺敷衍了事。我曾一再证明，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障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们却说成是我反对立即召开立宪会议!!!

如果不是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使我得到教训，知道要把反对者的老实态度看作是罕有的例外，那我也许要把这种话叫做“梦话”了。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报纸上把我的演说叫做“梦话”。真是好极了，普列汉诺夫先生！但是请看看，你自己在论战中是怎样的愚蠢和笨拙。假使我讲了两个钟点的“梦话”，为什么几百个听众会听得下去呢？其次，为什么你的报纸竟用整栏篇幅来评论“梦

① 本选集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编者注

话”呢？这是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

比起叙述、解释和回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71、1872、1875年怎样谈论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无产阶级需要哪种国家来¹⁵，当然，喊叫、谩骂要容易得多。

从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大概不愿意回忆马克思主义了吧。

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8月4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叫做“臭尸”，我引用了她的话。而普列汉诺夫、哥登别尔格这班先生们“叫屈了”……为谁叫屈呢？为那些被叫做沙文主义者的德国沙文主义者叫屈！

可怜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已经神经错乱了。

载于1917年4月7日

《真理报》第26号

署名：尼·列宁

按报纸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4卷

第1—6页

论两个政权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我国革命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革命造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一事实是要首先认清的，否则就不能前进。对于旧“公式”，例如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要善于补充和修改，因为这些公式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而到具体实现时却有所不同。关于两个政权并存的问题，以前谁也没有想到，而且也不可能想到。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究竟是怎样的呢？就是除临时政府即资产阶级政府外，形成了另一个政府，即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政府还很软弱，处于萌芽状态，但确实存在，并且在日益成长。

后一个政府的阶级成分怎样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穿军服的农民）。这个政府的政治性质怎样呢？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这个政权直接依靠革命的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这完全不是欧美先进国家中常有的一般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政权。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不考虑这一点，可是全部实质正在这里。这个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它的基本标志就是：（1）政权的本源不是由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人民群众在各地从下面发起的直接行动，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直接的“夺取”；（2）用

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同人民对立的警察和军队；在这种政权下，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即武装的人民自己来维持；（3）官吏（即官僚）或者也由人民的直接政权代替，或者至少受人民的特别监督，成为由人民选举、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代表；使他们从领取资产阶级高额薪金的有“地位”的特权阶层，变为使用特种“工具”的工人，他们的报酬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

巴黎公社这一特别类型的国家的实质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之流（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之流（“中派”分子，即摇摆于沙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子）先生们，以及所有一切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¹²等等，都把这种实质忘掉了和歪曲了。

他们空话连篇，装聋作哑，推托逃避，千番百次地相互庆贺革命，但是不愿意想一想，工兵代表苏维埃究竟是什么。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明显的真理：既然这种苏维埃存在着，既然它们多少是一种政权，那在俄国也就存在着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

我特别强调“多少”这两个字。因为这还只是处在萌芽状态的政权。它自己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了公开的协议，做了许多实际的让步，把自己的阵地不断让给资产阶级。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因为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犯了“错误”呢？这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庸人才会这样想，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这样想的。原因在于无产者和农民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上述领袖们的“错误”，只在于他们采取小资产阶级立场，不去启发工人的意识，反而加以蒙蔽，不去打破小资产阶级幻想，反而加以鼓励，不去使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反而使这种影响加强起来。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同志也犯了这么多的错误，竟“简单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当马上推翻临时政府？

我的回答是：（1）应该推翻它，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寡头政府，不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它不会给人民和平、面包和充分的自由；（2）但是也不能马上推翻它，因为它同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同彼得格勒这样一个主要的苏维埃，成立了直接的和间接的、形式的和实际的协议；（3）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因为它依靠第二个政府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对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第二个政府是直接代表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比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更高更好的政府，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来，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

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现时既没有对群众施加暴力的事实，也就没有别的方法可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¹⁶，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反对空谈，反对依赖资产阶级。

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主义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创造了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我们要团结起来进行无产阶级的的工作；一定会有愈来愈多的无产者和贫苦农民转到我们方面来。因为实际生活将会日益打破“社会民主党人”，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社会革命党人”，更“纯粹的”小资产者等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

资产阶级主张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觉悟的工人主张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主张用启发无产阶级意识、使它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办法取得

单一政权，而不是用冒险行动取得政权。

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则摇摆不定，妨碍这种启发和教育无产阶级的工作。

这就是决定我们任务的实际阶级力量的对比。

1917年4月9日
《真理报》第28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4卷
第18—21页

论策略书

说 明

1917年4月4日在彼得格勒，我用论策略的题目先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做过一次报告。当时到会的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他们就要回到各地，因此我不能有任何的拖延。会议结束时，主席格·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全体到会同志向我提议，要我立刻在希望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再做一次报告。

要立刻再做一次报告，无论多么困难，但是既然我自己的同志和孟什维克都有这种要求，而他们又因归期在即，不能让我拖延，我也就没有权利推辞了。

在报告时，我把我那篇发表在1917年4月7日《真理报》¹⁷第二十六号上的提纲^①念了一遍。

无论我的提纲或是报告，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和《真理报》编辑部中间都引起了一些分歧。经过多次商谈，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把这些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这样，可以给将在1917年4月20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供一些材料。

^① 我把登在这一号《真理报》上的提纲连同简要注释附在这封信的后面。（见本卷第13—18页。——编者注）

为了执行这个展开讨论的决定，我就把下面的这些信发表出来，在这些信里，我不希望对问题作全面的研究，而只想指出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任务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几个主要论据。

第一封信 对时局的估计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¹⁸，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根据哪些确切肯定的客观事实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呢？

在登载于1917年3月21—22日《真理报》第十四和十五两号上的我的第一封《远方来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在我的提纲里，我指出“俄国目前时局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因此我认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口号或“当前任务”就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和全体人民的组织的奇迹，准备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取得胜利。”

《真理报》第15号)①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

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的阶级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新阶级即资产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喜欢把自己称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的喧嚷：难道我们不也是向来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同那些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②，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

① 见本卷第11页。——编者注

② 在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上。

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新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¹²等等革命护国派，他们反对走向公社，他们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分裂。

现在谁只是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就应当把他送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古董保管库去（可以叫做“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的方式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关于这些改变，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¹⁹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使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死教条的牺牲品。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才可能是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既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又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不要忘记，彼得格勒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的政府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因为无论警察、脱离人民的军队或是威风凛凛地站在人民头上的官吏，都不存在。这是事实。这种事实表现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的特征。这种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不是背诵一些早已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以便更清楚地说明它。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也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阶级吗？为什么这一阶层不能取得政权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

我的回答是：这完全可能。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自由地加入了第二政府即附属政府，自由地补充、发展和改善了这个政府。但是，他们又同样自由地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这种现象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且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可

笑的。

农民夺取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我不仅没有忘记这种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我在直接地确切地表述土地纲领时还估计到一种新现象，即贫雇农和富裕农民之间发生了更深刻的分裂。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农民会听从社会革命党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劝告；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转向护国主义，劝告人民等待召开立宪会议，虽然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①！

可能，农民会继续保持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协议，保持他们目前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同资产阶级成立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记了土地运动和土地纲领，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忘记了现实，同样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实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同农民成立协议的事实，用更确切的、少带法律性而多带经济和阶级意义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同农民实行阶级合作的事实。

只有这一事实不再成为事实，只有农民脱离了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这一点以后会专门谈到。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根据这个未来阶段的可能性，而忘记自己在农民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的现在所负的责任，他是会变成小

^① 为了使我的话不被人误解，我现在先说在前面，我绝对赞成雇农和农民苏维埃立刻夺取全部土地，但是，它们自己要严格遵守秩序和纪律，丝毫不要毁坏机器、建筑物和牲畜，无论如何不要破坏经济和粮食生产，而要加强生产，因为士兵需要加倍多的粮食，人民也不应当再挨饿。

资产者的。因为他在实际上是鼓动无产阶级去信任小资产阶级（“它，这个小资产阶级，这些农民，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就会同资产阶级分开”）。他只根据愉快而甜蜜的将来的“可能性”，即农民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而忘记了不愉快的现在，忘记了农民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目前还在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和李沃夫“陛下”的反对派²⁰的角色。

我们上面所假设的这种人，很象甜蜜蜜的路易·勃朗和软绵绵的考茨基派，决不象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²¹，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回事，而是另一回事。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俄国现在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李沃夫等人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末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

我绝对保证，在我的提纲中，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¹⁸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也正象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详细指出过的²²，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

基主义，充分保证由大多数人实行公开的、直接的、绝对的统治，而且只是根据这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我在提纲中非常肯定地说，必须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发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

愚昧无知的人或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可以高喊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谁只要愿意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些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不会而且绝对不会滚到布朗基主义的泥潭中去。这样做，也不会滚到无政府主义的泥潭中去，因为无政府主义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到无产阶级统治的过渡时期必需有国家和国家政权。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张在这个时期必需有国家，不过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国家不是寻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是没有常备军、没有同人民对立的警察、没有站在人民头上的官吏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统一报》¹³上拚命地叫喊无政府主义，这不过是再次证明他离开马克思主义罢了。我在《真理报》(第26号)上曾向普列汉诺夫挑战，要他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1872、1875年在国家问题上是怎样教导的^①，普列汉诺夫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只能是默不作答，只能象被激怒了的资产阶级那样咆哮一通。

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不懂马克思的国家学

① 见本卷第18页。——编者注

说。顺便提一下，还在他的论无政府主义的德文小册子²³里，就已经有这种不懂的萌芽了。

* * *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尤·加米涅夫同志在《真理报》第二十七号上的一篇短评中，是怎样表述他同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的“分歧”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更确切地了解这些提纲和观点。

加米涅夫同志写道：“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有两个很大的错误：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问题提得不正确。这样提问题是抽象地、简单地、单色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提问题，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谁这样提问题，谁现在只是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谁就无法了解极其复杂的至少是“两色”的现实。这是从理论上说。而在实践上，他就是束手无策地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投降。

实际上，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普通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这一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后一个“也是政府”，自己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己使自己依附于资产阶级政府。

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

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努力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

建立一个特别的、脱离资产阶级政府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是不能建筑在不可知的基础上的。

如果这样的专政还可能实现，那末，走向这种专政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立刻坚决地彻底地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开。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小资产阶级已不是偶然地而是不可避免地转向了沙文主义（=护国主义），“支持”资产阶级，依赖资产阶级，害怕离开资产阶级等等。

如果这个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夺取政权，但它不愿意夺取，那末应当怎样“推动”它去夺取政权呢？

只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分离出来，摆脱这些小资产者的畏缩心理，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团结起来，才能使小资产阶级觉得脚下发“烫”，不得不在一定条件下去夺取政权；甚至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也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赞成并赫泽、策烈铁里、社会革命党人和斯切克洛夫等人的统一政权和单一政权，因为这些人反正都是“护国派”！

谁现在就能迅速而彻底地使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开，谁在下述两种可能情况下都是正确地反映了运动的利益，一种情况是俄国还会出现一个特别的、独立的、不依赖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一种情况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永远（直至社会主义到来）摇摆于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

谁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个简单公式来行动，谁就似乎是担保小资产阶级一定能够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

谁就是在目前束手无策地向小资产阶级投降。

附带谈一下，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公式”，不妨回忆一下我在《两种策略》（1905年7月）中特别强调的一段话（《十二年来》第435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①

加米涅夫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到了1917年，还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过去。而实际上，这个专政的未来已经开始出现，因为雇佣工人和小业主的利益与政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分裂，并且是在“护国主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现在我来谈谈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非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公开警告过别人，反对过这种意见，我在提纲的第八条中公开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②

谁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谁就不会起来反对实行社会主义的直接任务，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俄国建立“公社国家”（按照巴黎公社类型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能“立刻”办到，因为这需要所有（或大多

① 见本选集第1卷第575—57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数) 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代表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的策略和政策的全部错误与害处。而我十分明确地声明过,我在这方面只“指望”“耐心的”说明(如果要实行“立刻”就能实行的转变,还用得着耐心吗?)!

加米涅夫同志有点“不耐烦”地挥舞着拳头,重复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偏见,似乎巴黎公社想“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惜的是公社把实行社会主义过于推迟了。公社的真实本质并不是资产者通常所寻求的那种东西,而是它创立了特殊类型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已经产生,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加米涅夫同志不去仔细考虑事实,考虑现存的苏维埃的意义,考虑苏维埃在类型上、社会政治性质上同巴黎公社国家的一致,他不去研究事实,却说我似乎在“指望”“立刻”就会实现的东西。很遗憾,他只是重复许多资产者的伎俩:对于迫切的、现实的、实际生活提出来的问题,如什么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是否高过议会制共和国,它是否更有益于人民,是否更民主,是否更有利于斗争(例如同缺粮作斗争)等等抛开不谈,只是注意“指望立刻转变”这种空洞的、好象科学的而实际上毫无内容的、大学教授式的死问题。

这是一个空洞的虚构的问题。我所“指望”的只是、纯粹是: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处理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粮食分配、改善士兵给养等等实际困难问题上,要比官吏和警察高明得多。

我深信,工兵代表苏维埃比议会制共和国会更快地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关于这两种类型国家的比较,在另一封信里还要详细谈到)。它们会更好、更实际地、更正确地决定应当实行哪些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应当怎样实行这些步骤。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今天,德国的地主和资产者正在采取这

种步骤来对付人民。明天，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获得全部国家政权，它就会更好地采取这种步骤来为人民谋福利。

什么东西迫使我们采取这种步骤呢？

是饥荒，经济破坏，即将临头的破产，战争的惨祸，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惨痛的创伤。

加米涅夫同志在他的短评的末尾声明：“在广泛的争论中，他希望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只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希望和一定要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党，而不变成共产党员宣传员的小团体，就只有采取他这种观点。”

我认为，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估计是非常错误的。加米涅夫同志把“群众的党”和“宣传员的小团体”对立起来。但是要知道，“群众”现在正好屈从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在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者能够抵抗“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同群众“在一起”，即屈从于共同的狂热，要更体面些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欧洲各交战国里，沙文主义者不也是借口要“同群众在一起”来为自己辩护吗？难道不应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为了把无产阶级的路线从“群众的”护国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解脱出来，宣传员的工作不正好是目前的工作吗？把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混在一起，不分析群众内部的阶级差别，这正是造成护国主义狂热的条件之一。轻蔑地谈论无产阶级路线的“宣传员的小团体”，恐怕不太妥当吧。

写于1917年4月8—13日

(21—26日)间

1917年4月“波涛”出版社

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4卷
第22—35页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

俄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有下列各种基本特征：

这次革命的阶级性

1. 仅仅代表一小撮操纵全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官吏)的农奴主-地主的旧沙皇政权已经打碎和废除,但是没有彻底摧毁。君主制还没有正式废除。罗曼诺夫匪帮还在进行恢复君主制的阴谋。农奴主-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还没有消灭。

2. 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已经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同那些在1906—1914年间非常热心地拥护暴君尼古拉和刽子手斯托雷平的公开君主派(如古契柯夫和其他一些比立宪民主党人⁴更右的政治家)缔结了同盟。李沃夫之流的资产阶级新政府,企图而且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皇室进行谈判,想使俄国的君主制复辟。这个政府在满口革命词句的掩护下,任命旧制度的拥护者担任国家要职。这个政府把国家机器

的全部机构(军队、警察、官吏)交给资产阶级,力求使这个机构的改革愈少愈好。群众的革命首创行动和人民的从下面夺取政权,是革命真正胜利的唯一保障,但是新政府已开始竭力加以阻挠。

直到现在,这个政府还没有指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对地主土地占有制这一农奴主沙皇制度的物质基础,它丝毫不去触动。对资本家的金融垄断组织,大银行,辛迪加和卡特尔等等的活动,它根本不想去调查、公布和监督。

新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最主要的部长位置(内务部、陆军部,即指挥军队、警察、官吏,指挥一切压迫群众的机关的司令部),都属于公开的君主派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拥护者。昨天被迫成为共和派的立宪民主党人,只得到一些不能直接指挥人民、对国家政权机关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位置。劳动派^①的代表和“也是社会主义者”的亚·克伦斯基,除了用响亮的词句使人民放松警惕和注意外,不起任何作用。

由于这一切,甚至在对内政策上,资产阶级新政府也不配享有无产阶级的丝毫信任,而无产阶级也不应当予以任何支持。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3. 由于客观条件,现在对外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是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勾结起来进行战争、瓜分资本主义赃物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政府。

新政府服从俄国资本及其强有力的保护者和主子即世界上最富裕的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违反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

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十分明确地表示出来的愿望，不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去停止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使各民族互相残杀的战斗。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包含掠夺内容（瓜分波斯，抢劫中国，抢劫土耳其，瓜分奥地利，夺取东普鲁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资本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它承认了沙皇政府缔结的这些条约；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使大俄罗斯民族腐化堕落，成为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

新政府承认了这些可耻的掠夺性条约以后，违反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各民族大多数人民明白提出的要求，不向各交战国提出立刻休战的建议。它只是用一些冠冕堂皇、有声有色、但是毫无内容的宣言和词句来敷衍了事，这样的宣言和词句在资产阶级的外交家口里，总是用来欺骗被压迫人民中轻信的和幼稚的群众。

4. 因此，在对外政策方面，新政府不仅不配享有丝毫信任，而且向它继续提出要求，要它表达俄国各族人民的和平意志，要它放弃兼并等等，实际上也只是欺骗人民，让人们抱着不能实现的希望，阻碍人民提高觉悟，间接使人民容忍战争继续下去；而决定这一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的，不是善良的愿望，而是进行战争的政府的阶级性质，这个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同俄、英、法等等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联系，以及这个阶级所实行的实际政策等等。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 和它的阶级意义

5. 我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就是在革命

胜利的最初几天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是说有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属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绝大多数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扫除了整个沙皇君主制度，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完全接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群众的直接力量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6. 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然得到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信任的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竟自愿把国家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自愿把首位让给临时政府，同它成立支持它的协议，而自己只是充当监视和监督立宪会议的召开（召开的日期，临时政府直到今天还没有宣布）的角色。

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使两个专政交错结合在一起：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种专政，就是说，是一种既不依靠法律、也不依靠预先表示出来的民意，而是依靠暴力夺取的政权，而且政权是由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夺取的）；另一个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兵代表苏维埃）。

毫无疑问，这种“交错”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现在，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正在各处拚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兵工代表苏维埃，好造成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期，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达到“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这种过渡的动荡局势的阶级意义（以及阶级原因）在于：我国革命也同其他一切革命一样，要求群众有高度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同时一下子就把众多的普通人卷进了运动的漩涡。

一切真正革命的、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和国家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急剧地增加起来。

俄国也是这样。俄国正在沸腾。十多年来在政治上沉睡不醒，一直受沙皇制度残酷压迫，替地主和厂主作苦工，因而在政治上萎靡不振的千百万群众，现在已经觉醒过来并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业主，小资产者，即站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那些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

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

小资产阶级过的生活是业主式的，不是无产阶级式的（指它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依赖资产阶级，在思想方式上也跟着资产阶级走。

对资本家即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就是俄国群众现时政治情况的特点，这就是在欧洲一个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以革命速度产生出来的现象。这就是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间成立“协议”的阶级根

源(我要强调指出,我所指的,与其说是形式上的协议,不如说是事实上的支持,默默达成的协议,以及轻信地不觉悟地让出政权);这种协议给了古契柯夫之流一块肥肉,给了他们真正的政权,而苏维埃所得到的只是克伦斯基之流的诺言、尊敬(暂时的)、恭维、空话、保证和奉承。

另一方面,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缺乏觉悟性和组织性,这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

一切民粹主义的政党,直到社会革命党¹²,一直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组委会派⁶(齐赫泽、策烈铁里等等)也是一样,非党的革命者(斯切克洛夫等)同样随波逐流,或者没有抵挡住、没有来得及抵挡住这种浪潮。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7.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人物,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实际情况的特点必然造成现时策略的特点。

这种特点提出了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酸醋和苦汁掺入革命民主词句的甜水中去”(这是我们党中央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昨天在彼得格勒全俄铁路职工代表大会上说的,这句话说得非常中肯)。要进行批评,指出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培养和团结觉悟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成员,使无产阶级从“普遍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中解脱出来。

似乎这“只是”一种宣传工作。其实这是最实际的革命工作,否则就不能推进革命,目前革命所以停顿,所以被空话阻塞和“裹

足不前”，并不是由于外界的阻碍，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使用暴力（古契柯夫暂时还只是这样威胁，说要用暴力来对付士兵群众），而是由于群众的不觉悟的轻信态度。

只有同这种不觉悟的轻信态度作斗争（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并且应当是用同志的态度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指出实际生活的经验等），我们才能从猖獗一时的革命空话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扬群众在当地大胆坚决的创造精神，促使他们自动实现、发展和巩固自由、民主以及全部土地归全民所有这一原则。

8. 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各个政府的经验创造了两种压制人民的方法。第一种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罗曼诺夫一世（刑棍尼古拉）和尼古拉二世（暴君尼古拉）已把这种屠杀方法全部表演给俄国人民看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被受过多次大革命和群众革命运动“教训的”英法资产阶级修饰得非常精巧。这就是欺骗，恭维，说空话，无数的许诺，小恩小惠，小处让步，大处不放等等。

俄国现时的特点就是从第一种方法极其迅速地转到第二种方法，从用暴力压迫人民转到恭维人民，用诺言欺骗人民。正象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一样。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把持着政权，维护资本的利润，为了俄国资本和英法资本的利益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时用空洞的诺言、堂皇的宣言、娓娓动听的声明来敷衍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这类“厨子”的高论；尽管这些“厨子”在那里不断地威胁、劝告、央求、恳请、要求、慷慨陈词……猫儿瓦西卡还是边听边吃²⁴。

这种轻信的不觉悟和不觉悟的轻信，必然会日益消失，特别是对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更是这样，因为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

位)教会他们不相信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应该”教导人民相信资产阶级。无产者应该教导人民不相信资产阶级。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9. “几乎把一切”都吞没了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它的最大最鲜明的表现要算是革命护国主义了。革命护国主义是俄国革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死敌。

谁在这一点上失足而不能自拔，谁就谈不上革命。不过群众的失足和领袖不同，因此，他们的解脱方法也不一样，他们是经过另一条发展道路、经过另一种方法求得解脱的。

革命护国主义一方面是群众受资产阶级欺骗的结果，是农民和一部分工人不觉悟的轻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因为小业主从兼并和银行利润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他们“神圣地”保卫着以屠杀其他民族来腐化大俄罗斯人的沙皇制度的传统。

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玩弄高尚的革命自豪感，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由于革命的这一阶段，由于古契柯夫一米留可夫之流的所谓共和国代替了沙皇制度，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在俄国方面就发生了变化。人民也就相信了（暂时地相信了）这种谎言，这多半由于旧的偏见，认为俄国的其他一切民族都是大俄罗斯人的某种私有财产或世袭领地。沙皇制度卑鄙地腐化大俄罗斯民族，使他们习惯于把其他各民族都看成是下等民族，“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流毒是不能一下子就消灭掉的。

我们要善于向群众说明，决定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的，不是某些人物、团体以至某些民族的“善良愿望”，而是进行战争的那个阶级的地位，那个阶级的政治（战争只是这一政治的继续），资本这一现代社会中主要经济力量的相互联系，国际资本的帝国主义性质，俄国在财政、银行、外交上对英法等国的依赖等等。要用群众易懂的话说明这个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谁也不能一下子就把它做得尽善尽美。

但是我们宣传的方向，确切些说，也就是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不管话说得多么漂亮，不管用怎样的“实际”理由来辩护，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都是贩卖社会主义，都是彻底背弃国际主义。

“打倒战争”的口号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估计到当前任务的特点，没有估计到必须用另一种方法去对待广大群众。我看，这个口号就同“打倒沙皇”的口号一样，“美好的当年”的蠢笨鼓动家曾简单直接地带着“打倒沙皇”的口号到农村去，结果挨了一顿打。革命护国主义群众是真心诚意的（不是指个人，而是指整个阶级说），也就是说，对他们所属的阶级（工人和贫农）来说，兼并和压迫别的民族确实是毫无所得。他们并不象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先生那样，明明知道不消灭资本统治就不能放弃兼并，还用漂亮的词句、无限的许诺，多不胜数的诺言来无耻地欺骗群众。

护国主义群众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平凡，他们说：“我并不愿意兼并，但是德国人‘压榨’我，因此我维护的是正义的事业，完全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利益。”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得到胜利，胜利也许不

会很快到来，但胜利是稳固可靠的。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10. 战争不是“凭愿望”就能结束的。单方面的决定不能结束战争。用一个护国派士兵的话说，“把刺刀插到地里”是不能结束战争的。

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协议”，全世界无产者的“发动”，各国人民的“意志”等等，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因为这些充满在护国派、半护国派、半国际主义派报纸论文中的词句，这些充满在无数的决议和宣言以及兵工代表苏维埃的决议中的词句，无非是小资产者的空洞的、幼稚的、善良的愿望而已。关于“表示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关于无产阶级轮流进行革命发动（俄国无产阶级发动完了，按“顺序”就应当是德国无产阶级）等等词句，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一切都是路易·勃朗主义^①，都是甜蜜的幻想，都是把“政治运动”当做儿戏，实际上重复着猫儿瓦西卡的寓言。

虽然战争确实只有利于资本家强盗，只会使他们发财致富，但战争并不是由资本家强盗的恶念造成的，战争是由半世纪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及其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求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平。

1917年二三月的俄国革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开端。这次革命走了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是只有走第二步，即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4—17页。——编者注。

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这将是在全世界“突破战线”——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无产阶级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的灾祸，给人类以持久和平的幸福。

俄国革命既然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也就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了这种“突破”资本“战线”的阵地。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新型国家

11. 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不为人们所了解的现象，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人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型的国家。

最完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权力属于议会；国家机器和管理机关象通常的情形一样，有常备军，警察，以及实际上从不撤换、拥有特权、站在人民头上的官吏。

但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革命时代，产生了一种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国家从某些方面来看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²⁵。这就是巴黎公社型的国家，它以人民自己的直接武装代替了脱离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巴黎公社的实质就在这里。资产阶级的著作家们曾谩骂和诽谤巴黎公社，错误地认为巴黎公社是打算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的。

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开始建立的正是这一类型的国家。这种新型的国家现在在我国已经出现了，这就是由全俄人民代表立宪会议或由苏维埃会议统一起来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

共和国。它的出现是由于千百万人民的主动，是由于人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动地创立民主制度，既不等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教授先生们拟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中的老学究和老顽固（如普列汉诺夫或考茨基之流先生们）放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一般的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必需有国家和国家政权。

与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之流先生们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上述时期需要的，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

巴黎公社型的国家和旧式国家的主要区别如下：

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回到君主制是非常容易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军队、警察、官吏等等一切压迫机器仍然原封未动。而公社和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则打碎并废除这架机器。

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的独立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至上地直接参加整个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工兵代表苏维埃则恰巧相反。

工兵代表苏维埃再造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马克思曾把这种国家叫做“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6①}。

常常有人反驳说：俄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实行”公社。这是农奴主的论调，农奴主曾经说：农民还没有准备好享受自由。凡是在经济现实中和大多数人民意识中还没有绝对成熟的改革，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维埃都不会“实行”，都不打算“实行”，而且也不应当

① 本选集中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均按列宁的俄译文译出，其中个别地方与原文稍有出入。——编者注

实行。经济破产和战争造成的危机愈厉害，就愈需要最完善的政治形式，才能更容易地医治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可怕的创伤。俄国人民的组织经验愈少，就愈应当坚决着手人民自己的组织建设，而不是专靠一批资产阶级政客和享有“肥缺”的官吏去做。

我们愈是迅速地抛弃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先生们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旧偏见，愈是热心帮助人民立刻在各地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把全部生活抓到苏维埃手里，李沃夫之流先生们愈是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则人民愈是容易选中（通过立宪会议，如果李沃夫老是不召开立宪会议，那就不通过它）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人民自己进行新的组织建设时，难免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而不断前进，总比等待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学教授来草拟关于召开立宪会议、关于永远奠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消灭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要好一些。

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并善于进行宣传，不仅无产者而且十分之九的农民也会起来反对恢复警察，反对从不撤换的、拥有特权的官吏，反对脱离人民的军队。新型国家的实质就在这里。

12. 用民兵代替警察，这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改革，现时在俄国大多数地方都已实现。我们应该向群众说明，在大多数普通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改革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资产阶级，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阶级，也总是恢复君主专制类型的那种脱离人民、受资产者指挥、惯于多方压迫人民的旧式警察。

不让警察恢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全民的民兵，把它和军队融合起来（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从十五岁到六十五岁（可以以此作为少年和老人参加的年龄标准）的男女公民，一律应当参加民兵。雇佣工人和仆人等等在民兵中服役时，资本家应当照发工资。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

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至于护理病人、照料孤儿、注意饮食卫生等等的“警察”职能，除非妇女有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平等，是根本不能完满实现的。

不让警察恢复；吸引全体人民的组织力量来建立人人要担任的民兵，——这就是无产阶级为保护、巩固和发展革命而应当给群众提出的任务。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13. 现在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俄国农村在最近是否会爆发强大的土地革命。我们不能知道，农民中近来确已加深的阶级分化，即一部分人成为雇农、雇佣工人和贫农（“半无产者”），另一部分人成为富农和中农（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究竟已达到怎样的深度。只有实际经验才会解决而且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为了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必须立即提出土地纲领，而且必须宣传那些立刻可以实现的实际措施。

我们应当要求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是说，把国内一切土地归国家中央政权所有。这个政权应该规定移民土地的数量等等，定出护林、改良土壤等等的法律，严禁土地所有者（国家）和承租者（农户）之间有任何中介行为（严禁土地转租）。但是管理土地和规定地方的占用土地条件，都应完全由各区域和各地方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而不应操在官僚的手里。

为了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和产量，为了发展合理化的大农场

和对它们实行社会监督，我们应当在农民委员会内部争取把各个没收来的地主庄园改组为大的模范农场，并由雇农代表苏维埃负责监督。

社会革命党人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词句和政策，特别是什么“消费”定额、“劳动”定额以及“土地社会化”等等空谈；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说明，在商品生产下的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生活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状况。

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必要立刻把农民代表苏维埃分开，它应当说明，必须组织单独的雇农代表苏维埃和单独的贫农（半无产者）代表苏维埃，或者至少要组织这种阶级地位的代表们举行单独的定期会议，作为一般农民代表苏维埃中的单独的党派。否则，民粹派所说的关于一般农民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甜言蜜语，就会成为富裕农民这一变相的资本家用来欺骗贫苦群众的护身符。

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工兵代表苏维埃进行着资产阶级自由派或纯粹官僚式的宣传，劝农民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不要夺取地主土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号召农民立刻自动地实行土地改革，并根据当地农民代表的决定立刻没收地主土地。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坚持增加食品生产，以供应前方士兵和城市，严禁损坏牲畜、工具、机器和建筑物等等。

14.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宣布并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合并或强迫划入版图的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完全自由。

如果不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

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

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的接近以至进一步的融合，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不是暴力，而仅仅是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自由的和兄弟般的联合。

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则各民族劳动群众自愿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强大。

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细规定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15. 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只有躲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把这个真理当做借口，替那种拖延不执行实际上完全成熟的迫切革命措施的政策进行辩护，而这些措施在战时往往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并且为了同日益逼近的经济总崩溃和饥荒作斗争，这些措施也是绝对必要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等于“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应当绝对坚持实行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予以实行。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无法医治战争的创伤，无法防止即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侵犯那些大发“战争”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高额利润。

社会主义国际的情况

16. 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正是在现时特别有力地提到了首要地位。

现在，只有懒汉才不拿国际主义起誓，连沙文主义护国派，连普列汉诺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连克伦斯基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刻不容缓地把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口头上的国际主义做一个鲜明、确切、肯定的对照。

向全世界工人发表毫无内容的宣言，空口担保自己忠于国际主义，企图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各交战国革命无产阶级发动的“顺序”，强要在各交战国社会党人之间订立关于革命斗争的“协议”，忙于召开各社会党代表大会进行和平运动，诸如此类等等，所有这些主张、企图或计划，无论它们的炮制者怎样真诚，但从客观意义来看，都只是一些空话，至多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善良愿望，只能作为沙文主义者欺骗群众的掩饰而已。在玩弄议会欺诈手段方面，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最圆滑、最老练的，他们早就打破了纪录，一方面高喊空前响亮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词句，同时又极其可耻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加入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内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公债（象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近来在俄国所做的那样），反对本国的革命斗争等等。

好心肠的人常常忘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残酷环境。这种环境决不容许空谈，这种环境嘲笑天真甜蜜的愿望。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

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²⁷。

在两年多的战争时期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三种派别;谁要是离开现实的基础,不承认这三种派别的存在,不对它们进行分析,不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派进行彻底斗争,他一定会软弱无力,束手无策,陷入错误。

三种派别如下:

(1)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首先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

这些人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各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先生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盖得、桑巴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²⁸和“拉布分子”(指“工党”²⁹的领袖),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和他的党,丹麦的斯陶宁格和他的党,美国的维克多·伯格及其他“保卫祖国派”等等。

(2)第二派即所谓“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国际主义者之间。

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从各方面“逼迫”政府,赞成坚决“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赞成各种各样有利于和平的运动,赞成不割地的和平等等,同时也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和平。“中派”赞成“统一”,反对分裂。

“中派”专讲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他们是那些客观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尊贵的地位等等）的工人阶层和集团，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帮助他们为瓜分资本主义赃物而斗争。

“中派”是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1914年的阶段转到新阶段的过渡现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级许多特别需要的宝贵的艺术，即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的艺术；自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辟了社会革命的纪元起，新阶段的到来在客观上是必然的。

“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中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1914年8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中派”就是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和国会中的所谓“工人或劳动友谊社”³⁰，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和一般的所谓“米诺利特”³¹（少数派），英国的菲利浦·斯诺顿、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³²的其他许多领袖以及一部分英国社会党³³的领袖，美国的莫利斯·希尔奎特等等，意大利的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等，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等，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组委会

派,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策烈铁里等等。

自然,个别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转到“中派”的立场,或者相反地从后一立场转到前一立场。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同样,虽然个别人可以从这一派别自由地转到另一派别,虽然有人力求融合各个派别,但政治派别是各不相同的。

(3)第三派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齐美尔瓦尔得左派”³⁴(我们把他们在1915年9月发表的宣言转载在附录内,使读者能够从原文来了解这一派别的产生)。

这一派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既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分裂,也同“中派”彻底分裂。他们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他们坚决反对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甜言蜜语(社会和平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梦想不打破资本的枷锁和统治而获得永久的和平),反对利用种种借口来否认因这次战争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适当的和及时的。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或“国际派”³⁵,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的最有名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的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后来,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出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因此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有几百个甚至几千

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起来。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本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列金、大卫之流）作无情的斗争，而且同本国的中派即同本国的齐赫泽、策烈铁里之流（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一百一十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统一”，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此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象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正确地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臭尸。

德国另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是不来梅的报纸《工人政治》³⁶。

在法国，最接近真正国际主义者的，有洛利欧和他的朋友们（而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以及在日内瓦出版《明日》杂志³⁷的法国人昂利·吉尔波。在英国，有《工联主义者报》³⁸和一部分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的党员（如威廉斯·罗素曾公开号召同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分裂），有苏格兰的国民教员社会主义者马克林，他因为从事反战的革命斗争，被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判处苦役；英国有几百个社会主义者都因这种罪名而被关入监牢。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机会主义“社会党”内那些从1917年1月开始出版《国际主义者报》的分子。³⁹在荷兰，有出版《论坛报》的“论坛派”⁴⁰（潘涅库克、海尔曼·果特、怀恩科普、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后者曾是齐美尔瓦尔得的中派，现在已转向我们）。在瑞典，有青年党或左派党⁴¹，党的领袖有林德哈根、土列·涅尔曼、卡尔逊、

斯特辽姆、泽·霍格伦，霍格伦曾在齐美尔瓦尔得亲自参加建立“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工作，现在因为进行反战的革命斗争，被捕入狱。在丹麦，有特利尔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退出了以斯陶宁格部长为首的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在保加利亚，有“紧密派”⁴²。在意大利，最接近国际主义的是党的书记康斯坦丁·拉查理和中央机关报《前进报》⁴³的编辑塞拉蒂。在波兰，有拉狄克、加涅茨基和其他团结在“边疆区委员会”中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此外还有罗莎·卢森堡、梯什卡和其他团结在“总委员会”⁴⁴中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们举出“全民投票”的理由（1917年1月）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作斗争，1917年2月11日，他们在特斯举行的社会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原则上革命的反战决议⁴⁵。在奥地利，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左派青年朋友，其中一部分人常在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内活动，现在最反动的奥地利政府已封闭这个俱乐部，并迫害勇敢地——虽然很鲁莽——刺杀了首相的弗·阿德勒；以及其他等等。

问题不在于色彩，就是左派中也有不同的色彩。问题在于派别。问题的全部实质就是：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们才是社会主义的整个将来，只有他们才是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腐化群众的人。

在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中，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一般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客观上是必然要起变化的。谁如果只是向资产阶级政府“要求”缔结和约或“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等等，他在实际上就是堕落到改良派的立场。因为战争问题在客观上只是革命问题。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从战争走向民主的非强制的和平，可以使各国人民从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老爷们亿万利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可以而且应当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但是不能陷入马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义去要求那些与帝国主义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和阶级斩断这些联系；而不斩断这些联系，用战争反对战争的一切议论都只是空洞的骗人的词句。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实际上的改良主义者，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帮凶。

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的破产 ——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17. 齐美尔瓦尔得国际一开始就站在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的主要缺点，它破产（因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了）的原因，就是同社会沙文主义、同以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等为首的海牙（荷兰）社会沙文主义旧国际完全分裂的问题上，在这样一个实际决定一切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动摇不定。

在我国还有人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得多数派就是考茨基派。这是一个不能不考虑到的基本事实，现在西欧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实。就连沙文主义者，德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海耳曼，即极端沙文主义的“开姆尼斯报纸”⁴⁶的编辑兼极端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钟声》杂志⁴⁷撰稿人的海耳曼（自然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热烈主

张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人)，也不得不在报刊上承认，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齐美尔瓦尔得多数派就是一个东西。

到1916年末和1917年初，这个事实已完全确定了。虽然昆塔尔宣言⁴⁸斥责了社会和平主义，但整个齐美尔瓦尔得右派，整个齐美尔瓦尔得多数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1917年1、2月中的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投票赞成社会党⁴⁹代表大会（1916年12月举行的）和“劳动总联合会”⁵⁰代表大会（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这次代表大会也是在1916年12月举行的）通过的和平主义的决议^①；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1916年12月17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自然不是偶然的）鼓吹民族主义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上。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罗伯特·格里姆，在1917年1月，同他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雷利希、弗吕格、古斯达夫·弥勒等）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1917年1、2月举行的各国齐美尔瓦尔得派的两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青年的国际组织的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年国际》⁵¹的编辑明岑堡，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参加“斯巴达克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尔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得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的能力是很大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发挥出象俄国工人阶级那样大的革命力量。但是能者应

^① 列宁曾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的第三篇中专门批判了这些决议，见本选集第2卷第909—914页。——编者注

当多劳。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得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得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得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延迟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活动了。

这就是我在上面一一提到的那些“真正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他们，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化群众的人。

如果以为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数量很少，那末就请每个俄国工人想一想，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前夜，俄国的觉悟的革命者多不多呢？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宣布”国际主义，而在于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不以希望订立协议和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来欺骗自己。只要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下去，国际间的往来就会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铁钳钳住。甚至被迫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附属政府的“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先生，在1917年4月，竟不准瑞士社会主义者，瑞士社会党书记，即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廷进入俄国，虽然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要到妻子的亲戚那里去，虽然他在里加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因而坐过俄国的监狱，在出狱时向沙皇政府缴纳过保释金，而现在他是想来取回这笔保释金的。既然“共和主义

者”米留可夫能够在1917年4月的俄国做出这种事来，那末资产阶级关于实现不割地的和平的种种诺言、词句和宣言等等究竟有什么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政府逮捕托洛茨基应当怎样解释呢？不让马尔托夫离开瑞士，想把他骗到英国，使他遭到同托洛茨基一样的命运，这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我们不要陷入幻想，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然事实证明，有人不但不准那些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离开斯德哥尔摩到我们这里来，甚至连他们的信也不准寄来（虽然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完全可以用最严密的手续来审查这些信件的），因此，“等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或会议，就无异是背叛国际主义。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成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害怕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议了，看到我们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了，看到我们现在也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的决议了，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信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

能者应当多劳。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的自由。我们不是用这种自由去宣传支持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革命护国主义”，而是要勇敢地、忠实地、本着无产阶级的和李卜克内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国际，这个国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种叛徒、同“中派”动摇分子是势不两立的。

18. 根据上述情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不可能统一的问题，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宁可象李卜克内西一样只剩下两个人，——这就是说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一起，——也不能有一分钟想同组委会派、同齐赫泽和策烈铁里统一；他们同《工人报》⁵²的波特列索夫结成联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赞成发行公债⁵³，他们已经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了。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

谁想帮助动摇者，自己首先应当不动摇。

我们党究竟应当用什么名称， 才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是 能帮助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19. 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党应该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自称的那样，叫做共产党。

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这个宣言有下面两个主要问题被社会民主党歪曲和背叛了：（1）工人无祖国，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2）第二国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过这一点⁵⁴。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的名称（社会民主）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一切国家的。

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领袖们，象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之流先生们，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了。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国家是必需的，但（正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象一般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象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生活和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虽然它还很软弱，还处在萌芽状态，这种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这已经是群众的实践问题而不只是领袖们的理论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由脱离人民的武装队伍来控制群众的。

我们这个正在诞生的新国家也是一种国家，因为我们需要武装队伍，需要最严格的秩序，需要用暴力来无情地镇压保皇派和古契柯夫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企图。

但是，我们这个正在诞生的新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俄国许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群众自己，就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拥有特权、实际上从不撤换的人。

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看一般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这种民主通过旧的君主制的管理机关、警察、军队和官吏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要向前看正在诞生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

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不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而且在1917年3月以后，它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使它成为“国家”的唯一政权，成为所有国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

现在的形势已和1871—1914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此外别无他法。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现在还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时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的利润腐化，巴黎公社已遭到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刚刚（1871年）获得胜利，半农奴制的俄国仍然沉睡不醒。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了解了当时国际形势，了解了要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们也应当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⁵⁵

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因此在客观上必然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全人类临近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使千千万万的人粗野和死亡。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畏缩地、不坚决地、不自

觉地、过分信任资产阶级地走头几步的时候，大多数的（这是真情，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正是这种用来影响群众的工具——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跑到“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被这些领袖弄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受了他们的欺骗。

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就让“许多”工人去真诚地理解社会民主党吧。现在已经是学会区别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领袖。

全世界的客观形势却是这样：我们党的旧名称便于人们欺骗群众，阻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一步骤上，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所看到的都是那些言论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领袖，而他们“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统一”，他们都拿着“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支票要求兑现……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会把我们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怕同社会国家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混淆起来，不怕同法兰西共和国激进社会党人这个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骗群众的最先进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党混淆起来呢？……“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革命中明天的任务，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把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把包围着无产者的那些“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一群对实际

事业的破坏都置之不理。

这种理由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苟且的理由。

我们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百万人卷进去、有千百亿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除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不能有真正民主的和平来结束这场战争。

可是我们又自己害怕自己。我们还舍不得脱掉这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肮脏的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

1917年4月10日于彼得格勒

跋

由于经济破坏和彼得堡各印刷厂停工，我这本小册子已经过时了。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4月10日写成的，今天已经是5月28日了，可是还没有出版！

小册子是当做一个行动纲领的草案写的，准备在我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⁵⁶召开以前，宣传我的一些观点。小册子曾经用打字机打了若干份，在会前和会上发给一些党员，也总算完成了它的一部分工作。现在，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会议已经开过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早已公布（见《士兵真理报》⁵⁷第13号增刊），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我的小册子往往也就是这些决议的草案。

现在我只希望，在研究这些决议时，小册子对阐明这些决议多少有些帮助。另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在第二十七页上我建议，留在齐美尔瓦尔得只是为了了解情况^①。代表会议没有同意我这个意见，因此我不得不对关于国际的决议投反对票。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代表会议犯了错误，事变的进程会很快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得，就是在（虽然这违反我们的本意）推迟第三国际的建立，我们不摆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的齐美尔瓦尔得这个沉重的包袱，就是间接地阻碍第三国际的建立。

① 见本卷第60页。——编者注

现在我们党的处境(在全世界所有工人党的面前)要求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现在除了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拖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得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立刻就能放手进行这项工作(同时,只要情况允许,还可以利用一下齐美尔瓦尔得)。

可是现在,由于代表会议的错误,我们只好消极地等待,至少要等到1917年7月5日(即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召开的日子;只要它不再来一次延期,就是万幸!它已经延期一次了……)58。

代表会议闭幕后,我党中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登在5月12日《真理报》第五十五号上。这项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决议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得同部长们去商量问题,我们就退出齐美尔瓦尔得^①。我希望,只要我一召开“左派分子”(即“第三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见本小册子第23—25页^②)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另一半错误也会很快地得到纠正。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917年5月6日成立的“联合内阁”59。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好象更是过时了。

其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一点也没有过时。它的一切论述都是以阶级分析为根据的,这种分析对交出六个部长给十个资本家部长做人质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来说,象火一样的可怕。既然小册子的一切论述是以阶级分析为根据的,它就没有过时,因为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加入内阁,只不过使彼得格勒苏维埃同资本家政府协议的形式稍微改变了一下,而我在小册子第八页上曾特别强调,“我所指的,与其说是形式上的协议,不如说是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4卷第35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5—57页。——编者注

事实上的支持”^①。

事情愈来愈清楚：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不过是资本家的人质，“革新了的”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根本不想而且也不会履行自己的漂亮诺言。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在政治上已经破产了，他们已成为资本家的帮手，实际扼杀革命。而克伦斯基则已堕落到对群众使用暴力的地步（参看小册子第9页：“古契柯夫还只是这样威胁，说要用暴力来对付群众”^②，而克伦斯基已经来实现这种威胁了……）⁶⁰。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已经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破产了。这一切，人民是会愈来愈清楚地看到的。

联合内阁只是我的小册子简要分析过的我国革命根本阶级矛盾发展中的过渡现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存在。不是后退到彻底的反革命，就是前进到把政权交给另外的阶级。在革命时期，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中，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

尼·列宁

1917年5月28日于彼得堡

1917年9月“波涛”出版社

第一次用单行本刊印

署名：尼·列宁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4卷

第36—69页

① 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2页。——编者注

战争与革命

(1917年5月14日〔27日〕的演讲)

最近期间，在一切报刊上，在每次人民会议上，常常提到了战争与革命的问题，看来，你们中间很多人，不仅对于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已经相当熟悉，而且已经感到有点厌烦了。我一直没有在本区党的会议或一般人民会议上讲过话，甚至也没有出席过这些会议，因此我很可能陷于重复，或者对你们特别感兴趣的方面谈得不够详细。

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我在群众大会和党的会议上，很注意人们对于战争问题的提法，我深信，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产生许多误会，是由于我们在分析战争问题的时候，往往使用着十分不同的语言。

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

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有可能同这种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碰在一起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我们尤其不能否认这一点的，是因为在欧洲革命史上，近百年来（一百二十五年至一百三十五年）除了有许多反动战争以外，还有革命战争，如法国的革命人民群众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欧洲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现时在西欧（最近期间也在我们俄国）最流行的一种欺骗群众的手段，就是靠引用革命战争的例子来愚弄群众。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必须弄清楚，该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不弄清楚这些，我们关于战争的一切谈论都是纯粹的空谈，都是字面上的和没有结果的争论。既然你们要我讲战争和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我要把这一方面详细地谈一谈。

大家知道，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⁶¹ 这句名言是著作家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之后不久，对战争史作了考察，从中得出了哲学教训后说的。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已经成为一切肯思考的人的思想。大约在八十年前，他就反对了这样一种庸俗鄙陋的偏见：似乎战争同有关政府和有关阶级的政治没有关系，似乎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把战争看做只不过是举行进攻，破坏和平，后来又把这种被破坏的和平恢复起来。相互厮杀而又言归于好！这就是还在几十年前就被驳倒的粗鄙的观点，实际上，只要对任何战争史稍微作过仔细研究，都可以驳倒这种观点。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

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即该国某个阶级在战时所推行的政治，必然是而且一定是它战前长时期在国内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十八世纪末，法国的革命市民和革命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国的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镇压了本国的君主和地主。革命阶级的这种政治不能不彻底动摇欧洲所有其他专制的、君主的、半封建的国家。而战争也是胜利了的法国革命阶级的政治的必然继续，在这种战争中欧洲的所有君主国结成了有名的联盟，用反革命的战争反对革命的法国。革命的法国人民不但当时在国内第一次表现出了几百年来没有过的革命毅力，而且在十八世纪末叶的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巨大革命创造精神。他们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我认为这个例子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现时资产阶级报刊的政论家根本忘记了的东西，他们利用还不觉悟的人民群众怀有偏见，愚昧无知，不懂得每个国家、每个阶级所发动的任何战争与它们战前的政治有着密切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联系，而愚弄这些人民群众。每个战前实行统治的阶级都保证用所谓的“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所以说是“所谓的”，是因为它们为了“和平地”统治殖民地而采用的那些镇压手段，未必能够称得上是和平的。

在欧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这种和平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欧洲的民族只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实现了对殖民地亿万居民的统治。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象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了解现代战争，首先必须对欧洲各国的全部政

治作一个总的观察。不应该抓往容易从社会现象联系中抽出来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个别例子和个别事实，因为相反的例子也是很容易举出来的。应该从欧洲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抓住这些国家整个制度的全部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种制度是怎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这次战争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不管是君主国的报纸还是共和国的报纸都一样——总是企图把与这次战争毫不相干的历史内容加到这次战争上。例如，现时在法兰西共和国使用得最普遍的一种手段，就是试图把法国现在进行的战争说成是1792年法国大革命战争的继续或类似那样的战争。现时最流行的一种欺骗法国人民群众、法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手段，就是把当时的“行话”和个别口号硬搬到我们这个时代来，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共和制的法国现在也还是为了维护本国的自由而反对君主制的。他们忘记了一个“小小”情况，就是1792年在法国进行战争的是一个革命阶级，它进行了空前未有的革命，依靠群众空前未有的英雄主义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君主制；后来它奋起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只是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当时法国的战争是法国革命阶级的政治的继续，这个阶级举行了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以空前未有的毅力镇压了本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并且为了继续这种政治，又进行了革命战争来反对联合起来的君主制的欧洲。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联盟，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它们几十年来的全部政治就是不断地进行经济竞争来统治全世界，扼杀弱小民族，保证银行资本获得三倍至十倍的利润，把全世界囊括

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内。这就是英国和德国的真正政治。这就是我要着重指出的。任何时候都必须强调这一点，如果忘记了它，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次战争，我们就会束手无策，就会被一切以谎言欺骗我们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牵着鼻子走。

我们必须研究和了解资本主义强国的两大集团（互相反对的英国集团和德国集团）在战前几十年间的全部的真正政治。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会忘记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且会根本无法了解这次战争，会被鼓吹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骗子米留可夫牵着鼻子走。我在前面提到的克劳塞维茨，早在八十年前就指出了米留可夫所使用的那种极为流行的手段，就嘲笑了这样一种观点：原来各民族和平共居，后来互相厮杀起来了！似乎真是这样！不把战争同有关国家、有关国家制度和有关阶级在战前的政治联系起来，难道能够说明战争吗？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是人们所经常忘记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不懂得它，十分之九的关于战争的谈论都成了空洞的对骂和无谓的争吵。我们说，如果你们不研究两个交战国集团几十年来的政治（避免抓住偶然现象和个别例子），如果你们不表明这次战争同战前政治的联系，你们就根本不能理解这个战争。

这种政治一再向我们表明，两个世界庞然大物即两个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不断地进行着经济竞争。一方面是英国，它控制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是世界上第一个富国，不过它创造这些财富，不单是靠本国工人的劳动，而主要是靠剥削广大的殖民地，靠英国银行拥有极大的力量。英国银行率领着其余一切银行，形成三、四、五个大银行集团，支配着几千亿卢布，而且这种支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已经使得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处在这个资本的魔掌之中，没有一块土地不被英国资本用千百条绳索缠住。到了十九

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个资本的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国家的界限，造成拥有空前之多的财富的大银行集团，通过这个银行网用几千亿卢布把全世界网罗了起来。这就是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情况，法国的一些著作家，例如现在被一些前社会党人（如有名的金融问题著作家里季斯）所把持的《人道报》⁶²的撰稿人还在战前几年就已写道：“法国是一个金融君主国，法国是一个金融寡头，法国是一个全世界的高利贷者。”

另一方面，同这个主要是英法集团对立的是另一个资本家集团，这个集团更加凶恶，更加蛮横。这个集团的资本家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已被占光了，但是他们采用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新方法，有了优良的技术和无比优越的组织，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这个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为一个机构，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这就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几十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只有它才给你们指出了正确解决战争问题的途径，才使你们了解到，这次战争也是在战争中互相厮杀的那些阶级的政治的产物，是两大集团的政治的产物，还在战前很久，它们就在世界各国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剥削网，从经济上把世界分割完毕。它们是一定要发生冲突的，因为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重新瓜分世界是不可避免的。

旧的分割是根据英国在几百年间打败了它先前的许多竞争者。从前同英国竞争的有称霸世界的荷兰，有进行了将近百年的争霸战的法国。英国仗着自己的经济力量，仗着自己商业资本的力量，通过长期战争，确立了举世无敌的世界霸权。后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掠夺者，1871年产生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强国，它的发展

比英国快得多。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一本经济史方面的书不承认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德国的发展特别迅速。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也就是年轻的和强大的掠夺者的迅速发展。它出现在欧洲列强联盟的面前，它说：“你们打垮了荷兰，击溃了法国，夺得了半个世界，请你们也给我们适当的一份吧。”“适当的一份”是什么意思呢？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在银行世界里，怎样来确定这一份呢？在那里，力量取决于银行的多少，这正象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报纸以纯粹美国式的直率态度、以纯粹美国式的无耻态度所讲的那样：“在欧洲，现在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要想称霸世界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是有的，我们要建立银行，我们将要称霸世界。”这是美国一家亿万富翁的指导性报纸的声明。我认为，美国这个高傲自大恬不知耻的亿万富翁说出来的这句厚颜无耻的话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资产阶级撒谎家的千百篇文章所包含的真理超过一千倍；那些撒谎家把这次战争说成是为了民族利益和民族问题而引起的战争，并散布诸如此类极其明显的谎言来推翻整个历史，抓住德国强盗袭击比利时这样个别的例子。当然这个事件是真实的。这个强盗集团确实空前野蛮地袭击了比利时，但是它所做的，同另一个强盗集团在昨天和今天用其他手段对其他民族所做的，并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在兼并问题（这个问题我原打算把它作为引起现代战争的经济关系史和外交关系史来简略地叙述一下）上争论时，我们总是忘记，这个问题通常就是这次战争发生的原因问题。这次战争是由于瓜分掠夺物引起的，通俗点说，就是两伙强盗分赃引起的。我们在兼并问题上争论时，还经常遇到一种手法，这种手法从科学方面来看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而从社会政论方面来看，则只能叫做卑劣的欺骗手段。你们问问俄国的沙文主义者或社会沙文主义

者，他们一定会把什么是德国的兼并这个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因为他们对这一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你们请他们给兼并下个总的定义，即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英国和俄国的定义，那他们决不会满足你们的请求。他们永远下不出这样一个定义！《言论报》⁶³（为了从理论进到实际问题）嘲笑我们的《真理报》¹⁷说：“这些真理派分子竟把库尔兰看做割地！同这些人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回答道：“好吧，请你们给兼并下一个定义吧，这个定义既适用于德国人，也适用于英国人和俄国人。我们再补充一句，或者是你们对此采取躲避态度，或者是我们立即就把你们揭穿。”^①于是《言论报》默不作声了。我们肯定地说，任何一家报纸，无论是随便说说应该保卫祖国的一般沙文主义者的报纸，还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报纸，从来都没有给兼并下过一个适用于德国和俄国即适用于作战的任何一方的定义。事实上它们不能下这样一个定义，因为这场战争正是兼并政治的继续，就是说，是进行战争的两个集团的资本主义掠夺和抢劫的继续。因此很清楚，这两个强盗中究竟哪一个先下手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请你们看看这两个集团几十年来的海军开支和陆军开支吧，请你们看看它们在大战前所进行的那些小的战争的历史吧；其所以说是“小的”，是因为在这些战争中欧洲人死得不多，而那些被他们摧残的、在他们看来不能算是人民（难道某些亚洲人和非洲人是人民吗？）的人民却死了好几十万人；他们对这些人民所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战争：这些人民手无寸铁，赤手空拳，被他们用机枪扫射。难道这是战争吗？这实质上不是战争，这是可以忘记的。看，他们就是这样来欺骗人民群众的。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4卷第15—16页。——编者注

这次战争是德国人和英国人在非洲、英国人和俄国人在波斯进行掠夺、屠杀整个民族、空前暴虐（我不知道他们之中谁的罪行更大）的政治的继续。由于互相争夺，德国资本家把英国人和俄国人看成自己的敌人。怎么，你们仗着你们有钱就强吗？可是我们比你们更强，因此我们也有这种“神圣的”掠夺权利。这就是战前几十年英德金融资本的真正历史。这就是俄德之间、俄英之间和德英之间的关系史。这就是了解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目前流行的那种关于战争爆发原因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欺人之谈。他们忘记了金融资本的历史，忘记了这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怎样成熟起来的历史，而把事情想象为：两个民族原来和平共居，后来一个进攻，一个实行自卫了。一切科学被置诸脑后了，银行被置诸脑后了，人民被征入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的农民被征入伍。须要自卫，这就是一切！要是这样来谈论问题，那就该彻底取缔一切报纸，烧毁一切书籍，禁止在报刊上谈论兼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这种兼并观点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们在兼并问题上不能讲出实话，因为俄、英、德三国历史上连年不断的残酷的流血战争都是由兼并引起的。自由主义者在波斯和非洲进行了残酷的战争，在印度鞭挞了政治犯，原因是他们敢于提出我们俄国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些要求。法国的殖民主义军队也压迫了各国人民。这就是以往的历史，这就是亘古未有的真正的掠夺史！这次战争正是这些阶级的这种政治的继续。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兼并问题上作不出象我们那样的答复来。我们的答复是：任何一个民族，不是根据本民族大多数人的自觉自愿，而是根据国王或政府的决定并入另一个民族，都是被兼并的民族，被掠夺的民族。放弃兼并就是使每个民族享有单独成立国家或自由结成联盟的权利。这样的答复，对于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觉悟的工人都是十分清楚的。

《土地和自由报》⁶⁴ 登载过几十个决议，其中每一个决议都有一种非常糟糕的答复：我们不愿意为统治其他民族而进行战争，我们要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所有工人和农民都是这样讲的。他们以此来表达工人和劳动者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以此来说明：如果进行战争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反对剥削者，那我们是拥护战争的。要是那样，我们也会拥护战争，而且不会有一个革命政党反对这种战争。这许多决议的起草人讲得不对，因为他们把问题想象为好象战争是由他们进行的。他们认为：我们是士兵，我们是工人，我们是农民，我们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决议起草人在一次群众大会后向我提出的问题：“干吗你们老是在谈论反对资本家呢？难道我是资本家吗？我们是工人，我们在捍卫自己的自由。”这话不对，因为你们是按照资本家政府的意志在作战，进行战争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如果是一个没有研究过政治、不懂得外交秘密和金融掠夺内幕（例如俄国和英国对波斯的压迫）的工人或农民，忘记了这个事实，天真地问道，“我作战，这与资本家何干呢？”那我不惊奇的。因为他不懂得战争同政府的联系，不知道进行战争的是政府，而他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他可以自称为革命人民，写出许多娓娓动听的决议，——这种情况在俄国很多，因为不久以前它才在俄国盛行起来。不久以前，临时政府发表了“革命”宣言。但是事情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比我们更有经验的一些民族，在资本家靠写“革命”宣言来欺骗群众方面，早就打破了世界纪录。如果把法兰西共和国成为支持沙皇制度的共和国以来的议会史拿来看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几十年来的议会史上，有几十个宣言都是用最漂亮的词句来掩盖最卑鄙的殖民主义政治和金融掠夺政治的。整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就是这种掠夺的历史。这就是此次战争产生的根源。这不是由于资本家居

心不良，也不是由于君主们推行了什么错误的政治。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不是的，这次战争是由大资本主义尤其是银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柏林的三四个银行和伦敦的五六个银行统治着全世界，霸占着一切资源，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金融政治，最后由于世界上再没有地盘可供自由争夺，于是它们在空前残酷的搏斗中冲突起来了。其结果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要放弃它所占有的殖民地。这样的问题在资本家的世界里是不能靠自觉自愿来解决的。这只能靠战争来解决。所以，责备这个或那个戴王冠的强盗是可笑的。这些戴王冠的强盗，他们是一丘之貉。同时，责备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资本家也是荒谬的。他们的罪过只在于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但他们是按照文明国家所全力维护的一切法律来这样做的。“我有充分的权利，我要购买股票。世界上一切法庭、一切警察、一切常备军、一切舰队都在保护我的买卖股票的神圣权利。”握有几万万卢布的银行建立起来，这些银行在全世界建立了银行掠夺网，它们在殊死的搏斗中冲突起来，这是谁的罪过呢？去找罪人吧！这里的罪过在于半世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摆脱这种情况，除了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和进行工人革命，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我们党从分析战争中得出的答案。所以我们说：极简单的兼并问题竟被弄得如此混乱，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竟如此撒谎，甚至可以说成似乎库尔兰不是俄国的割地。库尔兰和波兰已被俄、德、奥这三个戴王冠的强盗瓜分一百年了，他们各自抢了一块肥肉，不过俄国强盗当时强些，因而抢得多些。后来，参加瓜分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强盗的德国，成长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它说：让我们来重分吧！你们想保持原状吗？你们认为你们强些吗？那我们来较量较量吧！

这就是这次战争的起因。当然，“让我们来较量较量吧”这种

口号，仅仅是近十年来的掠夺政治即大银行的政治的反映。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兼并问题上，任何人都不会象我们那样，把任何一个工人和农民都能理解的简单的真情实况讲出来。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约问题竟被一切报刊无耻地弄得混乱不堪。你们说，我国的政府是革命政府，参加这个革命政府当部长的有民粹主义者、孟什维克这些准社会主义者。可是这些部长只是声明他们主张不割地的和平，却不说明不割地的和平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夺去德国的割地，保留自己的割地），既然如此，那你们的“革命”内阁，你们的关于不愿进行侵略战争（同时却使军队实行进攻）的宣言和声明，有什么价值呢？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手中有由暴君尼古拉用十足强盗手段缔结的条约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要是没有进行掠夺、没有读过科学书籍的工人和农民不知道，那是情有可原的，然而现在宣扬这个的是熟知这些条约内容的有教养的立宪民主党人⁴。这些条约是“秘密的”，但全世界的外交刊物都在谈论这些条约：“你获得海峡，你获得阿尔明尼亚，你获得加里西亚，你获得亚尔萨斯—洛林，你获得的里雅斯特，而我们则要彻底瓜分波斯。”德国资本家说：“如果你们不把我的殖民地连同利息归还我，我就要夺取埃及，我就要扼死欧洲人民。”股票这个东西没有利息是不行的。因此，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条约问题在一切资产阶级报纸上引起了大量的空前惊人的无耻的谎言。

请你们看看今天的《日报》⁶⁵。一位毫无布尔什维主义嫌疑的诚实的民主主义者沃多沃佐夫在报上声明说：我反对秘密条约，让我把同罗马尼亚缔结的条约讲出来吧。这个条约是有的，它的内容是，如果罗马尼亚站在盟国方面作战，它可以得到外国的很多领土。其他盟国缔结的一切条约都是如此。它们没有条约是不会去扼杀一切民族的。要想知道这些条约的内容，用不着去翻专门的

杂志，只要回忆一下经济史和外交史上的一些主要事实就够了。例如，奥地利几十年来向巴尔干进攻，在那里扼杀……它们在战争中冲突起来，原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个缘故，所以前任部长米留可夫和现任部长捷列申柯⁶⁶（前者参加的政府没有一个部长是社会主义者，后者参加的政府有许多部长是准社会主义者）对于人民群众愈来愈坚决地要求公布条约的呼声，只能作这样的声明：公布条约就是同盟国一刀两断。

是的，条约是不能公布的，因为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个匪帮。我们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申柯，不能公布条约。从这里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申柯不能公布条约，那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帮助资本家部长们继续进行战争。另一个结论是，既然资本家自己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打倒资本家。哪一个结论比较正确，请你们自己去决定，但是你们务必要考虑到后果。要是象民粹主义的部长和孟什维克的部长那样去推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政府说不能公布条约，那就应该发表新的宣言。当然纸张还没有贵到连新的宣言也不能写的地步。我们写出新的宣言，就要举行进攻。为什么呢？目的何在呢？谁来规定这些目的呢？现在士兵们正被召去执行同罗马尼亚和法国缔结的掠夺性条约。请你们把沃多沃佐夫这篇文章寄到前线，然后再抱怨说：这全是些布尔什维克，这个同罗马尼亚缔结的条约完全是布尔什维克臆想出来的。如果这样，那就不仅应该取缔《真理报》，把研究了历史的沃多沃佐夫赶跑，而且应该把米留可夫的一切非常危险的书籍全都销毁。请你们把这位“人民自由党”的领袖即前任外交部长的任何一本书打开看看。他的书都是好书。书中说的什么呢？说的是俄国“权利”占领海峡，占领阿尔明尼亚，占领加里西亚，占领东普鲁士。他把

一切都瓜分好了，甚至还附上了地图。不仅应当把写了革命文章的布尔什维克和沃多沃佐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而且应当把米留可夫的书籍全部销毁，因为把摘自他的书中的一切引文收集起来，寄到前线，就会发现，任何一个煽动性的传单都不能起那样大的煽动作用。

按照我今天讲话的计划，现在我来谈谈关于“革命护国主义”的问题。我想，在我荣幸地向你们做了上述报告以后，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讲得简短一些。

借口我们举行了革命，我们是革命人民，我们是革命民主派，用这种办法来掩盖战争，这就叫做“革命护国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举行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我们推翻了尼古拉。与推翻整个地主资本家阶级的革命相比，这个革命并不十分困难。革命以后是谁掌握了政权呢？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在欧洲早就掌握了政权。欧洲还在百年以前就发生了这种革命，在那里，捷列申柯之流、米留可夫之流、柯诺瓦洛夫⁶⁷之流早就掌握了政权，至于他们是否向本国皇帝交纳皇室费⁶⁸，或者是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奢侈品，那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无论在共和国或在君主国里，无论把大量资本投入租让企业没有，银行总归是银行，利润总归是利润。如果哪一个不驯服的国家胆敢不听从我们文明的资本，不让我们的资本在殖民地，在非洲和波斯设立这种美好的银行，如果哪些不驯服的民族不听我们文明银行的话，那我们就要象利亚霍夫⁶⁹在波斯那样，象法兰西“共和国”军队残暴地屠杀非洲人民那样，派遣我们的军队，让它们在那里建立文化、秩序和文明。这同样是“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是由不觉悟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他们看不见战争同政府的联系，不知道这种政治是由条约固定下来的。条约依然存在，银行依然存在，租让依然存在。尽

管在俄国政府中坐着他们那个阶级的优秀人物，但是世界大战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没有丝毫改变。新的“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是伟大的革命概念来掩饰卑鄙齷齪的条约所引起的肮脏的流血战争罢了。

俄国革命没有改变战争，但它造成了任何国家没有过的、西方大多数革命都没有过的组织。从前的大多数革命往往只限于产生一个象我国捷列申柯之流和柯诺瓦洛夫之流所组成的新政府，而国家仍然处于萎靡不振、混乱不堪的状态。俄国革命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是一个萌芽，表明俄国革命能够战胜战争。这个事实就是：在我国，除了一个由“准社会主义的”部长们组成的政府而外，即除了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实行进攻的政府，同英法资本勾结的政府而外，我们在全国内还有一个独立于这个政府之外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网。这就是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最后使命的革命。这就是西欧在同样的条件下不曾有过的革命。这就是真正不须要实行兼并的阶级的组织，这些阶级没有把几百万卢布投入银行，对于俄军上校利亚霍夫和英国自由主义大使是否合理瓜分波斯也不感觉兴趣。这个革命能够向前发展的保证就在这里，就在于：对兼并真正不感兴趣的那些阶级，尽管它们过分轻信资本家政府，尽管它们有“革命护国主义”这样极其糊涂的骗人思想，尽管这些阶级支持公债，支持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但是它们建立了一种代表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组织，这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在俄国很多地方，苏维埃的革命工作要比在彼得格勒进行得深入的多。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资本家的中央机关盘踞在彼得格勒。

昨天斯柯别列夫在演讲中说：我们要夺取全部利润，夺取百分之百的利润。这是吹牛，以部长的口气吹牛。如果你们看看今天的《言论报》，你们就会看到人们是怎样看他这句话的。那里写道：

“要知道这样就会造成饥饿和死亡，征收百分之百就等于征收全部！”斯柯别列夫部长比最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还激进。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最左的人，这是一种诬蔑。其实斯柯别列夫部长“左”得多。有人用最卑鄙的话骂我，说我主张把资本家剥得精光。至少叔尔根⁷⁰说过：“让布尔什维克把我们剥得精光吧！”请你们想想，竟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走到叔尔根公民跟前，要把他剥得精光。他倒可以振振有词地把斯柯别列夫部长责备一顿。我们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得这样过分。我们从来没有主张夺取百分之百的利润。但是这种诺言毕竟是可贵的。你们要是看看我们党的决议，就会看到，我们在那里以更有根据的形式提出了我今天提出的主张。这就是应该对银行实行监督，然后规定合理的所得税^①。如此而已！斯柯别列夫却主张从一个卢布上面征收一百个戈比。这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主张毫无共同之处。斯柯别列夫简直是在吹牛。他并不准备认真实行，即使他打算实行，也实行不了，原因很简单，他既然同捷列申柯和柯诺瓦洛夫很有交情，要许下夺取全部利润的诺言，未免有点可笑。从百万富翁身上夺取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收入是可以的，但只是不能依靠这样的部长。要是政权掌握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那是真可以做到的，但也不需要夺取全部利润。苏维埃会夺取大部分收入。别的国家政权是不能这样做的。从斯柯别列夫部长方面说，可以怀着最美好的愿望。这些政党我已看了几十年，因为我投身革命运动已有三十年了。因此，我决不怀疑他们抱有善良的愿望。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不在于有善良的愿望。善良的愿望会把人引入地狱。现在部长先生们签署的公文已经堆满了所有办公室，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要是你们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4卷第279页。——编者注

想实行监督，你们就开始实行吧！我们的纲领就是这样，我们读了斯柯别列夫的演讲后只能说：再多的利润我们是不要的。我们比斯柯别列夫部长有节制得多。他主张实行监督，也主张夺取百分之百。我们不想夺取百分之百，我们要说的是：“只要你们不开始干，我们就不相信你们。”我们不相信任何空话和诺言，也不劝别人相信，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许多议会制共和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纸上的声明不可相信。如果你们想实行监督，就应该马上实行。只要有一天的时间，就能够颁布一项关于这种监督的法律。每个银行的职员委员会、每个工厂的工人委员会、每个政党都有进行监督的权利。可是有人对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是商业秘密，这是神圣的私有财产！好，两条道路随你们选择一条吧。假使你们要爱护这一切账簿，爱护托拉斯的一切业务，就用不着吹嘘什么监督，用不着说什么国家就要灭亡。

德国的情况更糟。在俄国可以弄到粮食，在德国简直就弄不到。在俄国可以依靠组织做很多事情。在德国什么也办不到。粮食再也没有了，全国人民的灭亡不可避免。现在有人说，俄国处于死亡的边缘。既然如此，那末，保存“神圣的”私有制度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我要问：监督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也许你们忘记了尼古拉·罗曼诺夫对于监督写过很多东西。你们可以从他那里找到很多关于监督的说法，如国家监督、社会监督、参议员的使命等。革命后的两个月内，工业家们掠夺了整个俄国。资本赚了百分之几百的利润，每个表报都谈到了这点。可是当工人们在这期间“大着胆子”讲出他们要象人那样生活的时候，全国资产阶级的刊物都咆哮起来了。每一号《言论报》都发出疯狂的叫嚣，说工人掠夺国家，而我们则是要实行监督来反对资本家。不能少来些诺言多来些行动吗？如果你们想实行官僚监督，想通过从前那样

的机构来实行监督，那我们党是决不支持你们的，虽然在你们的政府中有着不是半打而是一打民粹主义的和孟什维克的部长。监督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实行。你们应当建立监督机构，即银行职员委员会，工程师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而且明天就应当开始建立。要是这些机构中任何一个官员提供出不正确的情况，都必须受到刑事处分。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们想知道，我国现在有多少粮食，多少原料，多少劳动力，应该如何处置。

现在我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有人把一种荒谬的看法加在我们头上，说我们主张单独媾和。德国资本家强盗们在采取媾和步骤，它们说：如果你把矿山给我，我就把土耳其和阿尔明尼亚的一小块领土给你。看，每个中立城市的外交家们在讲些什么！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是用外交上的暗语掩盖着罢了。外交家所以存在，正是为了用外交语言说话。说我们主张靠单独媾和来结束战争，这是十分荒谬的！想靠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来结束这个由各个最富强的国家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结束这个由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引起的战争，这种想法十分愚蠢，甚至加以反驳都是可笑的。我们专门写了决议来加以反驳，那是由于这和广大群众有关，有人在他们面前诬蔑我们。但今天要来认真地说明这点是没有必要的。各国资本家进行的战争，只有靠反对资本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只要监督没有由空谈变为事实，只要资本家的政府没有被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府代替，这个政府就只有叫喊：我们就要灭亡了，我们就要灭亡了，我们就要灭亡了。现时在“自由的”英国监禁着许多社会主义者，原因是他们讲着我所讲的话。在德国拘留着李卜克内西，原因是他讲了我所讲的话。在奥地利拘留着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大概他现在已经处死刑了），原因是他通过手枪讲了我所讲的话。全世界工人的同

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一边，而不是在那些投靠本国资本家的社会主义者一边。工人革命在全世界发展起来。当然，在其他的国家里，它会困难些。因为那里没有象尼古拉和拉斯普庭²那样的疯子，那里掌握政权的是他们那个阶级的优秀人物，那里没有进行反对专制的革命的条件，那里已经存在着资本家阶级的政府。这个阶级的卓越代表早就在那里实行统治。那里的革命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它必然要到来，尽管许多革命家牺牲了，尽管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会牺牲，尽管卡尔·李卜克内西会牺牲，但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全世界的工人是拥护他们的。全世界的工人一定要胜利。

关于美国参战一事，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有人动不动就说，美国有民主，美国有白宫。我说，美国推翻奴隶制是半世纪以前的事情。美国解放奴隶的战争在1865年就结束了。从那时起美国的亿万富翁就成长起来了。他们把整个美国控制在自己的金融魔掌之中，准备扼死墨西哥，而且必然要同日本展开太平洋的争霸战。这场战争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一切文献都谈到了这点。美国参战的真正目的就是准备将来同日本作战。美国人民毕竟享有较多的自由，因此很难设想，他们能够忍受强迫的义务兵役，能够忍受建立一支进行侵略、对日作战的军队。美国人会从欧洲的例子看到这将造成什么后果。因此，美国资本家需要干预这个战争，以便找到借口，用保护弱小民族的权利这个崇高理想做幌子，来建立强大的常备军。

农民拒绝把粮食卖成货币，他们需要的是农具、鞋子和衣服。这个决心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的确，俄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也出现了（虽然不太厉害）其他国家早就存在的现象：货币失去了自己的效力。整个事变进程把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到了这种程度，使得农民连货币都不要了。他们说：“我们

要货币干什么？”他们讲得很对。资本主义的统治遭到破坏，并不是由于谁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荒谬的。如果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束，那是无法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战争加速了这个过程，使得资本主义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历史不冲垮和摧毁资本主义，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它。

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个农民说出了大家看到的事实：货币的权力破坏了。在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农民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用农具、鞋子和衣服换取粮食。这就是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就是现实生活所提示的答案。不这样，千百万人民就要忍饥挨饿，裸体光脚。现在千百万人民面临着死亡，根本顾不到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使全部政权转到代表大多数人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这样做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是谁也没有断言，这样困难的事一下子就能办好。我们根本没有这样说过。有人说，我们想使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可是苏维埃不愿意取得政权。我们说，实际生活的经验将向苏维埃表明，而且全国人民也将看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我们不想“夺取”政权，因为革命的全部经验教导我们，不依靠大多数人的政权是不巩固的。“夺取”政权将是一种冒险行为，所以我们的党不会这样做。如果政府将来成为大多数人的政府时，它可能会实行一种在初期看来是错误的政策，然而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那时政治方向的和平转变仍然在原来的组织中进行。不能臆想出别的什么组织来。因此我们说，不能设想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怎样结束战争呢？如果工兵代表苏维埃取得了政权，而德国人还在继续进行战争，那我们怎么办呢？凡是关心我们党的观点的人，可以看看最近几天的《真理报》，在那里，我们确切地引用了我们1915年在国外就讲过的话：如果俄国的革命阶级——工人阶

级掌握了政权，它一定要提议媾和。如果德国的资本家或任何别的国家的资本家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那时我国工人阶级就将一致奋起进行战争^①。我们不认为能够一举而结束战争。我们并不许下这种诺言。我们不宣传按照一方面的意志来结束战争，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许下这种诺言是容易的。但是无法实现。要想轻而易举地摆脱这个可怕的战争是不可能的。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你们或者再打十年，或者去进行艰难困苦的革命。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我们说，各资本家政府发动的战争只有靠工人革命才能结束。1912年世界各社会主义政党在巴塞尔一致通过了一个宣言⁵，后来我们把这个宣言登在我们的《真理报》上，但是任何一个交战国，无论是“自由的”英国，或是共和制的法国，至今都没有把这个宣言公布出来，原因是它在战前就讲出了关于战争的真情实况；关心社会主义运动的人，去读读这个巴塞尔宣言吧。那里说，由于资本家的竞争，英国和德国之间将要爆发战争。那里说，火药已经装得很满，枪就要自动发射了。那里还写着战争将要由于什么原因而爆发，战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而又投奔本国资本家政府的社会主义者，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发生了分裂：一些人当了部长，另一些人被关进了监狱，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宣传准备战争，另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如美国的倍倍尔——在美国工人中有很高威信的尤·德布兹则说：“让他们赶快把我枪毙吧，我是不会拿出分文来支持这个战争的。我要进行的战争只能是无产阶级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就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分裂的情况。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在保卫祖国。他们错了，他们是在保卫一小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3页。——编者注

撮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另一小撮资本家。我们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唯一正确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有几十个人已走上了断头台，有成百成千的人已被关进了监狱。这些坐牢的社会主义者是少数，但工人阶级拥护他们，整个的经济发展拥护他们。这一切向我们说明，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个战争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目前我们应当准备这种革命，援助这种革命。俄国人民尽管痛恨战争，渴望和平，可是当沙皇还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们要反对战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准备革命来反对沙皇和推翻沙皇。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昨天的历史向你们证实了这一点，明天的历史也将向你们证实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应当援助日益高涨的俄国革命。这是在1914年末说的。因为这一点，我们的杜马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⁷¹，可是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给答复。你们老谈革命，可是罢工停止了，杜马代表做苦工了，一种报纸也没有了！”有人就是这样责备我们躲避答复的。同志们，这种责备我们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们曾经回答说：你们可以愤愤不平，但是只要沙皇没有被推翻，是没有任何办法来反对战争的。我们的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虽然还没有完全证实，但已开始得到证实。革命已开始从俄国方面改变战争了。资本家们还在继续进行战争，我们说：只要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没有到来，战争就不会停止，因为要进行这场战争的人还掌握着政权。有人对我们说：“在许多国家中，一切处于睡眠状态。在德国，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拥护战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反对战争。”我回答说：这一个李卜克内西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全国人民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寄托在拥护他的人们身上，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你们不相信吗？你们就继续进行战争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你们不相信李卜克内西，不相信工人革命，不相信革命正在成熟，你们

就相信资本家吧！

除了几个国家的工人革命以外，谁也不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战争不是儿戏，而是空前严重的大事，战争使千百万人遭受牺牲，要结束它不是那样容易。

前线的士兵不能够把前线同国家分离开来而独自行动。前线的士兵是国家的一部分。只要国家在作战，前线就要受苦受难。这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战争是统治阶级掀起的，要结束它只有靠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否很快得到和平，完全决定于革命的发展。有人把事情说得很好听，有人说让我们马上来结束战争吧，不管他们怎样说，没有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当政权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里的时候，资本家们一定要反对我们；日本要反对，法国要反对，英国也要反对，各国政府都要反对。反对我们的是资本家，拥护我们的是工人。那时资本家发动的战争就要结束了。这就是我对如何结束战争这一问题的答复。

第一次载于1929年4月23日
《真理报》第93号

按速记记录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4卷
第367—390页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⁷²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1. 一切地主的和私有的土地, 以及皇族和教堂等等的土地, 都应该立刻无偿地交给人民。

2. 农民应该通过农民代表苏维埃立刻有组织地夺取当地的全部土地, 从经济上加以支配, 这丝毫不妨碍立宪会议或全俄苏维埃会议(如果人民把中央政权交给它的话)将来对土地制度做最后的决定。

3. 土地私有制应该根本废除, 即全部土地应该归全体人民所有。土地应该由地方民主机关来支配。

4. 农民应该摒弃资本家、地主和他们的临时政府的意见, 不要同当地地主达成“协议”, 立刻支配土地; 全部土地的支配应该由当地多数农民的组织的决议来确定, 而不能由多数人(农民)同少数人, 而且是极少数人(即地主)协商确定。

5. 地主和资本家现在和将来都会用种种办法反对把全部地主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资本家不仅拥有巨大的金钱势力, 而且能通过报纸, 通过许多习惯于资本统治的官吏、职员等等, 来影响目前还愚昧无知的群众。因此, 不消除农民群众对资本家的信任, 不建立起农民同城市工人的紧密联盟, 不把整个政权完全交给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全部地主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的事业就不能彻底实现, 就不能巩固。只有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掌握国家政权, 只

有不依靠警察、官吏和脱离人民的常备军而依靠工农都参加的武装民兵来管理国家，才能保证实现全体农民所要求的上述的土地革命。

6. 农业雇佣工人和贫农，即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而靠出卖部分劳动来取得生活资料的农民，应该尽一切力量单独成立苏维埃，或者在全体农民苏维埃中成立特别小组，以便与那些必然想同地主资本家勾结的富农进行斗争，捍卫本身的利益。

7. 由于战争的缘故，俄国同一切交战国及许多中立国（非交战国）一样，因缺乏劳动力和煤铁等而遭到经济破坏、灾难和饥饿的威胁。只有由工农代表监督和领导全部生产和分配，才能挽救祖国。因此，农民代表苏维埃现在必须同工人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以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换取农具、鞋子、衣服和其它物品，不要通过资本家，不要让资本家管理工厂。因此，应该鼓励把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交给农民委员会共同使用。同样，应该鼓励根据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在农艺师指导下把每个大的地主庄园建成用优良农具共同耕种的模范农场。

写于1917年5月17日(30日)前

第一次载于1917年“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土地问题资料》小册子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4卷
第445—446页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演说

(1917年6月4日〔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第一次代表大会⁷³上)

同志们，在给我的短短的时间里，我只能谈一谈执行委员会报告人和随后几个发言人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我想这样好一些。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出席的是什么会议，现在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的苏维埃是怎么一回事，人们为了掩盖自己对革命民主制的毫不了解和对它的完全背弃，就在这里大谈特谈的革命民主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论革命民主制，但是抹杀这个组织的性质、阶级成分和它在革命中的作用，对这些问题一字不提，同时却以民主派自居，真是怪事。他们把西欧所有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纲领给我们描述了一番，把现在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府（我国政府也在内）都承认的改革纲领给我们描述了一番，同时却又对我们谈革命民主制。他们是在什么人面前说这些话呢？是在苏维埃面前。那我就来问问你们，在欧洲哪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有这种多少有点象苏维埃的机关呢？你们一定会回答说：没有。这种机关任何地方都没有，也不可能，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产阶级政府，以及刚才向我们描述的、在所有国家里都提过几十次但仍然是一纸空文的改良“计划”，或者是人们现在都向它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机

关，革命创造出来的新型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只是在革命巨大高潮的年代有过先例，例如1792年和1871年在法国、1905年在俄国。苏维埃，这是任何一个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都没有的机关，而且决不可能与资产阶级政府同时存在。这是我们在党的决议中把它叫做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那种更民主的新型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唯一的政权是属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如果认为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认为可以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或者想用现在有某种机关正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存在的事实来支吾搪塞，那都是徒劳无益的。不错，它们是同时存在的。但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才发生了空前多的误会、冲突和摩擦。正是由于这种情形，俄国革命在第一次高涨、第一次前进之后发生了停滞，发生了现时在我国联合政府⁵⁹中、在一切对内对外政策中因准备帝国主义的进攻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倒退现象。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成立通常的资产阶级政府，这样就不需要农民、工人、士兵等等的苏维埃了，苏维埃不是被那些手里有军队、丝毫不顾克伦斯基部长演说的反革命将军解散，便是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些机关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不能后退，也不能停在原地，只有前进才能生存。这种国家形式不是俄国人空想出来的，而是革命创造出来的，因为没有它，革命便不能胜利。在全俄苏维埃内部，各政党间必然会发生摩擦和争夺权力的斗争。但是各种可能产生的错误和幻想是要由群众根据亲身政治经验来消除的（喧声），而不是部长们做做报告，根据他们昨天说的、明天写的、后天要许诺的就能消除的。同志们，从俄国革命创立的、现在能不能存在还成问题的机关看来，这是很可笑的。苏维埃不能够按照现在的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工人和农民又不是小孩子，竟要开会通过那些没有任何根据的决议，听那些没有任何根据的报告！这样的

机关是向一种新型的共和国过渡的机关，这种共和国将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的没有警察和常备军的坚强政权，这样的政权在西欧还不能存在，而俄国革命没有这种政权就不能取得胜利，就不能战胜地主和帝国主义。

没有这样的政权，就谈不到我们自己会取得这样的胜利，并且愈深入地研究人们在这里向我们建议的纲领和我们面临的事实，二者之间的基本矛盾就愈清楚地显现出来。象报告人和其他发言的人所说的一样，人们都说第一次成立的临时政府真糟糕！以前布尔什维克，命运多乖的布尔什维克说“不给这个政府任何支持和信任”的时候，人们纷纷责骂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大家都说以前的政府很糟糕，可是由准社会主义者当部长的联合政府又怎样呢？它和以前的政府有什么区别呢？难道空谈纲领、草案还谈得不够吗？难道还不到实行的时候吗？从5月6日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请大家看看事实，看看俄国和所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经济破坏的情形吧。怎么会发生经济破坏呢？这是资本家的掠夺造成的。这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这是报纸上公开承认的事实，而且并不是我们的报纸，并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老天在上，而是内阁派的《工人报》⁷⁴。这个报纸上说：“革命”政府提高了煤炭的工业价格！！联合政府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有人说，俄国是否可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立刻全面地进行根本的改造。同志们，这些都是空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正象他们经常阐述的那样：“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¹⁸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不可能向纯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只有某种中间的、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因为几百万人卷入了资本家之间的罪恶战争，他们正处在生死的关头。问题不在于答应进行一些改革——

这是空话——问题在于去做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想拿“革命的”民主制做借口，那就请把这个概念同资本家内阁的改良主义民主制清楚地区别开来，因为现在应当抛掉“革命民主制”的空谈，不再拿“革命民主制”来互相庆贺，现在应该是按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科学社会主义教导我们的那样来作阶级评价的时候了。人们建议我们实行资本家内阁的改良主义民主制。也许从西欧通常的范例来看，这很好。可是，现在许多国家处在灭亡的前夕，那些实际的办法似乎正象上面发言的邮电部长先生所说的那样，复杂得简直难于实行，必须特别加以研究，——其实这些办法是十分清楚的。他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夺取全部政权。我回答说：“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一样，它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掌声，笑声）你们尽可以随便发笑，但是，如果部长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把我们和右派政党相提并论，那他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答。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一点。在还有自由的时候，在逮捕和流放西伯利亚等等威胁——这些威胁来自同我们的准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共事的反革命分子——还只是威胁的时候，任何一个政党都会说：相信我们吧，我们会拿出我们的纲领的。

我们的代表会议⁵⁶在4月29日已经提出这个纲领⁷⁵。可惜人们不重视这个纲领，不按这个纲领去做。看来需要对这个纲领作一番通俗的解释。现在我竭力把我们的决议、我们的纲领向邮电部长先生作一番通俗的解释。我们纲领中关于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要求立刻——不要拖延——公布资本家所获得的高达百分之五百至八百的骇人听闻的利润。他们的这些利润并不象“纯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那样是在自由市场上获得的，而是靠军事订货获得的。这才是真正需要而且可能实行工人监督的地方。

这就是你们这些自称为“革命”民主派的人应该代表苏维埃实行的办法，而且可以立刻实行。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让人民看清什么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什么是玩弄帝国主义的把戏，玩弄人民财产、玩弄几十万人生命的行为。这几十万人明天就会因我们继续扼杀希腊而丧命的。把资本家老爷们的利润公布出来吧，逮捕五十至一百个最大的百万富翁。哪怕是软禁尼古拉·罗曼诺夫的优待条件拘留他们几个星期也行，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迫使他们说出各种线索、骗人的把戏、卑鄙齷齪自私自利的勾当，这些东西使我国甚至在新政府管理下每天也得损失千千万万的财富。这就是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的基本原因，因此我们说：我国一切都是老样子，联合内阁并没有改变什么东西，只是多了一大堆宣言和动听的声明而已。不管人们多么诚恳，不管他们多么诚恳地希望劳动者过好日子，但是情况并没有改变，掌握政权的仍旧是原来那个阶级。现在实行的政治并不是民主政治。

有人对我们说，要使“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民主化”。难道你们真不知道这些话只有对俄国才是新鲜的吗？在其他国家不是已经有几十个准社会主义者部长向全国许过这样的诺言了吗？我们面前摆着活生生的具体事实：地方居民选举政权机关，而中央却硬要指定或批准地方政权机关的人选，这样来破坏起码的民主，试问这些诺言还有什么意义呢？资本家还在盗窃人民的财产。帝国主义战争还在进行。而有人却答应我们改革，改革，改革，这些改革在现在这个范围内根本不能实现，因为战争压倒一切，决定一切。有人说，战争并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你们为什么不同意这种说法呢？标准何在呢？这首先在于哪一个阶级当权，哪一个阶级继续做主，哪一个阶级继续利用银行业务和财政业务榨取几千亿的利润。这个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因此战争仍然是帝国主

义战争。第一次成立的临时政府也好，由准社会主义者担任部长的政府也好，都没有改变任何东西：秘密条约还是秘密条约，俄国还是为争夺海峡而战，为继续贯彻利亚霍夫对波斯的政策⁶⁹等等而战。

我知道，你们不希望这样做，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样做，部长们也不希望这样做，因为决不会希望去做这种杀害几万万条人命的事情。可是让我们看一看米留可夫和马克拉柯夫之流现在大谈特谈的进攻吧。他们完全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这同政权问题、革命问题有关。有人说，应该把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别开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可笑的。立宪民主党人⁴明明知道现在摆着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至于说从下面发动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可能导致单独媾和的结局，这是诬蔑。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我们要实行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逮捕资本巨头，斩断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一切线索。否则，说多少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也都是空话。我们所要实行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撇开各国政府，向各国人民宣布：我们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强盗，不论是捷列申柯⁶⁶——捷列申柯丝毫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过比他稍微蠢些，——还是法国的、英国的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本家。

你们自己的《消息报》⁷⁶弄糊涂了，说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而提议保持原状。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不割地”的和平的。甚至农民代表大会⁷²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接近真理，它谈到了要建立“联邦”共和国，这就是说，俄罗斯共和国不愿意用新的或旧的方式压迫任何一个民族，不愿意用暴力强迫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芬兰或乌克兰，都要与它同居共处，而陆军部长却向芬兰和乌克兰百般挑衅，造成不能容许的冲突。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有坚强政权

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共和国，但是这个坚强的政权是要各民族人民自愿才能建立起来的。“革命民主制”是庄严的字眼，可是被人用在以卑鄙的挑衅手段使乌克兰和芬兰问题复杂化的政府身上了！其实乌克兰和芬兰并不愿意分离，只不过是说，不要把起码的民主拖延到立宪会议召开时才实行罢了。

只要你们不放弃自己的割地，就不能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要知道，这是很可笑的，这是一种把戏，欧洲每个工人都会嘲笑说：他们口头上说得很漂亮，号召各国人民打倒银行家，而自己却把本国银行家送进内阁去。逮捕银行家，拆穿他们的把戏，查出各种线索，这些事情你们都没有做，尽管你们拥有不容抗拒的权力机关。你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你们知道，革命是不能预定的，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通过流血起义的艰苦道路干起来的，而在俄国没有一个团体、一个阶级能够同苏维埃政权抗衡。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这个革命如果立刻同一切资本家阶级决裂，立刻向各国人民提议和平，那末在极短时期内就会得到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赞同，因为这些国家快要灭亡了，因为德国已经陷于绝境而不能自拔，因为法国……

（主席说：“您发言的时间到了。”）

再有半分钟我就讲完了……（喧声，会场上有人请求继续讲下去，有人反对，有人鼓掌。）

（主席说：“我向大会征求意见，主席团建议延长发言时间，谁反对？大多数赞成延长。”）

我刚才谈到，假如俄国的革命民主派不是口头上的民主派，而是真正的民主派，那它就会推动革命前进，而不是同资本家妥协，不是空谈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而是取消俄国自己的割地，并且公开宣布，它认为任何兼并都是犯罪的强盗行为。这样才能避免因

瓜分波斯和巴尔干而使千百万人受死亡威胁的帝国主义的进攻。这样才能开辟通向和平的道路。我们并不认为这条道路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它并不排斥真正的革命战争。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象巴札罗夫⁷⁷今天在《新生活报》⁷⁸上提出的那样；我们只是说，俄国现在的情况使它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要执行的任务比原来想象的要容易一些。俄国的地理条件非常好，假如列强敢于凭资本、凭资本掠夺的利益来反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同它联合的半无产阶级即贫农，那末这对它们将是最困难的任务。德国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而在美国——它想吞并墨西哥，并且大概很快就要同日本打起来——参战以后，德国的情况更加不可收拾了，它一定会被消灭的。法国的地理位置使它遭受的苦难最多，使它疲惫不堪。这个国家的饥荒虽然没有德国厉害，但人力的损失比德国大得多。如果你们第一步从限制俄国资本家的利润开始，剥夺他们榨取几万万利润的一切可能性，如果你们向各国人民提议和平，反对一切国家的资本家，并且公开声明，你们决不同德国资本家以及一切直接或间接纵容他们或者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进行任何谈判和发生任何关系，决不同英法资本家谈判，那末你们才会在工人面前斥责他们。你们也就不会把发给麦克唐纳出国护照这件事⁷⁹看成是一个胜利，麦克唐纳从来没有进行过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允许他出国，是因为他没有表示过反对英国资本家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原则、实践和经验，而我们的马克林同志和其他几百个英国社会主义者就是因为进行这个斗争而坐牢的，我们的李卜克内西同志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坐牢的，他被关在苦工牢里就是因为他说过：“德国士兵们，向你们自己的皇帝开枪吧。”

临时政府的大多数委员在特别召开的第三届杜马会议上（我不知道这届杜马算是第三届还是第四届），每天都扬言要把我们送

去做苦工，司法部也正在拟定关于这一问题的新法令草案，其实，把帝国主义者资本家送去做苦工岂不更正确吗？马克林和李卜内西才是把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思想付诸实现的社会主义者。这就是为了争取和平必须向各国政府说的话，必须向各国人民控诉各国政府。这样，你们就能使一切帝国主义政府陷于混乱的境地。现在你们自己却陷于混乱的境地了，因为你们一方面在3月14日向人民发表的和平宣言⁸⁰上说：“推翻你们的皇帝、你们的国王和你们的银行家吧”，但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掌握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一种空前未有的、数量多、经验丰富、有强大的物质力量的组织，却同我们的银行家订立联盟，成立准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还拟定一些在欧洲已经写了几十年的改良草案。欧洲在嘲笑这种争取和平的斗争。只有苏维埃夺取了政权并且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欧洲人才能了解这种斗争。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采取以反对资本家的阶级的规模，以不经过流血的革命来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步骤。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俄国。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存在一天，俄国就始终是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不可能同普通形式的临时政府长期共存。只有不实现进攻时，苏维埃才照原样存在。转入进攻是俄国革命的全部政治的转变，即从期待和平，从准备由下面举行革命起义来获得和平，转为恢复战争。从一条战线上的士兵联欢，进到所有战线上的士兵联欢，从冒着服苦役的危险用面包皮同饥饿的德国无产者交换铅笔刀的自发联欢，进到自觉的联欢，这就是已经显示出来的道路。

我们把政权拿到了自己手里，我们就要制裁资本家，那时，战争就不是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战争了，因为战争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进行战争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纸上写的什么东西来决定的。在

纸上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写的。只要资本家阶级在政府中占大多数，那末无论你写什么，无论你说得多漂亮，无论有多少准社会主义者当部长，战争还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大家都知道、都看到的。阿尔巴尼亚的例子，希腊和波斯的例子⁸¹，都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攻击我们关于进攻问题的书面声明⁸²，可是没有人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答应拟定一些方案是容易办到的，而具体的措施总是拖延不实行。草拟关于不割地的和平的宣言是容易的，但是要知道，阿尔巴尼亚、希腊和波斯的事件却是在联合内阁成立以后发生的。《人民事业报》⁸³关于这些事件写道：扼杀希腊是对俄国民主制的侮辱。大家都知道，这个报纸不是我党的机关报，它是政府的机关报，部长的机关报。米留可夫，这个被你们当做大人物看待的米留可夫，其实不过是他们党里一个普通党员，他跟捷列申柯没有任何区别，连他也写道，协约国的外交扼杀了希腊。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却不管你们多么愿意和平，不管你们多么真诚地同情劳动者，也不管你们多么真诚地希望和平，——我完全相信，群众对和平的愿望不会不是诚恳的——你们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除了继续推进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结束战争。俄国革命一开始，来自下面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也就开始了。如果你们掌握了政权，如果革命机关掌握了政权，并且用它来进行反对俄国资本家的斗争，那时你们就会得到其他国家劳动者的信任，就可以提议和平。那时我们的和平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得到保证，即从筋疲力尽、大势已去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法国方面得到保证。如果那时的形势使我们不得不进行革命战争，——这一点谁也不知道，我们也不能担保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那我们就说：“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如果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如果它真正消除了资本家对施政方针的任何影响，使他们

无法扩大经济破坏，无法获得几万万利润，那我们是不会拒绝进行战争的。”革命政权会向一切国家的人民宣布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是自由的，德国人民不应该为保有亚尔萨斯和洛林而战，法国人民也不应该为保有法国的殖民地而战。因为法国如果为它的殖民地而战，俄国也有希瓦和布哈拉，这也是类似殖民地的地区，那时就会开始瓜分殖民地了。怎样进行瓜分，按照什么标准呢？按照力量。而力量已经起了变化，资本家的状况是除了战争外，别无他路可走了。一旦你们取得革命政权，你们就可以通过革命道路来达到和平：向各国人民发出革命号召，用你们的例子来说明策略。那时在你们面前就会展开一条用革命方法取得和平的道路，你们就很有可能使几十万人免于死亡。那时你们就可以确信，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是拥护你们的。即使英美日的资本家想进行反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战争，但是由于资本家已经被制服、被排除，监督权转到了工人阶级手中，使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加十倍，他们百分之九十九是进行不了的。你们只要声明你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你们要保卫自己的共和国，保卫工人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不受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资本家的侵犯，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保证和平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关于进攻问题的声明具有根本的意义。整个俄国革命史上的转变关头已经到来了。俄国革命开始时，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帮助了它，英国资产阶级以为俄国是同中国和印度相似的国家。可是，俄国除了地主和资本家占大多数的政府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这种按力量来说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代表机关，虽然你们参加资产阶级联合内阁的行动使它受到了损害。但是俄国革命却使下层群众反对资本家政府的革命斗争在各个国家中都获得了极大的同情。现在的问题是：前进还是后退。革命时期停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政治、经济的意义来

说，而不是从战略的意义来说，进攻是整个俄国革命的转变关头。现在举行进攻，就是继续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就是继续使几十万、几百万人为扼杀波斯和其他弱小民族而送命，客观上就是这样，不管这个或那个部长的意志和认识如何。在贫农的支持下把政权转归革命无产阶级，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就会以最可靠的、人类历史上最无痛苦的方式来进行，俄国和全世界的革命工人取得政权和获得胜利就有了保障。（会场上一部分人鼓掌）

载于1917年6月28日（15日）和
29日（16日）《真理报》第82和83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
根据列宁修改过的速记
记录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5卷
第1—12页

论 口 号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

显然，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我国革命过去的一个时期，即在2月27日至7月4日⁸⁴这些一去不复返的日子里，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它显然已经不正确了。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不能了解当前的迫切问题。每一个口号都应当根据一定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提出。而目前7月4日以后俄国的政治局势，同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的局势是根本不同的。

那时候，在过去的这一革命时期，国内存在着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论在物质上或形式上，国家政权都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我们决不能忘记，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那时候，政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双方同意分掌政权。苏维埃是由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压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群众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在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最近的一步、直接能够实现的一步的口号。这是

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内，和平发展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最合乎愿望的，但是现在，革命无疑已经不可能和平发展了。

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不仅仅是由于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严重的力量能够反对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不仅仅是如此。说当时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还由于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是可以最和平最无痛苦地进行的。

人们对于后面这一点也还是注意不够的。苏维埃按其阶级成分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末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有可能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是可以巩固的，还是不会削弱的。必须时刻注意到，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那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事实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它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它会及时地大大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联合起来。

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本来是很可能实现的。这对人民来说会是最容易、最有利的东西。这会是一条最无痛苦的道路，所以当时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但是现在，这个争取政

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斗争已经结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我们所以说七月四日事变是一个转折点，是因为在这次事变以后客观形势起了急剧的转变。政权不稳定的局面不存在了，政权基本上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¹²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⁴妥协的基础上，各个政党的发展使这两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实际上参与了反革命的屠杀，成了反革命的帮凶。由于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他们在各政党斗争的进程中就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月27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勾结在一起，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过去，部分地用威胁手段吓住他们，把国家实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⁸⁵，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的士兵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

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象是唐·吉珂德精神⁸⁶，或者是一种笑料。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现在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或作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维埃内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刽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抹杀过去的事实。

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赞助过残杀布尔什维克、赞助过在前线枪杀士兵和解除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就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帮助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主要的）就是企图象市侩那样

用“道德观念”来模糊问题的政治实质。

问题的实质在于，用和平方法现在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了。现在能够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目前真正的执政者，即依靠调到彼得堡来的反动军队、依靠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的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

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革命的人民群众才能够战胜这些新的执政者，而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不仅是要由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

谁把市侩的道德观念混杂在政治问题中，谁就会这样议论：就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赞助过卡芬雅克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和革命部队的武装，犯了“错误”，但也应当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阻难”他们改正“错误”；要使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地倒向工人方面来。这种议论，如果不是对工人的又一次欺骗，也是一种幼稚的甚至愚蠢的见解，因为小资产阶级群众倒向工人方面来，正是说明而且只是说明他们离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现在只有宣布策烈铁里、切尔诺夫、唐恩和拉基特尼科夫是刽子手的帮凶，那才能算是改正“错误”。我们完全无条件地同意这种“改正错误”的办法……

我们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应当作一补充：正是在革命中，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弄不清楚真正的政权在哪里的情形，都会发生形式上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分离的情形。这也正是一切革命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1917年3、4月间，人们不知道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维埃手中。

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使觉悟的工人冷静地观察一下革命的根本问题：目前国家政权是在谁的手里。只要你想一想政权的物质

表现是什么，而不把空话当做事实，那你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国家首先就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之类的物质的附属物⁸⁷。在现在，那就是士官生和特地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的哥萨克，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就是那些封闭《真理报》¹⁷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某一部分士兵武装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些士兵的人，就是那些在军队中对某些人进行屠杀的人。正是这些刽子手实际上掌握着政权。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是没有实权的部长，是傀儡部长，是赞助屠杀的政党的领袖。这是事实。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本人也许“不赞成”屠杀，他们的报纸羞羞答答地推卸屠杀的责任，但是这件事是改变不了的，这种政治上改头换面的把戏是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的。

封闭彼得格勒十五万选民的机关刊物，士官生因工人沃伊诺夫把《真理小报》¹⁷从印刷厂拿出来就把他杀害（7月6日）。这难道不是刽子手的行为吗？这难道不是卡芬雅克分子干的勾当吗？有人会对我们说：这不是政府的“过错”，也不是苏维埃的“过错”。

我们回答说，这样对政府和苏维埃来说才更糟糕，因为这就是说它们等于零，它们是傀儡，实际上不掌握政权。

人民首先应当很好地知道事情的真相，应当知道实际上是谁掌握着国家政权。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政权掌握在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克伦斯基、某些将军和军官等）手里，而整个资产阶级都支持他们，这个阶级以立宪民主党为首，包括通过所有黑帮报纸，通过《新时报》、《活的言语报》⁸⁸等等进行活动的君主派在内。

必须推翻这个政权。否则一切关于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话都是空话，都是“欺骗自己，欺骗人民”。

策烈铁里部长和切尔诺夫部长以及他们的政党现在也是拥护这个政权的；必须向人民说明他们充当着刽子手的角色，并且说明

这些政党在4月21日、5月5日、6月9日和7月4日犯了“错误”以后，在他们赞同进攻政策（这种政策已经十分之九预先决定了卡芬雅克分子在七月的胜利）以后，是必然会有这种“结局”的。

必须改进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进行鼓动必须考虑到当前革命的具体经验，特别是七月事变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说，应当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敌人是那帮军人，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并且应当明确地揭露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直起着刽子手帮凶的作用。

必须改进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必须说明，不推翻军人的政权，不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使他们失去人民的信任，农民绝对没有希望获得土地。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条件下，这是一个漫长的极其困难的过程，但是战争和经济破坏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这种“加速器”可以使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相当于一年。

对于上述言论，大概会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谈坚决斗争就是鼓励分散的发动，这正好帮助了反革命势力；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摧毁反革命势力仍然是使政权转到苏维埃手里。

我们对第一种反对意见回答说，俄国工人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决不会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时刻受人挑拨。他们现在起来反抗对反革命有利，这一点是无庸争辩的。只有在广大群众中重新掀起革命高潮，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只是一般地谈论革命高潮、革命来潮、西方工人的援助等等是不够的，必须从我们过去的事件中作出一定的结论，必须考虑的正是我们所取得的教训。吸取了这种教训就一定会提出同夺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

第二种反对意见也是以极一般的议论来代替具体的真理。除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取得1917年7月的经验以后，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贫农或半无产者支持这个政权，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已经回答过，哪些情况能够使这一点很快实现。

在这次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苏维埃，但是不是现在的这种苏维埃，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关。到那时候，我们会主张按照苏维埃的形式来组织整个国家，这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苏维埃的问题，而是同目前的反革命势力，同目前的苏维埃的背叛行为作斗争的问题。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现在的苏维埃垮台了，苏维埃由于被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所操纵而完全破产了。现在，这些苏维埃象是一群被牵去宰割、在屠刀下咩咩哀叫的绵羊。现在，苏维埃在节节胜利的反革命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一筹莫展。可能有人会把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了解为“只是”号召把政权交给现在的苏维埃，如果这样说，如果号召这样做，那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欺骗人民。而欺骗是最危险的行为。

从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俄国阶级斗争和政党斗争的发展周期已告结束。新的周期开始了，在这个周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在斗争火焰中重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应当运用七月事变以后的新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了。在新的周期开始时，必须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已经取得胜利这一

事实作为出发点；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它妥协，而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战胜它。当然，在这个新的周期，无论是反革命势力获得彻底的胜利，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彻底的失败（不经过斗争），或是重新掀起革命高潮，都还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只好放在以后，在这些阶段到来的时候分别来谈了……

写于1917年7月中旬

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喀琅施塔得委员会用单行本刊印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5卷
第173—180页

革命的教训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应当仔细考虑俄国革命的教训，特别是现在7月底，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因为失败而告终的时候，更应当如此。

一

我们看一看：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究竟是要得到什么？他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不是给人们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对前线士兵采

用死刑，审判自己起来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捣毁工人报纸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纸。常常甚至没有提出任何罪名，或提出显然是诬告的罪名，就逮捕布尔什维克。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惩办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破坏自由，因为这只是根据一定的罪名惩办一定的人。这种反驳显然是故意胡说，即使个别人犯了罪，即使这种罪名已经由法庭证明和承认，那也不能因此而捣毁印刷所和查封报纸。如果政府公布一条法律，宣布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它的方针和观点都是违法的，那是另一回事。但是谁都知道，自由俄国的政府不能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做。

地主和资本家的报纸因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而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甚至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罪名来加在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身上的时候，就公开要求逮捕和惩办布尔什维克，这是揭穿那些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诬蔑性控告的主要证据。

人民要求和平。而自由俄国的革命政府，却根据从前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使俄国资本家便于掠夺别国人民而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密约，再一次发动掠夺战争。这些密约一直没有公布。自由俄国的政府借词推托，始终没有向各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和约。

粮食没有了。饥荒又要来了。大家都看到，资本家和富人靠军事订货丧心病狂地盗窃国库（现在战争每天要耗费人民五千万卢布），抬高物价，榨取空前多的利润，但是，在认真地计算产品的生产和把产品分配给工人方面，简直什么也没有做。资本家愈来愈猖狂了，他们把工人赶到街头，而且正是在人民苦于商品缺乏的时候。

绝大多数农民都在许多次代表大会上响亮而明确地发表声明，宣布地主土地私有制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抢劫。但是自称为革

命的和民主的政府却一连好几个月都在愚弄农民，用诺言和拖延手段欺骗农民。资本家一连好几个月不让切尔诺夫部长颁布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可是，在这个法律终于公布出来之后，资本家便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和攻击，而且直到现在还在攻击。政府在保护地主方面是这样的卑鄙无耻，竟开始把“擅自”夺取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

愚弄农民，劝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资本家则一再拖延，推迟召开这个会议。现在，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压力，这个会议已定于9月30日召开，可是资本家又公开地叫嚷，说这个期限“太”短了，要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党“立宪民主”党⁴或者说“人民自由”党的最有势力的党员，如帕宁娜，就公开鼓吹把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

解决土地问题要等到召开立宪会议。召开立宪会议要等到战争结束。结束战争要等到完全胜利。结果就是这样。在政府中占多数的资本家和地主简直是在嘲弄农民。

二

在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自由国家里，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皇帝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

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能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建立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建立自己的政

党。因此，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1917年2月27日推翻沙皇政权以后，俄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在将近四个月中，就是通过各个自由组成的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管理的。因此，为了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首先必须研究哪些政党是主要的，这些政党维护哪些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政党的相互关系怎样。

三

在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国家政权转到第一次成立的临时政府手中。这个政府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资本家所组成，而同他们连成一气的还有地主。资本家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占最重要的地位，它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或者说政府党。

政权落到这个政党手中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当时同沙皇军队斗争、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的根本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和农民，水兵和士兵。政权之所以落到资本家政党手中，是因为这个阶级有财富，有组织，有知识。在1905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间，俄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在本身的组织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大。

立宪民主党一直是君主派政党，1905年是这样，1905年到1917年还是这样。在人民战胜沙皇暴政以后，这个党就宣布自己是共和党的了。历史经验表明，当人民战胜了君主制的时候，资本家的政党总是愿意成为共和党的，只要能够保住资本家的特权和它对人民的统治。

立宪民主党在口头上拥护“人民的自由”，实际上它拥护的是资本家，于是所有的地主、君主派和黑帮分子马上就站到它那边去了。报刊和历次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以后，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所有黑帮的刊物都同立宪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一切君主派虽然还不敢公开活动，但是在选举中，例如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就支持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便集中全力继续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是同英法资本家签订掠夺性密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进行的。根据这个条约，俄国资本家在战争胜利后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和阿尔明尼亚等地。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话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关系到工农利益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

人民利用了自由，开始自动组织起来。占俄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要组织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在二月革命时已开始形成，二月革命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俄国多数大城市和许多县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就通过苏维埃团结起来了。

苏维埃的选举是完全自由的。苏维埃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即工农的组织。苏维埃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工人和穿着军服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

不言而喻，苏维埃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决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只有这样，我国革命才能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这样，真正要求和平、真正厌恶侵略战争的劳动群众，才能够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结束侵略战争和争取和平的政策。

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才能制裁那些大发“战争”横财而使国家遭到破产和饥荒的资本家。但是，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¹²。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而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成立协议，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从革命开始以来在整整五个月内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

四

我们首先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然后再来探讨多数人民信任他们的原因。

五

在俄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通过不同的形式同资本家妥协的。

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刚推翻沙皇政权而取得胜利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做“社会主义者”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⁸，直到1917年3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尽量通过他来拉拢和软化苏维埃。

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心甘情愿地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

苏维埃自己认为是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苏维埃的领袖们成立了所谓“联络委员会”，也就是同政府联络、接洽的委员会⁸⁹。在这个联络委员会中，苏维埃的领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经常同资本家政府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不管部部长或非正式部长了。

整个3月间和几乎整个4月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资本家推来推去，支吾搪塞，竭力争取时间。在这个时期中，资本家政府没有采取一项比较认真的措施来推动革命。甚至对于召开立宪会议这种最迫切的任务，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向各地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成立中央的筹备委员会。政府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恢复由沙皇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掠夺性国际条约，尽量小心谨慎地不露形迹地阻挠革命，什么都答应，什么都不执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联络委员会”里当了傻瓜，他们被美丽的词句、诺言和“明天就办”的空话喂饱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象一篇著名的寓言中的乌鸦⁹⁰一样，经不起阿谀奉承，高兴地听信资本家所作的保证，说什么他们高度尊重苏维埃，未经苏维埃同意决不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资本家政府并没有为革命做任何事情。但是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恢复了掠夺性的密约，更确切些说，就是确认了这些条约，并且又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外交官进行秘密谈判，加强了这些条约的“生命力”。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为作战军队的将军和军官的反革命组织奠定了基础（至少使他们互相接近了）。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开始把工业

家、厂主组织起来，这些人在工人的压力下本来已不得不一再让步，但同时又开始怠工（破坏生产），准备一到适当的时机就停止生产。

但是把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组织到苏维埃中去的工作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被压迫阶级的优秀分子已经感觉到，尽管政府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达成了协议，尽管克伦斯基吹得天花乱坠，尽管有了“联络委员会”，这个政府仍然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群众已经感觉到，如果不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业就必然遭到失败。群众已经愈来愈愤怒了，愈来愈不能忍耐了。

六

群众的愤怒在4月20—21日爆发了。运动是自发的，谁也没有去准备它。这个运动非常猛烈地反对政府，有一个团甚至全副武装出动，到玛丽亚宫去逮捕各部部长。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苏维埃是能够（而且应当）把政权夺过来的，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政府，同政府的妥协更加使自己陷入泥坑，并且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断送革命的步骤。

革命迅速地彻底地教育了各个阶级，这是在平常和平时期不曾有过的。组织得最好、在阶级斗争中和政治上经验最多的资本家学得最快。他们看到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国家资本家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所用过的那种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组织所谓“联合内阁”⁵⁹，即由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叛徒组成共同的内阁。

在自由、民主和革命工人运动同时并存最长久的国家，如英国

和法国，资本家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后，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俄国的“民主的、共和的”资本家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马上就上了钩，于是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的参加“联合”内阁也就在5月6日成了事实。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傻瓜们欢天喜地，沐浴在领袖入阁的荣幸的光辉中洋洋自得。资本家也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们得到了“苏维埃的领袖”做反人民的帮手，得到了这些人支持“在前线发动进攻”的诺言，即支持恢复已经中断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资本家知道这些领袖外强中干，知道资产阶级关于监督以至组织生产的诺言、关于和平政策的诺言是永远不会兑现的。

结果正是这样。在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从5月6日到6月9日或18日，完全证实资本家的算盘打对了，他们的确毫不费力就愚弄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当彼舍霍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宣称要夺取资本家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家的“反抗已经打垮了”等等花言巧语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的时候，资本家却不断地在巩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裁资本家。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部长已经成了转移被压迫阶级视线的留声机，而整个管理国家的机关实际上仍然操在官僚（官吏）和资产阶级手中。大名鼎鼎的工业部副部长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个机关的典型人物，他对任何反对资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挠。部长们从事空谈，一切仍然照旧。

策烈铁里部长更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革命的工具。当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者大胆地起来撤换政府任命的政治委员时，策烈铁里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安抚”工作。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喀琅

施塔得大肆进行恶毒的疯狂的造谣、诽谤和攻击，给它加上企图“脱离俄国”的罪名，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来吓唬小资产阶级和庸人。而策烈铁里就是被吓坏了的庸人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比谁都“老实地”上了资产阶级攻击的圈套，比谁都热心地“抨击和安抚了”喀琅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做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结果他成了同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成立如下一项“协议”的工具，喀琅施塔得的政治委员不能简单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选举，政府批准。背叛社会主义而投靠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就是把全部时间花在进行这类可耻的妥协上面的。

凡是资产阶级的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主义的”部长斯柯别列夫、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现了（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拼命替内阁辩护，替资本家掩饰，一次又一次地用诺言欺骗人民，劝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

切尔诺夫部长同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做生意，显得特别忙碌，直到7月间，直到在7月3—4日的运动⁸⁴后新的“政权危机”发生，直到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切尔诺夫部长一直忙于办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众望的事情，即“开导”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劝告他们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买卖。禁止土地买卖的诺言是在彼得格勒全俄农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上郑重其事地向农民宣布的。但是诺言仍旧是诺言。切尔诺夫无论在5月或6月都没有实现这个诺言。直到7月3—4日，由于革命的浪潮自发地起来了，恰好立宪民主党人又退出内阁，这样他才有可能实行这项措施。但是就在当时，这也是一项孤立的软弱无力的措施，不能使农民反对地主、争取土地的斗争得到真正的帮助。

这时候，要执行在前线恢复帝国主义强盗战争这一帝国主义

反革命的任务，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是不能胜任的，而新出炉的社会革命党党员“革命民主主义者”克伦斯基却顺利地出色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克伦斯基沉醉在自己美妙的言词中了，而那些把他当做小卒玩弄的帝国主义者则恭维他，奉承他，崇拜他，因为他诚心诚意地为资本家服务，劝导“革命军队”同意恢复战争，以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条约，使俄国资本家得到君士坦丁堡和里沃夫，得到埃尔斯伦和特拉布松。

从5月6日到6月9日，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部长的掩护和保卫下，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准备好了进攻，要对外部敌人发动攻势，又要向内部敌人即革命工人进攻。

七

6月9日，革命工人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在彼得格勒举行示威，使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满和愤怒有组织地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被自己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所牵制，被帝国主义的进攻政策所束缚，感到自己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而非常恐慌。到处都发出反对游行示威的狂吠，这一次狂吠把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了。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行同资本家妥协的政策，在他们的领导下，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联盟的形势就完全确定了，并且非常明显。6月9日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就在这里。

布尔什维克取消了举行示威的决定，他们决不愿意在这个时

候引导工人去同联合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殊死的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多少保持一点威望，不得不定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资产阶级怒不可遏，它正确地看出，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倒向无产阶级方面的表现，于是决定在前线发动攻势来麻痹民主派的行动。

果然，6月18日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即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在彼得格勒的群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6月19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主义者^①克伦斯基庄严地宣布的前线的进攻正是6月18日开始的。

这次进攻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恢复掠夺战争，这是违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的。因此，进攻一方面必然使沙文主义大大加强，使军权（因而也使政权）转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另一方面必然对群众采取暴力，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

如果说5月6日是用绳索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绑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战车上，那末6月19日则是用锁链把他们当做资本家的奴仆锁住了。

八

由于重新挑起掠夺战争，群众的愤怒自然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增长起来。7月3—4日，群众的愤怒爆发了，布尔什维克本想阻

^① 波拿巴主义（因法国两个名叫波拿巴的皇帝而得名）是用来称呼这样一种政府的，这种政府利用资本家政党和工人政党之间的极端尖锐的斗争，竭力装做无党派的政府。实际上这种政府是替资本家服务的，它最善于用诺言和小恩小惠欺骗工人。

止，当然，他们是应当使这个运动具备最有组织的形式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被自己的主人资产阶级锁住了的奴隶，他们同意一切照办：同意把反动军队开进彼得格勒，同意恢复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军队的武装，同意非法逮捕、通缉人犯和查封报纸。于是执政的资产阶级不能完全掌握的而苏维埃又不愿意掌握的政权，就落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地主和资本家是完全支持他们的。

一级一级地滚下去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既然躺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斜坡上，就不能不往下滚，一直滚到底。2月28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答应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5月6日，他们把资产阶级政府从破产中拯救出来，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并且同意实行进攻。6月9日，他们同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对革命无产阶级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造谣和诽谤。6月19日，他们支持重新挑起的掠夺战争。7月3日，他们同意把反动军队调来；这就是把政权完全交给波拿巴主义者的开端。一级一级地滚下去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落得这样可耻的下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小业主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造成的结果，欧洲的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九

当然，谁都看见过小业主怎样拚命挣扎，想“出人头地”，想做真正的主人，想上升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资产阶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小业主不是自己成为资本家（在一百个小业主中，

至多有一个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破产,成为半无产者,最后成为无产者,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这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多次证明了的。

当事变发展得非常迅速的时候,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造成的极深刻的危机的影响下,俄国革命的经验,也就是从1917年2月到7月这一时期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不稳定这一条老真理。

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想从战争、饥饿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下解放出来,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是叛徒,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地站到革命工人这一边来,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贫苦农民支持他们的话)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的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争取正义的持久的和平。

后 记

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得出它是在7月底写的。

8月间革命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本文所谈到的问题。后来在8月底发生了科尔尼洛夫暴动,造成了革命的新转变,从而向全体人

民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勾结反革命将军是想解散苏维埃，恢复君主制。革命的这一新转变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它能不能取消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有害政策，不久的将来自有分晓……

尼·列宁

1917年9月6日

本文写于1917年7月底

后记写于1917年9月6日(19日)

本文载于1917年9月12日和13日(8月30日和31日)《工人报》第8和第9号

在第8号上署名尼·科夫

在第9号上署名尼·列宁

后记载于1917年“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尼·列宁《革命的教训》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5卷
第216—230页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饥荒逼近

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混乱不堪，正在日益解体，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供应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故意不断地对生产暗中破坏（损坏东西、停闭、破坏和阻挠），指望空前的灾难会使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地主的无限权力。

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必将到来，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必须“英勇努力”以防止毁灭，等等。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承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工人失业。只要想一想：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各种货物却都卖空了，国家因产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深渊，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工人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之为腐朽的革命也许要公正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政体，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

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无情的，它对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可以看到，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可以实现，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仅仅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就会触犯一小撮地主、资本家的空前利润。

的确，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演说，任何党派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十分清楚地肯定地承认了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消除人力的任何浪费，节省人力。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公认的。然而这也正是人们所不做的，他们唯恐触犯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唯恐触犯地主和资本家靠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工作”）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谁都知道，谁都看到，谁都为之惊叹不已。

可是国家方面丝毫没有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计算和监察。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全国各地对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计算以及实施监督的任何尝试，都始终是暗中破坏的。只有幼稚到了极点的人才不懂得，只有虚伪透顶的人才假装不知道，这种暗中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用

什么手段进行的。这种银行家和资本家的暗中破坏，这种对任何监督、监察、计算的破坏，都是同民主共和的国家形式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资本家老爷们很好地领会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本来是一切赞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都在口头上承认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¹²，在他们的朋友一攀上部长、次长等高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政体代替君主政体，丝毫也不会触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本质，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加以改变，就可以同样顺利地在民主共和制下保持这种利润，正如在君主专制下一样。

在民主共和制下对任何监督、计算、监察实行的现代最新式的暗中破坏手段，就是资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监督“原则”，承认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一样），不过主张“逐渐地”有计划地“由国家来安排”这种监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对监督的破坏，把监督化为乌有，化为有名无实的东西，以及掩盖他们对监督的玩弄，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而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无生气的官僚监督机关，这些机关完全听从资本家的意志，根本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能做。

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到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过“联合政府”⁵⁹，因此他们要在政治上对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负纵容资本家的责任，负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的责任。

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谓“全权”（不要笑！）机关中的最高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⁷⁶ 1917年9月7日第一六四号上，

登载了一个管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决议，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们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在它的决议中正式承认，“政府所设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是事实。

难道证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政策破产的证据，有比他们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有力的吗？

还在沙皇制度时代就认为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必要，并且为此也建立了一些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经济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破坏现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5月6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负责实行国家监督和调节。那时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发誓说，他们不只对政府的行动负责，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也在实际监视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从5月6日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在这长长的四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间经济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在水运方面、农业方面和矿山勘探等方面本来有极大的可能做出许多事情，但是四个月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认政府所设的监督机关“不起任何作用”了！！

而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是民主会议⁹¹召开前夕的9月12日），这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俨然以国家要人的姿态高谈什么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⁹²之流，即同列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申柯⁹⁶之流搞联合，来代替同立宪民主党人⁴的联合，便可挽救时局！

试问怎样来解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种惊人的盲目呢？是否应该认为他们在国家工作上是个极端蠢笨幼稚，不知道自己在于干什么，而自甘迷误的孩子呢？或者说他们由于占据部长、次长、总督、专员等等高位过多，就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盲目病呢？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步骤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的、没有试验过的、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未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办法和步骤，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

唉！的确有人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制度”，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⁹时就已经知道实行监督的基本步骤、主要办法和途径：使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它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以实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一切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和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督。所有这些

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令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详细地论述过了。

假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使它的机关不是因献媚于资本家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末国家随手就可以从大量的监督办法中找到大家已经知道的、已经被人采用过的办法。这里的唯一障碍，即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人民隐瞒的障碍始终是：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愿意挽救俄国、使它摆脱战争和饥荒的真正革命政府的政纲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政府叫做革命民主政府不是开玩笑，那它只要在成立政府的开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通过决议、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人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法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 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实行银行国有化；

(2) 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的最大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 取消商业秘密；

(4) 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

(5) 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或奖励这种联合并且对它们实行监督。

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漂亮的诺言来欺骗“老百姓”，根本不想实现这些诺言。

监督并调节粮食的输送，或者监督并调节一般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这是荒谬可笑的。这好象是只抓偶然到手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见那千百万卢布。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工业紧密地生长在一起，不“插手”到银行中，绝对不能做出丝毫重大的、丝毫“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也许，国家“插手”到银行中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过程吧？有人通常竭力拿这种情景来恐吓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私有者”一个戈比，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而只是一小撮富人的唯利是图的卑鄙欲望在起阻碍作用。常常有人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所关心的就是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并集中于银行的那种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刷的和书面的字据做证明的，这些字据就叫做股票、债券、期票、票券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时，就是说，在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字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十五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十五卢布的所有者，谁有一千五百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由股票、债券、期票、货物证等等所表现的一千五百万卢布。

那末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由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废除了商业秘密等等），就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和成立分行，以及使用顶名人等等的时候采取的一切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一切银行合并为一（这种合并的本身丝毫也不改变私有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私有者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往来流动的去向，以及这种流动是怎样发生和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种事情仍免不了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做好征收所得税的工作，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极大部分是落空的。

银行国有化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行了，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会动手的。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

骤，这个办法只要下一道命令，“一举手”就可以实现。既然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办法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账务而已。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每省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各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末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设法抗拒，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怕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打破一切因循守旧的恶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末，只要发布一道命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敢于稍微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账目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把贫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的节省将是巨大的，假定国家保存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末，在普遍利用银行、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大众化等方面会大大地前进一步。正是对小业主和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大众化和简单易行。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对一切主要的现金业务加以考察，不让有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从而调节经济生活，最后就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来进行重大的国家设施，不必因所谓“中介”而付给资本家老爷们巨大的“酬劳”金。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

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服务的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口沫飞溅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的“防御”观点，即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那末，象德国和美国这样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先进国家，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些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制，一个是共和制，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常常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这个名词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象“谢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是并非无知的、不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也象“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有时甚至用来称呼那些《日报》⁶⁵或《统一报》¹³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创办的并且用钱来维持的，因而参加这些报纸的所谓社会主义者本人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若是不把“革命民主”当做装饰门面的词句，当做口头禅来用，而考虑一下它的意义，那末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据说，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都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以这

个称号自封(其实是污辱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有利得多；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持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千千万万的“超额利润”，正是为了保证他们在金融上玩弄种种欺诈的把戏。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办法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另一方面保证(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

这样的方式，在共和制帝国主义的俄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方式不仅由米留可夫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现，而且也由克伦斯基同捷列申柯、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在实现，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性”及其获取骇人听闻的利润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简单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制度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 * *

银行国有化对同时进行的保险事业国有化会有极大的帮助，保险事业国有化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为一，集中它们的活动，

由国家来监督。在这里，也可以毫不困难地通过保险公司的职员代表大会来立刻实现这种合并，只要革命民主国家下令实施，并责令各保险公司的经理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延迟地实行这种合并就行了。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费，使所有保险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多保险者的数目。除了一小撮肥缺占有者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加之这种改革也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人民的劳动，提供许多极其重大的可能性来真正“调节经济生活”，而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的各部门形成了一种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使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真实行调节经济生活，就必须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且拿糖业辛迪加为例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时代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良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

组合，自然，这种合并充满了最反动最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贱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但这是有利于财阀和富豪的监督和调节。

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命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来把反动官僚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人民的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⁹³和捷列申柯⁶⁶之流大发其财。要向民主派号召表现独立主动精神，而不是向官僚号召；要向工人和职员号召表现独立主动精神，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只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用同这些糖业大王实行“联合”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那末这件事就能够而且应当在几天之内一举而成。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结果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①。

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就已经把石油业大规模地“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专靠剪息票为生，同时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特别在国家遭到

① 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克伦斯基政府宣布实行糖业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职员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资本家！！

极大的危机，必须节省人民的劳动和增加燃料产量的时候。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申柯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象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方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即由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留在不可侵犯的旧国家机构中旧职位上的官吏）。

要想做些认真的事情，就必须把官僚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命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和账目，对生产暗中破坏，不采取措施提高产量，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徒刑。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或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完备的监督制并扩大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他们。如果能立刻在1917年4月就实行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末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蕴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运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在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样因循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瓦解现象，仍然是不断浪费人民的劳动，——一切都象在沙皇时代一样，改变了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收发文件上的称呼而已。

煤炭工业在技术上和文化上所具备的实现国有化的“现成”条

件并不差：那班掠夺人民的强盗煤业大王，在管理上的无耻程度也并不轻，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坏设备和停止生产等许多极明显的事实。甚至孟什维克的内阁派报纸《工人报》⁷⁴也承认了这些事实。结果怎样呢？同样地什么也没有做，只是举行了几次工人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而已！！任何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监督制，即从下面由职员联合会和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做啊，我们“大家”不是都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工商界“联合”吗！可是联合的意思就是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从而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取消商业秘密

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就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后者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或者这种监督只有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才能实现。不管这一点对所有没有成见的人来说是怎样明显，不管《真理报》¹⁷主张取消商业秘密是怎样的坚决^①（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都还没有想实行这一真正监督的首要步骤。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4卷第481—482页及第25卷第127—131页。——编者注

这一点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对生产实行暗中破坏的资本家的致命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加思索地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绝对不容许普遍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簿记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的不可侵犯性”。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的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并且还以此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即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经济的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现代的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根本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欺诈行为和惊人利润的工具。大资本主义经济，按它本身的技术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用自己的各种业务来直接或间接地联合成百、成千以至成万个家庭。它并不是小手工业经济或中农经济，这两种经济根本不采用什么商业簿记，所以取消商业秘密也同它们无关！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持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了生产或交换上的需要，而是为了掩盖投机买卖和极不正当的谋利手段，掩盖直接的欺诈行为，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欺诈行为是特别流行的，它特别巧妙地用伪造的账目和资产负债表来掩盖自己，欺骗公众。

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持这种秘密，便是保持极小一撮人

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账目，那就是说，法律也承认了上述这个事实，不过这种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已实现）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让人民看清真相，不让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全部真实情况。

如果按革命民主方式来做，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命令大企业和富人公开全部账目，让任何一部分公民（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者，譬如一千或一万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很容易地完全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工会，通过工人工会，通过一切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

此外还要加上战争这一点。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库、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那些借口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来反对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双倍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揭发盗窃国库的行为^①。

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是一贯的、取得法律保障的盗窃国库的行为，立宪民主党的老爷们连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只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战争使俄国现在每天耗费五千万卢布。每天五千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每天在这五千万中至少有五百万，也许有一千万以至更多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提供军事订货贷款的大公司和大大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5卷第52—54页。——编者注

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人民、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做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惊人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信件”，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照例隐瞒“不愉快”事实、回避“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有不少各种各样的确切陈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受，都容忍那个专说“监督”、“调节”等漂亮话的政府！！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刻颁布法令，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把账目公开，不准他们未经政府允许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①来惩治那些隐瞒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自下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工会、工人工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可以说是吓慌了的民主主义者，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吓慌了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东西，是从来没有试行过的“乌托邦”。其实早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在法国就有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真

① 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刊物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借以维持剥削制度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2—255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恐怕是任何革命政府都行不通的。

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当时他们已经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一百二十五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农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

实质上，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激起人民公愤的资本家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支持的经济破坏现象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工农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非常害怕的事情。

强迫合并成联合组织

强迫实行辛迪加化，例如强迫工业家成立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有什么新的东西。这里也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而这些很不光彩的政党竟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申柯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来“款待”俄国。

强迫实行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结果使阶级斗争普遍地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目增加，式样增多，意义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人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

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同一地方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项法令丝毫没有直接（指法令本身）触动私有制关系，没有剥夺任何私有者的一个戈比，并且也没有预先决定，究竟这种监督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现，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现。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现法令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令，国家并不需要设立特别的机关进行特别的调查以及任何事先的研究，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保障这种超额利润的除了无人监督以外，还有旧的经营方式）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令，并不需要任何机关，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想以此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令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行，要依靠现有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的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表现得比剥削者高过无数倍的。

假定说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并且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两个工人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组成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那末切实执行法令的责任，首先落在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身上（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的真正首领、真正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令的工作，就把他们当做逃避军

役而以军法治罪，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一人有罪，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令，他们也应该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要担负这个责任。“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会计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推销产品、节省人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在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时，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我再重复一遍，成立一个辛迪加联合组织，这本身丝毫不会改变私有制关系，也不会剥夺任何私有者一个戈比。这一情况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纸经常“恐吓”中小业主，说什么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捏造出来的，因为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的。我们常常说的只不过是那些立刻就要实行的最迫切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比较彻底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当前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最小的业主和小业主成立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令之内（象我们上面假设的例证中指出的那样），即使不把它们合并，更不用说晚一些合并，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在这里，从技术和文化水平来看，已经具备了实行“联合化”所必需的人力与物力，所缺少的只是革

命政权为了发动这些人力和物力而必须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所需要的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技术人材和一般知识干部，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合并，而且要从最大的和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合并才能节省知识干部，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干部。1905年以后，在沙皇政府的统治下，俄国农民甚至在穷乡僻壤也能够战胜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在成立各种联合的事业上大大跨进一步，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合并就完全可能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强制执行，并且能依靠“下层”，依靠民主势力，即依靠职员和工人的支持、参加、同情和关心，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就行了。

调节消费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遍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实行了面包配给制。

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战胜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明显的比较，前者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者为了不玷污自己的称号，就应当认为自己的直接任务是用强力同一切陈旧的东西决裂，尽快地把运动向前推进。

面包配给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范例，它的任务只有一个(至多也只能实现这一点)：分配现有粮食，使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定额的远不是一切东西，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只不过如此而已。别的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

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额，加以实行，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毫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这样昂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毫无例外地在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在这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典型国家里，我们都看见富人经常是不受任何消费“定额”的限制的。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嘲笑的事实，并且德国的社会主义的报刊（有时甚至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还是经常登载关于富人的“菜单”，关于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假装有病到那里去疗养）可以无限制地得到白面包，关于富人享用山珍海味来代替大众化的食品等等的短评和消息。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工人以及一般劳动群众发挥自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正当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制以外是什么也不需要的。这样的国家随时随地都不会放松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并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不想把更多的战时重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解决战争带给人民的困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政策，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调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自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用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极多的，“老

百姓”在忍饥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用各种“附加物”来补充国家规定的很小的消费额，并且不让自己受到监督。

在刚刚经过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大家看到富人可以随便不受“面包配给制”限制，这种现象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目，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这种现象十分严重。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东西，而且是大量的。人民却在忍饥挨饿。对消费的调节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关心，要在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上实行这种调节。

“大家”都受到排队买东西的痛苦，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做“民主制度”！

当国家空前贫困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组成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实行完备的消费监督；第二、要富人担负劳动义务，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等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时的灾难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由居民中的贫苦阶级来监督富人消费的监督制。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的真正革命的力量。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俄国的部长们，象他们在一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僚一样，专门说些漂亮话，什么“为人民利益共同劳

动”、“调动一切力量”等等，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和觉察到了这些话是虚伪的。

结果是踏步不前，经济破坏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对工人施行军事苦役制吧，我国政府不能这样做，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设施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向革命民主的道路上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一点不敢触犯资产阶级的实际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

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方法和办法。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民主派同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只是我们谈到，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实际冲突所证实，只要提到我国革命半年来的经历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鼓励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的农民进行“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痛苦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民主组织、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都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进行了反对民主组织的斗争，并且打败了这些组织！！

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的后台进行活动，而不是公开地出现在人民面前（这同一般立宪民主党人喜欢用的活动方式完全一样，他们推出策烈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下令取消自发民主组织发出的指示！！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烈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讨好资本家、维护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破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议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晦地提交人民审判。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而已，你看，不是已经把他赶走了吗……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

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的全部政策，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主义分子。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同民主组织发生联系，依靠它们来老老实实在地做些事情。彼舍霍诺夫的工作经验和他退出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主义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¹¹党员，虽然决心尽量同资产阶级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

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⁷⁸第一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右派代表罗洛维奇这个顽强维护私商利益、无情反对粮食垄断、反对国家干涉经济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

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回答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俄国革命还在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举动，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

可惜！事实给了这个反声明一个非常残酷的修正，说对了的原来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有资格分子的代表。原来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尽管民主派的代表愤慨地否认发生这种事情的一切可能性。”

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却为资本家的利益干着

与此相反的勾当！

资本家的代表罗洛维奇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象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论报》⁶³和《交易所报》⁶⁴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

消息这样灵通，这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了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在实际上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受他们指使的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欺侮人民的举动呢？也许他们已经向工人和农民发表了宣言，说既然这样只好把克伦斯基及其同僚送进监狱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个我们已经提到的吓人的决议而已！在这个决议中，他们声明，克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有害的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莫大的打击”，并且指出，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违法”的！！

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违法，它为了讨好富人、地主和资本家，采取这种危害全部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危害整顿极端不稳定的财政工作的办法，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还在谈论什么同工商界妥协，继续同捷列申柯开会商议，宽恕克伦斯基，并且只通过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是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

在这里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一个真理，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

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甚至包括拥护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坚决主张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种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这种政策已经把国家弄到竟然提高粮食价格这样可耻的地步！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的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更加紊乱，财政破产更加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祸根。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拥护的克伦斯基政府正好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不可避免的财政破产，除了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的民主监督，即工人和贫农“从下面”对资本家进行监督之外，也就是除了前面所说的办法之外，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而大发横财，并且给急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原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

贵，不停地飞涨。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富人隐瞒投机得来的财富的行为呢？

可以征收所得税，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规定很高的累进税率。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和死的条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投机获利的机会愈多，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的现象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总是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达到的，而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或成为军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民主共和制的法国和美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以免同资产阶级闹翻和破坏同它的“联合”，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做“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揭露隐瞒收入的现象。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于穷人是无所谓的，反正穷人朝不保夕，一星期总要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赚来的很少几个钱归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

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把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畏惧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的革命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迫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把自己的账目公开，不会把储藏的钞票向民主国家“报账”。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制，取消商业秘密，规定用没收财产的办法来惩治隐瞒收入的人等等，他们就能很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成为对富人的监督，迫使一切拥有国家纸币的人、一切隐藏国家纸币的人把这些纸币交还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以下列原则为指针的：«après nous le déluge»——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⁸⁵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的心灵。当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时，就认为这是极合理而公道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对工人“私人生活”的侵犯，是工程师的“侦探或告密”行为。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做自己的公开账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实行反过来的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仆役等等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些材料，协助政府来揭露隐瞒收入的现象，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当“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时，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人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账，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但是当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把他的收支情况弄清楚，要把他的奢侈生活揭露出来时，——哪怕这种奢侈生活在战争期间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呵，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还是归结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害怕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前进呢？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论述的办法实质上大多数都不是民主主义的，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现在“实行”社会主义还太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那边去了）所以这样议论，是由于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基础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已。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糖业辛迪加又明显地表明了垄断资本主义是怎样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连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破坏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下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资本主义大企业如果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是在供应全体人民的需要。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人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全部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要想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要是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象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式的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倾向。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二十世纪的俄国，在用革命手段取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要想前进是不可能的。

害怕前进就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和普

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

* * *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想象成远不可及的模糊的将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每一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而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一个前进的步骤，是按照一定的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步骤，是节省人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滥用人民劳动的步骤。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必然使工人服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末试想想看，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整、指导的普遍劳

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完全民主制存在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手段，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既然谈到战胜已经临头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联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阐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防能力，换句话说，会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末这些办法就不能实现。

事实上，把银行和辛迪加收归国有，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人民的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劳动群众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都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要好些。如果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鼓励群众自动参加这个斗争，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国有和辛迪加国有，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在经济组织方面提到高得无比的程度。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对生产暗中破坏的资产阶级成立“联合政府”，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倒阁组阁”的把戏上，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盘踞在部长、次长等等官位上，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末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在经济上经过了彻底改造的国家，土地已归农民，银行已归国有，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超过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一定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已归农民委员会所有的农民国家的军事实力，一定超过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国家。

人们常常援引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军事义勇奇迹。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的速度、果断手段、毅力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性的英勇“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⁹⁶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二十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就能办到的（法国在一百二十五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这甚至也不是光靠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

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二十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变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十八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着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自卫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沙皇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里沃夫，阿尔明尼亚等等。

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它进行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村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的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觉悟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破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

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进行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建议缔结民主的和约，不这样来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自卫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唤起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始终不渝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现代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密切的联盟，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方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全部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抉择：或是灭亡，或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急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1905年的传统还活生生地存在着），使得俄国的革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

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同时，欧洲的反战浪潮日益高涨，全世界的工人革命日益发展，也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很少见到的革命民主的自由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在形式上有相应的改变）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这个老原则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起了反动的作用，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

革命的经验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们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遭到失败⁹⁷。在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年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联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重复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把资产阶级与民主派对立起来的论调。这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正好象把尺与斗拿来对比一样。

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只有丝毫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十足蠢才才会否认这一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要如此荒谬地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为了掩盖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整个“联合”的实质、整个联合内阁以及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克伦斯基的全部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地说：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没有消除战争，也没有消除经济破坏。

这是撒谎。遭到破产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这个联盟统治了俄国半年，在这半年中，经济破坏加深了，战争局面弄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

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破产愈彻底，人民受到教育也就愈快。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出路，那就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1917年9月10—14日

1917年10月底由“波涛”
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5卷
第312—356页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⁹⁸

初版序言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在这里是指这些国家的“后方”而言）已经变成了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剧和灾难，使群众生活困苦不堪，使他们更加义愤填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际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使得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个流派（在俄国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不太露骨的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海德门和费边社分子²⁸，等等）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

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帝国主义战争也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些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各个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可耻地遭到彻底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领袖卡尔·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做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现在（1917年8月初）大概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者

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二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节。

作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论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

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现在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译得不完全，或者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⁹⁹

这一段话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歪曲。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

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当1917年革命中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即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¹²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无数决议和他们的政治家的许多论文，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向来就这样说），而是唱着貌似社会主义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论上”，它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

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结论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们会看到，这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结论。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证明）……“忘记”和歪曲了。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织¹⁰⁰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我们现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自然”的，但这是同宗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长期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社会权力的设立，这种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社会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这种社会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制度所没有的”¹⁰¹……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个“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再直接符合”武装的居民，即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竭力促使觉悟工人注意的东西，正是盛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那些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十九世纪末叶，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这是不能不这样的。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使自己同社会脱离的特殊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比较起来，只是在复杂的程度上、技术的高明上有所不同，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成为不可能，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上面恩格斯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在实践中

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是薄弱的（这里指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垦殖者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社会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社会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⁸⁷……

这段话至迟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¹⁰²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从此海陆军备无限增长，1914年至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和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使强盗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接近于彻底崩溃的地步。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在1914年至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

“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社会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¹⁰³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论问题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¹⁰⁴……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俾斯麦时代,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在开始压迫革命无产阶级以后，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¹⁰⁵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种“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⁵⁹中实行怠工，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十二万卢布的肥缺，试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结，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烈铁里、阿夫克森齐也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烈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他说普选制是

“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¹⁰⁵。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想法，似乎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真正能够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种荒谬的想法，只是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虚伪性，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今的”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¹⁰⁶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看到，即使引用也多半是为了崇拜偶像，也就是说，为了正式表示对恩格斯的尊敬，而丝毫不想考虑一下，先要经过怎样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甚至他们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话是非常著名的，经常有人引证，它清楚地表明了目前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把戏的本质，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加以说明。现在我们把这句话的出处的那一整段论述转录如下：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迄今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消失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

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¹⁰⁷（《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德文第3版第301—303页）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只有马克思提出的与无政府主义关于“废除”国家的学说不同的一点，即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一点，被现代社会党当做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接受下来了。这样来割裂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只有缓慢的、平静的、逐渐的变化，而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最普遍、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是抹杀革命，甚至是否认革命。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从理论上说，产生这种歪曲的根源就是忘记了我们上面全部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也指出的极重要的情况和观点。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这样一来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人们

是“照例不”思索的，他们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句话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这个出色的极其深刻的定义在这里是说得十分清楚的。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豪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就是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明显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也是国家、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指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但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

可以担保，在一万个读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的人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十个人中可能有九个人不懂得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懂得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的！伟大的革命学说就是这样被人偷偷地改成了流行的庸人主义！人们千百次地重复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把它庸俗化并且极其简单地装到头脑中去，形成了固执的偏见。而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却被抹杀和“忘记”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只是市侩式地夸大了民主的概念，没有丝毫政治内容。既然人们当时可以合法地利用这个口号来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制，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

第五、在恩格斯这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

亡的论述以外，还谈到了暴力革命的意义。恩格斯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的有历史意义的评价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颂扬。但是，“谁都不记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党内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这些思想在群众中进行的日常宣传鼓动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是密切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

请看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你们看，真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据说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在每次革命胜利以后，道德和思想都有显著的提高，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没有生气、萎靡不振、软弱无力的僧侣思想，竟要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¹⁰⁸（《反杜林论》德文第3版第193页；第2编第4章末）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说里呢？

人们往往用折衷主义，用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任意（或者为了讨好当权者）强调前者或后者的办法把它们结合起来，而且在一百

次中有九十九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正是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奇,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常见的。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在下面我们还要更详尽地说明这一点。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¹⁰⁹,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三十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¹¹⁰的时候,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表现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个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详细而具体地发挥了他们的这些见解。我们现

在就来谈谈他们学说中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

1. 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 1848 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本书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这两部著作的作者在做出 1848—1851 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以前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¹¹¹（1885 年德文版第 182 页）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 年 11 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来同这一段关于国家会随着阶级消灭而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比较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

阶级变为〈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¹¹² (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37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人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最流行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忘记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個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

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民。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们不是把改造设想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设想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意识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的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

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¹¹³，也就是不承担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民的革命领袖。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末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 1848—1851 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2. 革命的总结

关于这个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总结 1848—1851 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着重号是我们加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半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着重号是我们加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¹¹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 年汉堡德文第 4 版第 98—

99 页)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做了一般的历史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 1852 年提出来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是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他拿 1848—1851 年革命伟大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面临着各被压迫阶级独立行动的时候，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进？无产阶级对这个国家机器的任务怎样？

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由于亲身所受的苦痛，现在已经领会到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很深刻地领会到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愚蠢地、轻率地否认这一点，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了做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一种寄生机体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粉饰的市侩，当然是有很大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绝对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多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就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个机构的，因为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静和显要的职位，使他们驾于人民之上。我们看一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吧：以前黑帮分子把持的官吏位置，现在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赃物了。实际上他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拖延“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召集立宪会议的日期，他们又慢吞吞地想拖延到战争结束以后！至

于瓜分赃物，攫取部长、次长、总督等肥缺，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分配政府要职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赃物”的一种表现。现在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完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是1917年2月27日到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事实愈多，各被压迫阶级，首先是领导它们的无产阶级，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那个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实际的事变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经验的。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852年，根据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精确的观察，只能断定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这三年法国历史更为广泛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

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在法国,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¹¹⁵ (1907年版第4页)

最后一句话已经过时了,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坚决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和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各国)里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新瓜分官吏职位这种“赃物”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及其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在1848—1851这三年内,法国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表明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空前地加强起来，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也就骇人听闻地扩大了。

现在，整个世界历史无疑正在比 1852 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对这一点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①

1907 年梅林把 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摘要登载在《新时代》¹¹⁶（第 25 年卷第 2 分卷第 164 页）上。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¹¹⁷……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

^① 第二版增加的一节。

说同资产阶级最渊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考茨基写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是在 1918 年 8 月，即在本书第一版刊行以后很久才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用市侩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马克思在上面所评述的资产阶级立场，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以内。（在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内，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

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拚的愚蠢举动。¹¹⁸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

运动，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写了一些鼓舞工人农民进行斗争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以自由主义的论调大叫其“本来就不用不着拿起武器”。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员表现了如他所说的“冲天”的英雄主义而欢欣鼓舞。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而做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1872年6月24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¹¹⁹……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一点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读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

了解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的。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着一种庸俗的“了解”，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原文是 *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¹²⁰（《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分卷第709页）（马克思的《致库格曼书信集》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校订和作序^①的。）

“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简要地表明了。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流行的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完全忘记了，而且被它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

^① 见本选集第1卷第683—691页。——编者注

解的，那时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还没有军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官僚制度。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因为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曾经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到了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用官僚军事机构来支配一切、镇压一切的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摧毁、破坏“现成的”（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司徒卢威的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例，那末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两次革命中显然都没有积极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这无疑

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自己站起来了，给整个革命的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人民的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当然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消灭“寄生虫”、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它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更正确些说，只是指出这个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

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曾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过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十九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怎样的呢？公社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自命为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纲领中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实际上他们恰巧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

已经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¹²¹……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一次大更替，即用一些根本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另一些机构。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实行得象一般所能想象的那样极其完全极其彻底的民主由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变成了一种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

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把这一点看做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把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看做“幼稚的东西”而“忘记了”它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斯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及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

“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

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的措施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¹²²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头”（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资产者，或者是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绝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的，是渴望推翻这个政府和渴望“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3. 议会制的消灭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

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 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¹²³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议会制提出的卓越批评，现在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被人忘记的言论”了。以部长和议员为职业的人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主义者，把批评议会制的事情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而根据这一理由又振振有词地宣布，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主义者”，就产生一种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象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做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摒弃无政府主义，因为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问题，如果把议会制看成国家的一种制

度，那末就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任务来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以外，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请读作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不理解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机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打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国这个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腐朽的市侩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议会的样子，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主义的”部长先生们用空谈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农民。在政府里，则不断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国家”工作却在官厅和司令部里“做”！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⁸³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上流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主义者”（请原谅我用这个名

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原封未动,照旧行使着职权,十分“自由地”对革命的创举实行怠工!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历史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政府官场里的切尔诺夫、鲁萨诺夫、晋集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在公众面前象谈小事情一样满不在乎地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人的,官僚主义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的”联合政府的实质。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代议机构仍然存在,然而作为特殊制度的议会制,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议员们享有特权的议会制,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不是空谈,如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不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那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不要议会制。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产阶级民主需要的那种官吏机构的职能时,他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加以比较,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加以比较。

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

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正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一样，从来不对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或策烈铁里所说的“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机关和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幻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

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范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类型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性的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设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付给所有这些人的工资,也象付给所有“国家”官吏的工资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对一切托拉斯的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这样做会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估计到了已经由公社实际开始了的试验(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

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消灭议会制而保留代议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4. 组织民族的统一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废除（断言应该废除是有意的捏造），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消灭，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民族的统一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¹²³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遗臭万年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了解，或者更正确些说，是多么不愿意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 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应该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

歧，可是在这些要点上，他们的思维过程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作用在增长，但是，“我怀疑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未必就象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Auflösung——直译是解体、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好象这样一来，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就会完全消失”（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136页）。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虫”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要建立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庸俗的市侩人物中和停滞的“改良主义”环境中看到的東西，即只是看到了“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没有想过。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不会革命地思考和不会思考革命到了这种程度，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斯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那段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组织在公社内，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斯坦根本没有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斯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故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取消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有

意的捏造。马克思故意使用“组织民族的统一”这种说法，以便提出同资产阶级的即军队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的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但是……不愿意听的人比聋子还要聋。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不愿意听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虫这样的话。

5. 消灭寄生虫——国家

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现在再引几段。

马克思写道：……“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新的机构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bricht——打碎〉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¹²⁴〉……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们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经成为废物的国家政权的東西了”¹²⁵……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经成为废物”，——马克思在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谈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大约半世纪以前写的，现在必须把这些话发

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观察了他经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做出的结论，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²⁶……

空想主义者从事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避而不谈政治形式的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着这个“典范”磕头磕得头破血流，宣布摧毁这种政治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确切地考察了法国历史，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按1851年事变所应得出的结论：问题在于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当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怎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

公社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

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

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马克思对公社经验的意义问题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

1. “住宅问题”

恩格斯在他论住宅问题的著作（1872 年）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并且屡次谈到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代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前者 and 后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他又说明了前者不同于后者的地方，即向国家消灭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

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预备凭空设想一套未来的社会结构，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象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¹²⁶（1887年德文版第22页）

这里没有谈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是谈到了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根据现代国家的命令也进行剥夺和占据住宅的活动。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与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¹²⁷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

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¹²⁸(第 68 页)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提到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要求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及其享有特权的官员。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¹⁶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来的时候，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¹²⁹……(第 55 页)

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认“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做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这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算做“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斥责国际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风气现在已经愈来愈流行了。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常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单纯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们来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是特别有益的。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 1873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论文¹³⁰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论文在 1913 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¹³¹……（《新时代》第 32 年卷（1913—1914）第 1 分卷第 40 页）

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只是反对这样的“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目的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分歧。但我们肯定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了资本家的压迫以后，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

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如果不利用那种“暂时的形式”的国家，又利用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他们自命为“反权威主义者”，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航海的轮船来说，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企业，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¹³²……

恩格斯由此指明了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运用它们的范围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改变，把它们看做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恩格斯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

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¹³³（第 39 页）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特别容易引起误会的说法，指出了国家消亡的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 1873 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

者对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对暴力、权威、政权、国家的特殊任务。

现在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纯粹市侩式的极其庸俗的一句话：“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庸俗的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提出了关于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的革命政权**，即运用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口吻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对银行和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办。

3. 给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附带说一下，据我们所知，这封信第一次由倍倍尔发表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二卷里，也就是说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

三十六年之后。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足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sich auflöst)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必须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²⁵ (德文原本第321—322页)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也作了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现在这种为了机会主义者的方便而伪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

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在审查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困难也许只是在用词上。德文中有两个词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词不是指单个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也许只好采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词，虽然这也有它的不便之处。

“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末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逐渐无事可做而随着失去其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他攻击得对，因为“人民国家”象“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是无稽之谈，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地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清除它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搁置了三十六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警告

过的那些错误。

倍倍尔在 1875 年 9 月 21 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顺便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判断，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 2 卷第 334 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Unsere Ziele»）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国家的完全不正确的议论：

“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们的目的》1886 年德文版第 14 页）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九版（第九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如此顽固地重复着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议论，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人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4.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 1891 年 6 月 29 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十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爱尔福特纲领¹³⁴草案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顺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从而说明了他是如何善于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Planlosigkeit）这几个字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

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¹³⁵（《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分卷第8页）

这里指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加上着重号，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回过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类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类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类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类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末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¹³⁶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帝国国会只是“专制

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规定各小邦存在、德意志各小邦结成联盟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工具转变成公有财产”，那“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einreissende)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¹³⁷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和平地实现党的一切要求”¹³⁸……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是出于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说明，正是在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他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的（仅仅是“设想”！），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¹³⁸……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绝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

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致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¹³⁹……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述了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有可能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在无产阶级领导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人忘记的言论”，孟什维克党在俄国 1917 年革命的开头半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也把这些话忘记了。

关于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制共和国的问题，恩格斯写道：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

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把它们溶化在德国的整体中。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了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海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完全单一制的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都有它特别的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转到完全单一制的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来加以补充。¹⁴⁰

恩格斯对国家的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却非常细致地去分析那些过渡形式，以便根据各个不同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估计某一个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在这些特殊条件下，民族问题就提出来了。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虽然无情地批判了小国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问题来掩盖这种反动性的现象，但是他

们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的”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有这种倾向。

无论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语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英国似乎已经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问题还存在，因此他承认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前进一步”。自然，这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

但是，恩格斯绝对不象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的统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Gemeinde)，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 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县(Bezirk)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县长(Staathalter)

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象消除普鲁士的 Landrat 和 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那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县和市镇通过由普选权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¹⁴¹

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主义”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¹⁷（1917年5月28日第68号）^①上，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所谓革命民主派的所谓社会主义代表们是如何恶劣地背弃民主主义。自然，这些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而把自己束缚起来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恩格斯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驳斥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非常流行的偏见，即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见。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省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所有一般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地方自治的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在我们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中都没有充分注意。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98—501页。——编者注

5. 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三版写的导言中(写于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顺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意见以外,还对公社的教训作了一个极其鲜明的总结。这个总结,由于根据了公社以后二十年的全部经验而作得非常深刻,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对国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¹⁴²……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这个实质正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时候,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卡芬雅克⁸⁵式的荣幸)落到了“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烈铁里身上。他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¹⁴³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说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并且说这一般是“国家”所需要的。

策烈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论述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证明策烈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恩格斯顺便提出的另外一个有关国家问题的意见是关于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它的日益机会主义化和日益腐化，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也愈来愈加以庸俗的歪曲，把这个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问题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这种完全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立场正是恩格斯当时出来反对的，但恩格斯在1891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内机会主义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说得很谨慎：

“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卑鄙的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法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刻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¹⁴⁴……

恩格斯故意把“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加上着重号，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侩的水平，市侩承认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

将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史的历史学家在探讨该党1914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时，会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有趣的材料：从该党思想领袖考茨基的论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门的暧昧言论起，直到党对1913年的与教会分离的运动（«Los-von-Kirche-Bewegung»）的态度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后二十年是怎样为斗争的无产阶级总结公社教训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认为最重要的教训：

……“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¹⁴⁵……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①。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¹⁴⁶……

^① 名义上约等于二千四百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六千卢布。有些布尔什维克提议例如在市杜马内给九千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议全国以六千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饶恕的。

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界线，在这个界线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服务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手续，使绝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服务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所犯的那种错误：他们说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巧妙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推论，对于任何一种民主制度，连给官吏发微薄的薪金的办法也包括在内，都可以套得上，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彻底的民主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任何民主都是会消亡的。

这是一种诡辩，正象古时候有句笑话：一个人掉了一根头发，他是否就成了秃头呢？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

恩格斯继续写道：

……“这种炸毁(Sprengung)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

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抛掉为止。”¹⁴⁷

恩格斯警告德国人，叫他们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原理。他的警告现在看起来好象是直接对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的教训。因为他们在“联合政府”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崇拜！

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象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阶级斗争形式和阶级压迫形式，能够大大地促进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2）为什么只有新一代才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完全抛掉呢？这个问题是同民主的消除问题联系着的，现在我们就

来谈谈这个问题。

6. 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给自己那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写道，在所有的论文里，他都用“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词，而不用“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¹⁴⁸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说来，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许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 不恰当的〉。然而，对真正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¹⁴⁹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十九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它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确切的，不让这个名称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也许某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话来安慰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有真正的政党，它很好地在发展；就连“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名称，除了表示我们在1903年布鲁塞尔-伦敦代表大会¹⁵⁰上占多数这个完全偶然的事实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称，也还“可以过得去”……现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侩民主派在七八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⁸⁴，“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对我在四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弧内……

但是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们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

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制度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第九年卷第一分卷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同上述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从表面上比较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

家制度”，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尤其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所以有表面上的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目的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扼要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完全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问题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

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对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

由于每个国度的历史发展的特点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国同在美国完全不同。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¹⁵¹……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提出了问题，并且好象是警告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切证明了的科学材料。

十分确切地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证明了的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

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¹⁵²……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调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是怎样变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在这个时期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性”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别是使工

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一百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三百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末无论在选举法的“细微的”（似乎是细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议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场所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按资本主义原则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细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间，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细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¹⁵³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虚伪和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已经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²⁵

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

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少数人镇压多数人的特殊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须采取极凶恶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须造成无数流血事件，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经历过的。

其次，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剥削者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武装

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为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关于这个未来,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在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拿出一部分作后备基金、作扩大生产的基金和补偿“磨损了的”机器的费用等等,然后在消费品中还要拿出一部分作为管理费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象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

冷静的考察。马克思在具体分析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时说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¹⁵⁴

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完成社会所必需的某一部分劳动，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这样，除去作为社会基金的一部分劳动之外，每个劳动者从社会方面领取的，也就相当于他对社会所贡献的。

这样，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就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领取一份同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在同等的劳动下，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同等份额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¹⁵⁵……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驳倒了拉萨尔关于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说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的教授和“我们的”社网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¹⁵⁵……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

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¹⁵⁵

现在我們才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 to 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¹⁵⁶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下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的话来搪塞，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¹⁵⁷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白白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

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们和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谈到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不仅谁也没有许过“实施”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诺言，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实施”，因为这根本是不可以“实施”的。

这里我们也就要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不恰当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着重来谈它就很不可笑了，至于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在格拉弗、柯尔涅利逊这些克鲁泡特金之流的人物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象一个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格耶所说的那样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

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这好象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一个阶段。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

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是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兵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构里“受了训练而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

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①。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计算，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丑恶现象，并且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

① 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为“政治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前面第四章第二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计算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象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象一般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

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助长机会主义的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庸俗化的现象。

为了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

1. 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名字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诺夫很巧妙地论述这个题目，对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一般关于国家的问题完全避而不谈！他的这本小册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

这两部分的结合，不但十分可笑，而且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

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自己是怎样看待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的。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正在同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作最猛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¹⁵⁸闭幕才两年。”¹⁵⁹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他们“自己的”，认为它能证实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

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不理睬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已经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无可计量。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想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有空前强烈的要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也比其他各国多得无可比拟，这样就把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所谓年轻的基地上来了）。

考茨基之所以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以外，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如果有人想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堕落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就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杂志¹⁶⁰，曾不

得不同考茨基进行论战，并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¹⁸¹上提出的决议叫做“橡皮”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当我们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中，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国家问题上恰恰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的遗臭万年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看到，这种企图是毫无成效的）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与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于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¹¹⁹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格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

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Sprengr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粗暴更不象样的了。

而考茨基是怎样最详尽地驳斥伯恩施坦主义¹⁶²的呢？

他避免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说什么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来说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如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完全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相反的话妄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考茨基却一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页）

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四十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即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代替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做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的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

鸿沟。

现在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那就是他的《社会革命》这本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制度”问题作为专题来研究。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谈的只是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都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马克思在1872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上已经“过时的”东西，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有一节专门谈“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问题。其中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国内战争、“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给了工人一些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警告不要“崇拜”国家，特别是警告德国社会主义者不要“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主义纲领”，接着就叙述了这个纲领的条文。至于1871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象“冠冕堂皇”的老一套的话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有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问，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拿“深刻的”斗争一类空洞而浮夸的话来回避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对

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刻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在口头上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末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行政。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组织起来。”（1903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148页和第115页）

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用公社的教训做例子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工厂、大商店和大资本主义农场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要求每个人绝对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他所担负的一部分工作，不然就会有整个企业陷于停顿或机器和产品损坏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但是整个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是无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整个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行政”，象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

监督”“机构的”“行政”，可是这个机构却不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要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考虑马克思的话：“公社不是议会式的，而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考茨基完全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供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连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些办法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又暴露了他对国家的“崇拜”和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象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俄国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候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象1899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斯坦的小册子那样只谈一般的革命纲领，也不象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管社会革命到来的时期而泛论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时代”已经到来的具体条件。

作者肯定地指出了一般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所起的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

之后,东方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以惊人的速度日益逼近。“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时代已经开始。”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应当成为衡量德国社会民主党(包括考茨基本人)的言行的一个尺度: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答应要做什么,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却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来就比人们想象的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肯定地说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但是他在那本自称为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结合起来,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来谈一谈。

德国社会民主党好象以考茨基为代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认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1909年);但是,既然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那末我还是要反对马克思在1852年说过的话而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正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的。

3. 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

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或“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贫乏可憎。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分卷）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之后，就来谈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代（Auflösung——直译是解体）国家这个强力工具……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词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很清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的其他缺点因与本题无关，这里暂且不谈），那末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出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实质抓住了，但是就在这个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滚到

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的论断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

在这个争论中，反对考茨基而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因为马克思正是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滚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他把“夺取”只是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就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空隙。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自己的话。马克思在1850年曾说必须“坚决把强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问道：潘涅库克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吗？

这不过是一套把戏，正象伯恩斯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的。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消灭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行政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消灭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行政机构要采取怎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取得国家政权以前（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öst——直译是解体）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消灭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在在内阁中没有一个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可以取消的……为了避免误会，我再重复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怎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在的国家。”（第725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革命问题。这无论在他的那篇论文的标题上或在上面对引的那段话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这正说明他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来代替革命的观点。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再来专门谈吧。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行政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内阁”的“崇

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内阁”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是否保留“内阁”，是否设立“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把它破坏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关于官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被缩小、压抑并阉割得残缺不全了。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负责人被资本主义环境腐蚀了（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负责人也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被选举出来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官吏也还会存在，官僚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

平，并且还以“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的那个绝妙的理由，就是过去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斯坦在他的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斯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解释的英国工联的经验。据说，工联根据自己七十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来代替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隶制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制度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不公平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行政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自己来参与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用自己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在公社所采取的实际办法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一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内阁和官吏可

不行呵！”——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象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只须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和怎样去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指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指那些跟着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拚命的策略，而不采取那种以大无畏的精神并根据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革命地完成具体任务的策略。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勇气百倍地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要看到公社在数星期内就能够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上述种种办法来扩大民主和根绝官僚制。我们要学习公社社员们的革命勇气，要看到他们的实际办法就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能立刻实现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劳动日，发动群众去建设新生活，使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毫无例外地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迁就（*entgegenkommende*）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Verschiebung*）……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

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迁就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一定会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因为他们都赞成争取一个“迁就无产阶级的”政府。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是“二者之间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一定会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因为他们完全同意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争取“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和争取驾于政府之上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目的，它是机会主义者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点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会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 *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社会主义月刊》派（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坦的那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¹⁶³，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和

王德威尔得¹⁶⁴，在意大利党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¹⁶⁵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关费边社分子和“独立党人”（即“独立工党”³²，实际上它是始终依附自由派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先生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的而且往往是主要的作用，他们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毫无重大的区别。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了无数空隙。

现在，为了解决究竟由英国或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或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国家及其因帝国主义竞赛而加强的军事机构已经变成了屠杀千百万人民的军事怪物，在这个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①

① 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

“第七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自然，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能谈一谈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政权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初 版 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两月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大纲。但是，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二分册（关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许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

作 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彼得格勒

写于1917年8—9月
1918年“生活和知识”
出版社用单行本刊印

按1919年“共产党人”
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原文
刊印并根据手稿和1918年
的版本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5卷
第371—479页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¹⁶⁶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现时占优势的各“社会主义”政党，散布一种机会主义的谎话，说什么准备起义以及一般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布朗基主义”¹⁶；这是这些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曲解。

机会主义的首领伯恩斯坦由于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早已弄得声名狼藉，现时的机会主义者又叫喊什么布朗基主义，其实他们一点也没有刷新和“丰富”伯恩斯坦的贫乏“思想”。

竟有人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而诬蔑他们是布朗基主义！难道有比这样曲解真理更令人气愤的事吗？因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正是马克思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肯定、最准确、最无可争辩，正是他把起义叫作艺术，他说，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须赢得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惶失措的时候，不停地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等等。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

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

在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还不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

为什么应当承认正是目前的时机是我们党必须承认起义已经被客观事变进程提到日程上来，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时机呢？要证明这一点，也许最好使用比较法，把7月3—4日的情形⁸⁴和9月间的情形对照起来看一看。

在7月3—4日，也许还可以不违反真理而这样提出问题：夺取政权也许更正确些，因为敌人反正是会诬蔑我们暴动，把我们当作暴动者惩办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当时必须夺取政权的结论，因为当时还没有具备使起义获得胜利的客观条件。

(1)当时作为革命先锋队的阶级还没有拥护我们。

当时我们在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中间还没有获得多数。现在我们已经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多数。⁸⁷这种多数只是经过了七八月的事变，经过了“惩办”布尔什维克和科尔尼洛夫叛乱才形成的。

(2)当时还没有全民的革命高潮。而现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已经有了这种高潮。外省的情形和许多地方苏维埃夺得政权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3)当时在我们的敌人中间以及在三心二意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没有发生整个政治上的严重动摇。而现在却发生了很厉害的动摇。我们的主要敌人，即协约国的和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因为“协约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脑），在究竟战到最后胜利还是实行单独媾和来反对俄国的问题上已经动摇不定。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显然失去人民中的多数之后，也极厉害地动摇起来，放

弃了同立宪民主党人⁴ 联盟即联合的政策。

(4)所以说,在7月3—4日举行起义就是犯了错误,因为当时我们无论在实力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权。尽管彼得格勒有时也会在我们手中,我们在实力上还是不能保持政权,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人和士兵还不会为占领彼得格勒而死战,他们还没有这样“凶狠”,他们无论对克伦斯基之流或者对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都还没有这样切齿痛恨,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亲眼看到社会革命党人¹²和孟什维克参加迫害布尔什维克,从而受到锻炼。

在7月3—4日的时候,我们在政治上也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军队和外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是可能而且一定会向彼得格勒进攻的。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现在阶级的大多数,即能够引导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拥护我们。

现在人民的大多数已经拥护我们,因为切尔诺夫退出政府的举动,虽然远不是唯一的标志,但是极为明显的标志,它说明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联盟(以及从社会革命党人本身)是得不到土地的。而这一点正是革命带有全民性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的党所处的地位也对我们有利,这时整个帝国主义以及整个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都发生了空前的动摇,而我们的党却切实懂得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胜利的保证,因为人民快要完全绝望了,而我们给全体人民指出了正确的出路,我们“在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日子”向全体人民显示了我们的领导作用,后来我们又向联盟派提出妥协的建议,而且在他们始终动摇不定的情形下遭到了他们的

拒绝。

如果现在以为我们的妥协的建议还没有遭到拒绝，以为民主会议⁸¹还会接受这个建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妥协是由一个政党向其他政党提出来的，不然就没有可能提出来。其他政党已经拒绝了。民主会议只不过是一个会议罢了。千万不要忘记，民主会议里并没有大多数革命人民的代表，没有义愤填膺的贫苦农民的代表。它是少数人民的会议，决不能忘记这个明显的真理。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就成了不可救药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布自己为议会，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

现在我们具备了起义胜利的一切客观前提。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有利，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消除一切使人民受折磨的动摇，才能消除世界上这种最折磨人的东西；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粉碎用单独媾和的手段来反对革命的鬼把戏，才能公开提议迅速缔结更全面、更公正的和约，有利于革命的和约，来粉碎这种鬼把戏。

最后，只有我们党在起义中获得胜利，才能拯救彼得格勒。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和平提议竟遭到拒绝，如果我们连停战都得不到，那时我们就要作“护国派”，就要作各主战政党的首领，就要作最“主战的”政党，我们就要以真正革命的方式进行战争。我们将夺取资本家所有的面包和靴子。我们只留给他们一些面包皮，我们要叫他们穿草鞋，我们将把所有的面包和靴子都送到前线去。

那时，我们一定能捍卫住彼得格勒。

进行真正的革命战争的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或者精神资源，俄国都还非常丰富。德国人至少会跟我们停战，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而在目前赢得停战，就无异是战胜了全世界。

* * *

既然我们意识到绝对必须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举行起义来挽救革命，来消除两个帝国主义者联盟通过“单独媾和”瓜分俄国的危险，那末：第一、我们应该使我们自己在民主会议上的政治策略适应于日益成熟的起义条件；第二、我们应该证明，我们不是只在口头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思想。

我们应该立刻在民主会议中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追求数量，不要怕把动摇分子留在动摇分子的营垒中，他们留在那里要比蹲在坚决忠诚的战士的营垒里对革命更有利。

我们应该写一篇布尔什维克的简短的宣言，用最有力的词句着重指出：冗长的演说以及一般“演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挽救革命；绝对必须同资产阶级一刀两断，撤换现政府的全部官员，同准备通过“单独媾和”来瓜分俄国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完全决裂；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掌握。

我们的宣言应当结合纲领草案，以极其简短有力的词句说出这个结论：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没收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制裁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生产的行为。

这个宣言愈简短愈好，愈有力愈好。在宣言中还必须明确指出极其重要的两点：人民已经吃尽了动摇不定的苦头，受尽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犹豫不决的折磨；我们必须同这两个政党彻底决裂，因为它们背叛了革命。

另一点是：我们要立刻提议缔结不割地的和约，立刻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断绝关系，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或者马上赢得停战，或者使整个革命的无产阶级转到保卫国家方面来，使革命民主派在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真正正义的、真正革命的战争。

我们既然宣读这篇宣言，号召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空话，号召行动起来而不是写决议案，那就应当把我们整个党团都派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里才是我们党团工作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活动的中心，那里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源泉，那里才是民主会议的推动力。

在那里，我们应该作慷慨激昂、充满热情的演讲来说明我们的纲领，并且这样提出问题：要就是民主会议全盘接受这个纲领，要就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正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团都集中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末我们就能正确估计开始起义的时机。

既然要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末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保罗要塞，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向市中心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战，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

当然，这不过是大概地谈谈，以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期不象对待

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忠于革命。

尼·列宁

写于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

1921年第一次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

按杂志原文刊印并根据打字副本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0页

革命的任务

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和平和自由的事业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顺利、和平、迅速、平静地获得胜利。

俄国革命的进程向我们表明了实践上的这些动摇。我们决不对社会革命党¹²和孟什维克党抱幻想，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我们无产阶级的道路上。贫苦农民的穷困，战争和饥荒的惨状，这一切愈来愈明显地向群众表明：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

小资产阶级希望同资产阶级“联合”、同资产阶级妥协，希望能够“平静地”等待“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等等。他们这些“和平的”希望都被革命的进程残酷无情地打破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是最近的一次惨痛教训，是在各地的资本家和地主欺骗工农、军官欺骗士兵等等的千万个小教训上又添上的一次最大的教训。

在军队、农民和工人中间，不满、愤慨和怨恨的情绪日益增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什么都答应而又不兑现，这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推动他们走上起义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的左派反对派(斯皮里多诺娃等)和孟什维克中间的左派反对派(马尔托夫等)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这两个

党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中已经占百分之四十。而在下层，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特别是在贫苦农民中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多数都是“左派”。

科尔尼洛夫叛乱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学到了好多东西。

还不知道：现在苏维埃会不会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走得更远些，从而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或者苏维埃仍旧在原地踏步不前，从而使无产阶级起义的爆发成为必然的。

这一点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释我们的纲领，说明它的全民性质，说明它是绝对适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以下各节就是我们解释这个纲领的一次尝试。

我们要尽量把这个纲领带到“下层”去，带到群众中去，带给职员、工人和农民，不仅要带给受我们影响的农民，而且特别要带给受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农民，带给非党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民。我们要尽量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能独立判断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决议，向民主会议⁹¹、苏维埃、政府派遣自己的代表团。这样一来，不管民主会议的结果如何，我们的工作总不会徒劳无益。无论对于民主会议，无论对于立宪会议的选举或者一切政治活动，我们的工作都是有用的。

生活教导群众认识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从4月20日到科尔尼洛夫叛乱，“时间虽十分短促，而经历却非常丰富”。

群众的经验，被压迫阶级的经验，使他们在这一时期内学会了很多东西，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完全离开了群众。这一点正是在最具体的纲领上应该最正确地表现出来，因为

这个纲领终究会交给群众讨论的。

同资本家妥协的危害性

1. 如果照旧让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使人数不多)掌握政权,让象阿列克谢也夫、克列姆博夫斯基、巴格拉齐昂、加加林等将军这样明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掌握政权,或者让那些在资产阶级面前软弱无力但却善于摹仿波拿巴的克伦斯基之流掌握政权,那就是对饥荒敞开大门,对资本家故意加速、加深的必不可免的经济崩溃敞开大门,另一方面,也就是对军事崩溃敞开大门,因为军队痛恨大本营,他们决不会满腔热忱地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此外,如果照旧让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掌握政权,他们一定会象在加里西亚和里加干过的那样,故意给德国人开放战线。只有根据下面的新原则建立新政府,才能防止这一点。在有了4月20日以来的全部经验以后,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旧同资产阶级妥协,不管是怎样的妥协,那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

政权归苏维埃

2. 全部国家政权应当根据一定的纲领并且在政府完全对苏维埃负责的条件下交给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各地苏维埃应当立刻改选,以便总结最近几个星期来全体人民在革命中取得的内容极其丰富的经验,并且消除有些地方一直没有纠正的极不公正

的现象(例如选举时不按比例、不平等,等等)。

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机关的地方和在军队中,全部政权应当完全交给地方苏维埃和它们选出的政治委员,或者交给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其他机关。

全国各地应当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把工人和革命军队,即实际已经证明能够镇压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军队,无条件地武装起来。

给各国人民以和平

3. 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即同时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工农群众)提出马上根据民主条件缔结全面和约,马上签订停战协定(哪怕停战三个月也好)。

民主和约的主要条件是放弃兼并(掠夺),这并不是说归还各个列强失去的东西,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唯一正确的理解是:无论欧洲或者殖民地的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得到自己决定成立单独的国家或者加入任何别的国家的自由和可能。

苏维埃政府既然提出和约条件,自己就应当立刻实行这些条件,就是应当公布并且废除那些一直束缚着我国的秘密条约,即沙皇签订的准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其次,我们必须立即满足乌克兰人和芬兰人的要求,保证他们和俄国境内的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有充分的自由,直到分离的自由;对于整个阿尔明尼亚也要采取同样的原则,我们必须让出阿尔明尼亚和被我们占据的土耳其领土。

这样的和约条件是不会受到资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

国人民极大的同情，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性战争的一致愤恨，这样，我们提出的停战和开始和谈的要求就很有可能立刻被接受。因为，工人反对战争的革命正在各地不可遏止地高涨着，要推进这个革命，决不能空谈和平（一切帝国主义政府早就用空谈在欺骗工人和农民，我们的克伦斯基政府也不例外），而只有同资本家决裂并提出和约。

如果任何一个交战国连停战的要求都不肯接受（这种可能性很小），那末，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战争就是真正被迫进行的，就是真正的正义战争和防御战争。单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这一点的认识，就会使俄国在军事方面加强好多倍，特别是在同掠夺人民的资本家完全决裂以后；更不用说，到那时候我们方面进行的战争将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成为同一切国家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了。

在这里必须特别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话。他们说：要是我们破坏同英国及其他国家资本家结成的目前这种掠夺性的同盟，他们就会使俄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害。这种话往往被一些胆子最小的人和小市民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谎话，因为“协约国的财政支持”是要使银行家发财，它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不过是绞索对被绞死的人的那种支持。俄国有足够的粮食、煤炭、石油和生铁，不过要做到正确地分配这些产品，必须赶走剥削人民的地主和资本家。至于说到目前协约国方面对俄国人民的可能的军事威胁，有人推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似乎会把他们的军队同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进攻提出公正和约的俄国，这种推测显然是荒谬的；至于英国、美国和日本，即使它们向俄国宣战（这是它们万难做到的，因为这样的战争极不得人心，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瓜分亚洲，特别是由于掠夺中国而发生了物质利益的冲突），也不会使

俄国受到它在同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作战时所受到的损失、所遭到的灾难的百分之一。

土地归劳动者

4. 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宣布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把这些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地主的农具也应当交给这些农民委员会支配，以便无条件地首先交给贫农无偿地使用。

绝大多数农民早在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上和在各地方寄来的数百份委托书上（在《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¹⁶⁷所载的由二百四十二份委托书写成的综合材料中也可以看到）提出了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是非常迫切需要的。农民在“联合”内阁时期已经尝够了拖延的苦头，再不能容许丝毫拖延了。

凡是拖延这些措施政府，都是反人民的政府，工人和农民应当举行起义来推翻、打倒这样的政府。相反地，只有实行这些措施政府，才会是全民的政府。

防止饥荒和经济破坏

5. 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消费实行工人监督。5月6日以来的经验证明，不采取这项措施，一切改良的诺言和打算都会落空，而威胁着全国的饥荒和空前未有的灾难则一星期比一星期迫近。

必须立刻把银行、保险事业以及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石油、煤炭、冶金、制糖等）收归国有，同时必须无条件地取消商业秘密，并且规定由工人和农民严格地监督一小撮资本家，因为他们一向靠供给国家商品发财，拒绝账目公开，逃避合理的利润税和财产税。

这些措施对于平均分挑战争重担说来是绝对公平合理的，对于防止饥荒说来是刻不容缓的，因为这些措施并不剥夺中农、哥萨克和小手工业者一个戈比的私有财产。只有制止资本家的抢劫行为，禁止他们故意停顿生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实行粮食同工业品的正常交换，并且使富人隐藏起来的数十亿纸币流回国库。

不实行这些措施，就不能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因为地主的土地大部分都抵押给银行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的。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最近通过的决议中（《工人报》⁵²第152号），不仅承认政府的措施（如提高粮价使地主富农发财）极端“有害”，不仅承认“政府所设调整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甚至还承认这个政府“违背法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执政党承认这些事实，再一次表明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十分罪恶的政策。

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6. 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的叛乱得到了以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⁴为首的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支持。这已经由《中央执

行委员会消息报》⁷⁶公布的事实完全证实了。

可是，在彻底镇压这次反革命叛乱方面，甚至在调查这次叛乱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也决不可能在这些方面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不管是什么委员会，如果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就不能进行彻底的调查和逮捕罪犯等等。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逮捕科尔尼洛夫分子将军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头子(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列布申斯基、马克拉柯夫等)，取缔反革命组织(国家杜马和军官联合会等)，把参加这些组织的人交给地方苏维埃监视，解散反革命军队，以保证俄国不致发生有人必然试图加以重演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彻底地公开地调查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案件和其他一切案件，哪怕是资产阶级起诉的案件也包括在内；只有这样的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才会号召工人完全服从它和协助它。

资本家利用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数百万金钱，霸占最大的印刷厂和大部分报纸，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封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纸(《言论报》⁶³、《俄罗斯语言报》⁶⁸等)，没收它们的印刷厂，宣布报纸上登载私人广告的事业由国家垄断，私人广告应当交给由苏维埃发行的、向农民讲真话的政府报纸登载。只有这样才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走(也应当夺走)这个用来任意造谣诬蔑、欺骗人民、把农民引入迷途、筹划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革命的和平发展

7. 目前在俄国民主派面前，在苏维埃面前，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面前，出现了革命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是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而不再拖延、保证国家不致遭到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崩溃、保证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

如果苏维埃现在独占地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以执行上述纲领，那末，苏维埃就不仅会得到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即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且会激起军队和大多数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热情，没有这种热情就不能战胜饥荒和战争。

现在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只要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就会和平地交出政权。只要工人和农民起来监视剥削者，没收抗拒分子的全部财产并暂时逮捕他们，就足以制止资本家抗拒苏维埃纲领的行动。

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斗争并通过实践来考验它们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末从4月20日的运动起到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止的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已经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不可避免的崩溃将使这一战争日益迫近。人们的理智能够考虑到的事实和理由都说明，这

次战争的结局一定是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取得彻底的胜利，使上述纲领得以实现；但是它也可能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战争，要使好几万地主、资本家和同情他们的军官丧命。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而不实行上述纲领就不能挽救革命。但是如果苏维埃抓住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那末无产阶级一定会全力支持苏维埃。

载于1917年10月9日和10日
(9月26日和27日)《工人之路报》
第20和21号

署名：恩·卡·

按《工人之路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42—51页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再版序言

从正文里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9月底开始写，10月1日写成的。

10月25日的革命，已经把这本小册子提出的问题从理论变成了实践。

现在应当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理论根据，是不堪一驳的。这些论据已经被推翻了。

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证明工农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生气勃勃，真诚正直的农民，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一定会用全副精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问题。

干起来吧，大家都干起来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应当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

尼·列宁

1917年11月9日于彼得堡

1918年第一次载于彼得堡出版的《士兵和农民丛书》中尼·列宁写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从《言论报》⁶³到《新生活报》⁷⁸，从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立宪民主党人⁴到半布尔什维克，总之，除布尔什维克以外，所有一切派别在什么问题上的见解是一致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或者即使敢于夺取并且夺到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极短暂的时期也保持不住。

如果有人问，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某些极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狂信者”才会认为这个问题是现实的，那末我们就要一字不改地引用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的声明，并且驳斥这种论调。

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敢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谈几句。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⁷³上对策烈铁里部长的某次发言当场大声提出的指责中，已经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复¹⁶⁹。而且，不论在报刊上或者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听到布尔什维克发表过关于我们不应当单独夺取政权的声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一般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

现在，我们来引用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¹²和半布尔什维克（我倒更愿意称他们为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在我们关心的这

一个问题上所发表的声明。

9月16日《言论报》的社论说：

“……亚历山大剧院的大厅里笼罩着分歧和瓦解的气氛，社会党人的报刊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有十分明确、直截了当的观点。在民主会议⁹¹上，这是少数人的观点。然而在苏维埃里，却是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尽管布尔什维克言词激昂，自吹自擂，摆出十分自信的姿态，但是他们除了一小部分狂信者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在一张嘴上勇敢。他们本身没有夺取‘全部政权’的愿望。他们大部分是一些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实质上是一群胆小鬼，他们心灵的深处深切地了解自己腹中空洞无物，也了解自己目前的成就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也象我们大家一样非常清楚：他们彻底胜利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迅速垮台的第一天。他们按本性来讲是一些毫不负责的人，按方法和手段来讲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能算作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流派，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偏向。要想永远摆脱和根除布尔什维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如果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尝试难以实行并且有招致毁灭的危险，那就不妨舍命逞一下英雄。我们再说一遍，幸亏这些可怜的当代英雄决不想真正夺取全部政权。在任何条件下，创造性的工作都是他们难以胜任的。因此，他们的十分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态度，只能表现于政治讲坛上和群众大会上的空谈。实际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的立场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是，这种立场在某一方面也取得了某些实际结果：它把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派别联合起来反对对自己……”

立宪民主党人是这样议论的。现在请看俄国最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⁹³ 9月21日的一篇同样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社论中：

“……如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资产阶级不愿意根据民主会议批准的纲领同民主派合作，那末，联合内阁就应当从民主会议的成员内部产生出来。这对拥护联合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牺牲，但是，宣传政权的‘纯粹路线’思想的人也应当作这样的牺牲。不过，我们担心在这方面也可能达不成协议。

那就只有第三种即最后一种办法了；政权应当由民主会议中原则上拥护清一色的政权思想的那一半成员来组织。

明确地说，就是布尔什维克必须组阁。布尔什维克极力把仇视联合的思想灌输给革命民主派，答应在消灭‘妥协主义’以后给他们各种好处，并且说妥协主义是我国一切灾难的根源。

如果布尔什维克了解自己的鼓动，不欺骗群众，那末他们任意发出的支票就应当兑现。

问题非常明显。

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他们仓卒创立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

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

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种办法，三条道路，其他的办法和道路是没有的！”（着重号是《人民事业报》自己加的。）

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议论的。最后，请看新生活派“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如果脚踏两只船的企图也可以称作立场的话）。下面这一段话摘自9月23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社论：

“……如果再同柯诺瓦洛夫、基什金一起组织联合内阁，那就只能表示民主派又一次投降，表示撤销民主会议的关于根据8月14日的纲领成立责任政权的决议……”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清一色的内阁，就象在联合内阁里担任责任阁员的社会党人一样，很难体会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内阁不但不能把革命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也不能指望从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那里得到多少积极的支持。

但是组织另一种清一色的内阁，即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这也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更坏的出路，其实这不是出路，简直是死路。诚然，这样的口号谁也没有提出过，只是《工人之

路报》¹⁷⁰上对此有些偶然的、畏首畏尾的说明，以后又不断加以‘解释’。（这些责任政论家连9月21日《人民事业报》的社论也忘掉了，居然“胆敢”写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

“现在，布尔什维克又正式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七月事变之后，当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代表的苏维埃明确地走上积极反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时候废除的。现在不仅可以认为‘苏维埃路线’是经过纠正的路线，并且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到，在准备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布尔什维克将获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旨在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策略路线’。其实，苏维埃也可以理解为农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依靠俄国绝大多数民主分子的政权。但是这样一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失去独特的意义，因为它使苏维埃成为在组织成分上同民主会议所组织的‘预备议会’几乎相同的东西……”（《新生活报》的论断是最无耻的谎话，等于说，冒牌和伪造的民主同民主“几乎是相同的东西”；预备议会是伪造的，它是以少数人，特别是以库斯柯娃、柏肯盖姆、柴可夫斯基之流的意志来冒充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甚至在阿夫克森齐也夫和柴可夫斯基之流所伪造的农民苏维埃派去出席民主会议的人中间，反对联合的人也占很大的百分比，如果这些人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在一起，结果必然是联合政策垮台。第三，“政权归苏维埃”就是说，农民苏维埃的政权主要是分布在农村中，而在农村中是可以保证贫苦农民占优势的。）“……既然两者都是同样的东西，那末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就应当立刻取消。如果‘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只是掩饰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那末这样的政权所表明的正是革命的破产和失败。

由于无产阶级不仅脱离了国内其他阶级，而且也脱离了民主派的真正生气勃勃的力量，它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在环境非常复杂的条件下开动这个机构，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扫除掉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会附带地扫除掉整个革命。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

目前唯一符合时局要求的政权，就是由民主派内部真正诚心诚意地组织联合内阁。”

* * *

请读者原谅，我们摘引了这样多的话，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须确切地介绍一下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各个党派的立场。必须确切地证明这种极为重要的事实：所有这些党派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不仅是十分现实的问题，而且也是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立宪民主党人到新生活派，“大家”都确信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所持的理由。

一本正经的《言论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不过是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话把布尔什维克痛骂了一顿。顺便说一下，我们引用的话也表明，如果以为《言论报》在“煽动”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因此大喊大叫：“同志们，当心些，敌人劝我们去做的是不是好事！”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不认真地考虑一般的和具体的见解，就“一心以为”资产阶级在“煽动”我们去夺取政权，那我们就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因为资产阶级一定永远会恶毒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要引起千万种灾难，永远会恶毒地叫嚣：“最好是让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然后把他们彻底打垮，这样就可以马上‘永远’摆脱布尔什维克了。”这种叫嚣也可以说是一种“煽动”，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煽动。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者根本

没有“劝”我们而且从来没有“劝”我们夺取政权。他们只不过想用似乎是无法解决的执政的任务来吓唬我们。

不，我们不应当被吓坏了的资产者的叫嚣吓倒。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无法解决的”社会任务，而马上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作为摆脱极端困难的状况的唯一出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任务，但是，只有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解决。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末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获得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巩固的胜利。

我们要十分认真地讨论一下使某些个别时刻变得对我们不利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让资产阶级疯狂的叫嚣吓倒，也不会忘记，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确实成了十分迫切的问题。现在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是对我们的党有莫大的危险的，这种危险比我们认为夺取政权“为时过早”的危险还要大得多。在这方面，现在决不可能说什么“为时过早”，因为千百万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一两件例外。

对《言论报》的恶毒的谩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背诵几句诗：

我们听到的赞许声音，
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
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171

资产阶级对我们这样切齿痛恨，这个事实也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一个真理：我们正确地给人民指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和方法。

* * *

非常难得，这一次《人民事业报》没有赏我们一顿痛骂，但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只是企图间接地、暗示地以“布尔什维克必须组阁”的趋势来吓唬我们。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社会革命党人在

吓唬我们的时候，自己却毫不作假地被吓倒了，被吓坏了的自由主义者的怪影吓得魂不附体了。我可以同样肯定地说，在某些特别高级和特别腐朽的机关里，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类似的“联络”（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触的，老实说，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勾勾搭搭的）委员会⁸⁹里，社会革命党人也能吓倒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第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议会”等等这一切机关里，空气坏到极点，臭得令人作呕，长久地呼吸这种空气对任何人都是有害的；第二、不作假是有传染性的，毫不作假地被吓倒的庸人甚至能把个别革命者暂时变成庸人。

尽管“按人之常情”来说，一个不幸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当过部长或者处于能在立宪民主党人面前当阁员的地位的社会革命党人毫不作假地被吓倒，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让别人把自己吓倒，就等于犯了很容易弄到背叛无产阶级的地步的政治错误。老爷们，把你们的切实的理由摆出来！不要妄想我们会被你们的恐惧心理吓倒！

* * *

这一次，我们只在《新生活报》上找到一些切实的理由。《新生活报》这次所扮演的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扮演这种角色对它来说，要比扮演使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¹⁷²显然感到“怪难为情”的布尔什维克的辩护士的角色更合口味些。

这位辩护士提出了六个理由：

- (1) 无产阶级“脱离了国内其他阶级”；
- (2) 无产阶级“脱离了民主派的真正生气勃勃的力量”；
- (3) 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
- (4) 无产阶级“不能开动”这个机构；
- (5) “环境非常复杂”；

(6) 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扫除掉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会附带地扫除掉整个革命”。

《新生活报》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实在笨得令人可笑，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是这一阶级的主要代表）和无产阶级。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时，说无产阶级脱离了其他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

《新生活报》大概是想说，无产阶级脱离了农民，因为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决不会是地主。但是也不能很明确地说，无产阶级现在脱离了农民，因为这种说法十分荒谬是太明显了。

很难设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象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很少脱离小资产阶级；请注意，这是指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在客观的不容争辩的材料中，我们有一些最近的材料，它们说明了策烈铁里“布里根杜马”¹⁷³，也就是声名狼藉的“民主”会议的“各选民团”赞成和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表决情况。试以苏维埃的选民团作例子，情况如下：

	赞成联合的	反对联合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	83	192
农民代表苏维埃·····	102	70
总 计	185	262

可见总起来说，多数人是拥护无产阶级的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口号的。同时从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苏维埃里面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增长。要知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民主会议，是由苏维埃的昨天的领袖，即在中央机关中拥有可靠的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召集的会议！显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拥有的真正的优势，在这里是被缩小了。

无论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上，或者在立刻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目前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里都已经得到了多数的拥护，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9月24日的《工人之路报》第十九号转载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¹⁷⁴第二十五号上发表的关于9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消息。在这个会议上，主张无限制联合的有四个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萨马拉省和塔夫利达省）；主张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的有三个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和黑海省）和两个军队的执行委员会；而反对联合的有二十三个省和四个军队的执行委员会。

可见，大多数农民是反对联合的！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无产阶级脱离了国内的其他阶级”。

此外还应当指出，主张联合的有三个边区省（萨马拉省、塔夫利达省、黑海省）和四个工业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科斯特罗马省和莫斯科省）。在前三个边区省中，剥削雇佣工人的富有的农民和大地主比其他各省多得多，在后四个工业省中，农民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俄国大多数省份强得多。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材料收集起来，看看有没有关于那些有最“富有的”农民的省份里的贫苦农民的资料，那倒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集团”使反对联合的人占了很大的优势，四十票对十五票。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之流对俄国受歧视的民族采取的兼并和横施暴力的政策，产生了应有的结果。现在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居民群众，即它们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超过了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因为在这些地方，历史已经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提到日程

上来了。资产阶级卑鄙地背叛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无产阶级则永远忠于这一事业。

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现今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急待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容争辩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无产阶级一点也不“没有脱离国内其他阶级”。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这两个问题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行坚决的、真正“革命民主派的”政策，这个政策会立刻保证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仅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而且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真正爆发出来，因为群众将从政府那里第一次看到，不是沙皇制度下的地主残酷地压迫农民和大俄罗斯人残酷地压迫乌克兰人的政策，不是在花言巧语掩盖下利用共和国来继续实行这类政策的意图，也不是挑剔、凌辱、诬蔑、拖拉、阻难和搪塞（也就是克伦斯基赐给农民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那一切），而是事实俱在的热烈同情，而是反对地主的紧急的革命措施，而是立刻恢复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穆斯林等等的充分自由。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老爷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拉拢合作社派的半立宪民主党人上层分子来帮助自己执行反对群众的反动民主政策。因此，对于实际政策的某些事项，例如是不是应当立刻把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是不是应当满足芬兰人或乌克兰人的某些要求等等，他们始终不敢征求群众的意见，不敢举行全民投票，甚至不敢在各个地方苏维埃、各个地方组织中进行表决。

而和平问题呢？这是现代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似乎无产阶级“脱离了其他阶级……”其实无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是各个阶级中一切生气勃勃、真诚正直的分子的代表，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到政权

以后才会立刻向各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只有无产阶级才会采取真正的革命措施（公布秘密条约等等），来尽可能快地取得尽可能公正的和平。

不，《新生活报》的老爷们叫嚣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这只能表明他们自己主观上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毫无疑问，俄国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没有“脱离”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即取得了“联合”的惨痛教训之后，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

* * *

第二个理由是无产阶级“脱离了民主派的真正生气勃勃的力量”。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实在费解。大概这是象法国人在这种场合常说的那样，“讲的希腊话”。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是一些能当部长的角色。他们完全有资格在立宪民主党人手下充当部长。因为对这种部长所要求的无非是善于说冠冕堂皇、八面玲珑、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空话，这种空话可以用来掩盖一切丑恶行为，因此一定可以博得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定会鼓掌赞成新生活派认为无产阶级脱离了民主派的真正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说法，因为这无异是间接地说（也许这在他们听来好象是直接对他们说）：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是“民主派的生气勃勃的力量”。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是死气沉沉的力量。这一点已经由联合的历史证实了。

新生活派被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氛吓倒了，竟把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重大差别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右

翼孟什维克，如《人民意志报》¹⁷⁵和《统一报》¹³等等当作“生气勃勃的”力量。而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跟群众而不是跟富农有联系的力量，只有那些受到联合的教训因而抛弃联合的力量，才是生气勃勃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左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积极的生气勃勃的力量”的代表。这个左翼的加强（特别是在七月反革命事变⁸⁴以后），就是表明无产阶级没有脱离其他民主力量的一个最可靠的客观标志。

最近社会革命党中派向左动摇的事实更加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切尔诺夫9月24日发表的声明就是这种动摇的证明，他说他那一派不赞成重新同基什金之流联合。从社会革命党在城市、尤其是在农村所得的选票的数目来看，这个党是目前占优势和居于主要地位的政党，而在这个党内中派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它的中派向左动摇的事实足以证明上述《人民事业报》的声明，即关于民主派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保证给”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充分的支持”的声明，决不是一句空话。

社会革命党的中派拒绝重新同基什金联合的事实，以及外省孟什维克护国派（高加索的饶尔丹尼亚等）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优势的事实，都是客观证据，证明相当一部分一直跟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群众将支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这就说明了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决没有脱离民主派的生气勃勃的力量。

* * *

第三个理由：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也许这是最普通最流行的理由。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这个理由指出了摆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所以它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毫无疑问，这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假

使我们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指出这个困难仅仅是为了逃避完成这种任务，那末我们实际上就同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差别了。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困难，应该唤起无产阶级的拥护者更仔细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

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新生活报》的撰稿人说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这个机构，这就暴露出他们非常愚昧无知，他们既不肯重视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又不愿看看布尔什维克出版物中早已说明的道理。

《新生活报》的所有撰稿人，都认为自己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也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可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破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①这本小册子中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分册已经印好，不日即可问世）。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构”。1917年4月4日以来，我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中也谈到过这一点。《新生活报》当然可以公开说他们根本不赞同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但是象这样一家经常傲慢地责骂布尔什维克对困难问题似乎采取了不严肃态度的报纸，公然对这个问题完全避而不谈，这无异是暴露了自己思想贫乏。

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和“开动这个机构”。但是，它能够把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和守旧性的东西以及其他

^① 见本卷第171页。——编者注

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打碎，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新生活报》居然把这个“国家机构”完全忘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新生活派在发挥自己的理论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无异是在政治理论方面干着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实践方面所干的事情。因为，既然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确实不需要任何新的国家机构，那末苏维埃也就失掉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权利了，那末科尔尼洛夫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消灭苏维埃的意图也就是正当的了！

如果我们注意到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新生活报》在彼得格勒市杜马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曾经同他们联合过）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某些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地方，那末《新生活报》这种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就显得越发骇人听闻了。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民主会议上宣读的苏维埃多数代表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由真正人民创造力的强大热潮建立起来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形成了一种革命国家机构的新组织，代替了旧制度国家机构的腐朽组织……”

这未免说得太漂亮了，就是说，在这里华丽的辞藻掩盖着政治上明确性的不足。苏维埃还没有代替旧“组织”，而且这个旧“组织”并不是旧制度的国家机构，它既是沙皇制度又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是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在这里毕竟要比新生活派高明得多。

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保证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同人民隔离，而是同人民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

大得不可比拟；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保证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手续而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证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良容易实行。第五，它保证有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有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以外，处在历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我国1905年的苏维埃，可以说只是腹内的胚胎，因为它们总共只存在了几个星期。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苏维埃的全面发展。在1917年的革命中也还谈不上这一点，因为几个月的时间太短促，尤其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糟蹋了苏维埃，把它们变成了清谈馆，变成了这些领袖的妥协政策的附属品。苏维埃在李伯尔、唐恩、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人领导之下活活地败坏了，腐朽了。苏维埃只有在夺取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天资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不是成为单纯的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就是成为玩具。“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使苏维埃陷入瘫痪状态。

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决不

能利用旧的机构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糟蹋苏维埃的悲惨历史，实行“联合”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苏维埃摆脱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历史，也就是苏维埃通过“炼狱”，即苏维埃实际领教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联合的全部卑鄙龌龊行为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个“炼狱”不是摧毁了苏维埃，而是使它们受到了锻炼。

* * *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密的、最负责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象司徒卢威那样死背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不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是把它当作一般政权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干脆用新生活派的口吻说不是实行工人监督，而是实行国家监督，那末结果就是一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话，实质上就是一个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式，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点也不反对工人参加“国家”监督。科尔尼洛夫分子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清楚，这种参加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上巧妙地收买一切格沃兹迭夫、尼基廷、普罗柯波维奇、策烈铁里之流以及所有这一伙匪徒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把它放在无产阶级专政后面，这是为了说明我们谈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末就有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机构，俄国工人群众在这个机构的统治下“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折磨”已经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

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工人监督就可能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到处通行的、最精密最负责的计算。

这是主要的困难，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维埃正在筹划无产阶级的这种可以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组织工作。

现在我们要谈国家机构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了。在现代国家机构中，除了常备军、警察、官吏这个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个同银行和辛迪加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的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个机构决不可以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而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产生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而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办事处——这已经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

这个“国家机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夺取过来”,把它“开动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是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阶级政府能够而且应当用一道命令把这些职员变成国家职员,这正象白里安及其他资产阶级部长这些资本主义看门狗用一道命令把罢工的铁路职工变成国家职工一样。我们需要而且能够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国家职工,因为资本主义简化了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使它们成为比较简单的、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记录工作。

把银行、辛迪加、商业等部门的大批职工“国家化”,无论在技术上(由于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或者在政治上,在苏维埃进行监督和检查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应当象对待资本家一样,一律“从严”。他们一定会象资本家一样起来反抗。一定要粉碎这种反抗;十分天真的彼舍霍诺夫象真正的“国家婴儿”一样,早在1917年6月就含糊地说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而无产阶级是一定要认真实现这句小孩子话,这句幼稚的豪言壮语的。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问题只是粉碎极少数人,简直可以说是一小撮人的反抗;职员联合会、工会、消费合作社和苏维埃将对他们每个人实行监督,使所有的齐特·齐梯奇⁹²之流都受到包围,就象法国人被困在色当城下一样。只要弄到一张经理、理事会理事、大股东等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齐特·齐梯奇的名

字。他们在全俄国总共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拥有苏维埃、职员联合会等机构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给他们每个人指定十个甚至一百个监督者，这样一来，甚至通过工人监督（监督资本家）也许就能使任何反抗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用不着去“粉碎反抗”了。

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现的他们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税率）的办法来代替没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帐目公开、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工人国家的工人监督。

强迫实行辛迪加化，即强迫在国家监督下实行联合，这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东西，这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实现了的东西，也是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东西，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万能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①。

* * *

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第四个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开动”国家机构。这个理由同前一个理由比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旧机构我们当然既不能掌握也不能开动。新机构苏维埃已经由“真正人民创造力的强大热潮”开动起来。不过必须解除领导这个机构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套在它身上的羸缚。这个机构已经开动起来，不过必须摒弃那些妨碍它飞速前进的畸形的小资产阶级赘疣。

^① 参看我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那里更详细地说明了强迫实行辛迪加化的意义。（见本卷第148—151页。——编者注）

为了补充以上的说明，还应当研究两点：第一，不是我们而是资本主义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第二，在管理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的事业中加强民主主义的意义。

粮食垄断和面包配给制不是我们而是进行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进行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建立了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象在它全部历史性的创造中一样，是要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得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臆造”和“凭空创造”这种武器。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是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是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的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一旦用来对付资本家和一般富人，一旦由工人用来对付这班人，它就会发挥出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开动”国家机构的力量，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监督和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只能起恐吓的作用，只能粉碎积极的反抗。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恐吓”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且还要粉碎消极的、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们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强迫他们在新国家组织范围内工作。“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担任新的国家职务。无论是对资本家，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以及某些高级职员等等，都应当如此。

我们也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进行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给了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那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

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

每个工人都要有一个劳动手册。那时，这个证件对他并不是一种侮辱，虽然现在它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证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证明。

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的制度（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绝大多数农民大概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用不着劳动手册的）。劳动手册将不再是“黑骨头”的标志，不再是“下”等人的证件，不再是雇佣奴隶制的证明。它将变成新社会里再也没有“工人”同时也没有一个人不是工作者的证明。

富人应当向最接近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工会或职员联合会领取劳动手册，并定期，例如每周，向同一联合会领取老老实实完成工作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不能领到面包配给证和其他食品。无产阶级的国家会说：我们需要从事银行事业和联合企业工作的优秀组织者（在这方面，资本家有比较多的经验，而使用有经验的人，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需要比从前多得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我们要所有这类工作人员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我们大概只能逐渐实行完全平等的工资制，在过渡期间要给这些专家保持比较高的工资，但是，我们要使他们受到工人的全面监督，我们要彻底地无条件地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我们决不虚构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良好的工厂、试验站、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夺取过来；我们还必须借用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

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可以用组织全体居民参加苏维埃的方法来粉碎，自然必须惩办特别顽强和进行抗拒的资本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把他们关进监

狱，但是同时，无产阶级的胜利一定会增加我今天在《消息报》⁷⁶上读到的那种情形。我们这样说，当然丝毫不会陷入空想主义，不会离开冷静地、实际地估计情况的立场。今天的《消息报》说：

“9月26日有两个工程师到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声明说，有一批工程师决定组织一个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协会。该协会鉴于现在实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所以决心听从工人群众指挥，愿意维护工人的利益，并且同各个工人组织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回答说，理事会愿意在自己组织中成立工程师部，该部应当把工厂委员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基本提纲列入自己的纲领。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和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团体的发起人近日将举行联席会议。”（1917年9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 * *

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开动国家机构。

1905年的革命以后，十三万地主管理了俄国，他们的管理方法就是对一亿五千万人无穷无尽地使用暴力，永无休止地进行侮辱，强迫大多数人民从事苦役和处于半饥饿状态。

而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来为穷人谋福利，反对富人。这二十四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一百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正是党员数目同党所拥有的选票数目的这种比例关系，已经由欧洲的经验 and 俄国的经验，譬如说，至少已经由彼得格勒杜马的八月选举确定了。因此，我们已经有一个由一百万思想上忠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个月的20号领取一大笔钱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绝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并且也不可能有的。这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为了说明运用这个绝妙方法是多么容易，它的效果是多么灵验，我们且举一个尽可能简单明了的例子。

国家有时要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常便饭，我们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也要做这样的事情。

资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无人工作而缴不出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一大帮法警、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需要一大队哥萨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法警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们知道，撵人搬家的情景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濒于绝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愤怒，激起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每分钟都可能把法警和民警队打成肉酱。需要强大的武装力量，还要从某一遥远的边区把几个团队调到大城市来，好使士兵不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而且不致“传染上”社会主义。

假设无产阶级国家需要用强迫的方式把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搬进富人住宅去。假设我们的工人民警队是由十五个人组成的，两个水兵，两个士兵，两个觉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一人是我们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一个知识分子和八个劳动贫民，这八个人当中至少必须有五个妇女、仆人、粗工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二男二女住着五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一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你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以前，你们必须挤一挤。你们的电话要十家共用。这样可以节省约一百个工时，不必跑小铺等等。其次，你们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轻微劳动的没有事干的半劳动力：十五岁的女公民和十四岁的男公民。他们每天要值班三小时，监

督十家的食品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记。我们队里的这位大学生公民马上就会把这个国家命令抄成两份，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字据，保证切实执行这个命令。”

依我看来，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同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情形就会是这样。

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粗工和任何一个厨妇都不是马上就能够管理国家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烈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先生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成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收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

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把民主主义教给人民。立宪民主党的女士们同意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最好的资料给女仆们作关于妇女平权的讲演。并且还准备在最近的音乐会上，在露天舞台上，在几千人面前表演接吻；演讲人立宪民主党的女士吻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吻前任部长策烈铁里，使感激不尽的人民受到一次实例的教育，知道共和制的平等、自由、博爱是什么……

是的，我们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策烈铁里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忠于民主主义的，并且他们正在人民中间宣传这种民主主义。可是，如果我们对于民主主义有某种另外的概念，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我们看来，为了减轻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的痛苦和灾难，为了

医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就需要实行革命的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上述例证中那种根据贫民利益分配住宅的革命措施。无论是城市或者农村的食品、衣服、靴鞋等以及农村的土地等都应该这样处理。我们可以立刻建立一个由一千万人，甚至由两千万人组成的国家机构，一个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国家机构来进行这样的管理国家的工作。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保证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同情。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觉悟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训练”（我们并没有白白地在资本主义那里受训练）而富有纪律性的工人，他们能够建立工人的民警队并逐渐把它扩充（立刻开始扩充）为全民的民警队。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领导，并且他们也能够吸引真正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

自然，这种新机构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但是，难道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吗？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以外，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要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即资产者、官吏和“社会主义”部长们企图按老办法管理国家，但又无法管理，结果七个月之后居然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激起了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向他们表明，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合理地最有秩序最有组织地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符合贫民的利益。不这样，就不能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真诚地、勇敢地、普

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狭隘的、旧的、官僚的力量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在群众的力量看来，在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胁之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看来，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

* * *

同国家机构问题有关的还有集中制问题，巴札罗夫⁷⁷同志在9月27日《新生活报》第一三八号《布尔什维克和政权问题》一文中，特别强调地，同时也特别不能令人满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巴札罗夫同志是这样议论的：“苏维埃不是适应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机构”，因为七个月的经验已经表明，“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有几十件、几百件书面材料”证实，苏维埃虽然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已拥有“全部政权”，但是“在消除经济破坏状态方面，并没有取得稍微令人满意的成就”。需要一个“按生产部门划分，在每个部门内实行严格集中制并服从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央”的机构。“问题”——请看——“不在于更换旧机构，而仅仅在于改良旧机构……不管布尔什维克怎样讥笑持有这种计划的人……”

巴札罗夫同志这种反映资产阶级观点，同资产阶级的论调完全一模一样的议论，简直是软弱无力得令人吃惊！

事实上，说苏维埃仿佛某时在俄国某地曾经一度拥有“全部政权”，这简直是可笑的（这不过是重复资本家的出于阶级私利的谎话）。全部政权要求有对全部土地，对一切银行，对一切工厂的控制权；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经验和关于政治同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科学材料的人都不能“忘记”这个“小小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就在于它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对苏维

埃采取的任何一种重要步骤都实行怠工，把持政府，控制土地和银行等等，可是把经济破坏的罪过推在苏维埃身上！！联合的全部悲惨经验也在于此。

苏维埃从来没有掌握过全部政权，它的措施除了起缓和作用和加剧混乱而外，什么结果也没有。

向布尔什维克，向这些按他们全党的信念、纲领和策略来讲都是集中主义者的人证明集中制的必要性，那简直是多此一举。《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对他们那个“全国性的”观点加以嘲笑的意思和意义。而新生活派没有了解这一点，又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嘴巴上而不是在脑子里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在死背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的时候，随时都会滚到那种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超阶级的观点”上去，并把这种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伎俩叫作“全国性的”计划。

可爱的人们，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更通俗一点讲：我们不是讥笑那些“计划”，而是讥笑巴札罗夫之流不了解，他们否认“工人监督”，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拥护资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无缥缈的空想。

从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对过苏维埃的集中制，反对过苏维埃联合起来。我们中间没

有一个人反对按生产部门成立工厂委员会，反对工厂委员会的集中化。巴札罗夫在无的放矢。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所要讥笑的都不是“集中制”，也不是那些“计划”，而是改良主义。因为在有了联合的经验之后，你们的改良主义是太可笑了。谁说“不在于更换机构，而仅仅在于改良”，谁就成了改良主义者，就成了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派分子。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

这正是半年来联合所尝试的东西。

我们所讥笑的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说：“是呀，正是呀，我们恰好不反对改良，我们主张工人参加全国性的监督，我们完全同意。”而巴札罗夫由于没有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细加思索，就上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圈套，于是好心的巴札罗夫在客观上就扮演了资本家应声虫的角色。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企图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们的下场，过去就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正因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都不能理解阶级斗争，所以他们的政策是十分可笑地永远动摇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可爱的公民们，去拟订“计划”吧，那不是政治，那不是阶级斗争的事情，在那一方面你们可能给人民带来好处。你们的报纸有许多经济学家。你们去同那些准备研究调整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工程师及其他人士联合起来吧，请你们要你们的大“机关”（报纸）拿出一个副刊来认真研究关于俄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关于银行和辛迪加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材料，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的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不致引起特别有害的影响，正是这种“计划”工作不致引起工人的讥笑，而会得

到工人的感谢。

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使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节省劳动的办法，探求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老老实实全面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

我们拥护集中制，也拥护“计划”，但是，我们拥护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制和计划，是无产阶级为了贫民、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反对剥削者而调整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制和计划。我们只同意把所谓“全国性”了解为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全部政权交给大多数人民，即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工人和贫苦农民。

* * *

第五个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因为“环境非常复杂”……

真是聪明人！他们也许情愿顺应革命，不过是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渴望这种革命的叹息，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的悲歌。即使革命开始时环境并不太复杂，革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造成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因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¹²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就是旧东西死亡的无比复杂的痛苦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生活方式的诞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而只有套中人¹⁷⁶才能认为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国内战争是可以设想的。

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末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

到树林里去。

第五个理由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因为其中既没有什么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没有任何别的思想。其中只有一些被革命弄得悲哀和恐惧的人们所发出的叹息。为了说明这种叹息的特点，让我来谈一下我个人的两个小小的回忆。

七月事变前不久，我同一个富有的工程师谈过一次话。这个工程师从前是一个革命者，做过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甚至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现在，他完全成了一个被吓倒了的人，成了一个对于情绪激昂、无法抑止的工人愤恨的人。他（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到过外国的人）说，假如这些工人能象德国那里的工人一样有多好呵，当然，我了解社会革命一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这里，在战争弄得工人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不是革命，这是毁灭。

要是历史好象德国特别快车进站那样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准时达到革命，他是肯承认社会革命的。文雅的乘务员打开车厢的门喊道：“社会革命站。全体下车(Alle aussteigen)！”那时，为什么不从齐特·齐梯奇之流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转到工人组织中的工程师的地位呢？

这个人见过罢工。他知道，就是在最和平的时候，一次最普通的罢工也总要掀起一场情绪激昂的狂风暴雨。他当然懂得，在阶级斗争唤起了一个全国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时候，在战争和剥削把千百万受地主数百年折磨、受资本家和沙皇官吏数十年掠夺和殴打的人民弄到几乎绝望的地步的时候，这种狂风暴雨必然要更加猛烈千万倍。他“在理论上”了解这一切，但他仅仅在嘴巴上承认这一切，他简直被“非常复杂的环境”吓坏了。

七月事变后，由于克伦斯基政府抬举我，给我一种特别关心的照顾，使我不得不转入地下。当然是工人把我们隐藏起来的。有

一次，在离彼得格勒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么好的面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给坏面包。我们早就不去想，在彼得格勒能给好面包。”

给七月事变作的这个阶级评价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从什么形势中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的道路，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口号和我们党的机构，以便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挨过饿的人还没想到过。面包对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一样。要运用极其复杂的方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最根本的问题，接近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

而被压迫阶级的代表，甚至待遇很好和非常有知识的工人，也都是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关键，单纯直率得惊人，信心坚定不移，观点极为明确，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整个世界被分成两个阵营，“我们”劳动者和“他们”剥削者。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丝毫不感到不安：这只是劳动跟资本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役。要砍木头就别怕木头屑飞开。

“革命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真令人难以忍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我们把‘他们’逼迫了一下，‘他们’已经不敢象先前那样耍无赖了。我们再逼迫一下，就可以完全把他们打倒了。”工人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 * *

第六个，即最后一个理由：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扫除掉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会附带

地扫除掉整个革命”。

先生们，请别吓唬人，你们吓不倒谁。我们已经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克伦斯基执政和它没什么两样）领教过这种敌对力量和它们的进攻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怎样扫除掉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和为数不多的特别富有、特别“敌视”革命的地方小地主阶层的代表曾处于多么可怜和无可奈何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看见了的，这是人民都还记得的。9月30日的《人民事业报》劝导工人在立宪会议召开（在反对起义农民的“军事措施”保护下召开！）以前要“容忍”克伦斯基执政（即科尔尼洛夫叛乱）和伪策烈铁里布里根杜马。《人民事业报》上气不接下气地再三重复《新生活报》的第六个理由，并声嘶力竭地喊道：“克伦斯基的政府决不听命。”（不听命于苏维埃政权，即不听命于工农政权，《人民事业报》为了不落在蹂躏者、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请看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

但是，无论《新生活报》或者《人民事业报》都吓不倒觉悟的工人。你们说：“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更简单明了、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克伦斯基政府要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事业报》的老爷们竟敢说，这似乎将是“国内战争”，这似乎是“可怕的前途”！

不，先生们，你们欺骗不了工人。这将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一小撮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绝望的骚动。或者，他们想“不听命于”人民，并且不顾一切地挑动人民大规模地重复在维波尔格对待科尔尼洛夫分子的行动，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想这样做，要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克伦斯基想这样做，他就会使人民怒发冲冠。但是，先生们，你们这样是吓不倒工人和士兵的。

真是卑鄙无耻到绝顶了：他们伪造了新布里根杜马，利用伪造手段招募了一些反动合作社派即农村富农当作帮凶，再加上一些资本家和地主（所谓有资格的分子），又企图利用这帮科尔尼洛夫匪徒来摧毁人民的意志，摧毁工农的意志。

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竟弄得农民起义象大河一样到处泛滥起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弄得爆发了农民起义…… 同一个《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9月30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在9月29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

“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做什么来消灭仍在俄罗斯中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

同一个《人民事业报》在9月29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革命的部长们的”行动方式“依然强烈地表现出斯托雷平式的手法”。换句话说，更简单明了地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廷、基什金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

“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他们在7月8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9月17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自食其言，甚至不顾孟什维克磨恩的劝阻而延期召开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11月底，而不是象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10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最近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能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能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军事措施的政府，即明目张胆地庇护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伪造选举的行为的政府会如期召开立宪会议。

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同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说：“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起义农民的政府！”

既然使几十万俄国士兵在6月19日之后的进攻中送了命，使战争拖延下来，使德国水兵不得不举行起义，把自己的长官投到水里，既然一味地空谈和平而不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向工人和农民，向朝不保夕的士兵说，“必须容忍”，要相信“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的政府，要再相信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一个月，也许他们在一个月中又会把几万士兵送到屠宰场……“必须容忍”。

难道这还不是恬不知耻吗？？

不，社会革命党的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是骗不了士兵的！

工人和士兵就连一天，连一个多余的小时也不会容忍克伦斯基政府了，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府将立刻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因此它一定能立刻停战并迅速缔结和约。

我们农民军队的士兵连一天，连一个多余的小时也不会容忍这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农民起义的克伦斯基政府违反苏维埃意志存在下去了。

不，社会革命党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再也骗不了工人和农民了！

* * *

在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的问题上，也就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新生活报》深信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扫除掉的那种进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逻辑上和政治上的非常惊人的错误，只有那些已经让别人吓得几乎神经失常的人才看不出来。

你们说：“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会扫除掉无产阶级专政。”说得好。不过可爱的同胞，你们都是些经济学家和有教养的人。你们都知道，拿民主来和资产阶级相比是无聊而愚蠢的事情，这好象拿斗来和尺相比一样，因为世上有民主的资产阶级，也有不民主的（能干出万第事件¹⁷⁷来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各种敌对力量”，这是一句空话。而阶级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拥护它的还有地主）。

俄国也象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成三种主要“力量”：资产阶级和地主，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首先是农民。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在俄国），正是有这三种主要“力量”，这不仅早已为科学的经济分析所证明，而且也为一切国家的整个近代历史的政治经验、为十八世纪以来所有欧洲革命的经验、为1905年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了。

那末，你们是想恐吓无产者，说资产阶级的进攻会把他们的政权扫除掉吗？你们的恐吓就是这个意思，也只有这个意思，此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内容了。

好吧。比方说，如果资产阶级能够扫除掉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那时就只有实行“联合”，也就是实行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或妥协。任何别的都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要知道联合已经试验了半年，已经引起了破产，并且你们这些可爱而不善于思考的《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自己也已经放弃了联合。

结果怎样呢？

《新生活报》的公民们，你们吓糊涂了，你们让别人吓得甚至连最简单的议论都不能自圆其说了，连总共不到五而只到三的数目都弄不清了。

或者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这是你们早已不拥护的，甚至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敢提的，因为它知道，在4月20—21日，人民只耸一耸肩就把这样一个政权抛开了，而现在则会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抛开这样一个政权。或者政权归小资产阶级即归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联盟，妥协），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愿意而且不能独立自主地夺取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经济科学证明了的。经济科学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资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间是站不住的。这个联合半年来在俄国已试用过不下几十种的方法，但终归失败了。

最后，或者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打垮资产阶级的反抗。这还没有尝试过，而这是你们《新生活报》的各位老爷劝人民不要去干的，你们用自己畏惧资产阶级的心理去吓唬人民。

第四种办法是连臆造也臆造不出来的。

这就是说，如果《新生活报》因为无产阶级政权仿佛可能被资产阶级搞垮而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等于暗地里回到同资本家妥协的立场上去!!! 象晴天的太阳一样清楚，谁害怕反抗，谁不相信能够粉碎这种反抗，谁教导人民说：“你们应当害怕资本家的反抗，你们制服不了这种反抗”，谁就是以此号召重新同资本家妥协。

现在，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都已看到联合的破产，不敢公开拥护它，同时他们又在接受着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害怕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全部政权，所以弄得糊里糊涂，《新生活报》也象他们一样，糊涂到了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地步。

* * *

害怕资本家的反抗，同时又自命为革命者，希望列名于社会主

义者之中——真是可耻！被机会主义腐蚀了的世界社会主义要在思想上堕落到什么地步，才能发出这种论调！

资本家的反抗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全体人民也看到过了，因为资本家比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更强，他们一下子就了解到苏维埃的意义了，他们马上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毒辣手段，以至采取空前未有的造谣诽谤的手段，制造军事阴谋，来破坏苏维埃，消灭苏维埃，糟蹋苏维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之下），把苏维埃变为清谈馆，长年累月地说些无聊的空话和玩弄革命的把戏来捉弄农民和工人。

而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反抗力量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贫困和资本主义奴役所摧残的人们实际看到和感觉到国家政权落到了被压迫阶级手中，并正在帮助贫民对地主和资本家展开斗争，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完全显示出来。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多么无穷无尽的回击资本家的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潜藏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才会出现；只有那时，如果有一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顽抗的工人阶级政权的敌人，就会有一百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们斗争，而在此以前这些新战士在政治上是沉睡不醒的，他们一直在贫困折磨和绝望状态中苟延残喘，不敢相信他们自己也是人，不敢相信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会为他们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警队会完全信任地召请他们去直接地、密切地、经常地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

在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这帮先生善意参加下，资本家和地主用尽一切办法糟蹋民主共和国，用效劳财富来糟蹋民主共和国，以致使人民变得冷漠无情，使他们觉

得一切都不关痛痒，因为挨饿的人是不能看出共和国同君主国之间的差别的，因为挨冻、赤足、受尽折磨、为旁人的利益送命的士兵是不会爱上共和国的。

但是，一旦一个最普通的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妇，随便那一个破产农民都看到，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但不向财富卑躬屈节，反而帮助贫民；这个政权敢于采取革命措施；这个政权把寄生虫的多余食品拿来分给饥民；这个政权用强制办法把无家可归的人搬进富人的住宅；这个政权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土地交给了劳动者，工厂和银行已处在工人的监督之下；百万富翁隐匿财产的行为立刻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一旦贫民看到这一切并且感觉到这一切，那时候任何资本家和富农的力量，任何拥有数千亿的世界金融资本的力量也战胜不了人民革命，相反地，人民革命将战胜整个世界，因为在所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熟。

如果我们的革命自己不害怕自己，如果它把全部政权交给无产阶级，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更加发展的和更加有组织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暂时受到了战争的压制，它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战争使它更加强大了。

* * *

担心资本家老爷们会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即保证会得到贫苦农民全力支持的无产阶级政权“扫除掉”！这是多么近视！这是多么可耻的害怕人民的心理！这是多么虚伪！流露出这种恐惧心理的人都属于“上等”（按资本主义的尺度，实际上是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习惯说“正义”二字，但自己并不相信它，只是当作一句空话来讲讲，并不赋予它任何内容。

这里有个例子：

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个著名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再找不到比他更温和的劳动派分子⁸，比他更温和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志同道合的人了。从来没有比他更热心地替资产阶级效劳的部长。比他更热心地拥护“联合”、拥护同资本家妥协的人，是世界上没有出现过的！

请看，根据护国派《消息报》的报道，这位先生在“民主”（应读作布里根）会议上的发言不得不供认了什么：

“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反映集团要求即阶级要求和民族要求的纲领。最公开地维护这个纲领的是布尔什维克。但是，另一部分民主派分子也很难拒绝这个纲领。要知道，这是劳动群众的要求，是被歧视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因此，民主派也难以同布尔什维克决裂，拒绝这些阶级要求，尤其是那些实质上是正义的要求。我们在革命前为这个纲领奋斗过，为这个纲领进行过革命，在其他条件下我们都会一致地拥护它，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个纲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现在，这种危险性更大，因为这些要求恰恰是在国家不能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首先要保卫国家这个整体，把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一条路，不管提出多么正义和强烈的要求，一概不予以满足，相反地，要各方面忍受必须忍受的限制和牺牲。”（9月17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当资本家还掌握政权的时候，他所保卫的不是什么整体，而是俄国的和“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的私利。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和资本家，和他们的秘密条约，和他们的兼并政策（掠夺别人土地），和他们的银行的金融敲诈行为断绝关系之后，战争才不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在断绝这种关系之后，战争才会在敌人拒绝接受正式向他提出的公正的和约的情况下，成为防御性的、正义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一个摆脱资本的枷

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银行和工厂置于工人监督之下的国家的国防力量，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许多倍。

而最重要的是，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既然他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的正义性，不得不承认它的要求是“劳动群众”即多数人民的要求，那他就得放弃自己的全部立场，放弃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全部立场。

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的政府将是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纲领。

要知道，彼舍霍诺夫先生是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政治朋友，是富农之类的老爷们的代表，如果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或者（完全一样的东西）克伦斯基的军队打败了布尔什维克，这些老爷们的老婆和姐妹第二天就会用小伞挑出被打得半死的布尔什维克的眼珠。

就连这样的一位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要求的“正义性”。

对他来讲，“正义”不过是空话而已。但是对半无产者群众来讲，对于被战争弄得破产，弄得痛苦不堪，弄得疲惫已极的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来讲，这不是空话，而是最尖锐、最迫切、最重大的关于饿死，关于取得一片面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什么政策都不能依靠“联合”，不能依靠饥饿的破产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的“妥协”。正因为如此，所以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定会得到这些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支持。

知识分子和那些根据他们“洞悉”经济唯物主义的“奥妙”这个堂哉皇哉的理由而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坏蛋们说：正义是一句空话。

思想一掌握了群众，就变成力量。恰好现在，布尔什维克，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代表，以自己的政策体现了那种在全世界推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

单是正义感，单是群众对剥削的反感，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当大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物质机构依靠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先进国家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起大量奇妙的技术，而资本主义却妨碍这些技术的运用的时候，当觉悟的工人团结成一个有二十五万党员的党，以便在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支持下有计划地把这种机构掌握在手中并把它开动起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末，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后 记

上面这篇文章写好了的时候，10月1日的《新生活报》社论又提出了一套糊涂的新妙论，这套妙论特别危险，因为它是隐藏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后面的，隐藏在“不要听别人挑唆”（不要落入这种关于什么挑唆的叫喊的圈套，因为这种叫喊无非是企图恐吓布尔什维克，使他们不要夺取政权）这种深奥的庸俗议论的烟幕后面的。

这套妙论说：

“不管是7月3—5日运动的教训，不管是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都非常明显地表明：民主派拥有在人民中威信最高的机关，如果它在国内战争中采取防御立场，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要掌握进攻的主动性，那它就要遭到失败并失去一切中间的、动摇的分子。”

如果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套议论中所反映的这种庸俗的糊涂思想表示任何形式的一点点让步，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革命。

因为写这种议论的作者，在谈到国内战争（谈这个题目恰好是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所能胜任的）的时候，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训曲解到极端滑稽可笑的地步。

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代表和创始人卡尔·马克思是这样谈论这些教训、谈论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训的：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

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任何时候不要玩弄起义，除非决心干到底（直译：估计到这种玩弄的全部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对的战斗力量在组织、纪律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马克思指的是起义的最“困难的”情况，即必须反对“巩固的”旧政权，反对还没有在革命影响和政府动摇影响下瓦解的军队）；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¹⁷⁸（见《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年德文版第118页）

《新生活报》的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把一切都改造过了，我们有的不是三倍的勇敢，而是两种长处，“我们有这样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世界历史的经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在“我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1917年两次运动的经验——被莫尔恰林¹⁷⁹式的眼镜所歪曲了的经验。

让我们不戴这副可爱的眼镜来看看这个经验吧。

你们拿7月3—5日的事变来同“国内战争”相比，是因为你们相信了阿列克辛斯基和彼列维尔节夫¹⁸⁰之流。而相信这样的人正是《新生活报》的老爷们的特色（尽管他们拥有大型日报的庞大机构，但在收集有关7月3—5日事变的材料方面却没有独立地作过一点事情）。

然而，我们暂且假定，7月3—5日的事变不是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在最初阶段内的国内战争的萌芽，而是真正的国内战争。我们就这样假定吧。

那末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训证明了什么呢？

第一，布尔什维克没有转入进攻，因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转入进攻，那就会在7月3日夜里，甚至在7月4日夺得许多东西。如果把这一事变当作国内战争来看的话（《新生活报》正是这样看的，而事实表明，这是自发性的爆发正向4月20—21日类型的示威演变），防御正是他们的弱点。

由此可见，“教训”是否定《新生活报》的才子的。

第二，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连起义的打算都没有，为什么当时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这并不在我们和《新生活报》争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关于“国内战争”即起义的教训，而不是争论在显然缺乏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使革命政党放弃举行起义的念头的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直到1917年7月的很久以后，布尔什维克才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在全国获得了多数（在莫斯科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九以上的选票），可见得到的“教训”又完全不是新生活派的那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想看到的那些。

不，不，《新生活报》的公民们最好还是不要搞政治吧！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

有争得多数，那就说不上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全国性的革命的增长；（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阵营中的大动摇。

为什么《新生活报》在谈论7月3—5日事变的“教训”的时候，连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也没有注意到呢？那是因为谈论政治问题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小团体中被资产阶级吓倒了的人们。

其次，第三，事实表明，正是在7月3—4日事变之后，正是由于策烈铁里老爷们被自己的七月政策揭穿了，正是由于群众把布尔什维克当作自己的先进战士而把“社会联盟派”当作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才开始垮台的。他们的垮台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就完全为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所证实了，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而“社会联盟派”遭到了失败。《人民事业报》不久前曾隐瞒各党派得票的总数，企图推翻这一事实，这只是自欺欺人；根据8月24日《日报》⁶⁵仅仅关于城市的材料来看，立宪民主党人所得选票的百分数从百分之二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绝对票数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布尔什维克所得选票的百分数从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绝对票数只减少了百分之十；各个“中派”所得选票的百分数从百分之五十八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四，绝对票数减少了百分之六十！！）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七月事变后和科尔尼洛夫叛乱前垮台的事实也为两党中的“左”翼几乎增加到百分之四十的情况所证明：这真是替遭到克伦斯基这帮老爷们迫害的布尔什维克“复仇”。

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失去了”数百个党员，但是在7月3—4日事变中赢得了许多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群众懂

得了并看到了它的忠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背叛。这就是说，得到的“教训”完完全全不是《新生活派》所说的那个，而是，决不能离开沸腾的群众去迁就“民主的莫尔恰林”，并且如果起义，那就要趁敌军分散的时候转入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新生活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马克思主义”在于不把精确估计客观环境作为策略的基础，而荒谬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国内战争”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召开立宪会议”混为一谈吗？

可是老爷们，这简直是令人可笑的，这简直是嘲弄马克思主义和一切逻辑！

如果在客观环境中没有什么使阶级斗争尖锐到“国内战争”的程度的根据，你们在谈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我们所分析的《新生活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如此）的时候，为什么要谈到“国内战争”呢？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并且证明，在客观环境的条件中没有进行国内战争的基础，因而可以并且应该把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在法律上和议会制上是“简单的”东西，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之类放在策略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那就可以认为这类代表大会和这类会议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在目前的客观条件下存在国内战争的必然性或者仅仅是可能性，如果你们不是“信口”谈论国内战争，而是明显地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国内战争形势的存在，那末，怎么能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会议放在首要地位呢？这简直是嘲弄饥寒交迫和遭受蹂躏的群众！难道饥寒交迫的人会同“等待”两个月吗？难道你们自己每天都在描写的日益加剧的破坏状态会允许“等待”到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会议的时候吗？难道在我方没有采取争取和平的重要步骤（即没有正式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的条

件下，德国的进攻会允许“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你们手头有这样的材料，使你们能作出结论说，从2月28日到9月30日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的历史，从10月1日到11月29日¹⁸¹就会发展得很沉静、和平、稳健、合法，决不会有爆发、飞跃、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危机吗？难道前线的军队，由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以前线的名义正式宣布“不再打下去”的那个军队会平静地忍受饥寒，直到“预定的”日子吗？难道由于你们把农民起义叫作“无政府状态”和“残杀”，由于克伦斯基派“武装”力量去镇压农民，农民起义就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因素了吗？难道可以设想一个在农民的国家里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能沉静地、公平地、不伪造地进行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吗？

先生们，你们不要讥笑“斯莫尔尼学院的惊慌”¹⁸²吧！你们惊慌的程度并不小些。你们正以惊慌的措词和可怜而立宪幻想来回答国内战争的各种严重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染上了这种情绪，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自己的革命。

尼·列宁

1917年10月1日

写于1917年9月底至
10月1日（14日）

载于1917年10月《启蒙》
杂志1—2期合刊

按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69—118页

局外人的意见

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0月8日，要在9日就送到彼得格勒同志们手中，恐怕希望不大。也许这篇东西会迟到，因为北方苏维埃代表大会定于10月10日召开。尽管这样，我还是想提出我的“局外人的意见”，也许能在彼得格勒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士兵可能很快发动但还没有发动的时候送到。

全部政权应转归苏维埃，这是很明显的。同样，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或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这在目前来说是一回事），一定会获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交战国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特别是俄国农民的最大的同情和全心全意的支持，这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应该是无可怀疑的。这个人所共知的早已证明的真理，无须多谈。

现在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未必为全体同志所彻底明白的问题，即目前政权转归苏维埃实际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看起来，这似乎是很明显的，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细心地思考过或思考着这个问题。现在拒绝武装起义，就等于背弃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等于完全背弃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但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必须仔细考虑这些规律。卡尔·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

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说的:勇敢,再勇敢”这样的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¹⁷⁸

如果把这点应用于俄国,应用于1917年10月,那就是说:一定要同时既从外面,又从内部,既从工人区,又从芬兰、烈韦里、喀琅施塔得等各方面,尽可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对他彼得格勒进攻,要使用全部舰队来进攻,要使集中的力量大大超过那拥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也许更多些)人的我国“资产阶级近卫军”(士官生)以及我国“万第军队”¹⁷⁷(一部分哥萨克)等等。

要把我们的三支主要力量——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配合起来,一定要占领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1)电话局,(2)电报局,(3)火车站,(4)特别是桥梁。

要挑选最坚决的分子(我们的“突击队员”、青年工人和优秀水兵)组成一些不大的队伍,派他们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战役,例如:

包围彼得格勒,切断其对外交通,用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的联合进攻把它占领下来——这是需要艺术和三倍的勇敢来执行的任务。

要把最优秀的工人编成一支配备枪枝炸弹的队伍，派他们去进攻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士官学校，电报局，电话局等等），口号是：**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敌人。**

我们希望，一旦决定发动，各领导者能够很好地运用丹东和马克思的伟大遗训。

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写于1917年10月8日(21日)

第一次载于1920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250号

署名：局外人

按报纸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159—161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¹⁸³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威胁）和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已经明确地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等）。

1922年第一次载于《无产阶级革命》
杂志第10期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171页

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¹³⁴

同志们！我还未能收到10月18日星期三的彼得格勒报纸。有人打电话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的《新生活报》⁷⁸上发表的声明全文告诉了我，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怀疑毕竟是不行了，我只好借这机会给党员同志们写这封信，希望在星期四晚上或者在星期五早上大家都能看到，因为对这种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实践问题愈严重，当工贼的人愈重要、“愈有名”，危险性就愈大，我们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由于这些工贼过去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愈不可饶恕。

你们想想看！党内都知道，党从9月份起就在讨论起义问题。可是谁也没听说这两个人中有谁写过一封信或一篇东西！现在，可以说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夕，这两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却出来反对多数，当然也反对中央委员会。这一点不是直接说出来的，但这样对事业的害处就更大，因为暗示更加危险。

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原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反对中央的，否则他们的声明就毫无意义了，可是他们究竟反对中央的哪一个决议呢，这点却没有说明。

为什么呢？

显然是因为中央没有公布那个决议。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两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20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竟在一家非党的，而且正是在这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携手反对工人政党的报纸上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的决议！

普列汉诺夫在1906—1907年曾在非党的刊物上发表言论，受到了党的痛斥，但是现在这种行为比他要卑鄙千倍，要有害百万倍！因为当时涉及的只是选举的问题，而现在涉及的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

在这样的问题上，在中央通过决议之后，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没有公布的决议，——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

过去我同这两个从前的同志关系很密切，如果我因此犹豫不决，不去谴责他们，那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我直率地说，我不再把他们两个当作同志了，我要尽力向中央和代表大会提出，无论如何要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如果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中央已经通过但还未公布的决议，引起战斗队伍内部的动摇和混乱，那末，工人政党就会无力解决实际生活向它愈来愈频繁地提出的困难的起义任务。

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惶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工人是不会加入这种政党的，因为它的第一个口号是：

“在中央会议上讨论决战问题遭到失败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在非党的报纸上攻击党没有公布的决议。”

让他们去建立这样的党吧；这样，我们布尔什维克工人党只会得到好处。

在将来所有的文件都公布出来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的工贼行为还会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暂时让工人把下面这个问题考虑一下：

“假定全俄工会理事会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多数决定准备罢工，但是关于罢工的日期等等暂时不公布。假定有两个理事以显然是骗人的‘特殊意见’为借口，在决议通过之后不仅写信给各地组织，说要重新审查决议，而且把自己写信的事情告诉非党报纸。最后，假定他们本人还在非党的报纸上抨击尚未公布的决议，并且在资本家面前诋毁罢工。

——试问，工人会不会犹豫不决，不把这种工贼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出去？”

* * *

至于起义问题在离 10 月 20 日那么近的今天的情况，我从远方，无法判断工贼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使事业究竟受了多大的损失。但毫无疑问，实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要补救这一点，首先必须开除工贼，恢复布尔什维克阵线的一致。

我们愈是彻底地把反对起义的思想理由公开出来，这些论据的弱点就愈加明显。前几天我刚给《工人之路报》¹⁷⁰寄去一篇有关的文章，如果编辑部认为不能发表，也许可以让党员看到这篇文章的手稿^①。

这些所谓的“思想”理由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等待”立宪会议。等等再说，也许我们能熬过去，这就是全部理由。即使有饥荒、经济破坏、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即使罗将柯采取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的步骤，即使有同盟歇业，我们也许还能熬过去。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175—195 页。——编者注

听天由命，这就是理由的全部力量。

第二、大喊大叫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资本家的一切都准备得好得出奇，工人的一切都不行。军事方面的“悲观主义者”在声嘶力竭地叫喊，“乐观主义者”却默不作声，因为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面前泄露点什么，除了工贼恐怕未必会有人引以为快。

困难的时刻。艰巨的任务。严重的叛变。

但是任务还是会得到解决，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农民起义和前线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一定会发生作用！我们要把队伍团结得更紧密，无产阶级一定要胜利！

尼·列宁

写于1917年10月16日(31日)

第一次载于1927年11月1日
《真理报》第250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196—199页

给中央委员的信

同志们!

我写这几行字是在 24 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

我尽力向同志们说明，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科尔尼洛夫分子展开的资产阶级进攻，维尔霍夫斯基的撤职，都说明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等等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

不能等待了!! 等待会丧失一切!!

立刻夺取政权的好处就是：能保护人民（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人民，首先是军队和农民）免遭科尔尼洛夫政府，即赶走维尔霍夫斯基、策划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政府的蹂躏。

谁应当取得政权呢？

目前这并不重要，让军事革命委员会¹⁸⁵“或其他机关”取得政权吧，只要这个机关声明，只把政权交给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军队利益（立即提出和约）、农民利益（立刻夺取土地，废除私有制）和饥民利益的人。

必须立刻把各区、各团以及其他一切力量动员起来，立即派遣

代表团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去，坚决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及其同党把持政权到 25 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我们今天夺取政权不是要反对苏维埃，而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夺取政权是起义的任务，起义的政治目的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会弄清楚的。

等待 10 月 25 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

这是各次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革命者知道挽救革命、提出和约、挽救彼得格勒、摆脱饥饿、把土地交给农民等事业都取决于自己，可是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

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

写于 1917 年 10 月 24 日
(11 月 6 日)

1924 年第一次发表

按打字副本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6 卷
第 214—215 页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⁸⁶ (摘录)

(1917年10月25—26日〔11月7—8日〕)

1

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绝大多数苏维埃都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代表大会。妥协派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就此结束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人员已经被逮捕。

苏维埃政权将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理；将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利；将建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将关心城市的粮食和农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

代表大会决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

代表大会号召前线士兵提高警惕，坚持到底。苏维埃代表大会深信，在新政府向各国人民直接提出的民主和约尚未缔结以前，革命军队定能捍卫革命，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实行向有产阶级征发和课税的果断政策，以保证革命军队的一切必需品，并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

克伦斯基和卡列金等科尔尼洛夫分子企图调军队到彼得格勒来。有几支被克伦斯基用欺骗手段调动的部队已经站到起义的人民这一边来了。

士兵们，积极反抗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提高警惕！

铁路工人们，使克伦斯基派到彼得格勒来的所有军车都停下来！

士兵们，工人们，职员们，革命的命运和民主和平的命运完全操在你们手里！

革命万岁！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农民苏维埃代表**

载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9号

按《工人和士兵报》原文刊印

2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

(10月26日〔11月8日〕)

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多，写得很多，想必你们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讨论得不少了。因此让我来宣读这个应由你们选出的政府来发表的宣言吧。

和 平 法 令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

本政府认为，一切交战国中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的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所渴望的公正的或民主的和平，即俄国工农在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式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的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

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到各国和各民族的最高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全部条件，就毫不迟延地立即采取一切坚决步骤。

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认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

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或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

如果某个民族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如果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示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示的，都完全一样），不让它有权在合并国军队或任何较强民族的军队完全撤走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这个民族的国家形式问题，那末合并这个民族的行为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毫无例外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

同时本政府声明，它决不认为上述和平条件是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家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其中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是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的兼并的。

本政府在建议各国政府和人民立即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公开谈判的同时，表示愿意通过书面联系、电报，通过各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或通过各国代表的会议来进行这种谈判。为了便于进行这

种谈判，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权代表前往各中立国。

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并认为停战时期最好在三个月以上，以便使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代表所参加的和约谈判完全可能结束，同时使各国最高人民代表会议完全可能召集起来最终批准和约条件。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的和平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¹⁸⁷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非常法¹⁸⁷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为全世界工人树立了榜样。所有这一切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应当立即开始和平谈判。我们应当既向各国政府呼吁，也向各国人民呼吁。我们不能漠视各国政府，否则就可能拖延和约的签订，人民政府是不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不同时间向各国人民呼吁。在各地方，目前政府和人民之间都有分歧，所以我们应当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我们要极力坚持我们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全部和平纲领。我们决不放弃这个纲领，但是我们应当使我们的敌人无法抓住把柄说，他们的条

件跟我们的不同，因此没有什么可以同我们谈判的。不，我们应当使他们无机可乘，我们不应当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条件。所以也就包括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将考虑任何和平条件和一切建议。我们将予以考虑，这并不是说我们将予以接受。我们要把这些条件和提议提交立宪会议讨论，立宪会议有权决定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让步。我们要与各国政府的欺骗行为作斗争，它们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没有一个政府会说出它所有的想法。我们是反对秘密外交的，我们要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行事。我们不忽视困难，而且也没有忽视过困难。战争不能用拒绝的办法来结束，不能由单方面来结束。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可是我们也不拒绝更短的期限，以便使疲惫不堪的军队可以得到短暂的喘息，同时，使一切文明国家有必要的时间来召集人民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在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的同时，我们也向那些对开展无产阶级运动有过许多贡献的国家的觉悟工人呼吁。我们向进行过宪章运动的英国工人呼吁，向屡次在起义中表现出全部阶级觉悟力量的法国工人呼吁，也向经历过反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艰苦斗争并建立了强大组织的德国工人呼吁。

在3月14日的宣言中，我们曾提议推翻银行家，可是我们自己不但没有推翻本国的银行家，甚至还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银行家的政府推翻了。

各个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可是三年战争已使群众获得了充分的教训。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苏维埃运动，在德国被刽子手威廉的士官生镇压下去的海军起义。最后，要记着，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一切新闻很快就会传出去的。

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鼓掌多时)

载于1917年10月27日《中央
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8号和
1917年11月10日(10月28日)
《真理报》第171号

报告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法令按《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原文刊印

3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结论

(10月26日(11月8日))

我不打算谈宣言的一般性质。你们的代表大会将要建立的政府,对于一些不大重要的条款可以加以修改。

我将坚决反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和平要求。最后通牒的方式会葬送我们的整个事业。我们不希望由于我们的要求不能作任何微小的让步,而使帝国主义政府借口说,我们抱着不能和解的态度,所以无法进行和平谈判。

我们要到处散发我们的宣言,使大家都知道。要想把我们工农政府提出的条件隐瞒起来,是不可能的。

要想把我国推翻了银行家地主政府的工农革命隐瞒起来,是不可能的。

如果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各国政府就可能置之不理,如果采用我们那样的措词,它们就不得不答复。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政府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不愿意秘密谈判。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

如果由于我们采取最后通牒的方式,使得某个边远省份的农民无从知道别国政府想些什么,那他会怎样说呢?他会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要排除提出各种和平条件的可能性呢?我倒想考虑考虑、研究研究各种条件,然后再告诉我们那些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怎样行事。如果各国政府不同意,我决心用革命的手段为争

取公正的条件而斗争；可是，有些国家也可能有某些条件，我决定建议这些国家的政府自己去继续斗争。我们的思想，只有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农民可能会对我们说的话，他还会责备我们在细节上太不让步，因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派去充当政府首脑的戴皇冠的和不戴皇冠的刽子手的一切卑鄙恶劣的行为。

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让各国政府把我们决不让步的态度当作借口，来向人民隐瞒为什么驱使他们进行屠杀。这不过是一滴水，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放弃这一滴可以滴穿资产阶级掠夺行为顽石的水。最后通牒方式会缓和我们敌人的困难处境。我们要把一切条件都告诉人民。我们要向各国政府提出我们的条件。让它们去回答它们本国的人民。我们要把一切和平建议提交立宪会议决定。

同志们，条文中还有一点你们应当仔细注意。秘密条约一定要公布。关于兼并和赔款的条款一定要废除。同志们，有各种各样的条款，各个强盗政府不仅签订了关于抢劫的协定，而且在这些协定中，还包括一些经济协定以及其他各种关于善邻关系的条款。

我们既不用条约来束缚自己，也不让别人用条约来束缚我们。我们拒绝一切关于抢劫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关于善邻关系和经济协定的条款，这种条款我们决不能拒绝。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我们提出这样长的期限，是因为各国人民已被拖了三年多的流血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渴望休息。我们应当懂得，必须让各国人民在议会参加下讨论和平条件，表明自己的意志，而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要求较长期限的停战，是为了让战壕中的军队得到休息，停止恶梦似的无休止的厮杀，可是我们也不拒绝较短期限的停战的建议，这种建议我们要加以研究，而且必须予以

接受，哪怕向我们提出的是停战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建议。我们的停战建议也不应当成为最后通牒，因为我们决不能让敌人把我们不和解的态度当作借口，来向人民隐瞒全部真相。这种建议决不当成为最后通牒，因为不愿停战的政府就是犯罪的政府。如果我们不让我们提出的停战建议成为最后通牒，我们就能使各国政府在本国人民眼里成为罪犯，而人民对于这样的罪犯是不会客气的。有人反驳我们说，我们不采用最后通牒方式，就是表示我们软弱；可是现在已经是抛弃资产阶级所谓人民力量的一切谎话的时候了。在资产阶级看来，只有当群众听从帝国主义政府指使，盲目去进行屠杀的时候，才算是有力量的。只有当一个国家能运用政府机构的全部威力，把群众派遣到资产阶级当局想叫他们去的地方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认为这个国家有力量。而我们的力量概念却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我们丝毫用不着害怕说出疲乏的真情实况，试问现在哪一个国家不是疲乏不堪，哪一国人民不在公开谈论这一点呢？就拿意大利来说吧，在那里由于这种疲乏不堪而产生了要求结束这场屠杀的长期革命运动。难道在德国没有发生提出停止战争的口号的工人群众示威运动吗？难道被刽子手威廉及其奴仆残暴地镇压下去的德国海军起义不是疲乏不堪引起的吗？既然在德国这样有纪律的国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开始说疲乏，说要停止战争，那我们就丝毫用不着害怕公开讲出这一点，因为这无论对于我们，无论对于一切交战国，甚至对于非交战国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实际情形。

载于1917年11月10日(10月28日)

《真理报》第171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4

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10月26日〔11月8日〕)

我们认为革命已经证实和表明，把土地问题提得很明确是十分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经清楚地证明应当把土地交给农民。已被推翻的政府以及妥协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¹²，犯了罪，他们用各种口实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国家陷于经济崩溃，激起了农民的起义。他们大谈农村里的暴行和无政府状态，显然是撒谎和玩弄怯懦的欺骗手腕。试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明智的措施造成了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呢？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是合乎贫农的需要的，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起风潮来吗？但是政府所采取的、阿夫克森齐也夫和唐恩领导的苏维埃所赞同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对农民的，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

这个政府引起了起义，却又对它自己引起的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叫嚣不已。政府本想用铁和血来镇压起义，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武装起义铲除了。工农革命政府首先应当解决土地问题，使广大贫农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现在我向你们宣读一个应由你们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令条文，其中一条附有根据二百四十二份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委托书拟定的给各地土地委员会的委托书。

土地法令

(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

(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时为止。

(3)任何毁坏被没收的即今后属于全民的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应由革命法庭惩办。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在没收地主田庄时遵守最严格的秩序,确定应没收的地段及其面积,编造全部没收财产清册,并对转归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产业连同一切建筑物、工具、牲畜和储存产品等等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

(4)下附农民委托书是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¹⁶⁷编辑部根据二百四十二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定的,公布于该报第八十八号(彼得格勒,1917年8月19日第88号),在立宪会议对伟大的土地改革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各地应以这个委托书为实行这一改革的指南。

(5)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

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

“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全盘解决。

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公正的办法应该是:

(1)土地私有权永远废除;禁止买卖、出租、出典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让出土地。

一切土地:国家的、皇族的、阁部的、寺院的、教堂的、租有的、长子继承的¹⁶⁸、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的等等土地,一律无偿地取消其原主所有权,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因财产改革而受到损失的人，只有在适应新生活条件所必需的时期内，有权取得社会帮助。

(2)所有地下蕴藏，如矿石、石油、煤炭、盐等等，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利，只归国家使用。一切小的河流、湖泊和森林等等交给村社使用，但必须由地方自治机关管理。

(3)具有高度农业文化的农场所占的土地，如果园、种植园、苗圃、养殖场、温室等等，不得分割，而应改为示范农场，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只给国家或村社使用。

城乡的宅地连同家用果园和菜园，仍归原主使用，其面积和税额，由法律规定之。

(4)饲马场，官办和民营的种畜场和种禽场等等，一律没收，变为全民财产，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只给国家或村社使用。

关于赎金的问题应由立宪会议研究。

(5)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不付赎金只给国家或村社使用。

少地农民的耕畜和农具不在没收之列。

(6)凡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依靠家属的帮助或组织协作社从事耕种的一切俄国公民(不分性别)，均享有土地使用权，但仅以有力耕种的期间为限。禁止使用雇佣劳动。

村社社员暂时丧失劳动力在两年以内者，村社必须在该社员劳动力尚未恢复的期间，通过公共耕种的办法予以帮助。

农民因年老或残废而永远无法自己耕种土地时，便丧失其土地使用权，但可向国家领取抚恤金。

(7)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各地条件，按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

使用土地的方式不应受任何限制，各乡村可决定采用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按劳动组合等方式使用。

(8)一切土地从脱离原主之日起，都是全民的土地。关于分配土地给劳动者的事宜，由地方自治机关和总自治机关(从按民主原则组成的无等级的城乡村社起到各省总机关止)负责主持。

土地应根据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率增长和农作技术提高等情况，定期重

新分配。

改变份地地界时，原份地的基本地段应予保留。

因故离村者应将其土地交还，但其近亲及其所指定的人，有领得该段土地的优先权。

施肥和根本改良土壤投入的价值，在交还份地时，其尚未使用的部分，应予补偿。

如果个别地方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当地全体居民需要时，过剩人口应迁往他处。

移民的组织 and 费用以及农具供应等等概由国家负责。

移民应按下列次序办理：首先是自愿迁移的无地农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员、逃兵等等，最后，才采取抽签或协商的办法。”

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是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唯一愿望，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尽可能立即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渐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

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就让它这样吧。无论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在实际生活烈火的考验中懂得，真理究竟在哪里。即使农民还继续赞成社会革命党人，即使他们将使该党在立宪会议上获得多数，那时我们还是要说：就让它这样吧。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

分自由。已被武装起义推翻的旧政府，曾想依靠没有撤换的沙皇旧官僚来解决土地问题。可是这些官僚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一味反对农民。农民在我国八个月的革命当中，已学会了一些东西，他们想要亲自解决一切有关土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反对对这个法案作任何修改，我们不希望规定得很详细，因为我们草拟的是一个法令，而不是一个行动纲领。俄国幅员广大，各地条件不同；我们相信农民自己会比我们更善于正确地适当地解决问题。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让农民自己去解决一切问题吧！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吧！（热烈鼓掌）

载于1917年10月28日《中央
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9号
和1917年11月10日（10月
28日）《真理报》第171号

报告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法令按《中央执行委员会
消息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223—240页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

1. 在拥有工人和职员共计五人以上，或每年资金周转在一万卢布以上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等企业，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

2. 工人监督，在能办到的小企业中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否则，由他们选出的代表实行，这种代表应立即在全体人员大会上选出，作出选举记录，并将当选人名单报告政府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3. 非经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许可，绝对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工厂(参看第7条)停工，以及对生产过程作任何改变。

4. 一切账簿和文件，以及一切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

5. 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只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取消他们的决定。

6. 在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一切企业主和一切由工人和职员选出实行工人监督的代表，均应对国家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凡玩忽职守、隐瞒存货和账目等等者，判处没收全部财产和五年以下的徒刑。

7. 凡为国防事业服务以及与生产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

8. 工人监督细则，由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代表

会议以及职员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联席会议制定之。

写于1917年10月26日和31日
(11月8日和13日)之间
载于1917年11月16日(3日)
《真理报》第178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254—25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宣言

(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

同志们!

大家知道,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⁸⁸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占了多数。

这是一个理解刚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在全俄各地发生并获得胜利的革命所必须知道的基本事实。一切资本家的拥护者,一切破坏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新的革命的基本原则而有意无意充当资本家的帮凶的人,常常忘记和避而不谈的,也正是这个事实。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决不应当有别的政府。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通过苏维埃的决议,只通过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了。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同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府。我们十分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拒绝了 this 建议,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我们

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然而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在人民面前有义务组织政府。

大家知道,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委员名单,并且代表大会也批准了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名单。

因此,什么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是苏维埃政府的说法是骗人的,是绝对不真实的。只有人民的敌人,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谎话。恰恰相反,现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直到苏维埃改选,或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新政府时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府才是公认的苏维埃政府。

* * *

同志们!我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李可夫、米柳亭以及其他几个人昨天(11月4日)退出了我党中央委员会,后面三人并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在我们这样大的党里,虽然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方针,但也难免有个别同志在反对人民公敌的斗争中表现得不坚定,不果敢。现在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于是有几个以前负重责的我党党员在资产阶级进攻的面前动摇了,从我们的队伍中逃跑了。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帮凶都因此而欢天喜地,幸灾乐祸,高喊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瓦解,预言布尔什维克政府必将覆灭。

同志们!不要相信这些谎话。逃跑的同志象逃兵一样,不仅抛弃了托付给他们的岗位,而且还违反了我党中央要求他们至少等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后再退出的直接决议。

我们坚决斥责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我们深信，一切身为我党党员或同情我党的觉悟工人、士兵和农民也都会坚决斥责这种逃兵行为。

可是，我们声明，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一分钟也不会，丝毫也不会动摇拥护我们党的群众的团结，因而也不会动摇我们的党。

同志们总还记得，其中两个逃兵，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还在彼得格勒起义以前就有过逃兵行为和工贼行为，因为他们不仅在1917年10月10日那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中央会议上投票反对起义，而且竟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鼓动党的工作人员反对起义。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不敢站到工人方面来、更多地倾向于资产阶级方面的报纸(如《新生活报》⁷⁸)都随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大喊大叫起来，说什么我们党“瓦解了”，“起义破产了”，如此等等。可是实际生活很快就驳斥了一些人的谎话和诬蔑，另一些人的怀疑、动摇和怯懦。利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破坏彼得格勒起义的行为所掀起的“风波”，原来不过是杯水风波而已，群众的伟大热情，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前线上，在战壕中和在农村里所表现的伟大英勇精神，好象火车抛弃木屑一样，轻而易举地抛弃了这些逃兵。

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被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的帮手的叫喊吓倒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象一个人，屹立不动地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

资产阶级的下流作家和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的人齐声责备我

们，说我们不肯让步、不愿和解，说我们不愿意同别的政党分掌政权。同志们，这都是谎话！我们曾经邀请过，而且还在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分掌政权。如果他们拒绝了我们的邀请，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谈判是由我们开始的，并且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我们又在谈判中作了种种让步，我们甚至有条件地同意容纳彼得格勒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巢穴的一部分代表。如果万恶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如果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弟以及士官生又象他们上星期日在彼得格勒所干的那样，象他们现在打算再干的那样（这已由破获普利什凯维奇阴谋和昨天即11月3日在他那里搜获的文件所证实了），试图反抗人民的意志，那末这个巢穴是首先要被人民铲除的。但是，那些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背后，并通过他们来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先生们，却把我们的让步说成是软弱的表示，并乘机向我们提出新的最后通牒。阿布拉莫维奇和马尔托夫两位先生出席了11月3日的会议¹⁸⁹，并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停止逮捕，不停止查封资产阶级报纸，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

我们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已经拒绝接受这个显然是由卡列金、资产阶级、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拥护者提出的最后通牒。普利什凯维奇阴谋，以及第十七军某些部队的代表于11月5日来到彼得格勒，说要向彼得格勒进攻，对我们进行威胁（这种威胁是可笑的，因为这些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先头部队已被击溃，在加特契纳附近溃败了，而其中大部分都拒绝反对苏维埃），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阿布拉莫维奇和马尔托夫两位先生的最后通牒，实际上是由谁发出的，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为谁服务的。

让全体劳动者都安心而坚定吧！苏维埃中的少数被资产阶级吓倒了，不管他们抱着怎样“善良的愿望”，事实上都是科尔尼洛

夫分子手中的傀儡，我们党决不会向他们提出的最后通牒让步。

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则；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必须诚恳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然而，对于那些没有群众拥护，实际上只有科尔尼洛夫分子、萨文柯夫分子、士官生等拥护的知识分子集团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

让全体劳动者都安心而坚定吧！我们的党，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党是团结一致地保卫着他们的利益的，而千百万城市中的工人、战壕中的士兵和农村中的农民照旧拥护我们的党，决心无论如何要使和平成功，使社会主义胜利！

写于 1917 年 11 月 5—6 日
(18—19 日)

载于 1917 年 11 月 20 日(7 日)
《真理报》第 182 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6 卷
第 283—287 页

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今天，11月18日星期六，我在农民代表大会¹⁹⁰上发言时，有人当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立刻作了答复。这个问题以及我的答复必须立即让全体读者知道，因为，从形式上来说，我只以个人名义讲话，而实质上我是代表布尔什维克全党讲话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讲话的时候提到工人布尔什维克同目前许多农民所信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的联盟问题，并且证明，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背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相反地，被剥削劳动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合”（联盟），由于两者的利益是根本相背的，不可能是“真诚的联合”。

我曾说过：假定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占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只占少数，甚至只有一个农业人民委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是不是能够实现真诚的联合呢？

能够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护国派）的斗争中是决不调和的，但在对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⁸⁶所批准的土地纲领中纯社会革命党的条文，例

如土地平均使用和在小业主中间重分土地的条文进行表决时应当弃权。

布尔什维克在表决这些条文时弃权，丝毫没有违背自己的纲领。因为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工人对工厂实行监督，接着是剥夺这些工厂，实行银行国有化，建立调节国内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人们应当同意被剥削的劳动的小农提出的过渡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我在发言中说：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1899—1909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承认，大农业国和小农业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在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这类条文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应当弃权，因为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农民)同意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的条件下，土地平均使用不过是达到完全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把这种过渡办法强加在无产阶级身上是荒谬的；但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在选择这些过渡办法的时候，应当向被剥削的劳动的小农让步，因为这些办法不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当时有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费奥菲拉克托夫同志)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在立宪会议中，农民希望通过关于土地平均使用的法律，资产阶级反对农民，问题要靠布尔什维克来决定，这时布尔什维克将采取什么态度？”

我回答说：在实行了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等措施，社会主义事业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应当投票赞成农民，反对资产阶级。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提出自己特别的声明，保留自己不同的意

见等等,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弃权,那就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而出卖自己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出卖农民。只要政权掌握在工农政府手里,只要实行了工人监督,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建立了指导(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工农最高经济机构等等,土地平均使用等办法是决不会危害社会主义的。

这就是我的答复。

写于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

载于1917年12月2日(11月19日)

《真理报》第194号

署名:尼·列宁

按报纸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11—313页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1. 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因为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建立议会时，是用许多违反民主制的办法准备假选举的。

2. 革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3. 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有立宪会议这一花冠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4. 在我国革命中，按照1917年10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立宪会议，是在无法通过这个立宪会议的选举正确表达一般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

5. 第一、只有当各党派候选人名单符合人民分成这个名单所反映的党派的实际情况时，比例选举制才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在我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从5月到10月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农民中受到最多人拥护的党，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10月中旬提出了统一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会议召开之前，发生了分裂。

因此，立宪会议的当选代表的比例，即使在形式上也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大多数选民的意志。

6. 第二、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所以不符合人民意志，特别是不符合劳动阶级的意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根源，而是社会经济的根源，即阶级的根源，这就是在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时，绝大多数人民还不可能知道在1917年10月25日，即在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以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十月苏维埃革命的全部规模和意义。

7. 十月革命为苏维埃夺取了政权，把政治统治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过来，并把它交给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我们看到这次革命正经历着循序发展的阶段。

8. 革命是从10月24—25日在首都取得胜利开始的，当时工兵代表苏维埃——无产者和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农民的先锋队——的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¹⁸⁸，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政权。

9. 然后，在11月和12月间，革命席卷了军队和农民的全部群众，这首先表现为撤销和改选旧的上层组织（军队委员会、省农民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所代表的是革命已经经过的、妥协的时期，是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而不是无产阶级阶段，因此这些组织必然要在更深更广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退出舞台。

10. 直到现在，即1917年12月中旬，被剥削群众的这种改造自己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强大运动还没有结束，而还没有闭幕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¹⁹¹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11. 因此，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俄国各个阶级力量的划分情况，在1917年11月和12月间，实际上根本不同于1917年10月

中旬各党派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所反映的情况。

12. 最近乌克兰的事件同样也说明(芬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的事件也部分地说明),在乌克兰拉达、芬兰议会等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各该民族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力量正在重新划分。

13. 最后,立宪民主党人⁴和卡列金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农政府的反革命暴动所挑起的内战,使阶级斗争达到最尖锐的程度,使历史在俄国各族人民面前,首先是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面前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完全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14. 只有工农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暴动(其表现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运动),只有用武力无情地镇压这种奴隶主的暴动,才能真正保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在革命中,事变的进程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已经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考虑工农革命的成果,不考虑苏维埃政权,不考虑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¹⁰²的决议等。现在全体人民都明白了,这个口号实际上意味着为排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15. 和平问题是人民生活中特别尖锐的问题之一。争取和平的真正革命斗争,在俄国只是在10月25日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的,这个胜利产生的初步成果就是公布秘密条约,缔结停战协议,开始就不割地不赔款的普遍和约进行公开谈判。

广大人民群众直到现在才真正充分地、公开地有可能看到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的政策,并研究它的结果。

在选举立宪会议时，人民群众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显然，从这一方面来看，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在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意志也是必然的。

16. 上述所有情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按照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以前、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存在的各党派所提的候选人名单召集的立宪会议，必然同10月25日实行了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这个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何况这些形式上的权利还由于立宪会议法不承认人民有权随时改选自己的代表而遭到破坏。

17. 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的法律的方面，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来考察立宪会议问题，而不估计到阶级斗争和內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转到资产阶级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善于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错误。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责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错误。

18. 由于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唯一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让人民尽量广泛地、迅速地实现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立宪会议本身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选的法令；立宪会议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监督问题上的政策；立宪会议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势力的阵营中来。

19.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由立宪会议引起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来

掩护。任何想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企图都是帮助反革命。

写于 1917 年 12 月 12 日（25 日）

载于 1917 年 12 月 26 日（13 日）

《真理报》第 213 号

转载于 1918 年莫斯科“共产党人”

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弗拉·

乌里扬诺夫）《无产阶级革命和

叛徒考茨基》一书

按该书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6 卷

第 355—359 页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 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发言

(1917年12月14日〔27日〕)

记 录

前一个发言人企图恐吓我们，说我们一定会走向灭亡，一定会堕入深渊。¹⁹³然而这种恐吓对我们并不新鲜。代表他那一派意见的报纸《新生活报》⁷⁸在十月革命前就曾写道：我国的革命除了造成暴行和无政府主义骚动以外，是不会有结果的。因此，说我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甚至同资产阶级无关的人也摆脱不了这种心理……；（国际主义分子喊道：“巧言感众！”）不，这不是巧言感众，你们常用的那种一斧头的说法，才真正是巧言感众呢。

在法令¹⁹⁴中所规定的一切办法，只是实行监督的一种真正保证。

你们说机关太复杂、容易出乱子，问题很难解决。不错，这是尽人皆知的起码道理。如果只是利用这种道理，来阻挠种种社会主义创举，那我们说，走上这条道路的人才是巧言感众之徒呢，而且是有害的巧言感众之徒。

我们想开始检查保险箱，但是有人却以学者专家的名义向我们说，那里除了文件和有价值证券以外，什么也没有。即使如此，那

人民代表把这些东西监督起来，又有什么坏处呢？

既然如此，这些批评得最厉害的学者专家们为什么要躲藏起来呢？对于苏维埃的一切决定，他们都声明同意，但只是原则上的同意。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切妥协分子的惯技，他们总是用原则上同意而实际上不同意的手段来葬送一切。

如果你们对一切事情都有办法，都有经验，那你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困难的道路上，除了遇到你们的怠工以外，就遇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呢？

你们从正确的科学理论出发，但在我们看来，理论只是人们采取行动的依据，理论使我们对这种行动具有信心，而不是使我们产生死亡的恐惧。当然，开头是困难的，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容易出乱子的问题，然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我们都解决了。

假使一本书除了妨碍采取新的办法，使人永远害怕新的办法以外，就毫无用处，那末这本书是分文不值的。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外，没有人会武断地说：不遭到抵抗，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用铁腕来对付旧世界，就可以获得胜利。

你们在原则上也接受了这个专政，但是一到把这个字眼译成俄文，叫作“铁腕”并在实际中应用时，你们就警告说，问题太容易出乱子了，太难解决了。

你们坚持己见，不愿意看见这只铁腕不但会破坏，而且会建设。如果我们从原则转向实际，这无疑正是我们的优点。

为了实行监督，我们曾经号召银行家同我们一起来制定他们能同意的办法，以便在实行充分的监督和账目公开的条件下领取贷款。但是在银行职员当中出现了珍视人民利益的人，这些人说：“他们在欺骗你们，你们要赶紧制止他们直接危害你们的罪恶活动！”因此我们才采取紧急的步骤。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复杂的办法。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实行这种办法，甚至有经济学识的人也不例外。我们要号召专家从事这种工作，但是这只有当权柄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才行。那时我们甚至能够聘请以前的百万富翁来作顾问。谁愿意工作，就请来吧，只是不要把任何革命的创举变成一纸空文，我们是不会上这个当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几个字，我们已经郑重其事地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实现它。

我们本来想走同银行妥协的道路，我们给它们贷款以资助企业，可是它们却策划了规模空前的怠工，实际情况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办法来进行监督。

一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同志说，他们在原则上将投票赞成立即把银行收归国有，以便稍后在极短期内制定实际办法。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草案所包含的无非是几项原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正等着讨论这些原则，如果现在不批准这个法令，那只会使银行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倍地破坏经济。

立即实行这个法令，不然反抗和怠工就会毁灭我们。（鼓掌，转为欢呼。）

载于1917年12月16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第253号

按1918年莫斯科出版的
《第二届全俄工兵农和
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中央
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一书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62—364页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 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粮食的紧张情况，以及由于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和一般经济破坏所造成的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

为了使全国公民，首先是一切劳动阶级，能够在自己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立即从各方面，不惜采取最革命的手段来展开这种斗争并着手安排全国正常的经济生活，特制定下列条例：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 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1. 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
2. 各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以及一切属于富有阶级（即全部财产在五千卢布以上或每月收入在五百卢布以上者）的股东，都必须继续有条不紊地经营企业的业务，执行工人监督的法令，向国家银行交出一切股票，并且每周向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报告本人的活动情况。
3. 国家的一切内债外债一律废除。
4. 证券和各种股票的小持有者，即属于各劳动阶级的小持有

者的利益,完全予以保护。

5.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凡十六岁至五十五岁的男女公民,都必须执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其他苏维埃政权机关所指定的工作。

6. 规定下列办法作为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第一个步骤:凡属富有阶级的人(见第2条)都必须备有劳动消费手册或劳动收支手册并如实记载,必须把上述登记手册送交相应的工人组织,或当地苏维埃及其机关,以便每周登记各人执行工作的情况。

7. 为了正确地计算和分配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某一个消费合作社。粮食局、供给委员会和其他类似机关,以及铁路工会和运输工会,都必须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监督本条法律的执行。特别是富有阶级的人,在组织和管理消费合作社的业务方面,必须执行苏维埃所指定的工作。

8. 各铁路职工工会必须火速制定并立刻实行各种非常措施,以便更合理地安排运输工作,特别是粮食、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输送工作,首先要运输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定运和托运的东西,其次是运输得到苏维埃许可的机关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定运和托运的东西。

同样,责成各铁路工会协同各地苏维埃采取最积极的办法以至采取革命的手段,坚决制止私贩粮食,并无情地取缔一切投机倒把分子。

9. 各工人组织、职员联合会和地方苏维埃,必须即使快关闭的和要遣散的企业以及失业工人转到做有益的工作和生产必需品,必须立即寻找定货、原材料和燃料。各地工会和苏维埃无论如何不得把这项工作搁置起来,并且开展城乡产品交换,但在没有奉到上级特别指令以前,必须严格遵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示

和训令。

10. 凡属富有阶级者必须将其全部现金存入国家银行及其分行或各储蓄所，每周取作消费用的数目不得超过一百至一百二十五卢布(按照当地苏维埃的规定)，而取作生产和商业用的数目，必须具有工人监督机关发的书面证明。

为了监督本法令的切实执行，将颁布用现行纸币兑换其他纸币的条例，犯欺骗国家和人民的罪行者，没收其全部财产。

11. 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怠工者、罢工官吏以及投机倒把分子都应给予上述同样处分，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各地苏维埃及其所属机关，必须火速制定最革命的办法来对付这些真正的人民公敌。

12. 工会及其他劳动者组织应协同当地苏维埃，组织若干流动检查小组，其中须有党和其他组织所推荐的最可靠的人参加，监视本法令的执行，检查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并把违反或回避本法令的犯罪分子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收归国有的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竭尽全力，采取非常措施来改进组织工作，巩固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监督机关必须每周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报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凡贻误工作和玩忽职守的犯罪分子，交由革命法庭制裁。

写于1917年12月上半月

1918年第一次载于《国民经济》
杂志第11期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67—369页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 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破坏所造成的地狱。”资本家同他们的自觉的和半自觉的拥护者就是这样写，这样说，这样想的。

我们回答说，布尔什维克执政虽然才两个月，可是已经向社会主义迈了一大步。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历史事件或者不善于联系起来评价这些历史事件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愿意看到，军队、农村和工厂里的各种不民主的制度，在几个星期内就几乎彻底摧毁了。不经过这种破坏，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不愿意看到，那种拖延战争、用秘密条约掩饰掠夺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谎言，在几个星期内就被争取真正民主和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代替了。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实际成果，即实现了停战和百倍地加强了我们的革命的宣传力量。他们不愿意看到，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

有些人不善于了解历史的远景，他们被资本主义的陈规所束缚；他们被旧事物的急剧破灭、被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代建筑崩溃倒塌的巨响和“混乱”（表面上的混乱）弄得目瞪口呆；他们被发展到极端尖锐程度的，即变成了内战的阶级斗争吓坏了。这是

唯一合法的、唯一正义的、唯一神圣的战争，这不是神父所说的神圣战争，而是凡人所说的神圣战争，即被压迫者要推翻压迫者，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实质上，所有这些受到束缚的、被弄得目瞪口呆的、被吓坏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仆从”，常常不自觉地以那种“道听途说”的、陈旧的、荒谬的、温情的、知识分子庸俗的关于“制定社会主义”的观念为指导，抓住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鳞半爪，重复着被那些不学无术和一知半解的人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把这种思想，甚至把这种“制定”社会主义的计划，硬加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头上。

这种思想是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容的，更不用说这种计划了。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制定”的；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同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的前提和含义就是潜伏的战争的状态，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斗争措施的状态。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责备过公社，认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运用自己的武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时不够坚决。¹²⁰

实质上，知识分子对于镇压资本家的反抗而发出的这种号叫，如果说得“客气”一点，不过是旧的“妥协主义”的复活。如果照无产阶级的直率说法，那就应当指出：这是继续在钱袋面前卑躬屈膝，这就是反对现在工人对资产阶级、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可惜做得还太软弱，还不够坚决）的号叫。一个妥协派的部长，好心肠的彼舍霍诺夫在1917年6月曾经宣布过：“资本家的反

抗已被粉碎。”就连这个好心肠的人也没有怀疑过，反抗确实应该被粉碎，它一定会被粉碎，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这种粉碎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就是镇压资产家的反抗，因而也就是系统地对整个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使用暴力。

富人的贪婪，肮脏的、狠毒的、疯狂的贪婪，他们的食客的那种惊惶万状和奴颜婢膝，这就是现在从《言论报》⁶³到《新生活报》⁷⁸的知识分子大肆叫嚣，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使用暴力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叫嚣，他们的可怜的议论，他们关于“自由”（资本家压迫人民的自由）的虚伪叫喊等等的客观意义就是这样的。假如人类能够来一次精彩的跳跃，一下子就跳到社会主义，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没有剥削者的切齿痛恨，他们不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迂回的办法暗中维护或恢复旧制度，而革命无产阶级也不接二连三地用暴力来“回答”这种企图，那末，这些知识分子是“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食客，正如德国一句有名的谚语所说的，只要皮子永远不洗湿，他们“愿意”把皮子洗一洗。

当资产阶级和惯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官吏、职员、医生、工程师等等采取最极端的反抗手段时，知识分子就大吃一惊。他们怕得抖起来；他们更加凄厉地哀号必须回到“妥协主义”上去。剥削者所采取的极端反抗的手段只能使我们和所有被压迫阶级的真诚朋友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并不期待通过谈判和协商，通过甜蜜的宣传或夸夸其谈的说教，而是通过生活的锻炼、斗争的锻炼，使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掌握政权。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且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应该学会这一点，因为它不能立刻得到这种本领。必须在斗争中学到本领。只有严酷的、顽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无产阶级。剥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剥削者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剥削者愈

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

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食客们的反抗的加强，无产阶级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农民的力量也在增长。随着被剥削者的敌人——剥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剥削者也在壮大、成长、学到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旧亚当”¹⁸⁵。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写于1917年12月25—28日

（1918年1月7—10日）

第一次载于1929年1月22日

《真理报》第18号

署名：列宁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74—377页

怎样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和私人进取心，以及其他的丰功伟绩和美妙之处。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丰功伟绩的意义和不顾“人的天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就是空前残暴地压制人民群众即绝大多数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竞争也就是排斥竞赛，而代之以金融上的欺诈、专横和对社会上层分子的阿谀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钱袋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

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以下的步骤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使全体居民一律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专由国家经营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使群众有可能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的精神。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实行了真正的工人监督来管制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的活动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扬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的技术文化成果来工作的。

为自己的劳动取代强制的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当然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不能不对那些顽固的寄生虫及其走卒采用暴力手段。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工人也不会有什么幻想。工人和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替剥削者做苦工，受到了剥削者无数的欺侮和凌辱，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已经锻炼出来了，他们知道要打破剥削者的反抗是需要时间的。工人和农民决不会传染上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⁷⁸和其他败类的感伤主义的幻想，这班老爷力竭声嘶地“高喊”反对资本家，对资本家“挥手指骂”、“严加痛斥”，可是一到要真正行动，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给资本家调换位子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象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在全国广大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世界的范

围内),有计划有组织的为自己的劳动取代强制劳动的这种伟大更替,除了需要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以外,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作出组织上的和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同采取军事措施无情地镇压昨天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已经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我们发号施令,我们要永远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行动的。从自私自利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果戈里笔下的那类神父、录事和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且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者肩上的那种伟大的、真正豪迈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安慰自己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教养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到了陈腐惯例、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卑鄙的自私自利观点的支持。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和有识别人的本领、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迫于饥饿贫困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中间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打破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实行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

用被迫劳动的人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只想摆脱多余的沉重负担，只想从资产阶级那里捞到一点东西，——这

是一种旧习惯，必须同这种习惯作斗争。这个斗争已经由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展开了。有一些新参加工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他们还是象从前那样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先进工人正在坚决反对这一种人。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思想的农民和劳动人民，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末，实行计算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只要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这个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觉自愿和诚诚恳恳地实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因为俄国有足够的粮食、铁、木料、羊毛、棉花和亚麻，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是必须正确地分配劳动和产品，对这种分配建立切实可行的全民监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其次是骗子、懒汉和流氓。

对人民的这些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不能有任何宽恕。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决战，同骗子、懒汉、流氓决战。这些人，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子孙。在这种社会里，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里，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求荣、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进行欺骗也行；为了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摆脱一分钟也行；为了不挨饿，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聊以糊口，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也行。

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种主要寄生虫，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则和法律，就要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动摇和怜悯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罪过。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即组织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地积极地用满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计算和监督。而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接受和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成绩方面实行竞赛，并在全国内把这种竞赛组织起来，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教养的人请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监督那些“有教养的”人所常有的懈怠是另一回事。

这种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喜欢事事都想插手但都半途而废，是“有教养的人”的

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们天性恶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这种可悲的，但在目前不可避免的特点，由于工人对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作没有实行充分的监督，因而产生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对于我国革命中的错误、缺点和失策，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缺少有教养的人、知识分子、专家的意见和指示是不行的。任何一个头脑多少清醒一点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决不能抱怨工农对他们不够重视，对他们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意见和指示是一回事，组织实际的计算和监督又是一回事。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意见和指示，可是到了要实行这些意见和指示，要实际地监督怎样把言论变成行动时，他们就显得“笨手笨脚”、无能为力了，这种情况简直达到了可笑、荒谬和可耻的地步。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那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¹⁹⁶这句话现在特别使人信服。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管制、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胜过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¹⁹

必须组织工农出身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板公式和想由上面规定一个统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板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的统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骗子，知识分子中间的懒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它的统一。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雄伟的毅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板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力，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须使苏维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供给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这种计算和监督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谁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穿上结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使一切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都不能逍遥自在，而是被关进监牢，或者罚以最繁重的强迫劳动；使一切违反社会主义规则和法律的富人都不能逃脱骗子的命运，公正地讲，骗子的命运也应该是富人的命运。“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这就是必须实际地安排好的事情。要是我们取得了这些实际成就，我们的“公社”，我们的工农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应当因此而自豪（这里加上尤其二字，是因为知识分子太喜欢而且过分喜

欢以自己的一般指示和决议而自豪)。

对富人、骗子和懒汉实行实际计算和监督的数千种方式和方
法，应当由公社本身和城乡基层组织制定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在方式方法方面的多样性，可以保证生气勃勃地、胜利地达到共
同的一致目标，即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肃清骗子这种跳蚤
和富人这种臭虫，等等。在一个地方捉十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
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特别是党的印刷所，有许多排字工
人逃避工作，这同样也是流氓行为)去坐牢。在另一个地方叫他们
去打扫厕所。在第三个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
片，使全体人民在他们悔过以前把他们当作危害分子加以监视。在
第四个地方，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在第五个地
方，想出各种不同的办法来配合运用，例如，对于富人、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可以有条件地释放，
使他迅速改过自新。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加丰富，社
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
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至于在哪一个公社，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
在哪一个村子，没有挨饿的人，没有失业的人，没有有钱的懒汉，
没有资产阶级奴才中的恶棍和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哪里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哪里为了给穷人修建新的好的
住宅，把穷人安置到富人的房子里去住，正常地供给穷人每个小
孩一瓶牛奶等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各个公社、
村社、消费生产合作社、协作社和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才应当展开
竞赛。正是在这种工作上，才应当把有组织才能的人从实践中选
拔出来，让他们参加全国范围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在人民中间
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

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

写于1917年12月25—28日

(1918年1月7—10日)

第一次载于1929年1月20日

《真理报》第17号

署名：弗·列宁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78—389页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

由资本家争夺赃物而引起的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破坏。而罪恶的投机活动和唯利是图的行为——特别是富有阶级的这种行为——使这种破坏更加严重了，竟使几十万几百万人遭到饥饿失业的痛苦。现在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救济饥民并且同投机者进行无情的斗争，因此工农政府制定下列条例，作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项法律：

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当地的(村的、乡的、镇的，或城市的一部分、街道的一部分联合成立的)消费合作社。

各家可以自由联合组成消费合作社，但是每社至少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户数属于非富有阶级(即工人、完全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等等)。

每个消费合作社除采购和分配产品以外，还要经营当地产品的销售事宜。由消费合作社理事会设立若干供给委员会，如无相当的供给委员会的书面证明，不许运输任何产品。

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收归国有，并且必须一无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

私人可以不在地方仓库而到中央仓库去购买产品，但是必须记在所属的地方消费合作社的账簿上。

如无供给委员会的证明而私自运输、买卖产品者，应当没收全部财产，判处半年以上的监禁，并强迫其劳动。

运输、买卖产品的证明书，应当一式两份，并有相当的供给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三人以上签名；一份须交理事会存档。

每份证明书上都应写明：产品是由哪个消费合作社发送的，应当送交哪个消费合作社。

电报局对于供给委员会的电报，可以不按次序，立即发出。

各供给委员会都应该在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监督下并遵照它的指示办事。

除遵照可能为进口商品规定的限制以外，每人都可以通过他所属的消费合作社自由购得任何产品，不受任何限制。

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品，必须按照自由价格售给当地供给委员会，但法律规定了固定价格的除外。应付的产品价款，记入所有者在当地（村、乡、城市、工厂等等）人民银行分行的往来账上。

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都必须组织若干监督、检查和指导小组，来协助居民组成消费合作社（供给委员会），并检查它们的账目以及它们管理的全部事项。

关于供给委员会管理账目和文牒的指示另行发布。

写于1917年12月25—28日

（1918年1月7—10日）

第一次载于1929年1月22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第18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90—391页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¹⁹¹⁷

立宪会议决定：

—

1. 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2.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二

立宪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因此决定：

1. 废除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以及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2. 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便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3. 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 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 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实行劳动者武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解除有产阶级的全部武装。

三

1. 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这次空前的罪大恶极的战争使全世界都淹没在血泊中，立宪会议表示具有不屈不挠的决心，要把人类从它们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因此完全赞同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下述政策：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国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争取在各国人民之间实现以自由的民族自决为基础的、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

2. 为了同一目的，立宪会议主张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完全断绝关系，这种政策是奴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数万万劳动人民，为少数特殊民族的剥削者谋福利的。

立宪会议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退军队、宣布阿尔明尼亚有实行自决自由的政策¹⁹⁸。

3. 立宪会议认为苏维埃关于废除（取消）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所签订的贷款协定的法令，是对国际银行资本即金融资本的第一个打击，并深信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起义获得完全胜利。

四

立宪会议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各党所提的名单选出来的，当时人民还不可能全体起来反对剥削者，还不知道剥削者保护他们的阶级特权的全部反抗力量有多大，还没有实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立宪会议认为，如果它同苏维埃政权对立起来，即使从

形式的观点来看,也是根本不正确的。

按实质说,立宪会议认为,现在正是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候,任何政权机关都不能有剥削者插足的余地。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立宪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任务仅限于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

同时,立宪会议竭力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紧密和巩固的联盟,它的任务只是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根本原则;至于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这应当由他们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

写于1918年1月初

载于1918年1月17日(4日)
《真理报》第2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96—400页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¹⁹⁹

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提供出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个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它才能领导这些阶级为争取它们政治经济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苏维埃就壮大、成长和巩固起来了，它根据本身的经验打消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形式的欺骗性，并且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不同这些议会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协行为决裂，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解放。而这种决裂的表现，便是举行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

根据十月革命前所提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立宪会议，反映了过去在妥协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⁴执政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当时，人民在投社会革命党¹²候选人的票时，还不能在拥护资产阶级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这个势必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会议，就不能不成为横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

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的劳动阶级，这引起了剥削者的拚命反抗，而在镇压这种反抗的过程中完全表明，十月革命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经验使劳动阶级确信：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完全不相容的，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

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现在，凡是反对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反对人民所争得的苏维埃共和国，而赞助资产阶级议会制和立宪会议，那就是向后倒退，就是要使整个工农十月革命失败。

在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由于上述情况，右派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也夫、切尔诺夫的党便占了多数。这个党拒绝讨论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非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建议，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拒绝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这是很自然的。这样，立宪会议就割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因此，目前在苏维埃中显然占有绝大多数、并得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退出这样的立宪会议，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在立宪会议外面，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正在进行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激烈的斗争，它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说劳动阶级为了摆脱剥削而对剥削者的反抗进行必要的武力镇压是非法的暴行，它们替那些为资本服务的怠工分子辩护，甚至还赤裸裸地号召采取恐怖手段，而“一些不知名的团体”已经开始实行这种手段了。因此，留在立宪会议的那部分人所起的作用，显然只是给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打掩护。

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解散立宪会议。

写于1918年1月6日(19日)

载于1918年1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408—409页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顾不得谈历史。是的，如果在某一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没有不可分割的直接的 actual 联系，那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关于不幸的和约，即最沉痛的和约的问题，却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非加以说明不可。因此，我把我于 1918 年 1 月 8 日在大约有六十位我们党的彼得格勒最著名的工作人员举行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宣读过的提纲刊登出来。

这个提纲如下：

1918 年 1 月 7 日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 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²⁰⁰

1. 目前俄国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的：毫无疑问，几乎全体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和它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

2. 同时，内战还没有达到顶点，这场战争是由有产阶级的疯狂反抗引起的，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维护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决战。在这场战争中，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有把

握的，但是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必须经过一段任何战争都要带来的，尤其是内战必然带来的严重破坏和混乱的时期，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下去。

3. 此外，这种反抗还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和非军事的形式，如怠工，收买流氓，收买资产阶级代理人，使他们钻进社会主义者的队伍来破坏社会主义者的事业，等等。这种反抗是这样的顽强，而且竟采取如此多种多样的形式，以致同这种反抗进行的斗争必然还要拖延一些时间，在主要方面进行的斗争恐怕还要经过几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结束。不坚决战胜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的这种消极的和隐蔽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4. 最后，俄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因而解决这些任务——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拥有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和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5. 总括所有这些情况，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结论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使社会主义政府完全可以放手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

6.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应当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对国际任务作任何决定的基础，因为大战第四年的国际局势使人根本无法估计，大概在什么时候爆发革命从而把某一个欧洲的帝国主义政府（包括德国在内）推翻。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应当加强和展开我们的一般宣传工作，特别是组织联欢的工作。但是，如果企图先断定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不会在最近

半年内（或类似这样短的时间内）爆发，然后再制定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策略，那就错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断定的，所以一切类似的企图在客观上都是盲目的赌注。

7. 到现在，即到 1918 年 1 月 7 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已经充分说明，实质上已经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每天都要而且必须预料到这种最后通牒会正式提出）的主战政党，在德国政府（它完全控制了四个同盟国中的其他政府）内无疑占了上风。这个最后通牒就是或者继续进行战争，或者签订割地和约，即签订有条件的和约：我们放弃我们所占领的全部土地，德国人则继续保持他们占领的一切土地，并且要求我们赔款（以支付俘虏的给养费为名），其数目大约为三十亿卢布，分数年付清。

8. 现在俄国社会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是立刻接受这个割地和约呢，还是马上进行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作任何中间路线的决定。再也无法继续拖延了，因为我们为了故意拖延谈判，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

的办法。

9. 在考察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理由就是单独媾和目前在客观上是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妥协，是“帝国主义的勾结”等等，因此这种和约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但是，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同意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资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资本家有利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才是不能允许的。

谁把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称作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实际上却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并且对人民隐瞒同这些帝

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谁才是背叛社会主义。谁一点也不向人民隐瞒，不同帝国主义签订任何秘密条约，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力量继续作战，才同意签订不利于一个弱国而有利于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的和约，谁就丝毫没有背叛社会主义。

10. 主张立刻进行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签订和约在客观上就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这样不但使德国帝国主义能从我国战线上腾出军队，并且还能获得数百万名俘虏等等。但是，这个理由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进行革命战争，会使我们在客观上变成英法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国人曾经直接向我军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建议，只要我们继续作战，他们每月可以发给我们每个士兵一百卢布。即使我们不拿英法一文钱，但是，由于我们牵制了一部分德国军队，在客观上我们还是帮助了他们。

由此可见，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完全摆脱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并且很明显，不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联系。因此，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较好这点出发，而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的原则，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11. 有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反对战争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失败主义者”，并且请求我们不要向德国帝国主义让步。但是，我们只主张对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采取失败主义的策

略，我们始终反对同“友好”的帝国主义结成正式的或实际的联盟去战胜其他帝国主义，这种办法根本是不能容许的，也是完全无用的。

因此，这个理由不过是上述理由的翻版而已。如果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我们把缔结单独和约拖延一定的时候，同时保证在这个期间在德国一定发动革命，那末，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许有所不同。但是，德国的左派不仅不这样说，反而正式声明：“只要能够坚持，你们就尽量坚持下去吧，但是，解决问题时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情况，因为关于德国的革命，我们不可能许下任何肯定的诺言。”

12. 有人说：我们在党的许多声明中曾经公开“答应过”进行革命战争，因而签订单独和约就会违背我们的诺言。

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政府在帝国主义时代必须“准备和进行”革命战争^①；我们这样说是为了反对抽象的和平主义，反对在帝国主义时代完全否定“保卫祖国”的理论，最后，是为了反对一部分士兵的纯粹自私的本能，但是，我们并没有承担不顾时机是否成熟就发动革命战争的义务。

我们就是在今天也绝对必须准备革命战争。我们现在正象过去实现自己的一切诺言那样来实现自己的这项诺言，我们过去的诺言只要是能够立刻实现的，都已经实现了，例如，我们废除了各种秘密条约，向各国人民建议签订公正的和约，屡次设法拖延和平谈判，以便使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时间来响应。

但是，在解决现在能不能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时，就要特别考虑到实现这一点的物质条件和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2页。——编者注

利益。

13. 在对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作一总的评价时，就应当得出以下的结论：这种政策也许适合那班专门追求外表漂亮和色彩鲜艳的人的癖性，可是完全忽略了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客观对比。

14. 毫无疑问，我军在目前和在最近几星期内（也许在最近几个月内）绝对不能顺利地击退德国的进攻，因为第一、大多数士兵疲惫不堪和精疲力尽，加之粮食方面遭到空前的破坏，过度疲劳的士兵无人替换，等等；第二、马匹完全不能使用，因而我们的炮兵有被歼灭的危险；第三、我们根本不能保卫从里加到烈韦里的海岸线，因此敌人很可能占领里夫兰的其余部分，然后占领爱斯兰，并从后方包围我们很大一部分军队，最后占领彼得格勒。

15. 其次，同样也毫无疑问，我们军队中的大多数农民，现在一定会赞成签订割地和约，不赞成立刻进行革命战争，因为依照社会主义原则整编军队、收编赤卫队等工作都还刚刚开始。

在军队完全实现民主化的情况下，违背大多数士兵意志去进行战争将是一种冒险行为，而要建立一支真正可靠和思想上巩固的社会主义工农军队，至少需要好几个月时间。

16. 俄国的贫苦农民能够支持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不能立刻在现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严重的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忽略阶级力量的这种客观对比将是一个无法挽救的错误。

17. 因此，对于现在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应当这样来认识：

如果德国革命在最近三四个月内爆发并且获得胜利，那末，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策略，也许不致于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德国的革命在最近几个月内不会到来，那末，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事件的发展必然会使俄国在遭受最严重的失败以后，被迫签订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并且签订这个和约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某个其他的政府（如资产阶级拉达²⁰¹和切尔诺夫派的联合政府，或者其他类似的政府）。因为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军队最初受到几次挫折以后，可能甚至不需要经过几个月，而是经过几个星期，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

18.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德国革命可能在最近几个星期的短时期内开始这一点，就把在俄国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策略。这种策略将是一种冒险的策略。我们没有权利进行这样的冒险。

19. 即使我们签订单独和约，德国的革命就其客观情况来看，也决不会遇到困难。沙文主义的狂热也许会暂时削弱德国的革命，但是德国的处境将仍然是极端困难的，德国同英美的战争将继续拖延下去，双方面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面貌已经全部彻底揭穿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例子将成为各国人民的活榜样，而这个榜样所发生的革命宣传作用将是巨大的。一边是资产阶级制度和两个强盗集团之间赤裸裸的掠夺战争。另一边是和平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20. 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在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在城市和农村小农的消费合作社实行实物交换的情况下，只要保证有几个月的和平工

作，那末，俄国的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改造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和全世界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也将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

21. 现在只有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明确提出的并得到社会主义军队完全赞同的推翻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这一目的而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才是真正的革命战争。但是，在现阶段上我们显然还不能提出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现在进行战争，那在客观上就是为了解放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而进行战争。可是，如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为了实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民族的自决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做了它能够做的一切，并且还在继续做下去。但是，既然目前的具体情况是：要维护几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等）被破坏了自决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那末，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利益当然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

因此，谁要是说：“我们不能签订可耻的丢脸的和约，我们不能出卖波兰等等”，那他就是没有看到，要是签订以解放波兰为条件的和约，那只会越发加强德国帝国主义去对付英国、比利时、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国家。从俄国方面来看，以解放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也许是“爱国主义的”和约，但是这丝毫也不会改变它仍然是**同兼并者**，同德国帝国主义者签订的和约。

1918年1月21日。对本提纲应作如下补充：

22. 奥地利和德国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接着柏林和维也纳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最后1月18—20日柏林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和巷战，所有这一切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德国革命已经开始这一事实。

根据这一事实，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把和平谈判再拖延和推迟一下。

载于1918年2月24日(11日)

《真理报》第34号

署名：尼·列宁

前言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提纲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415—423页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918年1月11日〔24日〕在全俄工兵农代表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²⁰²上)

同志们！自从俄国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已经有两个月零十五天了。现在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报告一下它在这段时期的工作。

两个月零十五天，这比过去统治了全国，或者说统治了剥削者和资本家的工人政权——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政权所存在的日期，一共只多五天。

我们应当首先回顾一下这一工人政权，追溯一下过去的历史，把它同10月25日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比较一番。这样把过去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加以比较，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尽管在战争和经济破坏的环境中条件是空前的复杂，而国际工人运动却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俄国苏维埃政权所处的有利环境又是多么不可比拟。

巴黎工人第一次创立了公社这种苏维埃政权的萌芽，他们仅仅支持了两个月零十天，就被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金分子枪杀了。法国工人不得不为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的尝试付出空前未有的重大牺牲，而对成立这个政府的意义和目的，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是不了解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要有利得多，因为俄国的士兵、工人和农

民已经创立了自己的机关即苏维埃政府，并通过它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斗争形式。这一点首先使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处境同巴黎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同。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机关，没有为全国所了解，而我们却一下子依靠了苏维埃政权，因而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苏维埃政权能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受到他们最热烈的支持和最衷心的拥护，因此苏维埃政权是不可战胜的。

有人对苏维埃政权抱着怀疑的态度，往往有意无意地出卖和叛变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他们不停地叫嚣，说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是不能在俄国支持下去的。好象在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当中有人曾经忘记（哪怕只是一分钟）：在俄国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长期存在下去，这个政权能够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农民、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团结成一支彼此密切联系的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力量。

我们从来也不怀疑，只有象我们党纲中所说的工人和贫苦农民这些半无产者的联盟，才能包括俄国人口的大多数，才能保证政权有可靠的支持。在10月25日以后，我们能够在几个星期内立即克服了一切困难，并在这个稳固的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权。

是的，同志们，旧的社会革命党¹²在农民还没有弄清他们当中谁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拥护者的时候，就提出了土地平均使用的口号，而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个任务究竟由谁来执行，是否要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当时我们就说过，这是一种欺骗。这一部分人现在发觉了自己没有群众，是一个空架子，他们原以为可以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现土地平均使用；欺骗的实质就在这里。当俄国革命在人民生活的最伟大的时刻表明了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经验的时候，当战争摧残了和摧残着人民，使千百万群众活活饿死，而战争的恶果已在实际生活中表明了妥协主义的经验的时

候，当苏维埃本身经受了妥协主义的教训、经历和饱尝了妥协主义的痛苦的时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那些想把劳动的农民联合到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方面来的人们的学说中，有着健康的、富有生命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种子。

只要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农民的面前摆得十分清楚和明显的时候，就发生了农民苏维埃和农民代表大会现在所表明的、谁也没有怀疑过的一件事实：当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时期到来的时候，农民便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两条基本的政治路线——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还是同劳动群众结成联盟；那时农民便明白了，代表农民的真正愿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当我们同这个政党订立我们的政府联盟的时候，一开始就使这个联盟建筑在最明显而清楚的原则上。如果俄国农民愿意同将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建立工人监督制的工人结成联盟来实现土地社会化，那他们是我们忠实的合作者，是我们最忠实和最宝贵的同盟者。同志们，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隔着一个长久的、比较困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是大私有制还是小私有制，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不言而喻，在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点。

每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知道，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只应该依靠实例的力量，依靠农民群众对实际生活的认识。农民群众认为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才是合适的呢？这就是现在实际摆在俄国农民面前的问题。农民群众自身能怎样来赞助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呢？农民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

过渡了，我们对他们是完全信任的。

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缔结的联盟，是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的，这个联盟不仅一天一天地在巩固，而且每时每刻地在巩固。如果在最初时期，我们还担心人民委员会内的党派斗争会阻碍工作的进行，那末现在，根据两个月共同工作的经验，我应该肯定地说，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作出了意见一致的决定。

我们知道，只有实际经验向农民指明例如城乡间应该如何进行交换的时候，农民才会根据亲身的经验，从下面来建立自己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内战争的经验，使农民清楚地看到，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统治以外，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鼓掌）

同志们！在这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每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听到会上右派的喊声：“独裁者”。是的，“当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大家都承认过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党纲上也写上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憎恨下面这种流行的偏见：说什么可以说服居民，可以向他们证明，剥削劳动群众是不应该的，是有罪的和可耻的，说什么一旦把居民说服以后，世界上就会出现天堂。不，这种空想的偏见在理论上早已被粉碎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实践中把它粉碎。

不能这样设想社会主义，不能认为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会将现成的社会主义托在盘子里奉献给我们，这是不会有的事。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用来反对剥削者的暴力，那末我们是拥护这种暴力的！（掌声如雷）有些人有意无意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者被资产阶级吓得非常惊慌，被资产阶级的统治压迫得非常厉害，以致于他们现在一看见这种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就张惶失措，痛哭

流涕，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前提，向我们提出了不可接受的要求，要求我们社会主义者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去取得完全胜利。这些人的哀号，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

早在1917年夏天，剥削者老爷们就已经知道：这是“最后的斗争”问题；如果苏维埃取得政权，他们就会失去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失去资产阶级镇压劳动群众的主要基础。

因此，十月革命就展开了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使剥削者停止自己的反抗，使他们不能不承认（即使对他们中间最开明的人来说也很难）：剥削阶级的统治是再也不会有了，从今以后，指挥一切的是大老粗，剥削者必须听从他们——尽管这对剥削者是一件多么不愉快的事，但也不得不如此。

这里会遇到许多困难，遭到许多牺牲，犯许多错误，这是一桩书本上读不到的、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新事业。事情很明显，这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过渡，采用别的方法是根本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过渡的。俄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个事实表明，最富有革命经验的就是革命群众自身（数百万人起来援助数十个党员），就是实际掐住了他们的剥削者的咽喉的革命群众自身。

因此，国内战争目前在俄国占了主要地位。有人提出“打倒国内战争”的口号来反对我们。我从所谓的立宪会议的右派代表们那里听到过这个口号。打倒国内战争……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同谁进行的国内战争呢？是同那些耗费几百万金钱来收买流氓和官吏的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列布申斯基之流进行的国内战争吗？是同那些接受这种收买的——不管他们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怠工者进行的国内战争吗？毫无疑问，在后一种人中间，有些人思想不开展，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收买，因为他们根本不能设想，可以而且应该根本摧毁过去的资产阶级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

上开始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来。毫无疑问，这种人是有的。但是，这难道能改变情况吗？

因此，有产阶级的代表们就只能孤注一掷。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后的斗争。他们甚至不惜采取任何罪恶手段，来破坏苏维埃政权。全部社会主义史，尤其是非常富有革命倾向的法国的全部社会主义史，难道没有告诉我们：在劳动群众自己夺取政权的时候，在问题涉及保存统治阶级私人钱袋的时候，统治阶级便进行空前的罪恶活动和屠杀。当这些人向我们谈国内战争的时候，我们只置之一笑，当这些人在青年学生中间散布他们的口号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说：你们在欺骗他们！

阶级斗争采取它的最后的形式，不是偶然的，因为被剥削阶级夺取政权的一切手段，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自己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要在俄国境内不仅扫除官吏，而且扫除地主，正象俄国农民在某些省份内所做的那样。

有人告诉我们，说人民委员会遇到的官吏和地主的怠工，证明人们不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似乎不明白，这帮资本家和骗子，流氓和怠工者，是一批被资产阶级收买来反抗劳动人民政权的匪徒。当然，谁认为可以一下子从资本主义跳到社会主义，谁认为可以使大多数居民相信，经过立宪会议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谁如果相信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神话，那就让他安然自得地去继续相信吧，可是，当实际生活粉碎这种神话的时候，希望他不要责怪实际生活。

谁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官吏们所组织的怠工，谁就会知道，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现在还遗留着许多资产者、资本家，他们正在希望恢复自己的统治，正在保护自己的钱袋；现在还遗留着流氓，他们是一批被收买的人，完全为资本主义所腐

蚀，不能提高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水平；现在还留下许多职员和官吏，他们以为保护旧制度是社会的利益。除了这些阶层的彻底崩溃，除了俄国和欧洲资产阶级的完全覆灭以外，怎么能设想社会主义的胜利呢？我们难道认为列布申斯基之流的老爷们不懂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吗？正是他们收买怠工者，叫他们不做工。难道他们是单独行动的吗？他们收买有价证券时，难道不是同法、英、美资本家们一起行动的吗？现在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些有价证券的收买究竟会给他们多少帮助。难道他们现在所收买的堆积如山的有价证券不会变成一文不值的毫无用处的废纸吗？

因此，同志们，当人们咒骂和责难我们实行恐怖、专政和进行国内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还远没有实行真正的恐怖，因为我们的力量比他们强大，我们有苏维埃，我们只要将银行收为国有，没收产业，就足以使他们服从我们，——我们就针对关于国内战争的一切指责回答说：是的，我们公开宣布了任何政府所不能宣布的事情。世界上第一个能够公开谈论国内战争的政府，就是工农兵群众的政府。是的，我们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战争。我们愈是直爽地说出这一点，这个战争就结束得愈快，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就会愈迅速地了解我们，了解苏维埃政权正在完成一桩真正与全体劳动者有切身关系的事业。

同志们，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很快就能得到胜利，可是我们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在两个月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经历了克伦斯基对苏维埃政权进攻的尝试，并看到了这次尝试的完全破产。我们经历了乌克兰克伦斯基组织政权的活动，那里的斗争现在还没有结束，但是每一个留心这个斗争的人，每一个听过苏维埃政权代表的几个真实的报告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乌克兰拉达²⁰¹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末日快要到了。（鼓掌）丝毫用不着怀

疑，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政权一定会战胜乌克兰资产阶级拉达。

现在谈谈同卡列金的斗争。如果卡列金有什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那末这里实际上不过是一切都依靠对劳动者的剥削，依靠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卡列金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劳动群众都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验，以事实为根据的宣传，以苏维埃组织为实例的宣传，会得到胜利；现在顿河区卡列金内部支柱的崩溃，与其说是起因于外部，还不如说是起因于内部。

因此，考察了俄国国内战争前线的状况以后，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有充分把握的，是完全有保障的。同志们，这个苏维埃政权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遵循了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训条，彻底地坚决地依靠群众，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使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受摧残的阶层觉醒过来，走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起来创立社会主义。因此，旧式的军队，即对士兵实行严酷教练和严刑拷打的军队已经过时了。这种军队已经完全破产了，已经彻底摧毁了。（鼓掌）军队的完全民主化已经实现了。

我现在向大家谈一件我所遇到过的事情。有一次，我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听到几个芬兰人和一位老太太谈话。我不能参加这次谈话，因为我不懂芬兰话。但是有一位芬兰人向我说：“你知道这位老太太讲出一件多么新奇的事情吗？她说，现在不要怕带枪的人了。有一次我在森林中碰到一个带枪的人，他不仅没有夺去我的干柴，并且还帮我找了许多。”

我听了这番话，就想到：让千百份报纸，——不管它们叫作社会党的报纸或准社会党的报纸等等，——让千百个非常响亮的喉

辱骂我们是“独裁者”、“暴力者”等等吧。我们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现在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他们说：现在不要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统治。（鼓掌）这就是人民所感到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没有教养的普通人说赤卫队正竭尽全力反对剥削者的这种宣传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宣传会普及到千百万群众，会坚固牢实地创立十九世纪法国公社已经开始创立的事业（但只是创立了很短一个时期，因为它被资产阶级消灭了），会创立一切社会主义者所向往过的社会主义的红军，会使全民武装起来。这种宣传会造就出许多新的赤卫队干部，以便能训练劳动群众去进行武装斗争。

如果有人议论俄国，说它不能作战，因为它不会有军官，那末，我们就不应忘记，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军官们在观察了同克伦斯基和卡列金作战的工人以后所讲过的一番话。他们说：“是的，这些赤卫队在技术上差劲透了，但是这些人如果能够稍微学习一下，那末，他们就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因为在世界斗争史中，破天荒第一次由没有官场习气的，而以争取被剥削者解放的思想作为指南的人组成了军队。当我们所开始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将是不可战胜的。（鼓掌）

同志们！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军队方面所采取过的方针，同时在统治阶级的另一种更精巧更复杂的工具——资产阶级法庭方面也采用了。资产阶级法庭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维持秩序的场所，实际上却是一种无情镇压被剥削者以保护富人利益的混淆视听的精巧的工具。苏维埃政权遵循历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指示，立即废除了旧法庭。让人们说我们不进行改良而一下子就废除了旧法庭吧。这样，我们就为创造真正的人民法庭扫清了道路，少用高压的力量，多用群众的实例，多用劳动者的威信，不拘形式地把

法庭这一剥削的工具改造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基础上施行教育的工具。毫无疑问，我们是不能一下子就得到这样的社会的。

苏维埃政权正在全世界最伟大的人民革命的全部经验所指示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条道路上迈进时所采取了的一些主要步骤。在任何革命中，劳动群众都在创立新的国家政权这条道路上开始迈了几步。可惜，他们只是开始迈进了几步，而不能将事业进行到底，不能创立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已经创立了新型的国家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并不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但如果你们说我们的国家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却是说得对的。你们正象那些把西欧许多资产阶级共和国称为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人一样，是说得对的，虽然谁都知道，没有一个最民主的国家是完全民主的。它们只有一点点民主主义，在小事情上削减剥削者的一些权利，可是那里的劳动群众仍然象在各处一样受到压迫。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说，资产阶级的制度既是旧的君主制也是立宪共和制。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头脑糊涂过，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一条多么困难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这些话将不是空话。

我们开始实行了许多摧毁资本家统治的措施。我们知道，我们的政权应该用一个原则把一切机关的活动联合起来，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这就是：“俄国宣布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是一个真理——它以我们将来要做的和已经开始做

的事业为依据；这将是我們一切活动的很好的联合；这将是这种活动纲领的宣布；这将对各国被剥削劳动者的号召。这些被剥削劳动者或者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或者（更坏些）把社会主义了解为切尔诺夫—策烈铁里式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我们在十个月的革命时期内已经尝试过和体验过了。我们深信，这是一个骗局，而不是社会主义。

因此，“自由的”英国和法国使用了一切方法，以求在我国革命的十个月内，不许有一期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入境。它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各国的工农群众本能地理解了俄国工人所做的一切。因为在每一个会议上，人们都以雷鸣般的掌声来欢迎俄国革命的消息和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各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已经同自己政党的上层分子发生矛盾了。这种旧的上层分子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象我们俄国的齐赫泽和策烈铁里一样已经被埋葬，但是它在世界各国都已经被击毙了，它已经死亡了。

现在同这种旧的资产阶级制度相对立的，已经有新的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破坏着资产阶级旧的壁垒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共和国。新式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有可能去镇压剥削者，有可能去镇压这些因旧日的钱袋和旧有的知识而显得强有力的极少数人的反抗。他们——教授、教师、工程师将自己的知识变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他们说，我愿意以自己的知识为资产阶级效劳，不然我就不工作。但他们的政权已经为工农革命所摧毁了，并且产生了一个同他们相对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内，群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

只有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真正有了这样的政权组织，这种组织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正着手向完全取消任何政权、任何国家过

渡。这一点，只有到没有剥削残余的时候，即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现在我简单地讲一讲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所已经开始实行的那些措施。为了在俄国土地上不仅消灭地主，而且要根本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铲除资本压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可能性而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便是着手实行银行国有化。银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中心。它集合着空前的财富，又在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内进行分配，它是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神经。这是一些精巧而复杂的机构，生长发育已经有几百年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打击，就针对着这些机构，它起初在国家银行中遇到了拚命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没有阻止住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组织国家银行方面，我们已经获得基本的成果；这些基本成果，已经掌握在工农手里。这些基本措施还需要长期进行研究，但我们在实行这些措施以后，就可以腾出手去搞私人银行了。

我们当时并没有按照妥协者大概会规劝我们的那样去做：首先等待立宪会议，然后也许制定一个法案，并把它提交给立宪会议，这样就把我们的意图告诉资产者老爷们，使他们能够找到一条退路，逃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也许是吸收他们参加合作，那时你们就能制定国法，——这就会是“国家的法令”了。

这是取消社会主义。我们当时做得很简单，我们不怕引起“有教养的”人的咒骂，更正确些说是贩卖一星半点知识的没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拥护者的咒骂；我们说，我们有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应当在今天早上占领一切私人银行。（鼓掌）在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在权力已经握在我们手里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早上占领了银行，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通过决议：“宣布银行为国有财产。”银行事业就这样实现了国家化。

社会化，转交到了苏维埃政权手中。

在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银行这一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经过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如此奇妙和精巧的机关，可以在几天内被打破或改造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断言过。当学者或冒牌的学者们摇头晃脑地预言未来的时候，我们说：随便你们怎样去预言未来吧！我们只知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道路：占领敌人的阵地，从经验中，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执掌政权。我们绝对不轻视我们道路上的困难，可是基本的东西，我们已经做到了。资本主义财富在分配方面的基础已经摧毁了。在这以后，取消国债，推翻金融压迫，都是轻而易举的了。在实行工人监督以后着手没收工厂，也是十分容易的事。当时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实行工人监督，就将生产分成许多单个的车间。我们已经粉碎了这种胡说。我们在实行工人监督的时候已经知道，要工人监督普及到整个俄国，还须经过不少的时间，但我们当时想表明，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从下面来进行改造的道路，以便工人自己从下面来创立经济条件的新基础。创立这样的新基础，需要不少的时间。

我们已经从实行工人监督进而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只有这个措施以及最近几天就要实行的银行和铁路的国有化，才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事业的艰巨，但是我们断定说，只有信赖劳动群众的经验和才能，切实担负起这个任务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劳动群众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基本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们知道，他们向苏维埃政权求助时，苏维埃政权只会援助他们反对剥削者。任何一种减轻他们劳动的措施，都完完全全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苏维埃政权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及时完成的，它经常会遇到困难的任务。工农群众常常派代表到政府里来

询问，比如说，对于某块土地，他们应该怎样处置。当我看到他们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感觉困难。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就是政权，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支持你们，但你们要注意生产，要使生产成为有益的生产。当你们着手去做有益的工作的时候，你们会犯错误，但你们可以学会工作。工人已经开始学习，他们已经同怠工者进行斗争。有教养的人筑起了一道围墙，阻止劳动者前进。这道围墙一定会被拆掉。

毫无疑问，战争腐蚀着前线 and 后方的人们，付给为战争而工作的人以高过任何标准的薪金，诱惑着一切逃避战争的人，诱惑着只想“抢劫”一番就逃走的流氓或二流子。但是这些分子，这些从资本主义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最坏的分子带来了旧制度的一切恶习。我们应当将他们赶走，而将一切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吸收到工厂企业中来，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主义俄国的核心。实行这个措施是不容易的，它会引起许多纠纷、争执和冲突。我们人民委员会和我个人，都会遭到他们的抱怨和威胁，但我们很镇静地对付他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求助的裁判人。这个裁判人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鼓掌）这个裁判人的话是无可抗辩的，我们是永远信赖他的。

资本主义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同这些上层分子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经过斗争，我们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斗争，我们开始了斗争，我们要在叫作苏维埃的这个机关的帮助下把斗争进行到底。如果我们将各种纠纷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法庭去仲裁，那末，任何问题都很容易解决。因为不论特权工人集团有多么厉害，但把他们放到全体工人的代表机关面前的时候，那末这种法

庭，我再重复一遍，对于他们将是无可抗辩的。这种整治方法，现在还刚刚开始实行。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充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由于历代的传统影响，他们非常习惯于等待上面的命令。他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到，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是一个统治阶级；在他们的队伍中，还有一些备受威吓和压迫的人，竟认为自己应该进资产阶级的肮脏学校。这个非常肮脏的资产阶级偏见保留得最为长久，但是现在它正在毁灭，而且一定会彻底毁灭。我们相信，随着苏维埃政权每一项措施的实行，越来越多的人会完全摆脱所谓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不能管理国家这种旧的资产阶级的偏见。只要动手管理国家，就可以学会管理国家！（鼓掌）

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从人民群众中选拔出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一项巨大的工作，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没有这种能够选拔人材的选拔机关，那末，要想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仅有关于监督的国家法令，甚至还有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无产阶级试图同工厂主联合会订立合同，以保证工人能够管理整个工业部门。制革工人已经开始同全俄皮革业工厂主联合会商订这种合同，而且几乎同他们签订了这个合同；我认为，这种合同有特别重大的意义²⁰³。这种合同表明，工人已逐渐在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同志们！我的报告，并没有谈到特别迫切和特别困难的问题——和平问题，粮食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列为议程上的特别项目，将要进行专门的讨论。

我作这个简短的报告，目的是要说明我个人和整个人民委员会对于我们所经历了的这两个半月的历史的看法，说明在俄国革命的这个新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新的国家政

权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政权面临着哪些特别任务。

俄国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行银行国有化，把全部土地交给劳动群众。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但是，同过去的革命作一番比较以后，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得到巨大的成就，我们深信，我们正站在能够保证我们取得完全胜利的道路上。

同我们一起前进的，还有被掠夺战争弄得四分五裂的比较先进的国家中的群众。这些国家中的工人，受过比较长期的民主化的教育。有人向我们描写，说我们的事业是多么困难；有人告诉我们，说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认为，这些议论只是说明资产阶级及其有意无意的拥护者毫无希望地企图曲解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我国工农队伍，是世界大军的一个支队，这支世界大军现在被世界大战冲散了，但它正在设法联合起来。关于我国革命的每一条新闻，每一段报告，每一个人，都赢得无产阶级雷鸣般的同情的掌声，因为他们知道，俄国正在实现他们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起义的事业，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某个国家实际行动起来的活榜样的作用，比任何宣言和任何会议都要大，正是这点使各国劳动群众精神奋发。

如果1905年的十月罢工——革命胜利的第一步，一下子就传播到了西欧，并在当时，1905年，就引起了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如果我们当时已在实践中看到，革命的实例，一国工人的发动有多大的价值，那末，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成熟起来。

如果我们犯了些错误，有了些过失，如果在我们的道路上遇着些障碍，那末，这对他们并不重要。对他们重要的是我们的实例，

就是这一点把他们团结了起来。他们说：我们会不顾一切，共同前进，取得胜利。（鼓掌）

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来考察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期的分娩痛苦，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团结全世界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他们并且说过，在十九世纪末叶，“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²⁰⁴，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已经养成奋不顾身的革命创造精神，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有可能易于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西欧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几乎都加入了内阁的切尔诺夫—策烈铁里式的政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也没有巩固的基础。我们看到了意大利的实例，我们在最近几天看到了奥地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强盗们的英勇斗争。²⁰⁵就假定强盗们能够暂时阻碍运动的开展吧，但是要想完全制止这个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个运动是不可战胜的。

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榜样将长期地摆在他们面前。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着。在那边是争吵、战争、流血、千百万人的牺牲、资本的剥削，在这边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现在的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

阶级了；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鼓掌)

载于1918年1月12、13、14和
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第8、9、10和15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426—443页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²⁰⁶

为了使疲惫不堪的、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们作了莫大的牺牲，并且向德国人声明我们同意签订他们所提出的媾和条件²⁰⁷。我们的军事代表已于2月20日（7日）下午离开烈日伊察到得文斯克去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回答。德国政府显然是有意拖延答复，显然是不愿意媾和。德国军国主义受各国资本家委托，要窒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归还沙皇。德国将军们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俄国工农的神圣义务，就是要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发动起来和胜利之前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匪军。人民委员会兹决定：（1）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都用于革命防卫事业。（2）责成各级苏维埃和革命组织要战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每一个阵地。（3）所有铁路组织及与之有关的苏维埃，必须以全力阻挠敌人利用交通工具；在退却时必须破坏道路，炸毁和烧掉铁路建筑物；全部车辆——车厢和机车——立即开往我国东方内地去。（4）凡有落入敌方危险的一切存粮和一般食物以及一切贵重财物，应当无条件地加以销毁；责成各地苏维埃对此加以监视，并且由各苏维埃主席亲自负责。（5）彼得格勒、基辅以及沿新战线所有一切城乡市镇的工人农民，都应当组织挖壕营，由军事专家指挥，挖掘战壕。（6）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

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7）一切反对革命的国防事业而站到德国资产阶级方面的，以及想利用帝国主义匪军的侵略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出版机关，一律封闭；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参加挖掘战壕以及其他国防工作。（8）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社会主义祖国万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人民委员会

1918年2月21日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8年2月22日
《真理报》第32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7卷
第15—16页

奇谈与怪论

我党莫斯科区域局²⁰⁸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拒绝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并在该决议的“说明”中声明,“认为党在最近将来的分裂恐难避免”^①。

这里既没有怪论,也没有奇谈。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背道而驰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奇谈怪论是附在决议后面的“说明”。它的全文如下:

“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将来的分裂恐难避免,因而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团结一切既反对单独媾和派,也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向其他所有国家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坚决实行工人专政,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

这里我们把那些……奇谈怪论加上了着重号。

^① 决议全文如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对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中央的成员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关键就在这句话。

这句话把决议起草人的全部路线引伸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句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他们错误的根源。

“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这是奇谈，因为在前提和结论之间根本没有联系。“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苏维埃政权遭到**军事失败**，也是适当的”，这样的提法不管对不对，还不能称之为奇谈。这是第一。

第二，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就不仅是奇谈，而简直是怪论了。显然，起草人陷入了迷宫。因此必须打开这个迷宫才行。

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的意思显然是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遭受军事失败，因而丧失苏维埃政权，就是说让俄国资产阶级获得胜利，也是适当的。起草人说出这句话，就是间接承认我的提纲（1918年1月8日宣读的、1918年2月24日发表在《真理报》¹⁷上的提纲）^①是正确的，我说，不接受德国向我们提出的和约条件，就会招致俄国的失败，苏维埃政权的垮台。

可见真理总是要占上风的（*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极端”反对我的，拿分裂威胁人的莫斯科派，既然已经公开说到分裂，就应该把自己的具体看法完全说出来，而这正是那些用革命战争的空话来支吾搪塞的人所避而不谈的。我的提纲和论据的全部实质（凡是愿意细心阅读我在1918年1月7日写的提纲的人都能看出），就是指明在认真准备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立刻接受极其苛刻的和约（这也正是为了认真备战）。可是那些专门空谈革命战争的人，却回避了我的论据的全部实质，或者是没有看到、

^① 见本卷第409—417页。——编者注

不愿意看到这个实质。现在我应当衷心地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揭穿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采取的“沉默阴谋”。莫斯科派首先对此作了答复。

他们的答复是什么呢？

他们的答复就是承认我的具体论据是正确的。莫斯科派也承认，如果我们马上同德国人开战，失败的确就在眼前^①。是的，这种失败的确会使苏维埃政权垮台。

我再一次衷心地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揭穿了那种对我的论据的实质，即对我指出的如果我们立刻应战就会遭到何种结局的具体说明所采取的“沉默阴谋”，并感谢他们大胆地承认了我的具体说明是正确的。

其次，既然莫斯科派实质上已被迫承认我的论据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还要加以反驳呢？

因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就应该丧失苏维埃政权。

为什么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一切想驳倒我的论据的人，其立论的真正实质就在于此。可是，无论在决议中还是在决议的说明中，对于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恰巧只字未提。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问题，决议起草人却找到了时间和场合来谈论——既谈到“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是用足以丧失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手段和办法吗？），又谈到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者，而关于恰恰是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反对媾和的人的立场的实质问题，

^① 有人反驳说，战争反正是躲避不了的。可是事实回答说：我的提纲是在1月8日宣读的，我们在1月15日就可能得到和平。如果……如果不是由于革命空话，我们一定得到了喘息时机（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最短促的喘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也有巨大的意义，因为那时德国人就势必宣布新的战争）。

却一声不响！

奇怪！非常奇怪！决议起草人不是正因为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特别心虚，所以才默不作声吗？如果明白地说出为什么（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也许就会原形毕露了……

但不管怎样，我们还得找出决议起草人可能依据的论据。

也许起草人以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就绝对不允许同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和约。这种意见，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反对媾和的人已经提出过了，可是支持这种意见的，在反对单独媾和的人中间，也是极少的²⁰⁹。显然，这种意见就是要否认布列斯特谈判是适当的，“甚至”以归还波兰、拉脱维亚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也要加以否认。这种观点的不正确是一目了然的（例如，它就遭到了彼得格勒大多数反对媾和的人的反对）。按照这种观点，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能缔结任何经济条约的，如果不飞到月球上去，那就无法生存。

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而能强行推动这种革命的，似乎只是战争，决不是和平，和平只会给群众造成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印象。这类“理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的发展要看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如何。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已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给以援助，不过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即使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甚至从强行推动论中间也是引伸不出来的。

也许决议起草人以为，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已经酿成公开的全国范围的内战，所以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德国工人，应

当牺牲自己（“丧失苏维埃政权”），拯救已经开始决战而受着严重打击的德国革命。从这种观点看来，我们虽然牺牲了，但是可以牵制住德国一部分反革命势力，从而就会挽救德国革命。

当然，在这种前提下，即使遭受失败，即使丧失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用决议起草人的话来说），甚至是应该的。但是很明显，这种前提并不存在。德国革命正在成熟，但显然还没有到爆发的程度，还没有到发生内战的程度。我们“即使丧失苏维埃政权”，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妨碍它。我们这样做却会帮助德国反动势力，被他们所利用，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困难，使那些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德国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广大群众更加离开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会被苏维埃俄国的灭亡所吓倒，如同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把英国工人吓倒一样。

不管怎样，在起草人的论断中，是找不出逻辑的。“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这种说法是没有合理的论据的。

“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真是怪论，莫斯科决议的起草人竟公然说出了这种话。

据说，既然德帝国主义者要向我们索取贡赋，既然他们禁止我们进行反德的宣传鼓动，那末苏维埃政权便丧失了意义，便“完全流于形式”了，大概这就是决议起草人的“思”路。我说“大概”，是因为作者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论点来支持上述的提法。

说苏维埃政权似乎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而可以采取丧失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这种“理论”的内容就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是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没有出路，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才会写出这种怪诞的决议。有时用来掩饰这种意思的所谓“经济上的”论据，归结起来也就是这种绝

望的悲观主义：既然人家可以向我们索取贡赋，可以要这个要那个，那还说得上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呢。

反正要灭亡！除了这种绝望以外，没有别的了。

在俄国目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觉悟的革命者有这种心情那是不能“理解”的。莫斯科派的观点弄到了如此荒谬绝伦的地步，就是很好的说明。1793年的时候，法国人从来不会说他们的胜利果实——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因此应该丧失共和国。他们满怀的不是绝望，而是对胜利的信心。一面号召进行革命战争，一面又在正式的决议中写着“丧失苏维埃政权”，这样就把自己暴露无遗了。

在十九世纪初叶，在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普鲁士及其他许多国家所遭受的失败以及受侵略者征服、屈辱和压迫等等的痛苦，比1918年俄国所受的大得无可比拟。普鲁士的优秀志士，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比我们现在所受的蹂躏厉害百倍，但是他们没有绝望过，没有说过他们的国家政治机关“完全流于形式”。他们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被“反正要灭亡”的心情所支配。他们签订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苛刻、更加残酷、更加屈辱和更加受压迫的和约²¹⁰，他们善于坚定地忍受侵略者的压迫，等待时机，起来战斗，再次受侵略者的压迫，又签订耻辱的、极端耻辱的和约，然后再重新奋起，并终于获得了解放（当然也利用了那些互相竞争的较强大的侵略者之间的纠纷）。

类似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在我国的历史上重演呢？

为什么我们要悲观绝望，要写出比最耻辱的和约实在更可耻的决议，即关于“苏维埃政权完全流于形式”的决议呢？

为什么同现代帝国主义巨魁作战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不能锻炼俄国民族的性格，加强自觉的纪律，杜绝高傲空谈的风气，教

给人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引导群众采取普鲁士人被拿破仑打败后所采取过的正确策略：既然没有军队，就应该签订最耻辱的和约，以便养精蓄锐，重新奋起？

为什么别国人民能坚定地经受多次惨痛，而我们却一看到非常苛刻的和约，就要悲观绝望了呢？

质问，同这种绝望策略相符合的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还是小资产者毫无骨气的特性？无产者懂得，既然没有力量，就得屈从，然而他善于在任何条件下都坚持不懈地养精蓄锐，准备重新奋起；而小资产者，如我们这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却在空谈革命战争方面打破了纪录。

亲爱的莫斯科“极端”派同志们，这决不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每天的考验都会使最有觉悟、最坚定的工人离开你们。他们会说，苏维埃政权没有完全流于形式，也决不会完全流于形式，不仅在侵略者打到普斯科夫，要我们缴纳粮食、矿产、现金等价值一百亿的贡赋时是如此，就是在敌人占领了下新城和顿河岸罗斯托夫，要我们缴纳价值二百亿的贡赋时，也是如此。

任何时候，任何外国的侵略，都不能使人民的政治机关（况且苏维埃政权不仅仅是一个比历史上所有的政治机关高得多的政治机关）“完全流于形式”。相反地，外国的侵略，只会加强人民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只要……只要苏维埃政权不去冒险。

没有军队，又拒绝签订最屈辱的和约，那就是冒险，人民有权利指责政权拒绝和约的冒险行为。

签订比布列斯特和约苛刻得多、耻辱得多的和约，在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如上面所举的），这样做非但不会损害政权的威信，不会使政权流于形式，不会使政权或人民遭到灭亡，反而锻炼了人民，教导人民即使处在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艰苦情况，也要善于建

立强大的军队。

俄国正在准备新的、真正的卫国战争，即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很可能以后一个时代——象拿破仑战争时代那样——是侵略者强迫苏维埃俄国进行多次解放战争（是多次，而不是一次）的时代。这是很可能的。

因此，这种可耻的绝望，比任何一个由于没有军队迫不得已缔结的苛刻的、极端苛刻的和约更加可耻，比任何一个耻辱的和约还要可耻。只要我们认真看待起义和战争，我们就是签订十个极端苛刻的和约，也决不会灭亡。只要我们不被绝望和空谈所断送，我们是不会亡在侵略者手里的。

载于1918年2月28日和3月
1日《真理报》第37和38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7卷
第54—61页

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

我们可怜的“左派”昨天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共产主义者报》²¹¹（应当说是：马克思时代以前的共产主义者），想逃避历史教训，逃避多次的历史教训，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也是枉然，他们是逃避不了的。

他们拚命逃避，在报纸上堆砌无数文章，累得满头大汗，“甚至”不惜印刷油墨，把“喘息”“论”说成是毫无根据的坏“理论”。

可惜！他们怎样大卖气力也推翻不了事实。英国的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这个事实是：自3月3日下午1时德军停止军事行动时起，至3月5日晚上7时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止，我们是获得了喘息时机，并且我们已经利用这两天工夫进行了实际的（不是空谈，而是实际的工作）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这是事实，群众会日益看得更加清楚。当前线军队无力再战，抛弃大炮，连桥梁也顾不上炸毁，慌乱奔逃的时候，保卫祖国和提高国防能力，那就不是空谈进行革命战争能做到的（主张革命战争的人，在军队这样慌乱奔逃时，连一个部队也没有阻止住，却还空谈革命战争，——简直可耻），而是要作有秩序的退却来挽救残余的军队，要利用每天的喘息时机来完成这些工作，——这都是事实。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

我们可怜的“左派”，为了逃避事实，逃避事实的教训，逃避责任问题，极力对读者掩盖不久前的，在历史上很重要的，还很新鲜

的事实，而援引早已过去了的，不关重要的东西来模糊他们的认识。例如卡·拉狄克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他12月间（在12月呵！）在《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写过关于必须帮助军队支持下去的问题。我没有机会把这个报告书读一遍，因此我不免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卡尔·拉狄克不把这个报告书全部发表出来呢？为什么他没有确切地直接说明，他当时对“妥协和约”究竟是如何了解的？他为什么不回想一下不久前的事实：他在《真理报》¹⁷上写过他幻想（最坏的幻想）有可能在归还波兰的条件下与德帝国主义缔结和约呢？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可怜的“左派”不能不抹杀那些暴露他们“左派”应负散布幻想的责任的事实，因为这种幻想实际上是帮助了德帝国主义，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

尼·布哈林现在甚至企图否认他同他的朋友们曾断定德国人不能进攻的这一事实。可是，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是事实，都知道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这样断定过，都知道他们散布这种幻想从而帮助了德国帝国主义，并且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发展；要知道德国革命现在所以被削弱了，是因为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农民组成的军队在狼狈奔逃时，被夺走了成千成万的大炮和价值若干万万的财富。这是我在1月7日提纲中^①已明确地预言过的。如果尼·布哈林现在非“抵赖”不可，那对于他就更坏。凡是记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说过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句话的人，现在看见尼·布哈林一定要“抵赖”他亲口说过的话，只会耸肩表示诧异。

而对于那些不记得这些话的人，或是没有听见过这些话的人，

^① 见本卷第409—417页。——编者注

我们介绍他们看看现在比卡·拉狄克在12月所写的东西更有点价值，更有点意义，更有点教益的文件。这个文件(可惜，被“左派”对他们的读者隐瞒了)就是(1)1918年1月21日在我党中央与现在的“左倾”反对派共同会议上的表决结果，和(2)1918年2月17日中央会议上的表决结果。

1918年1月21日会议在表决关于是否应当立刻破裂与德国的谈判的问题时，赞成的(在可怜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报》的撰稿人中)只有斯土柯夫一人。其余的人都是反对的。

关于万一德国人要破裂谈判或是他们提出最后通牒时是否可以签订割地和约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反对的只有奥波连斯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提纲登载出来？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报》对于这点默不作声呢?)和斯土柯夫，其余的人都是赞成的。

关于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应当签订已提出的这个和约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反对的只有奥波连斯基和斯土柯夫，其余的“左派”都弃权了!! 这是事实。

1918年2月17日在表决关于谁赞成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时，布哈林和洛莫夫“在问题这样的提法下拒绝参加表决”。而赞成的没有一个人。这是事实!

关于是否应当“在德国的进攻还不十分(正是如此!)明显以及这种进攻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暂不恢复和平谈判”的问题，进行表决时，赞成的有现在的“左派”报纸撰稿人中的布哈林、洛莫夫和乌里茨基。

关于“如果德国人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的问题，弃权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而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哈林否认了德国有

进攻的可能，散布了幻想，他实际上——虽不是他所愿意的，——用这种幻想帮助了德国帝国主义者，并且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发展。革命空谈的实质也就在于此。本来是向这间房里走，却走进那间房里去了。²¹²

尼·布哈林责难我不具体分析现在这个和约的条件。可是不难了解，对于说明我的论据和问题的实质，并没有任何必要来具体分析这些条件。下列事实就足够证明这点了，即我们面前的实际的、而不是幻想中的抉择只有一个：或者是承认这样的条件，而获得哪怕是几天的喘息时间，或者是沦为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境地。这是布哈林——至少对彼得格勒说——也不能否认的。这是他的同志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承认了的。

至于说，新条件恶劣、苛刻、屈辱的程度比布列斯特条件更甚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对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有罪的是我们可怜的“左派”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之流。这是上面援引的表决情形证实了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是怎样逃避也逃避不了的。给过你们布列斯特的条件，而你们却装腔作势，吹牛唬人来回答，以至弄成更恶劣的条件。这是事实。你们在这点上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

我在1918年1月7日提纲中，极其明显地预言过，由于我们军队的这种情况（这是空谈“反对”疲惫的农民群众不能变更的），俄国如果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就一定会要缔结更坏的单独和约。

“左派”是上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圈套，因为它本来就是要把我们拉进对于我们最不利的战争中去。

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主张立刻进行战争，显然是脱离了农民，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也就说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政策的不郑重，正如1917年夏季所有社会革命党人所执行的那种似乎

是“革命”政策一样的不郑重。

最觉悟与最先进的工人正在迅速地抛弃这种革命空谈的歪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就是榜样。彼得格勒内的优秀工人区域，如维波尔格区和瓦西里岛区已经觉醒起来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不主张立刻进行战争，它懂得必须准备，并且正在准备这个战争²¹³。1918年3月3日至4日举行的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反对革命空谈的人已经获得胜利了²¹⁴。

“左派”狂妄自欺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这点从波克罗夫斯基文章里的一句话就可看出来。他说：“要打仗，就要现在打〈着重点是波克罗夫斯基加的〉……要趁——听着！听着！——趁俄国军队尚未遣散而新军尚未编成的时候来打。”

谁不逃避事实，那他就会知道，在1918年2月间，无论在大俄罗斯、乌克兰、芬兰，回击德军的最大障碍都是我们的那个没有遣散的军队。这是事实。因为这个军队已经不能不狼狈奔逃，并且还牵动红军部队。

谁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视对这种教训应负的责任，不逃避这种教训，他至少会记得拿破仑第一与德国的战争。

普鲁士和德国多次同侵略国缔结过（比我们）苛刻十倍、屈辱十倍的和约，直到承认由外国人充任警察，直到承担派遣自己的部队去帮助拿破仑第一进行侵略战争的义务。拿破仑第一同普鲁士所订的条约对于德国的压迫和宰割，比现在兴登堡和威廉对我们的压迫要厉害十倍。可是，在普鲁士却有人能不装腔作势，签订了极其“可耻”的和约，他们所以签订这样的条约，是因为没有军队。虽然签订了苛刻十倍屈辱十倍的条约²¹⁰，但后来他们终于起义了，进行了战争。这样的情形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历史上有过几次这类的和约和这类的战争，有过几次得到喘息的情形，有过几次

侵略者重新宣布战争的事实，有过几次某一被压迫民族与某一压迫民族结成联盟的事件，这个压迫民族既是和另一侵略者竞争的对手，同时自己也是一个侵略者(请那些主张不要帝国主义者帮助而进行“革命战争”的人们注意!)

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

过去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已进到战争频繁的时代。我们正接近新的卫国战争。我们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的条件下去进行这个新战争。在这艰难的道路上，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一定会纠正装腔作势和空谈革命的作风，一定是既能接受极苛刻的和约，也能重新奋起的。

我们签订了提尔西特式和约。我们也会取得我们的胜利，获得我们的解放，正如德国人在1807年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在1813和1814年便达到了从拿破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的。从我们签订提尔西特式和约到我们获得解放的距离，很可能要短一些，因为现在历史进展得较快了。

打倒装腔作势的作风！认真工作、严守纪律、加强组织！

写于1918年3月5日

按手稿刊印

载于1918年3月6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7卷

《真理报》第42号

第65—71页

署名：尼·列宁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1918年3月7日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²¹⁵上)

政治报告的内容可以是列举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措施，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这种报告，而是关于我国整个革命的梗概；只有这个梗概，才能给我们的一切决议提供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我们必须考察以往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并且阐明为什么我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变化。我国革命发生了对国际革命将有巨大意义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获得最初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1905年所没有达到的目的。在二月革命时期，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自动的和自发的建立，重复着1905年的经验，因此我们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原则。群众根据自身的斗争经验懂得了革命的任务。4月20—21日的事变是示威游行与某种类似武装起义的举动的特殊结合。仅是这次事变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政府倒台了。从此就开始实行长期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是从当时执政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本质中产生的。七月事变⁸⁴还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群众还没有充分准备。所以没有一个负责的组织号召群众这样做。但是，从侦察敌情的意义上说来，七月事变具有很大的意义。科尔尼洛夫叛乱和接着发生的一些事变都是实际的教训，使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在十月革命时期也想与其

他党派分掌政权的人们的错误²¹⁶，就在于他们没有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同七月事变、前线进攻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等事实联系起来，正是这些事实才使千百万群众意识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以后就是我们在全俄各地的胜利进军，和随之而来的大家对和平的渴望。我们知道，单方面拒绝战争是得不到和平的；早在四月代表会议⁵⁶上我们就指出了这一点^①。在4月至10月这段时期中，士兵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妥协政策仍然使战争拖延下去，使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野蛮的、疯狂的进攻，使我们更深地陷入连年不断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转而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把政权掌握到苏维埃手里，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你们知道，拥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仅是克伦斯基而且还有阿夫克森齐也夫，他们甚至逮捕了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意识中去的这个政策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这个口号，使我们能够在十月间在彼得堡十分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并把俄国革命的最后几个月变成了一个全面的胜利进军时期。

国内战争已经成为事实。在革命初期甚至在战争初期我们所预言的，被当时很大一部分社会主义者所怀疑甚至嘲笑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1917年10月25日已经在最大而又最落后的参战国中成为事实。在这次国内战争中，绝大多数居民都站在我们这方面，因此我们异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

从前线归来的军队，把结束妥协主义的最大的革命决心带到了他们足迹所到的每个地方；这样，妥协分子、白卫军、地主子弟等等就在居民中间失去了任何支持。由于广大群众和向我们进攻的军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和这些敌人进行的战争就逐渐变成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34页。——编者注

了革命的胜利进军。彼得格勒的加特契纳战线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企图用来进攻红色首都的哥萨克发生了动摇；后来在莫斯科、奥连堡、乌克兰等地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俄国都掀起了内战的浪潮，而我们到处都能异常容易地取得胜利，这是因为果实已经成熟了，群众已经领受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全部教训。我们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经过群众长期历史经验的实际检验而成为他们的切身要求。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全面胜利进军的原因。由于这种全面胜利进军的情况，有些人就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所立即碰到的而且不能不碰到的困难忘记了，把它放到了次要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如果那种经历了1905年伟大试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末苏维埃在10月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的成功全靠那包括千百万群众的运动已经有了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因此，我们在政治方面就能预期我们后来所经历的那些辉煌成就和不断的胜利进军，因

为新政权形式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几道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所奠定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行。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的诞生这样容易，是因为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这个口号以前，群众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着1905年的惨痛经验因而变得聪明了的人民的深奥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当时，战胜国内敌人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任务。建立政权的任务也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群众已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政权的骨骼和基础。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当时我们没有怀疑，而且也不能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往后会遇到一些十分困难的任务。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容许象我们从前解决国内战争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本质不允许我们采用这种方式。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我国的卡列金分子，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而只遇到一些不值得严重注意的反抗；如果说，事件的进程已经由以往的整个客观发展所预先决定，因而我们只要最后说一句话，换一块招

牌，把“苏维埃是工会组织”的字样擦掉，写上“苏维埃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的字样，那末，在组织任务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每一个愿意深思熟虑地对待我国革命任务的人，立即就会明白：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漫长的和顽强的道路才能消灭这种瓦解现象，并战胜助长这种现象的分子，因为这些人把革命只看成是摆脱旧桎梏和尽量攫取一切的手段。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遭受严重破坏的时候，大量出现这种分子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要跟他们进行更加困难百倍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能预期有什么成效，这个斗争我们刚刚才开始。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还得经受艰苦的考验。在这里，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过去和卡列金分子进行斗争时那样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谁要想把这种斗争方式拿来解决摆在革命道路上的组织任务，那他必然会彻底破产，必然不能成为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

当革命具体地碰到了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即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些迷恋于革命初期胜利进军的盛况的青年同志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如果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如果我们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如果我们毫不费力地实施了土地社会化和工人监督的法令，——如果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拥有组织得极其完备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

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其所以不能，在于贸易关系，在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狭隘的民族革命转到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困难到了极点的。我再说一遍，很多自称为左派的青年朋友们开始忘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其实这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给我们挡开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没有工夫来对付我们。我们也觉得没有工夫去对付帝国主义。而某些帝国主义者当时之所以没有工夫来对付我们，那是因为现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全部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当时彼此之间的内讧而分裂成了两个集团。卷入这场斗争的帝国主义强盗正在全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因此，无论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不可能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反对俄国革命。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的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是这样），那时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受空前的灾难，几百万人的生命遭到了毁灭，那时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灾难折磨着各国人民，而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各交战国都陷入绝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那时客观形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陷于这种境地的各国人民还能打下去吗？只是由于我国革命碰上了这样一个幸运的时机，即两个巨大的强盗集团中，无论哪一个都不能马上打败对方，也不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只是由于我国革命能够利用而且利用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个时机，才在欧俄实现了光辉的胜利进军，并且使它波及到芬兰，开始赢得高加索和罗马尼亚。这就说明为什么在我们党的先进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超人的知识分子的

党的工作者，他们迷恋于胜利进军的盛况，他们说：国际帝国主义，我们对付得了！在那里也会是胜利进军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俄国革命的客观情况的特点就在于，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遭到的暂时的阻碍，因为向我们冲来的火车暂时抛了锚，它原来准备象火车碾碎独轮车那样地把我们轧死，抛锚的原因是两个强盗集团发生了冲突。当时革命运动到处都在展开，但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大都还处在开始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完全不象我国那样。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发动革命是无比困难的，而在我国却十分容易，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在我国却比在欧洲要困难得多。这个客观形势使得我们必然遇到历史上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转折。我们将要从10月、11月和12月在国内战场上反对反革命势力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时的全面胜利进军，转到同真正敌视我们的真正国际帝国主义交锋。我们要从胜利进军的时期过渡到异常艰难的时期，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用空话和漂亮口号所能躲开的（虽然这样做很痛快），因为在我们这个紊乱的国家里，群众已经极度疲惫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三年的痛苦的战争使他们筋疲力竭，完全陷于无力作战的状态。远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有一些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士兵群众的代表，在全体资产阶级面前大胆地说出真实情况：俄国军队是不会去打仗的。军队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一个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小农国家，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没有军队，但不得不继续同武装到牙齿的强盗（从前是强盗现在还是强盗）比邻共处，当然，宣传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是打动不了强盗的心的。这正象一只驯顺的家畜同猛虎躺在一起，而想劝猛虎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一样，这种和平只有用袭击猛虎的办法才能得到。我们党的一部分上层

分子(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组织)企图用空话和遁词来避开这种前途,他们说,不应该这样。他们说,我们一向高举大旗同敌人公开作战,振臂一呼就能摧毁一切敌人,而现在却要我们让步,接受屈辱的条件,这种和平是不可想象的。这决不可能。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首先声明,“德国人不可能进攻”。

这就是他们聊以自慰的第一个遁词。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极困难的境地。我们在进行空前困难的组织工作时遭受到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失败。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既然我们已经把全部革命事业掌握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我们就要把它担负起来,我们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酝酿中,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但是归根结底(不是马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前进;它也一定会完全成熟,因为它正在酝酿,并且快要成熟了。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当我们根据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并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应该注意到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如果你们说:每一次罢工都包含有革命怪物,谁不懂得这个道理,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说得很对的。的确,每一次罢工都包含有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如果你们说:现在的每一次罢工都是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步骤,那你们是在讲空洞的废话。这些话,我们“每次都在这里”听说,大家都厌烦透了,工人们早就把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抛弃了,因为,毫无疑问,虽然每次罢工都包含有社会主义革命怪物,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硬说每次罢工都能转变成革命,那就是废话。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酝酿的世界社会主义

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才能战胜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下面这种说法是荒谬绝伦的：认为我们应当掩盖我国革命现有的一切具体困难，并说，“我指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我可以做任何蠢事”。“李卜克内西一定会拯救我们的，因为他反正会取得胜利。”他会给我们提供完善的组织，他会把一切事情都预先安排妥当，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现成的形式，就象我们曾经得到西欧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我国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胜利，而在西欧却要花好几十年的工夫。总之，把胜利进军这种解决斗争问题的旧方式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是毫无益处的冒险行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它使我们遇到的不是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腐朽的家伙，而是国际强盗德帝国主义，而德国革命只是在酝酿中，显然还没有成熟。硬说敌人不敢向革命进攻，那是一种冒险，布列斯特谈判还不是我们应该接受任何和平条件的时候。客观力量的对比表明，我们不会取得多少喘息时机的。布列斯特谈判证明，德国人一定会进攻，德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革命还没有达到立即爆发的程度。这不能归罪于德帝国主义者，说他们没有用自己的行动促使革命爆发，或者象我国某些自称为左派的青年朋友们所说的，他们没有用自己的行动造成使德国人不能发动进攻的局势。有人对他们说，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是不得已才把军队复员的，——我们是不得已的，但是我们决没有忘记在我们驯顺的家畜旁边卧着一只猛虎，——而他们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不得已才把军队复员的，我们决没有忘记，单方面发出放下武器的命令是不能结束战争的。

一般说来，为什么我们党内任何一个派别，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反对把军队复员呢？难道我们都发疯了吗？决不是这样。远在十

月革命以前，非布尔什维克的军官们就说过：军队已经不能作战，让它在前线再支持几个星期已经不可能了。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看到事实，愿意正视丑恶的令人痛心的现实，而不是躲起来或故意把眼睛蒙上，用傲慢的空话来回避，对于这种情况都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没有军队，把军队保持下来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地把军队复员。军队是机体上患病的一部分，它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在技术方面没有任何准备就参加了战争，在不堪一击的情况下退出了战争。这不应该归咎于那些忍受了空前痛苦的人们。士兵们在几百个决议中，甚至在俄国革命的初期，就完全公开地说过：“我们已经淹没在血泊中，我们不能打仗了。”当时可以人为地拖延战争的结束，可以干克伦斯基的欺骗勾当，也可以把战争再延长几个星期，但是，客观现实已经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军队是俄罗斯国家机体上患病的一部分，它已经不能再忍受这场战争的重担了。我们把军队复员得愈快，这部分在病情还不严重的其他部分中恢复得愈快，国家就能更快地做好准备来迎接新的严峻的考验。正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才毫无阻拦地一致通过了把军队复员的决议，通过了这个从一些国外事件上看来好象是荒谬的决议。这是一项正确的措施。我们说，要保持住军队是一种轻率的幻想。军队复员得愈快，整个社会机体也就会更快地健全起来。因此，“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句革命空话，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是对事件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分估计，而从这句空话中又产生了一种空谈：“我们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但是，如果德国人进攻怎么办？“不会的，德国人不可能进攻。”你们有权利拿来孤注一掷的，不是国际革命的命运，而是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德国人一旦进攻，你们是不是要充当德

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是，我们这些从1917年10月起就成为承认保卫祖国的护国派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帝国主义者割断了联系；我们废除了秘密条约，战胜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提出了签订公开的和公正的和约的建议，因此，各国人民都会从事实上看到我们的一切愿望。坚决主张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怎么能采取这种已经带来恶果的冒险行动呢？而这种冒险行动已经带来了恶果，这是事实，因为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危机之一。

这个危机一定会被根除的。我们的党和我国革命，无论如何都不会由于这个危机而遭到失败，尽管目前这种失败的情况很可能马上发生。保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失败的，是这样的事实：事变已经使人们抛弃了解决派别分歧的老办法，抛弃了依靠许多著作和争论，依靠尽量分裂来解决问题的老办法，而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用整个世界史上的许多事实、事件和教训来检验一切。你们说，德国人不可能进攻。根据你们的策略，便得出了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的结论。但是历史已经给你们上了一课，它推翻了这种幻想。是的，德国革命在发展着，但是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不象会使俄国知识分子感到满意的那样快，并不象我国历史在十月革命时期发展的那样迅速，——在十月革命时期，我们无论到哪个城市去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几天以内十分之九的工人都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德国革命的发展，可惜还没有这样快。谁应该顾及谁呢？是我们应该顾及德国革命还是德国革命应该顾及我们呢？你们曾经希望，要德国革命顾及你们，而历史却给你们上了一课。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

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参崴，也可能在我们必须去的、也许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距离还要远得多的地方，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然而这种说法丝毫不会动摇我们以下的信心：我们应当善于踏踏实实地度过最困难的关头。

革命的到来，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要善于把这一点看作事实，要估计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中的开始，决不会象俄国革命开始时那么容易，因为当时俄国是尼古拉和拉斯普庭²统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居民对于俄国边疆上居住的是些什么民族，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关心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在资本主义很发达，每个居民都具有民主素养和组织性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准备就开始革命，那是不对的，荒谬的。现在我们还只是接近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痛苦时期。这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作为赌注。应该准备应付特别艰巨的困难，应付特别严重的失败，这些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洲的革命即使在明天开始，但毕竟还没有开始，而当欧洲的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会再有疑虑了，那时就不会再有关于革命战争的问题，而会出现一个全面胜利进军的场面。这种情况将来会出现，必然会出现，但是现在还为时过早。这就是历史教训我们，严厉地惩罚我们的一个简单事实，——而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的这种希望，——德国人不可能进攻，可以来欢呼“乌拉”，——受到历史的沉重打击之后，由于我们有苏维埃组

织，全苏维埃俄国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地认识到这一教训。他们都已经行动起来，集合在一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考虑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进行的争论，不是革命前仅限于党的狭隘范围以内的旧的争论，而是一切决议都要经过群众的讨论才能通过，他们要求用经验和事实来检验这些决议，他们从来不会被轻率的演说所迷惑，也不让自己离开事变的客观进程所指定的道路。一个知识分子或左派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借故逃避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他当然可以避而不谈我们没有军队，德国革命尚未到来等问题。群众的人数有千百万，——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千百万群众看见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知道军队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不是指个别的人，而是指真正的群众）知道：我们不能继续作战了；前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忍受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群众懂得这个真理，既然没有军队，强盗又在身边，那就不得不签订极苛刻的屈辱的和约。只要革命还未爆发，你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军队整顿好，还没有把军队复员，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以前，病体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我们欢呼“乌拉”是捉不住德国强盗的，也不能象打垮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打垮德国强盗。这就是群众不顾某些逃避痛苦现实的人的影响，坚定不移地得出的教训。

起先，俄国革命在10月和11月是全面的胜利进军，后来几星期突然遭到德国强盗的破坏，于是才准备接受掠夺性的媾和条件。的确，历史的转折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遇到的每次转折都非常痛苦。1907年，当我们同斯托雷平签订空前耻辱的内部条约时，当我们不得不通过斯托雷平杜马这个猪圈，在保皇书上签字²¹⁷而承担了某些义务时，我们经受了同样的痛苦，不过这些痛苦的程度

比现在的小一些罢了。当时优秀的革命先锋队里有一些人说（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对俄国革命充满信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去参加斯托雷平的合法机关。”将来你们会参加的。群众生活和历史比你们的信心更有力量。如果你们不参加，历史会强迫你们去参加的。这是一些过左的人，他们这个派别在历史刚一发生转折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既然过去我们一直是革命者，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并且又能够摆脱这种处境，那末，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客观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之所以在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内产生，是因为欧洲的革命不顾我们的愿望，没有及时爆发，而德帝国主义也不顾我们的愿望，发动了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善于退却。用空话掩盖不住令人万分痛心的现实；应该说：我们的退却要稍微有些秩序。秩序井然的退却现在我们做不到，——我们要稍有秩序地退却，赢得一个短促的时间，使我们机体上的患病部分稍微得到一点恢复。整个机体是健康的，它一定能消除自己的疾病。但是，不能要求它转瞬之间立刻就把疾病消除，要想制止军队的溃逃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对一位愿意当左派分子的青年朋友说过：同志！请你到前线去看一看，看看那里的军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把我的话当做不怀好意的建议，他说：“有人想流放我们，不让我们在这里宣传革命战争的伟大原则。”我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没有要流放反对派的意思，这不过是向他们建议，让他们去看一看军队已经开始大量溃逃的情形。我们早就知道了这种情形，早就不能不看到：前线上军队的瓦解，已经到了把我们的大炮贱卖给德国人这种骇人听闻的地步。这种情况当时我们是知道的，也正象现在我们知道军队已经不能

再维持下去一样。德国人不可能进攻的说法，是最危险的通词。既然欧洲革命已经延迟爆发，那末，我们就会遭到十分严重的失败，因为我们既没有军队，也缺少组织性，而且这两个任务现在不可能马上解决。如果不会适应环境，不愿意在污泥中爬行，那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空谈家。我建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同时历史的安排并不符合我们的这种心愿：各国革命同时成熟。

现在事情是这样的：内战已经作为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企图而开始了，这种企图证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腐朽；各国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是的，我们将来一定会看到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这还是一个非常动听、非常美妙的故事。我很了解，爱听美妙的故事是儿童的天性。但是请问，相信故事不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者的天性呢？任何故事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如果你给孩子们讲故事，故事里的鸡儿猫儿不是说的人话，那末，孩子们对你所讲的故事就不会发生兴趣。同样，如果你们向人民说，德国内战一定会到来，并且担保说，不会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只会爆发战场上的国际革命，那末，人民会说你们在欺骗他们。这样，你们只是在自己的见解中，在自己的愿望里，越过历史所造成的困难。如果德国的无产阶级将来能够发动起来，这当然很好。但是，这种情况你们是否已经计算好了，是否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确定德国革命在哪一天爆发的仪器呢？不，这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孤注一掷。如果革命爆发了，当然，一切都得救了。但是，如果革命的爆发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即使爆发了，但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时怎么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把赌注押在这种侥幸的事件进程上，这种进程没有到来，结果你们就不能适应国际革

命没有到来的情况，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

已经到来的阶段，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使我们这个已经把自己的军队复员（也应当复员）的国家遭到严重失败的阶段。我先前的预言已经完全证实了：由于拒绝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错误，所以我们签订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的和约。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军队的缘故才同帝国主义媾和的。当时我们是同霍夫曼²¹⁸谈判，而不是同李卜克内西谈判，——我们就是这样来援助了德国的革命。而现在你们却帮助德帝国主义，因为你们把自己的数百万财富——大炮和炮弹——送给了德帝国主义，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见到军队的不堪设想的状况的人都应该预料到的。从前线回来的每一个诚挚的人都说：德国人稍微一进攻，我们就必定灭亡。我们在几天之内就会成为敌人的战利品。

我们取得这个教训以后，就会消除我们的分裂现象，消除我们的危机（不管这种病症多么严重），因为一个更可靠的同盟者——世界革命一定会来援助我们。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批准的这个和约是提尔西特式和约²¹⁰，是空前未有的和约，是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屈辱、更具有掠夺性的和约。我的答复是：说得完全正确。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从群众观点来看问题的。企图依靠自己的幻想，把10月和11月里在一个国家内部革命胜利进军时期运用过的策略搬到世界革命事变的进程上去，这种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当人们说喘息是幻想的时候，当名为《共产主义者报》²¹¹的报纸——这名称大概是从“公社”这个词来的——登满了企图推翻喘息论的文章的时候，我说，我经历过许多派别组织的冲突和分裂，所以我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但是我应当说明，我看得很清楚，用党内派别分裂这种旧办法是不能治好这种病症的，因为现实生活会先把

它治好。现实生活在非常迅速地前进，在这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历史把生活的火车头推动得这样迅速，以致《共产主义者报》编辑部还没有来得及出版下一号，彼得格勒的大多数工人就开始对该报的主张感到失望了，因为现实生活表明，喘息已经成为事实。现在我们签订和约，我们就得到一个喘息时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更好地保卫祖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战争，我们的军队就会狼狈溃逃，这种情形是必须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的同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制止这种情形，因为战争比宣传，比成千上万的议论更有力量。既然他们不了解客观情况，他们就不能制止军队的溃逃，他们也制止不了。这支瘫痪的军队已经使整个机体都受了病毒的感染，因此我们遭到了新的空前未有的失败，我们的革命受到了德帝国主义的新的打击，——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轻率地弄到使自己在德帝国主义的袭击下没有机关枪。但是我们要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且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觉的纪律，建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将来还会象现在这样遭受德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只要人民没有学会斗争，没有建立起一支不会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的痛苦的军队，你们将来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这种蹂躏。”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德国革命还没有爆发，并且决不能保证德国革命明天一定会爆发。

因此，《共产主义者报》上的大量文章所坚决反对的喘息论是由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喘息已经成为事实，每个人都在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我们曾经预料过，我们在几天以内就会失去彼得格勒，因为当时逼近我们的德国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天的行程，优秀的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尽管有极高的热忱，但却是孤军作战。当时发生了军队被迫一直溃退到加特契

纳这种空前未有的混乱和狼狈状况，当时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竟然收复了没有丢失的地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报务员跑到火车站，坐在发报机旁发出这样的电报：“这里一个德军也没有，我们已经占领了火车站。”过了几小时以后，交通人民委员部就给我打电话说：“下一个火车站已由我们占领，现在我们已逼近杨堡。一个德军也没有。报务员照常工作。”这就是当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十一天战争²¹⁹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是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邀请这些人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让他们把实际情况谈出来。这是一种令人非常痛心、难过、悲痛和屈辱的实际情况，但它是十分有益的，是俄国人民会了解的。

我让人们迷恋于战场上的国际革命，因为它一定会到来。时机一到，一切都会到来的，可是现在你们必须建立自觉的纪律，无论如何必须服从领导，以便建立很好的秩序，使工人们学习战斗，——哪怕一天只学习一小时也好。这比描绘美妙的故事要困难一些。这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你们这样做就会帮助德国革命，就会帮助国际革命。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能够有多少天喘息时间。但是喘息时机我们已经得到了。军队必须迅速复员，因为这是一个瘫痪的器官，现在我们要来援助芬兰的革命²²⁰。

当然，我们是在违反和约，我们已经违反了三四十次。只有小孩子才不了解：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并且有了长足发展的痛苦而漫长的解放斗争时期，必须进行长期的谨慎的斗争。可耻的和约引起人们的反抗，但是《共产主义者报》的同志在谈论战争的时候，却感情用事，忘记了当时人们紧握着拳头过日子和眼前都是血迹斑斑的孩子的情景。这些同志怎么说呢？他们说：“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和约，不能忍受这种耻

辱。”他们报纸的名称是“共产主义者”，其实应该叫做“小贵族”，因为它用小贵族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这位小贵族临死的时候手握利剑，摆出美妙的姿态，说道：“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讨论问题时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

当军队溃逃的时候，同时为了避免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也不能不溃逃的时候，我接受和约是为了不让情况变得更坏。难道缔结和约是耻辱吗？每一个实事求是的农民和工人都会为我辩护，因为他们懂得，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德国人在缔结了提尔西特和约以后还从拿破仑的压迫下获得解放，这一点我讲了不止一次；我有意把我们的和约称为提尔西特和约，虽然我们并没有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上的那些条件，即承担派遣我国军队去帮助侵略者侵略其他民族的义务，——而这是历史上有过的事实。如果我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战场上的国际革命上，那末，我们的事情也一定会弄到这种地步。你们要当心，不要让历史也把你们变成了这种军事奴隶。只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取得胜利，苏维埃共和国就有沦为奴隶的可能。拿破仑曾经在提尔西特强迫德国人接受空前耻辱的媾和条件。在那里签订了好几次和约。当时的霍夫曼——拿破仑——曾经因德国人违反和约而把他们抓了起来，现在霍夫曼也会以同样理由来抓我们。不过，我们要竭力设法不让他马上抓住。

这次战争给俄国人民一个辛酸、痛苦而又严肃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必须组织起来，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建立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纪律。我们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否则我们会成为没落的民族，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

历史是这样前进的，而且也只能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和约

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的或者更坏的和约的手段。在布列斯特，力量的对比表明，可以签订一个战败国的和约，但不是屈辱的和约。在普斯科夫时力量的对比表明，我们必须签订一个耻辱的、比较屈辱的和约，而在下一阶段，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就必须签订一个屈辱三倍的和约。我们不会说，苏维埃政权只是一种形式，就象莫斯科的青年朋友们对我们所说的那样^①。我们不会说，为了挽救某种革命原则，可以牺牲内容。我们要说：让俄国人民懂得，他们应该遵守纪律，组织起来，这样才能经受住一切提尔西特和约的考验。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当广大群众参加了这些战争的时候，解放事业就会很快地实现。我们说：既然历史是这样前进的，那末，以后我们就会抛弃和约，恢复战争，——这也许是几天以内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做好准备。如果各报所载属实，纳尔瓦还没有被德国人占领，那末，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正在纳尔瓦外做准备。他们在纳尔瓦和普斯科夫附近（都不是在城里）集中自己的正规军，修复铁路，以便再一跃而夺取彼得格勒。这只野兽很会跳跃。它已经显示了这一手。他还要再跳一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应当做好准备，不要夸夸其谈，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因为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可以用来从彼得格勒撤退，如果彼得格勒被占领，我们的几十万无产者就会受到空前未有的痛苦。我再说一次，我有决心、并且认为有义务签订屈辱几十倍以至一百倍的和约，以便取得哪怕是几天的时间来从彼得格勒撤退。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减轻工人痛苦，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德国人的蹂躏，同时我可以使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火药等等更容易地从彼得格勒运出，因为我是护国派，我主

^① 参看本卷第438—445页。——编者注

张哪怕是在最遥远的大后方训练军队，现在那里正在整顿目前因瘫痪而复员的军队。

我们不知道，喘息时机会继续多久，我们要设法抓住这个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一点任何人都不知道，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约束，受牵制，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霍夫曼的行动是由三种情况决定的：第一，要消灭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他在几条战线上作战；第三，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和增长，霍夫曼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正象人们所断定的那样，他不能马上夺取彼得格勒，不能马上夺取莫斯科。但是，明天他会这样干，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再说一遍：当军队的瘫痪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在尽量利用每一个机会，哪怕是争取一天的喘息时间的时候，我们认为，每一个联系群众、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群众的严肃的革命者，都应该教育群众遵守纪律，治好群众的创伤，设法唤起群众去进行新的战斗。每一个这样的革命者，都会为我们辩护，都会认为签订任何屈辱的条约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是为了复兴俄国和治好它患病的器官。每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会懂得，我们签订这项和约不会妨碍我国的工人革命；谁都知道，虽然我们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但不会停止我们的军事援助；我们给芬兰人运去的是武器，不是不中用的部队。

也许，我们要进行战争；可能明天我们就放弃莫斯科，然后转入进攻；如果人民的情绪有了转变（这种转变正在逐渐成熟，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一定会到来，那时广大群众就不会说出现在他们所说的话来），就派遣我们的军队去迎击敌军。现在哪怕是最苛刻的和约，我也不得不接受。这是因为，目前我还不敢说，这种转变的时刻已经到来。复兴的时期一旦到来，大家都

会体会到这一点，都会看到，俄国人并不是傻瓜；俄国人看到并且懂得：应该忍耐一些，应该贯彻这个口号，——这就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

应该善于在新的道路上工作。这是极端困难的事情，但决不是毫无希望的事情。这样做决不会损害苏维埃政权，如果我们自己不用最愚蠢的冒险行动来破坏它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人民会说：我们决不再受折磨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只要我们不采取这种冒险行动，而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在不久前我们签订的空前屈辱的和约下进行工作，因为这样的历史危机，决不是一场战争、一个和约所能解决的。德国人民由于本国存在着君主制组织，在1807年背上了一付沉重的枷锁，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在签订这项和约之前，还签订了好几次耻辱的和约，这些和约都成了重新遭受侮辱和重新破坏和约的喘息时机。群众的苏维埃组织使我们易于完成任务。

我们的口号应当只有一个：认真地学习军事，整顿铁路上的秩序。没有铁路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是最有害的叛变行为。必须建立秩序，培养能够取得革命的优秀成就的全部毅力和力量。

既然已经取得了喘息时机，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哪怕是一小时也好，以便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并在那里建立新的军队。抛弃幻想吧，这些幻想已经使你们受到实际生活的惩罚，将来还会受到更重的惩罚。我们面临一个遭受惨重失败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应该善于正视这个时代，要做好准备，以便在秘密的条件下，在显然是给德国人当奴隶的条件下顽强地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不必掩饰；这确实是一个提尔西特和约。如果我们能够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末，尽管遭到了失败，我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

会胜利的。(鼓掌)

第一次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
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18年3月6—8日》一书

按1928年《全苏联共产党
(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
1918年3月》一书原文刊
印并根据速记记录和该书
1923年版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7卷
第75—97页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 名称的报告²²¹

(1918年3月8日晚上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²¹⁵上)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1917年4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能够立即通过看来没有引起很大争论、甚至几乎没有引起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你们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作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我们都认为附上“布尔什维克”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各方面事件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会了解到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它的雏形仅仅在巴黎公社有过，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²⁵总之，只要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本国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末，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会消失，因此，我们就不能坚持旧形式的民主。

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它不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是唯一科学的。认为这个名称可能给人机会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的反对意见，在中央委员会里马上就遭到了驳斥，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把自己只称为共产主义者，总是附加一些东西。尽管在这方面有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但是它们决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者与社会改良主义者、民族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类似的党派混淆起来。

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直到现在为止，欧洲各先进国家中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还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成了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真正障碍和真正阻碍。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很大的同情，因此，我们党应当尽量明确果断、坚定不移地声明我们党同这些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联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一种最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其次，同志们，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实践部分和政治部分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我们已有若干材料，即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的关于修改党纲的文集²²²，在我们党的两个主要理论刊物（彼得堡出版的《启蒙》杂志²²³和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杂志²²⁴）上曾经刊登过论述怎样修改我们党纲理论部分的文章。我们已经在这方面的一些材料。曾经有过两种基本论点，在我看来，这两种论点并不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上的分歧，有一种论点认为：我们丢掉我们纲领²²⁵中的旧的理论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拥护这个论点。不过要把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评述补充到纲领中去，然

后再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评述也补充进去，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了。不管我们的革命或者我们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队伍的命运如何，不管革命今后的变化如何，总之，卷入这场战争并把最先进国家引向饥饿、破产和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从客观上说来，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的。这里应该提一下三十年前（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估计欧洲战争可能产生的前途时所说的话。他说，成打的皇冠将在欧洲纷纷落地，而谁也不想拾取；他说，难以置信的破坏将成为欧洲国家的命运，并且欧洲战争的悲惨的结局只能有一个，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或者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或者是创造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²²⁶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贩卖自己的过了时的诡辩的人，他们认为在遭到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给群众造成破坏、野蛮、痛苦和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而且也不能保证这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或者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或者是创造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振奋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尽管文化遭到很大的破坏，但决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一笔勾销，要恢复它虽然很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绝迹。文化在其某些部分，在某些物质残余中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它。因此，有一种论点认为：我们必须保留旧的纲领，把评述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的部分补充进去。

我已经在我所拟定的党纲草案^①里说明了这个论点。另外还有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文集上。另外一种论点反映在我们的谈话中，特别是跟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并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文集上。这个论点认为必须完全删掉或者几乎全部取消纲领中旧的理论部分，并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象我们的纲领那样叙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叙述目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以及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论点有原则上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论点。我认为，把叙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掉，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事情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发展着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图景，我们不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的变化如何，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波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波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在革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大的波折，而这种波折还只是在我们这里有过；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猛烈，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了），为了在这个历史转折的过程中不致于惊慌失措并牢记这个总的远景，为了能看到贯穿着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看来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終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是笔直的，而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转折关头不致于惊慌失措，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6—430页。——编者注

或敌人把我们扔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惊慌失措，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在理论上说来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使我们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在理论上能够想象得到的、对我们来说是称心如意的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个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就能看到俄国国内战争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以及国内战争是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暴力将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二者相互交织着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各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整个时代。这个遭受巨大破坏、实行大规模军事强力和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评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真正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是否能轻易地或迟或速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被整个革命事变进程证实了的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这个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并引导到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

首先必须在纲领中确定下来。帝国主义开辟了社会革命的纪元，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我们不只是为了鼓动宣传而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而是提出新的纲领，并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说：“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而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首要作用暂时落在我们肩上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也是有绝对正确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各个政党的策略和我们所赞同的、成为与每个觉悟工人血肉相关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斯和巴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评述，这个评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²²⁷因此，我们应该重复这个基本的东西，以便更清楚地告诉西欧的劳动群众，为什么要对他们的领袖加以谴责。

根据这个基本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纲领结构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评述当作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出发，因为我们还是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如此；所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俄国的特殊的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但对欧洲来说未必是必须的。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

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来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我们正在这样做，我们所依据的是确定不移的事实。

其次，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苏维埃的国家类型。我在《国家与革命》^①一书中曾竭力从理论观点上来阐述这个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观点被西欧占优势的正式社会主义最严重地歪曲了，而由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在俄国建立的经验十分明显地证实了。在我们苏维埃里面还有很多粗犷的、不完善的东西，这一点用不着怀疑，每一个关心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里这种国家类型曾在一个城市内存在过几个星期，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事情。那些创造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没有一个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集团意识到他们所做事情。由于我们有巴黎公社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多年的发展为依据，因此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事情。虽然在苏维埃内部存在着粗暴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性格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了。这种国家类型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几个月，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内、在几个民族内部采用着。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表明：即使它被移到象芬兰那样在各方面都很优越的国家（那里还没有苏维埃），政权类型却仍然是新的、无产阶级的。

^① 见本卷第171—276页。——编者注

这就证明，苏维埃政权是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并以新的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的国家，这种新的民主能够推动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培养他们成为立法者、执法者和武装保卫队，并建立能够改造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开始得不好，如果历史让我们有更多一些时间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我们就能克服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评述新的国家类型在我们纲领中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得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条件下，在异常匆忙的条件下来制定党纲，我们甚至不能召开自己的委员会来制定正式的党纲草案。分发给代表同志们的只是称为草稿^①的东西，这一点大家都是明白的。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我觉得在这里应当表现出我们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告诉欧洲工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怎样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争取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肩负着光荣的任务，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末我们可以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具体的材料，说明我们打算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的国家，我们力图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力图说明为什么这是新型的民主（虽然在内部还有很多混乱和奇奇怪怪的情况），什么是它的灵魂——也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构。国家是镇压机构。必须镇压剥削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9—144页。——编者注

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构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就有可能去接近群众,更有可能去教育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希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的机构。这是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但是,从历史上看,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从我们一国的观点出发来解决它,同时也号召欧洲工人来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因此,我们认为这是继续巴黎公社的道路。因此,我们相信,走上这条道路的欧洲工人一定会前来帮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上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保证集会自由的要求特别重要,那末现在我们对集会自由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会来妨碍集会,苏维埃政权只是应该保证给予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什么“所有公民均有集会自由,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供给开会场所”。而我们说“少讲些空话,多做些实际工作”。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自由我们则不谈。我们必须把这一点推广到民主主义纲领的所有其他条文中去。我们应该自己来进行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法庭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在于大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这些任务,我们就能

促使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们革命所做的一切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这一点），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结果，不是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的重复，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涉及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我说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这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经过了考验，这就不早了^①。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丝毫不要拒绝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以为我们不会被拉向后退，那是空想。

俄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在历史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在任何后退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当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时候，我们将会利用经验所取得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一点应当在纲领中说明。我们要制定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来代替最低纲领。对新型国家的评述应当在我们的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

显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制定纲领。我们应该拟定纲领的基本要点，交给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去拟定基本提纲。甚至可以简单些，可以根据已经拟出提纲的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议的决议^②来制定。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评述苏维埃政权，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9—153页。——编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然后提出实际改造的建议。据我看来，在纲领的历史部分中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实行的没收土地和工厂的做法。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银行变成全国范围内的、能使居民亲自进行作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基础的社会会计、计算和监督的国家机关网。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应该以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要求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即目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银行政策方面，在组织产品生产、组织交换、计算与监督、实行劳动义务制等方面打算进行哪些改革。当取得了一些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要补充说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步骤和办法。这里应当十分精确和清楚地说明，什么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的，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已经开始的工作我们还没有做完。我们丝毫不要夸大和脱离事实，我们要非常客观地在纲领中叙述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打算做的东西。我们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欧洲的无产阶级，并对他们说：这是应该做的，——好让他们说：俄国人哪桩事情做得不好，我们要做得好些。当这个愿望吸引群众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不可战胜。大家都看到，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是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必须揭露这场战争，把它描述成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勾当。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同你们交换的总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建议马上具体地交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然后或许在这里制定一些基本的提纲，而现在如果认为这样做有困难的话，那就不这样做，把党纲问题送交中央委员会或者特别委员会，委托它们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和详细记录来制定目前必须立即更换名称的党的纲领。我以为，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认为大家都会同意，虽然我们的纲领在编纂方面准备得不够充分，我们正好碰上很多事情，但是目前不能做其他

任何事情。我相信，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办完这件事。在我们党的各个派别中有足够的理论人材，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制定出纲领来。当然，纲领中也许会有许多错误，更不用说在编纂和修辞方面的缺点，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安心地（这是编纂工作所必须的）来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我们工作过程中纠正这些错误，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实现这个纲领。如果我们不脱离现实，至少是准确地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类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向民主制提出了另外一些任务，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剥夺剥夺者”这个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转到银行国有化和土地国有化这样一些具体的公式，那末，这一切将是纲领的主要部分。

这里我们看到，希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希望帮助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农是怎样在抱有各种偏见、各种旧观点的情况下开始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的，而土地问题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改革。我们不把这一点强加在别的国家的身上，但是这是事实。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有人硬说我们想用暴力实行社会主义，那是枉费心机的。我们将从占优势的小经济的观点合理地来分配土地。同时我们要特别照顾公社和大的劳动组合。我们主张垄断粮食贸易。农民这样说过：我们赞成没收银行和工厂。我们决心帮助工人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用各种文字出版关于土地社会化的基本法令。这个法令正准备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们要在纲领中具体地说明这个思想，要在理论上谈清楚，丝毫不要脱离确定不移的具体事实。在西方这将是另一种样子。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方无产阶级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来帮助我们进行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在几个星期内制定我们的纲领，而我们所可能犯的错误，——实际生活会纠正它，——我们自己会纠正它。这些错误与我们将要获得的良好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第一次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18年3月6—8日》一书

按1928年《全苏联共产党(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一书原文刊印并根据速记记录和该书1923年版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7卷第114—126页

当前的主要任务²²⁸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²²⁹

人类历史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最大的最困难的转变，这个转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具有解放全世界的莫大意义。这个转变是由战争进到和平；是由一伙强盗为确立重新瓜分头号强盗已经抢到的赃物的新秩序，而把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者赶去厮杀的战争，转到被压迫者为摆脱资本桎梏而反抗压迫者的战争；是由痛苦、灾难、饥荒、野蛮化的深渊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幸福和持久和平的光明未来；——在这急剧转变的紧急关头，旧事物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事物又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的时候，有的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陷于绝望，有的人说些漂亮动听的空话来寻找救星，逃避那往往令人过分痛苦的现实，这是毫不奇怪的。

俄国曾特别清楚地观察了，特别紧张而痛苦地经历了由帝国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革命这历史进程上的一些最急剧的转变。我们在几天内就破坏了一个最老大、最强盛、最野蛮和最残暴的君主制度。我们在几个月中就经过了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许多阶段；而别的国家走过这些阶段却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就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公开反抗。我们的布尔什维主义在这个庞大国家

中到处都获得了胜利。我们唤起了那些受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最下层劳动群众，把他们引向了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我们创立并且巩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比最完善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更优越得多、更民主得多的新型国家。我们建立了为贫苦农民所拥护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已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我们唤醒了全世界千百万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燃起了他们的热情火焰。我们到处发出了国际工人革命的号召。我们向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宣战了。

而在几天内，帝国主义强盗乘我们还是手无寸铁的时候实行袭击，把我们打倒在地上。它强迫我们签订了极苛刻而屈辱的和约，这是我们敢于从帝国主义战争的铁钳中挣脱出来——哪怕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付出的代价。这个强盗残暴地蹂躏俄国，扼杀俄国，把俄国撕成碎块，他本国工人革命的怪影愈可怕地显现出来，他行凶也就愈厉害。

我们不得已才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²¹⁰。不要欺骗自己，而要有勇气来正视赤裸裸的、令人沉痛的真象。要全盘地、彻底地认清我们现在所陷入的惨重失败、分割、奴役、耻辱的深渊。我们对于这种情形认识得愈清楚，则我们争取解放的意志，从奴役境地重新获得独立的意向，以及无论如何要使俄罗斯不再是又贫穷又软弱而成为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的决心，就会愈加锻炼得象钢铁一样的坚强。

俄罗斯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国土和天然财富，可以供给所有的人的生活资料，如果说不是很富饶的，那至少也是足够的。我们在天然财富方面，在人力后备方面，在伟大革命为人民创造力提供的广阔天地方面，都有足够的材料来建立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俄罗斯。

俄罗斯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只要它能抛掉一切颓丧情绪和空谈，只要它能咬紧牙关，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兢兢业业干起来，只要它能认识到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沿着这条道路迈进，决不因失败而气馁，要一砖一瓦地去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固基础，努力不懈地工作，树立纪律与自觉纪律，到处注意加强组织性，加强秩序和求实精神，加强全民力量的紧密合作，加强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普遍的计算与监督，——这就是达到建立军事实力和社会主义实力的道路。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遭受严重失败后，既不当装腔作势，也不应当悲观失望。如果以为我们别无出路，只能在两条死路中选择一条，或者是缔结极苛刻的和约而“不光荣地”（从小贵族观点看来）死去，或者是进行绝望的战斗而“壮烈”牺牲，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认为我们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似乎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或背叛了自己的朋友，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我们没有背叛过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我们没有为任何一句假话辩护过掩饰过，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帮助任何患难朋友和同志，总是竭尽所能和所有去帮助他们。如果一个统帅率领着仓皇败退的残兵败将，撤退到边远地带，为了掩护这种退却，他万不得已接受了极苛刻而屈辱的和约，在这种情况下他无力援助被敌人截断了的那部分军队，这并不是什么背叛行为。这个统帅选择了挽救那尚有希望的事物的唯一道路，不同意去冒险，不向人民掩饰痛苦的真象，“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利用一切喘息时机，哪怕是最短的时机，来聚集力量，使军队获得喘息机会，或医治它所患的瓦解病和颓丧病，——这样的统帅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我们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当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强迫普鲁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时，侵略者把德国人的全部军队都击溃

了，占领了首都及一切大城市，设置了自己的警察，强迫失败者派出辅助军团去帮助侵略者进行新的掠夺战争，把德国分裂成许多小国，同某些德国人的国家结盟去反对另一些德国人的国家。虽然如此，可是德国人民甚至在签订了这样的和约之后仍然能够自立，能够聚集力量，能够奋起争得本身自由与独立的权利。

凡是愿意思索或善于思索的人，都可以从提尔西特和约（这不过是那个时代中强迫德国人签订的许多苛刻而屈辱的和约之一而已）的例子中明显地看出，那种以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签订极苛刻的和约都是陷入灭亡的深渊，而进行战争则是英勇行为和得救之路的想法是如何幼稚可笑。各个战争时代都教导我们，和约在历史上起过不少获得喘息时机和聚集力量来准备新搏斗的作用。提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耻辱，而同时它又是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当时历史环境除了提供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出路之外，再没有达到民族复兴的别的出路。当时，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眠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

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以火车头般的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

因此，俄国现在如果要从“提尔西特”和约走向——无可争辩地是在走向——民族复兴，走向伟大卫国战争的话，那末达到这种复兴的道路，就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道路，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赞成“保卫祖国”，不过我们准备进行的卫国战争是保卫社会

主义祖国的战争，保卫社会主义，也就是保卫祖国；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保卫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队伍。

“仇恨德国人，打死德国人”——这始终是通常的爱国主义的口号，即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口号。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可是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仍然忠实于与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来迟了。我们要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

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事实正是这样，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而外，同时还体现了纪律、组织和在最新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合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原则。

而这正是我们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终结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软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

1918年3月11日

载于1918年3月12日《全俄中央
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6号

署名：尼·列宁

按1918年莫斯科出版的
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
小册子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7卷
第145—149页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²³⁰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状况与 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取得了和平，——虽然是条件极其苛刻和极不稳固的和平——就能够在相当期间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方面，即集中到组织任务上来。

1918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第四段(或第四部分)中，——即在谈到劳动者的自觉纪律，和同混乱、捣乱等现象作无情的斗争的这一段(或这一部分)中^①，已经把这个任务向一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明确地提出来了。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和平之所以不稳固，自然不是由于这个共和国好象现在想要恢复军事行动；——除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及其应声虫(孟什维克等等)外，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会想到这种事情。和平之所以不稳固，是由于在东西两方与俄国接壤的、拥有强大军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主战派，随时能占上风，这些主战派因为俄国暂时软弱而垂涎，并且又被仇视社会主义和酷嗜抢劫的资本家们所怂恿。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83页。——编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说来，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和平保证，只是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已经达到最高限度的争执，这个一方面表现在西方的屠杀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在重新进行，另一方面表现在日美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统治权的帝国主义竞争非常剧烈。

很明显，防御力如此薄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处于非常不稳固而极端危急的国际状况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利用全部客观形势给我们的这个喘息时机，来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严重创伤，来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真正多少增强一些国防力量。

同样很明显，我们对于西方的因为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能给予何种重大协助，这就全看我们解决我们面前的组织任务的程度如何而定。

顺利解决我们当前首要的组织任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人民的政治领导者，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其次是劳动群众中一切有觉悟的分子，能够完全理解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间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

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消极的或破坏的工作。而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则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或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所以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是因为不仅当时受资本剥削的群众本身散漫，不够成熟，因而反抗表现得极其微弱，而且也因为那建筑在无政府状态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在广泛而深入地自发发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作为基本的组织力量。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

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的劳动群众能够积极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但是这只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即对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实行普遍的最严格的计算与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现在已经执掌了俄国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过程，特别明显地表明构成目前政治局势特点的现时历史转变究竟何在；这个历史转变使苏维埃政权必须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要重新提出新的任务。

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无论在沙皇制度时代或在切尔诺夫、策烈铁里之流与克伦斯基、基什金之流妥协的时期中，这个任务都曾占着首要地位。现在这个任务虽然还远未完成（而且无论何时都不会彻底完成的），但是它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因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大多数工人农民显然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的。

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且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这个任务绝没有彻底完成，并且还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一方面是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⁴，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应声虫和走卒孟什维

克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仍然企图联合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可是，镇压剥削者反抗的这个任务，在1917年10月25日到(大约)1918年2月，或者到鲍加也夫斯基²³¹投降这个时期，便已经大体解决了。

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当然，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就已经提出并且努力解决过这个任务，可是，当剥削者还采取公开的国内战争形式反抗的时候，这个任务便不能成为主要的中心的任务。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任务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取了俄国——从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穷人，从剥削者手中夺过来交给劳动者。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的主要任务过渡到管理这一主要任务的特征。

社会主义政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基本上完成了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紧接着就要解决管理这个任务。我们必须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崇高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并且这这也是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因为只有在解决这个任务以后(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决以后)，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前的总口号

条件极端苛刻而不稳固的和约，战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其代表为克伦斯基和维护他的孟什维克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遗留给我们的极度的经济破坏、失业和饥荒，——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的当前客观形势，必然使广大劳动群众感到极端疲惫，甚至筋疲力尽。他们迫切要求——也不能不要求——相当的休息。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军事失败、投机和资产阶级恢复已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的企图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内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苏维埃政权目前只有不顾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抗，在实际上来解决正是维持社会生活的这些基本和最基本的任务，才能使俄国稳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点看来好象是很奇怪的，其实因为有上述种种客观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由于当前情况中的具体特点，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关于土地社会化与工人监督等等法令，实际解决这些最基本的任务与克服开始走向社会主义时组织上的困难，是一物的两面。

精打细算，节省开支，不偷懒，不盗公肥私，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口号，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自己的剥削阶级统治地位，并且被革命的无产者正当地讥笑过，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经变成目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了。一方面，劳动群众切实实现这些口号，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盗们（以克伦斯基为首）弄得半死的国家的唯一条件；另一方面，由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法令来切实实现这些口号，又是

取得社会主义彻底胜利所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那些鄙视和拒绝把这些似乎是极其“陈腐的”和极其“庸俗的”口号当做首要任务的人，正是不善于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这个小农国家推翻了沙皇制度才仅仅一年，摆脱克伦斯基之流的统治还不到半年，当然遗留下了不少的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而每一次长期反动战争伴随来的野蛮残暴行为又更加强了这种无政府主义，同时还有不少悲观失望和无端愤怒的情绪；如果再加上资产阶级走狗们（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挑拨政策，那末，非常明显，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工农要使群众的情绪完全转变，要引导他们过渡到正确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劳动，需要多么长期顽强地努力工作。只有由贫苦群众（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实现的这种过渡，才能完成对资产阶级，尤其是对最顽固和人数众多的农民资产阶级的胜利。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拿西欧革命的规模来比较，我们现在大约达到了1793年和1871年的那种程度。我们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达到了这种程度，并且在一个方面毫无疑义还走得更远一些，这就是在全俄国宣告成立了最高类型的国家——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绝对

不能满足于已得的成绩，因为我们仅仅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出什么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就是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建立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我们还没有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的那些企业和经济部门中实行计算和监督。**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便绝对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同样重大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决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我们还必须无条件地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可是这样规定的任务是不确切的，不具体的，其中并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特点，即是为了保障**今后的进攻能取得胜利，应当马上“停止一下”进攻。**

关于这一点，可以把我们在反资本战争中的状况比做某一支常胜军的状况来加以说明，譬如这支常胜军，已经夺取了敌人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土地，但是它却不能不停止一下进攻来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弹药的储备，修理并且加固交通线，建筑新的仓库，调集新的后备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一下进攻，正是这支常胜军队为了夺取敌人其余的土地，为了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目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正是要这样“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谁不懂得这一点，那他就是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

当然，只能加上引号，就是只能用比喻的方式，来谈“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在通常的战争中，可以下一道停止一下进攻的通令，可以真正停止前进。而在反资本的战争中，却不能停止前进，要我们放弃继续剥夺资本，这也是谈不到的。这里所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迄今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

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

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我们现在只有竭尽全力进行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我们才能解决这个任务，才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才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整个“战役”。

我们承认必须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是否等于承认以前做的是犯了某种错误呢？丝毫不是的。我们再拿战争作比喻吧。如果单用轻骑队能够击溃并且击退敌人，那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只能取得一定限度的胜利，那末，要取得这个限度以外的胜利，就须要调来重炮队，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们承认现在应该弥补以前没有调来重炮队这件疏忽了的事情，这绝对不是承认轻骑队的胜利的攻击是一个错误。

资产阶级的奴仆们常常责骂我们用“赤卫队”来进攻资本。这种责骂是极其荒谬的，只能出于富人的奴仆之口。因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是当时各种情况绝对要求的：第一，当时资本曾以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萨文柯夫和郭茨、都托夫和鲍加也夫斯基等人为代表，进行军事反抗（而格格奇柯利目前仍在反抗）。要粉碎军事反抗，就非用军事手段不可，赤卫队正是完成了使被剥削劳动者摆脱剥削者压迫的极其崇高伟大的历史事业。

第二，当时我们所以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来代替镇压的方法，还因为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当时，我们还不能支配具有各种知识和技术的专家，因为他们要不是参加在鲍加也夫斯基之流的队伍中作战，就是还能用怠工来进

行不断的顽强的消极反抗。现在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怠工。“赤卫队”对资本的进攻收到了成效，获得了胜利，因为我们既战胜了资本的军事反抗，又战胜了资本的怠工反抗。

这是不是说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在**任何时候都是适当的**，在**任何形势之下都是适当的**，此外我们再没有同资本作斗争的别种方法呢？如果这样设想，那就是幼稚无知。我们虽然用轻骑队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有重炮队。我们采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能够采用管理的方法来取得胜利。当形势改变的时候，应该善于改变对敌人的斗争方法。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拒绝采用“赤卫队”镇压萨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可是我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竟在须要用“赤卫队”进攻的时代基本上已经结束（而且胜利地结束了）的时候，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这土壤上绝对不能再生长出任何资产阶级的这种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还把“赤卫队”进攻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代，或者更确切些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要彻底战胜资本，就必须善于使我们的斗争形式适合于这个阶段的特殊情况。

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超过。而专家，因为受了过去培养他们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就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当时由于战争和俄国落后，这是无法实现的），那末，

我们在打破怠工以后，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的专家完全服从我们。由于一般的组织计算和监督工作相当“晚”，所以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还没有造成那种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大多数怠工者虽然“到职服务”，但是国家要利用好的组织者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薪金），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自下而上的全民计算和监督的局面。有了这种局面，就必然能使这些专家服从，并且吸收他们来参加工作）。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可是并不是大家都仔细考虑到了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²³²。

自然，资产阶级的走卒，尤其是象孟什维克、新生活派⁷⁸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班下贱奴仆，因为我们承认后退一步而幸灾乐祸地耻笑我们。可是我们丝毫用不着去理睬这种耻笑。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不要掩盖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而要努力及时做完尚未完成的事情。我们用非常高的薪金来吸收资产阶级专家，这是离开了公社原则的，如果对群众

隐瞒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墮落到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未必没有遭受过局部的失败，未必没有在某一方面、在某一地方暂时退却过。而我们进攻资本主义的“战役”，比最困难的战役还要困难百万倍，如果因为部分和局部的退却就垂头丧气，那是愚蠢而可耻的。

从实际上来看这个问题吧。假设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需要一千个具有各种知识、技术和实际经验的头等学者和专家来指导国民劳动，以便尽可能迅速地发展全国的经济。假设应付给这些“头等明星”——其中大多数叫喊工人们腐化叫得愈厉害的人，自然受资产阶级道德的腐化也就愈深——每年每人两万五千卢布。假设这个总数（两千五百万卢布）还要加一倍（假定因为成绩特别优良和特别迅速地完成了组织上和技术上最重要的任务，还要给以奖金），或者甚至再加三倍（假定还要聘请几百个要求更加苛刻的外国专家）。试问每年花费五千万或一亿卢布来根据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能不能说这项费用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过多的或担负不起的呢？当然不能这样说。绝大多数觉悟了的工人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能不损失亿万卢布，而我们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还没有达到能吸引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明星”人人自愿来参加我们工作的那种程度。

当然，问题也有它的另一方面。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在革命迅速成功时，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冒险家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同各种委员当中那些无能的或者

无耻的人，是甘愿去充当盗窃国库的“明星”……的)，也要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能思考的、诚实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都会认识到：要立刻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我们是做不到的；要使苏维埃共和国免除每年五千万或一亿卢布“贡款”负担（我们因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款），除了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资本主义遗产”、“遵守资本主义传统”的人，即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盗窃国库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库”）以外，别无办法。如果觉悟了的先进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苏维埃机关帮助之下，一年内就组织起来了，有纪律了，精神振奋了，并且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劳动纪律，那末，一年以后，我们便能摆脱这项“贡款”，而且正是随着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提高的程度，甚至还能更早地……缩减这种“贡款”。我们工人农民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遵守优良的劳动纪律和学会极高的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迅速地免除向这些专家缴纳的一切“贡款”。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我们组织的对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全民计算和监督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这种情况是了解现时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任务的基本关键。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心正在转移到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上来。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在实行银行国有、垄断对外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方面，才能在征收适合无产阶级观点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方面，以及在实行劳动义务制方面，正确决定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当前任务。

在这些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计算和监督一般都没

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自然，这个任务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尤其在战争所造成的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形下，只有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可是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恰恰是在这方面同我们进行最严重的战斗，他们破坏正在整顿中的监督办法，例如破坏粮食垄断，夺取阵地来做投机事业和投机买卖。我们所颁布的法令，还远没有充分实现，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是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事业的原则。

要继续向前实行银行国有，要坚决地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会计的枢纽机关，首先主要应做出下列的实际成果：增加人民银行分行的数量，吸收存款，简化储户存款取款的手续，消灭“排队”现象，逮捕和枪毙受贿者和骗子等等。起初把最简单的事情切实做好，把目前的事情好好组织起来，然后再准备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巩固并且调整那些已经实行了国家垄断的事业（如粮食垄断、皮革垄断等等），借此准备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没有这种垄断，专靠缴纳“贡款”，我们就不能“摆脱”外国资本的羁绊。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就全看我们能否在相当的过渡时期内，用向外国资本缴纳某些贡款的办法来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独立。

在一般的征税工作上，特别是在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工作上，我们也非常落后。向资产阶级强征，在原则上是完全可行并且会得到无产阶级赞同的方法，但是，事实表明我们在这一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多半象是夺取的方法（把俄国从富人手里夺过来交给穷人），而很少象是实行管理的方法。可是，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就必须转而采用这第二种方法，就必须用经常正确地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办法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强征的办

法。这种税收办法，能给无产阶级国家更多的好处。这种税收办法，正是要求我们有更高的组织性，有更完善的计算和监督。

我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过迟，就再一次地表明，正是组织准备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这种工作之所以必要，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巩固已得的胜利，另一方面是为了准备一次“包围”资本并且迫使它“投降”的战役。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可是，我们在实行这个制度时，应当极其慎重，逐渐进行，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每一步骤，当然，首先是要对富人们实施劳动义务制。对于每个资产者——乡村资产者也在内——实行劳动与消费登记制，将是进到完全“包围”敌人和建立对产品生产与分配的真正全民计算和监督的一个重大步骤。

为建立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一切国家事务的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克服这种心理，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和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遗产”的影响，在建立计算和监督的问题上，即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的第二天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厉害。那些在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之后第一次觉得自己得到了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经过相当的时间，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亲身经历的苏维埃的经验，才能认识并且感受到。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

辟，就不可避免。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习惯与传统，也是反对国家监督的，要求“神圣私有财产制”和“神圣”私有企业的不可侵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指出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潮，说它们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如何不可调和，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明显，这个原理多么正确。力求把苏维埃的，即由国家实行监督 and 计算的思想灌输到群众的意识中去，力求实现这种思想，力求打破把获得衣食看作“私人”事情，把买卖看作“只是与我有关”的这种旧时恶习，——这是一个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自觉性反对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

我们已经把工人监督制定为法律，可是这种制度还刚刚开始渗到生活中去，甚至还刚刚开始渗到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意识中去。至于在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上不报告不监督的情形，这便是断送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便是盗窃国库（因为现在一切财产都是属于国库的，而国库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至于对计算和监督的玩忽，这便是直接帮助德国的和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这些人只要我们一不执行计算与监督的任务，便能乘机推翻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全体农民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窥伺”着我们，待机而动，——关于这一切，我们在鼓动工作中说得不够，先进的工人农民也没有充分地考虑和讨论。可是在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以前，在先进工人还没有搞好监督事宜，还没有对破坏这种监督或不关心这种监督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以前，便不能由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即工人监督）进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由许多生产消费公社构成的体系，而这些公社都能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每日劳动时间减少到七小时或六小时以至于更少。在这里，如果不搞好对粮食和粮食生产（然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的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是不行的。资本主义留给了我们一种群众组织，——消费合作社，这种组织便于我们过渡到对产品分配实行广泛的计算和监督。在俄国，这种组织发展得比先进国家里的差些，可是还是拥有一千万以上的社员。日前公布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²³³，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清楚地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目前形势和任务的特点。

这个法令，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社以及仍然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合作社达成的一种协议。说它是协议或妥协，是因为第一，上述这些组织的代表不仅参加了这一法令的讨论，而且实际上还取得了表决权，法令中有一部分条文因受到这些组织的坚决反对而删掉了。第二，这种妥协，实际上就是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免费加入合作社的原则（这是唯一彻底的无产阶级原则），同样放弃了某地全体居民都要加入一个合作社的原则。我们放弃这个与消灭阶级的任务相适合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允许了“工人的阶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之所以称为“阶级合作社”，只是因为它们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仍然存在。最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把资产阶级完全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内排除出去的条文，也大大地放宽了，只禁止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主参加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如果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政权已经搞好了全国范围内的计算和监督，或者至少是搞好了这种监督的基础，那就决不会有作这种妥协的必要。那时我们就能通过各地苏维埃的粮食部，通过各地

苏维埃下设的供给机关，把居民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合作社，不要资产阶级合作社的协助，不要对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让步，这种原则，使得工人合作社仍然是与资产阶级合作社同时并存，而不是把两种合作社合并起来，以便自己掌握全部管理权，自己监视富人的消费，这样来使资产阶级的合作社完全服从自己。

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这种协议时，具体确定了自己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策略任务和工作的特殊方法，就是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对他们作某些局部的让步，这样来造成向前进展的条件，此种进展比我们最初预定的要缓慢些，但是会稳固些，它能更可靠地保证我们的根据地和交通线，更好地巩固我们已经夺得的阵地。苏维埃现在能够（而且应该）用非常明显、简单而实际的尺度来测量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成绩：就是看有多少地方（公社或村庄、街坊等等）在何种程度上，合作社的发展已接近于包括全体居民的地步。

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我们苏维埃政权目前正处在这种情况中，因为战胜了剥削者，——由克伦斯基起到科尔尼洛夫止——它就有可能来直接解决这个任务，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

务。这也立刻可以看出，我们夺取国家中央政权只花了几天工夫，甚至在这个大国内镇压各地的剥削者的武装反抗（和怠工反抗）只花了几个星期，而现在要来切实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自然至少（尤其是在极其残酷的和带来极大破坏性的战争以后）需要几年的工夫。这个工作的长期性，完全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

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就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条件非常优越，甚至它在布列斯特和约以后还拥有极大的富源：矿石（乌拉尔一带），燃料（西西伯利亚的煤，高加索和俄国东南部的石油以及中部的泥炭），极丰富的森林，水力，化学工业原料（卡拉博加兹湾）等等。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条件，第一，就是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个事业现在正在突飞猛进，这是那些迷惑于资产阶级陈腐习惯的人所看不到的，这些人不能了解，在苏维埃的制度下，人民“下层”中的求知热情和首创精神，是如何蓬勃提高。第二，就是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这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情形特别不好，要是相信那些甘受资产阶级恐吓，或贪图私利而替资产阶级服务的人的说法，还甚至是没有希望的。这些人不懂得，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一种革命，是不被旧社会拥护者叫骂为崩溃现象和无政府状况等等的。自然，刚刚摆脱空前残酷压迫的群众，他们的心情是沸腾咆哮的，自然，要群众造成劳动纪律的新基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没有完全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前，这种造成劳动纪律新基础的工作，甚至还不能开始。

固然，我们绝对不要受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不能抱住旧有特权的人）所散布的、往往是制造出来的那种悲观失望情绪的影响。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掩盖显然恶劣的现象。恰恰相反，我们要揭发这种恶劣现象，加强用苏维埃的方法去同它斗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性不能战胜自发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克伦斯基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复辟的真正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便不能设想。

俄国无产阶级最有觉悟的先锋队，已经给自己提出了提高劳动纪律的任务。例如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在开始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法令草案²³⁴。这种工作应该加以赞助，应该用全力去推进它。目前的任务是：必须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制，采用泰罗制中许多合乎科学的进步的方法，以及根据生产的产品总额，或铁路运输业及水路运输业的经营结果来决定工资等等。

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以全力向人民提出的一个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宝贵的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同时，在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时候，还要考虑到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一方面，须要奠定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的基础；另一方面，须要采取强迫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致为无产阶级政权实际上还软弱的情况所玷污。

组织竞赛

说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意义，这是资产阶级喜欢散布的诬蔑社会主义的一种胡说。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才第一次开辟了真正大规模竞赛的途径，因为社会主义既消灭了阶级，也消灭了对群众的奴役。正是这个由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上的民主制过渡到劳动群众实际参加管理工作的苏维埃组织，才第一次广泛地提出竞赛。在政治方面实行竞赛，比在经济方面容易得多，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重要的正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竞赛。

我们拿组织竞赛的一个方法，如公开报道来讲吧。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保证这种方法的实行，实际上却使报纸刊物受资本的支配，用一些激动人心的政治上的空话来玩弄“小百姓”，用保护“神圣私有财产制”的“商业秘密”来掩盖作坊中、商业契约中、交货以及其他过程中的黑暗勾当。苏维埃政权已经取消商业秘密，已经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利用公开报道的方法去进行经济竞赛，我们几乎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必须有系统地进行工作，除了无情地压制全是谎言和无耻的造谣的资产阶级刊物之外，还要努力创办这样一种刊物：不是拿一些政治上激动人心的空话来玩弄和愚弄群众，而是提出一些日常的经济问题来让群众判断，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

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一般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就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我们差不多还没有着手进行这种伟大的、困难的然而又是极有成效的工作，即组织各公社间的竞赛，在生产衣服粮食等等的过程中实行工作报告制和公开报道的方法，把枯燥的、死板的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变成生动活泼的榜样，——坏的使人讨厌，好的使人羡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示范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组合示范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满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才能够梦想用慈善机关做榜样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榜样的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纸刊物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一切成绩，研究它们成功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坚决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行动等等的公社登上“黑榜”。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统计纯粹是“官家人员”或本行专家的专业。我们应该把它带到群众中去，使它通俗化，使劳动群众自己能逐渐地认识到和看到应该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样休息，休息多久，使大家都来注意研究和比较各个公社间的业务成绩，使优秀的公社立即得到奖赏（如在一定时期内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享有许多文化和美术方面的福利和奖品等等）。

一个新的阶级作为社会的领袖和指导人走上历史舞台，绝对

没有不经过极大的“颠簸”、震撼、斗争和风暴时期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选择适合新的客观环境的新方法上，也绝对没有不经过无把握的步骤、试验、动摇和犹豫时期的。趋于灭亡的封建贵族，在报复那些排挤自己并已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时，不只使用了各种阴谋手段，企图暴动和复辟，并且还滔滔不绝地讥笑“暴发户”“无耻之徒”的低能、粗笨和错误，说这些人既然没有王侯、贵族、世家所具有的长期执政的素养，竟胆敢掌握国家“神圣大权”，——现在，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之流，郭茨和马尔托夫之流，所有这些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或资产阶级怀疑论的英雄，对于那“胆敢”来夺取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也正是采用这种报复手段。

当然，新的社会阶级，以前一直受压迫、被贫困和愚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阶级，要能够掌握新的形势，认清环境，搞好自己的工作，锻炼出自己的组织者，这不是几个星期的事情，而是长年累月的事情。当然，领导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过去要造成一套从事大规模的、预计要包括千百万公民的组织事业的经验和技能是不可能的；而要把旧的、差不多完全是鼓动家的技能改造过来，这是一件很长期的事情。可是这并不是什么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我们明白知道必须转变，并且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坚定的决心，有达到这个伟大而困难的目的的毅力，——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转变。“老百姓”中，即工人和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农民群众中，有极多有组织才能的人；资本把这样的人成千地摧残、毁灭和抛弃，而我们呢，也还不善于去发现他们，鼓舞他们，扶持他们，提拔他们。可是，如果我们能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没有这种革命热忱，便不会有胜利的革命——学习这种工作，那我们就一定能学会这种工作。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

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干些糊涂事，空忙一阵，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让资产阶级社会的哈巴狗——由别洛鲁索夫起到马尔托夫止，对我们在采伐古老森林的时候砍下的每块多余的木片而狂吠吧！既然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无产阶级大象狂吠。让他们去狂吠吧！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地工作。只有这种人才，经过多次考验之后，才应该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使他们能担负领导人民进行劳动的职务，领导管理工作的职务。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的。

“严整的组织”和专政

最近的苏维埃（莫斯科）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建立“严整的组织”和加强纪律^①，作为现在最主要的任务。现在，大家都愿意“表决”和“签署”这样的决议，可是关于实现这些决议需要用强迫手段，而且正是要用专政形式的强迫手段，——这一点，人们却通常不去考虑。要知道，认为不用强迫手段，不用专政手段，便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是极其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83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妄语。1917—1918年的俄国，已经非常明显、触目、动人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这种理论，只有绝顶愚钝或硬不承认真理的人，才能在这方面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如果把科尔尼洛夫看作俄国式资产阶级的卡芬雅克⁸⁵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经过了数次非常急剧转变而非常迅速发展的国家，对于这个经过极其残酷的战争，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的国家，其他出路简直是谈不到的。一切中间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资产阶级不能讲真话，不能说他们需要科尔尼洛夫），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切尔诺夫之流、策烈铁里之流、马尔托夫之流（他们高谈什么民主派的统一，民主派专政，民主联合战线，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的愚蠢想法。谁要是经过了1917—1918年的俄国革命事变，还没有懂得决不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那末对于这样的人就只好一笑置之。

另一方面，不难了解，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

“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俄国革命正确地实现了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已经由苏维埃组织在俄国一切民族中胜利地建立起来这一事实所证明。因为苏维埃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这个先进阶级，发动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实行新的民主制，来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他们也正亲身体验到这个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

但是，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一般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象铁，却很象浆糊。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

部来进攻，如萨文柯夫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施展阴谋和举行暴动，以及在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人和孟什维克刊物上反映出他们的龌龊“思想”，不断造谣诬蔑；另一方面，是这种自发势力从内部来进攻，利用一切腐败成分、一切弱点来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我们愈是采用武力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则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愈加危险。要与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者，——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采用强迫手段。

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已经逐渐由武力镇压转到管理工作，镇压和强迫的一般表现也会逐渐由就地枪决转到法庭审判。在这一方面，革命群众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证明了革命的生命力，在尚未颁布解散资产阶级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即工农的法庭。可是我们革命的人民的法庭还是非常非常的软弱。还可以感觉到，群众把法庭看作一种与自己无关的衙门，这种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而留传下来的观点，还没有彻底打破。群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法庭正是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因为司法工作也是国家管理的一种职能），法庭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权机关，法庭是教育人民遵守纪律的工具。群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末要战胜这种苦难，决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就能收效的，只有从各方面普遍地进行全民的组织工作，加强纪律，来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所需要的粮食（燃料），及时运输并且正确地分配，这样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无论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部门、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

查出这种罪人，提交法庭，严厉惩办。我们现在坚决反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表现在人们很少认识到饥荒和失业现象是与任何一个人在组织上纪律上的自由散漫行为，有国民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的，——人们牢固地保持着小私有者的观点，只要我能多捞一把，哪管他寸草不生。

铁路事业，可说是最明显地体现着大资本主义造成的机构的经济联系，在这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发势力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的这个斗争，表现得特别突出。“管理”人中间产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贿人；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在为遵守纪律而斗争；但是，在前后两种人当中，自然有很多动摇的、“软弱的”人，他们无力抵抗投机、贿赂和个人利益的“诱惑”，不惜破坏整个机关来换取这种个人利益，而战胜饥荒和失业，恰好要靠这个机关正确地进行工作。

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给予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²³⁵问题而展开的斗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这个斗争是很说明问题的。自觉地表现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分子（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当时想把赋予个别人员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作是离开集体管理制原则、离开民主制和离开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有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反对关于独裁制的法令。这里就有了意义真正重大的问题：第一，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般讲来，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别人员的这种办法与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是否相容；第二，这件事情，——也可说是这个先例，——同目前政权的特殊任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非常仔细地来研究。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个人独裁与资产阶级民主制，毫无疑问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这一点上，咒骂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应声虫总是要圆滑手腕：一方面，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无政府主义的粗犷的东西，极力无视我们引用历史上的一切对比事实和理论上的证据证明苏维埃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甚至是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开端；另一方面，他们却向我们要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民主制，并且说，个人独裁是同你们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

这种论断简直坏透了。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迫手段。强迫手段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是取决于某些特别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的遗毒，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大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经过个别的人——来实现，而且是由一种组织来实现，这种组织的建立，正是要唤起和发动这种群众去从事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工作（苏维埃的组织就是这类的组织）。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制有何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

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一切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共同工作的人们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象随着音乐指挥者的柔和指挥一样。如果没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这种服从可以通过严厉的独裁形式来实现。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这种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必要的。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转到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与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象的——就是当前情况的特点。革命刚刚粉碎了束缚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退却，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竭尽全力来进行工作，这个过渡才会实现。那些害了《新生活报》、《前进报》²³⁶、《人民事业报》⁸³或《我们时代报》⁶³等报纸的庸俗疯狂病的人，是不肯考虑这一点的。

就拿一个中等的普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来看，把这种心理同他的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比较一下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在事实上没有看见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真正作过一点什么有利于他的重大的牺牲。他还没有看见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把许过他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给他，没有看见他们给他和平，牺牲一点“大国主义”的利益和大国密约的利益，牺牲一点资本和利润。

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当他自己用强力取得了这种东西，并且必须用强力来保卫这种东西不受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都托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侵犯的时候，他才看见了这种情形。当然，在相当时间内，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舒舒气，伸伸腰和展展躯体，取得一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剥削者没有给过他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当然，需要经过相当时期，普通的群众才能不仅亲眼看见，不仅信服，而且还会亲身感到：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下去，会助长经济破坏，自找灭亡，引起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复辟。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上（因而也是心理上）相应的转变，刚刚开始。我们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是被剥削群众要求解放的自觉代表者，我们的全部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这些寻找出路疲惫已极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遵守劳动纪律，使下列两种任务协调起来：一方面经常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在工作时间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人——独裁者——的意志。

资产者、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嘲笑“开群众大会”的办法，更常常恶意地指摘“群众大会”，认为这只是混乱、无谓的举动和小私有者利己主义的冲动。可是，不举行群众大会，被压迫群众永远也不能由剥削者强迫他们遵守纪律，转到自觉和自愿地遵守纪律。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群众的真正民主制，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建设新生活的行动，是他们在亲自清除了恶棍（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的活动场所后的初步行动，并且他们还要根据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的（不是别人的，不是贵族、资产阶级政权的）原则，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学会整顿这个活动场所。正是要有十月革命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胜利，正是要

有由劳动群众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绝对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命令。

这个过渡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看见，劳动群众怎样在自己队伍中造成了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去反对剥削者，推翻剥削者。这样一些阶段，象1905年10月以及1917年2月和10月，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唤醒了和发动了那些由剥削者压下去的社会“下层”。这些人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才得到了完全的自由来推翻剥削者，开始来认识环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事情。这些被压迫被蹂躏得最厉害的、知识最少的劳动群众举行群众大会，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并且到处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便是革命的第二个伟大阶段。

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必须把我们自己夺得的、把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了法规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固定下来，——必须把这些东西固定为日常劳动纪律的稳定的形式。这是一个最困难而又最容易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个任务，我们才能树立起社会主义的秩序。劳动群众举行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冲破一切堤岸，汹涌澎湃。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与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与劳动时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的精神结合起来。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学会。

我们一定会把它学会的。

昨天，我们曾遇到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危险，其表现就是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都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也夫斯基之流的行动。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个复辟，同样是这个复辟的危险，又表现为别种形式，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应该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会战胜它的。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没有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形式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有撤销被选举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的、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因而是空前第一次使真正的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

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层次的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绝对不同，这是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过渡。

当然，小资产阶级瓦解组织的自发势力（在任何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自发势力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而在我国革命

中,由于我国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落后,由于反动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表现得特别厉害),也不能不影响到苏维埃方面。

必须努力不懈地发展各地的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这种转变乃是一种创举,是一件难事,这当然会产生许多可说是摸索的步骤,许多错误和动摇,——没有这些现象,决不会有任何飞速的前进。在许多愿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的全部特点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在两者之间安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名词:“飞跃”(有些记得恩格斯著作的片断的人,还补上更加意味深长的一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²³⁷)。大多数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他们只“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认真钻研过问题,都不善于思考;社会主义的这位导师所说的“飞跃”,是指全世界历史的转变关头,并且这种飞跃往往包括十年或更多的年代。自然,在这样的时期,在嚣张一时的“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大飞跃时代的真正应当注意的地方，就在于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还积累得更快些，因此我们就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机，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关；也有另一种时机，即在破坏已经足够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此外还有一种时机，这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

苏维埃与“人民”，即与被剥削劳动者保持着稳固的联系，保持着灵活的和能伸缩的联系，就可以防止苏维埃组织受官僚主义的毒害。贫民任何时候都不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哪怕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东西。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几乎是同一样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派”，他们厌恶苏维埃，羡慕威风十足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和六十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一样。

正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

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现在应该极力发展这些形式。例如，国民教育委员会就是苏维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讨论和监督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代表会议，这种委员会是值得完全赞同和拥护的。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就是再愚蠢不过的了。现在，我们愈坚决主张有极为强硬的政权，愈坚决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纯粹执行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制，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结 论

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而危险的，必须随机应变和实行退却；这是等候西欧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这个革命的成熟过程是极其长久的；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险恶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中我们所经历的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必须马上用全力抓住的一个环节，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便能顺利解决任务，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至于下一环节，它正闪着特别的光辉，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令人向往。

试将“革命家”通常流行的概念，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口号，随机应变、退却、等候、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漫……比较一下吧。有些“革命家”听到这些口号以后，不觉义愤填膺，开始“痛斥”我们，说我们忘掉十月革命的传统，说

我们主张与资产阶级专家妥协，与资产阶级调和，说我们赞成什么小资产阶级性、改良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等等，这值得惊奇吗？

这些可怜的革命家的不幸，就在于甚至他们中间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动机并且绝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能了解一个落后的、被险恶的反动战争所破坏的、远比那些较先进的国家早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所应该经过的这种特别的和特别“不愉快的”情况，都没有毅力经受住艰难过渡中的困难关头。自然，对我们党持这种“正式”反对态度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集团代表人物和阶级代表人物中，个人的例外当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的。可是社会代表人物始终还是社会代表人物。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纯粹无产阶级人口占有莫大优势的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者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显露出来，而且有时会极其尖锐地显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在事变的每一转变关头都在犹豫、动摇，由1917年3月间的激烈的革命态度，转到5月间的颂扬“联合”⁵⁹，转到7月间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或者说，转到痛哭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主义”），又转到10月末小心翼翼地回避布尔什维克，再转到12月间赞助布尔什维克，最后，在1918年3月和4月间，这种人物最爱摆出目中无人的样子，并且说：“我并不是那种歌颂‘机关’工作、实用主义和渐进精神的人。”

这种人物的社会来源就是小业主，战争的惨祸、突然破产以及空前残酷的饥荒与破坏使他们暴怒发狂，他们疯狂地东奔西窜，寻求出路和救星，他们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信任和帮助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时而爆发绝望情绪。应该明确了解和坚定地认清：在这种社会基础上面，任何社会主义都是建设不成功的。只有毫不动摇地遵循自己的道路前进，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过渡时期也不灰心失望的阶级，才能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我们不需要

疯狂的热潮。我们需要有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

写于 1918 年 3—4 月

载于 1918 年 4 月 28 日《真理报》
第 83 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消息报》第 85 号

署名：尼·列宁

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
任务》小册子 1918 年莫斯科
第 2 版原文刊印并根据手稿
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 27 卷
第 216—255 页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左派共产主义者”小集团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²³⁸（1918年4月20日第1期）和他们的《提纲》的出版，最有力地证实了我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①那本小册子里所谈到的情况。那种有时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拥护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行为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著作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证实了。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议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这些议论说明了目前形势的特点；它们从消极方面非常明显地指明了目前形势的“关键”；它们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些比较好的人，他们虽然不了解形势，但是在知识方面和忠实方面，却远远超过那些犯有同样错误的平庸之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

—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政治——或想起政治作用的——权威的资格，向我们提出了他们的《目前形势的提纲》。把自己的观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则连贯地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有助于揭露我们的“左派”

① 见本卷第493—529页。——编者注

的错误，因为单是企图辩解，——而不是振振有词地说明，——就已经暴露出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是否正确这个老问题的种种示意、暗语和遁辞。“左派”不敢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滑稽可笑地东拉西扯，堆砌论据，挖空心思硬造理由，搜索各种“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他们涉及一切问题，但力求不看见这些问题是怎样互相矛盾。在党代表大会上有十二票反对和约，有二十八票赞成和约，这个数字，“左派”很关心地引用着，但是对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团内的好几百票中，他们得到的票数还不到十分之一这个事实，他们却谦逊地默不作声。他们制造一种“理论”，说赞成和约的只是些“疲惫的、丧失了阶级性的人们”，而反对和约的“则是经济上比较有生气和粮食比较有保证的南部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这种说法，如何不令人发笑？他们对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赞成和约的表决情况一声不响，对过去反对和约的、俄国的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丧失阶级性的政治集团（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只字不提。这是十足幼稚的骗人伎俩，想用可笑的“有科学根据的”解释，来掩盖自己的破产，来蒙蔽事实；然而只要把这些事实约略叙述一下，就足以表明：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空谈的口号来反对和约的，正是一些丧失阶级性的、党内知识分子“尖子”和上层分子，而赞成和约的则正是工人和被剥削的农民群众。

尽管“左派”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作了上述一切声明和遁辞，但是简单而明显的真理却还是在给自己开辟道路。提纲的作者不得不承认：“和约的签订暂时削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国际勾结的企图”（“左派”的这种说法还不够确切，不过在这里用不着来研究这些不确切的地方）。“和约的签订，已经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

的搏斗更加紧张了。”

这就是事实。这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当时反对签订和约的人，在客观上就受到帝国主义者们的玩弄，上了他们的圈套。要知道，在包括几国的、其强力足以战胜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已经在个国家中（尤其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使命，就是不要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战斗，要竭力避免战斗，要等待时机，使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搏斗更加削弱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促使其他各国的革命更加迫近。我们的“左派”在1月、2月和3月间，没有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现在，他们还是不敢公开承认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却不顾他们的一切混乱而给自己开辟道路，他们的混乱就是：“一方面不能不意识到，另一方面应该承认。”

“左派”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帝国主义体系必定会开始崩溃，即令德国帝国主义赢得当前战局的胜利，也只能使这个崩溃延缓一下，但是结果它将表现得更加剧烈。”

尽管竭力玩弄科学根据，但这种说法更加幼稚和不确切了。孩子们是这样来“理解”科学的：似乎科学能够断定在哪一年内，在春季和夏季或秋季和冬季里，“必定”“开始崩溃”。

想知道无法知道的事情，那是可笑的行动。任何一个庄重的政治家决不会说：“体系”在什么时候“必定开始”某种崩溃（况且这个体系已经开始崩溃，而问题是在于各个别国家内爆发的时机）。但是，无可争辩的真理却不顾这种幼稚得可怜的说法而给自己开辟道路，因为和约签订以后开始的“喘息”时机已经过了一个月，而其他比较先进国家的革命的爆发，已经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前更加迫近我们了。

这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拥护和约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曾向那些崇尚浮夸的人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帮助帝国主义者，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的时候，在战斗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使帝国主义者易于同社会主义作战。

但是，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特别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而特别富有小资产阶级的的气味，——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而“左派”却看不见这个“关键”，只是“傲慢地”说着一些空话，例如：

“……不振作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起根来了，这是政治形势方面的客观事实……”

这真是奇谈妙论！经过三年最痛苦最反动的战争以后，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正确的不沉醉于空谈的策略，人民得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十分小的、不巩固的和很不充分的喘息的机会，而自命不凡的“左派”知识分子却煞有介事地说：“不振作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起根来了<!!!>。”我在党代表大会上说过，“左派”的报纸或杂志不应该叫做“共产主义者”，而应该叫做“小贵族”^①，我这种说法难道不正确吗？

一个稍微懂得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的共产主义者，难道可以采取丧失阶级性的、充满小贵族情绪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说“和平心理”是“不振作的”，而认为挥舞

^① 见本卷第470页。——编者注

纸剑倒是“奋发有为”？其实我们的“左派”正是在挥舞纸剑，他们抹杀人所共知的并且为乌克兰战争所再度证明了的事实：受了三年战争痛苦的人民，如果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就不能继续作战；如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战争，则战争所能引起的往往是小私有者的涣散的心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的心理。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们的“左派”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丧失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

二

但是，也许“左派”关于战争的空话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热情，而且事关过去，因此并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吧？有些人这样为我们的“左派”辩护。但这是不对的。如果想自居于政治领导地位，就要善于周密地考虑政治任务，而“左派”因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就变成一些毫无定见的东摇西摆的说教者，这在客观上就只有一个意义：“左派”以自己的摇摆不定帮助帝国主义者唆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去投入对它显然不利的战斗，帮助帝国主义者把我们拖下陷阱。请听吧：

“……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不断地避免战斗，对国际资本的进攻实行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

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用言论和实际行动来配合国际的革命宣传，并且必须加强同国际社会主义（而不是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有机联系……”

关于这里对国内政策方面所作的攻击，将另外再谈。现在请看看对外政策方面的这种言辞上的放肆以及实际上的胆怯吧。目前每一个不愿意做帝国主义挑拨工具和不愿意坠入陷阱的人，应该执行什么策略呢？每个政治家都应当明确地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党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目前应当退却，应当避免战斗。我们的“左派”不敢作相反的回答，却来放空炮：“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

这是欺骗群众。如果想现在作战，就请直说吧。如果不愿意现在退却，就请直说吧。否则，就你们的客观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而你们的主观“心理”就是狂暴的小资产者的心理，这种小资产者尽管自充好汉，虚张声势，但深深地感觉到，无产者实行退却并力求有组织地退却，是正确的，无产者估计到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应该（在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甚至退到乌拉尔一带，这是正确的，因为在西方革命正在成熟的时期中，这是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虽然这个革命不是“必定”（与“左派”的空谈相反）在“春季或夏季”开始，但是它一月比一月更加临近，更加肯定。

“左派”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们不敢宣布现在退却是不必要的。他们翻来复去，玩弄字眼，拿“不断”避免战斗的问题偷偷地代替目前避免战斗的问题。他们光是吹肥皂泡：“用实际行动来配合国际的革命宣传”！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只能意味着下面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情况：或者是诺兹德烈夫习气²³⁹，或者是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攻击战。这种胡说不能公开讲出来，所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不用最响亮最空洞的词句来作掩护，借以避免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讥笑他们；他们以为，粗心的读者也许看不出“用实际行动来配合国际的革命宣

传”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夸夸其谈，这是丧失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气”的人，一定要给以惩罚，至少要加以讥讽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应该简单、明白、直接地向群众讲明这个痛苦的事实：主战派在德国又会占上风（就是说会立刻转而向我们进攻），德国和日本将根据正式协定或默契共同来瓜分我们，扼死我们，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空喊的人们，那末我们的策略就是：静候、拖延、避免战斗、退却。如果我们丢开空喊的人们，并且“振奋起来”，建立真正铁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纪律，那末我们就真可能赢得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就是退到了乌拉尔（这是最坏最坏的情况），我们也能使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更加有可能前来援助我们，更加有可能“越过”（用体育用语来讲）从许多革命爆发的开始到实行革命之间的距离。

实际上，这样的策略，也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加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个暂时处于孤立地位的队伍与其余队伍间的联系；而你们呢，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老实说，你们只是“加强”一个响亮词句与另一个响亮词句间的“有机联系”。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有机联系”啊！

亲爱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解释，为什么你们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因此你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加上引号，大概想借此来表示你们的讥讽，但实际上这个引号正表示出你们的思想一塌糊涂。你们惯于把“护国主义”看作卑鄙龌龊的东西，你们背熟了这一点，你们把这一点背得烂熟，以致你们中间有些人竟弄到荒谬地步，以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是不能容忍的（实际

上，只是在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你们没有很好考虑，“护国主义”为什么是并且在什么时候才是龌龊的。

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争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末这种战争就是正当的和“神圣的”。

我们是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护国派。我曾十分明确地一再讲过这一点，你们也不敢反驳这一点。正是为了“加强”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就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谁要是对于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的国防采取轻率的态度，他就是在破坏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在我们还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轻率地对待过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保卫祖国的问题，我们从原则上否认了这种保卫。当我们已成为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时，我们就要求一切人严肃地对待国防。严肃地对待国防，这就是说要切实准备并精确地估计力量的对比。如果力量显然不够，那末最重要的防卫手段就是退入腹地(谁要是认为这只是临时做出来应急的牵强附会的公式，那末，他可以去读一读克劳塞维茨这个老头子——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关于这一点的历史教训的总结)。²⁴⁰可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丝毫不象是懂得力量对比这个问题的意义。

过去，我们在原则上反对护国主义，所以我们当时有权利讥笑那些好象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想“保护”自己祖国的人。现

在，我们已经获得做无产阶级护国派的权利，因此，问题的整个提法就根本改变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最慎重地估计力量，最仔细地衡量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是否来得及帮助我们。资本的利益，就是要在全世界的工人还没有联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开始革命）以前，把敌人（革命的无产阶级）各个击破。我们的利益，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利用甚至是最小的机会，使决战推迟到整个伟大的国际军队的各个革命部队实现这种联合的时候（或者推迟到实现这种联合“以后”）。

三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厄运。我们读到他们目前形势的提纲中的下列词句，实在会不禁失笑：

“……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

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由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当他们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在一起的时候，就暴露出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左派”的厄运，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

实质，没有看到由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昨天，目前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盲人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碎的，比我们已经来得及加以统计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可以只有一个“坚决性”，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就不能没有这种才能。

我们的历史功绩，就是昨天（明天也会如此）在实行没收方面，在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怠工方面，我们是坚决的。如果今天把这一点写入“目前形势的提纲”，就等于面向过去和不懂得向将来过渡。

“……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终于找到了任务！但是我们这里的怠工现象已经完全“粉碎”了。我们所不够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进行统计，计算一下应该把哪些怠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样组织自己的力量去施行监督，譬如说，使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或监督者，去监督一百个为我们服务的怠工者。在这种情况下，乱叫什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就是胡说八道。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手段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只有疯狂反对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认为这就够了，——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犯这种错误。

如果我们上面所引的话会使人失笑，那末“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新发现就简直会使人捧腹大笑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右派布尔什维克倾向”之下，苏维埃共和国有“演进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的危险。你看，他们可真正把人吓倒了！因此“左派共产主义

者”十分热心地在提纲中，在论文中，再三重复着这一骇人听闻的发现……

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我暗自揣度，“左派共产主义者”会怎样义愤填膺地来挨斥这些话，他们将在工人面前给予“右派布尔什维克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评”。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因此，对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个使我们有权利、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正因为他们看不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所以他们就暴露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

第三，他们拿出“国家资本主义”来吓人，这就暴露出他们不了解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的苏维埃国家。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种情况。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那末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

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 (1) 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
- (2) 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 (3) 私人资本主义；
- (4) 国家资本主义；
- (5) 社会主义。

俄国如此辽阔广大，如此五光十色，以致社会经济结构的所有这些不同类型都错综在它里面。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究竟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部分甚至极大部分的种地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我国的投机商时时彼地在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办合作社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外壳，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便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开展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之类的经济范畴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是(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抗拒国家的任何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经济问题上“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才发生的。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这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

人，即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措施方面的敌人。如果说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最突出、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绞杀个别几个“要犯”和颁布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当时尚可原谅的话，那末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个问题还要采取纯空谈的态度，就只能引起每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俄国境内特别广泛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在每一个小资产者那里都有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多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使投机活动得以钻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毛孔中，从而排除国家垄断制。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他们在口头上（当然，他们的最真诚的信念也是如此）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只是帮助小资产阶级，只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只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他们要——在1918年4月！！——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真是胡闹！

小资产者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累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这种典型的经济类型也就是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货币是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若把贫民，即把多数居民或半无产者组织在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那我们便能做到这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制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之流和卡芬雅克⁸⁵之流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只有藏在关于“劳动”

农民的空谈后面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才看不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真理，但是有谁去认真地对待这些沉醉于空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呢？

存有几千小款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无疑希望把这几千小款用在自己身上，反对贫民，反对任何全国性的监督，而这几千小款却给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造成数十亿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一千的价值。又假定说，在我国，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二百落了空。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一千中拿出三百来就能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三百，不是二百，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打破，那末以后减少这种“贡献”，比如说减到一百或五十，就会是十分容易的任务。

这个简单的数字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例子弄得再简单不过了，——说明了现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一千统统“拿走”，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用很多办法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比现在还大，为了“领教”是值得破费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混乱状态、经济破坏和松弛现象是无比重要的，因为继续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最

大的、最严重的、绝对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的危险，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献，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安排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无比地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里面并没有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已经得到保障的国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根本不知道政治经济学为何物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永远不会了解这些真理，但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它们。用不着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争论，只要指出他们是爱说空话的人的“丑恶榜样”就够了；而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应当争论，因为这里是马克思主义者犯了错误，而分析他们的错误，是可以帮助工人阶级找到正确的道路的。

四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

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而同样用国家，但已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关于这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谈起，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足足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值得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笨蛋之外，没有人期待历史会平稳、宁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演进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分离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若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料构成，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击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仍然迟不“诞生”，那末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用全力仿效国家资本主义，为了比彼得更快地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我们不惜采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这

两个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孤芳自赏地议论道——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末我们只须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所谓“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在经济上犯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或者是因为他不知道具体事实,看不见现存事物,不会辨别真理,或者是因为他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未注意研究我国目前这一过渡的一些具体形式和阶段。顺便说一下,这也就是使《新生活报》⁷⁸和《前进报》²³⁶营垒中的优等人物神智不清的理论错误。该营垒中的劣等人物和中等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优等人物则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¹⁵⁵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仍然是一种抽象东西,只有经过一些想建立某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具体尝试,这种抽象的东西才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一步,正因为如此,所以用“演进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共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8页第1栏)的话来吓唬自己也吓唬别人,这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正意味着他们不懂得“演进”的真正道路,在思想上离开这条正路走到“一边”去了;而在实践上这便等于向小私有制的资本

主义开倒车。

为了使读者相信，我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做过“高度”的评价，让我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录几段：

“……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破坏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将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下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第27页和第28页）^①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梯级往上登得越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越充分，我们就应该越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入口”，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似乎威胁我们的论断，是经济上的一个极大错误，是他们完全充当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的明证。

^① 见本卷第162、163、164页。——编者注

五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①，他曾顺便提出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显然是指“左派共产主义者”〉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²⁴¹（即从资本家匪帮，也就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它表明：第一，布哈林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高出一筹，他完全不是绝望地堕入空谈，恰恰相反，他却极力思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痛苦而艰难的过渡——的具体困难。

第二，这个意见更加明显地揭露了布哈林的错误。

确实如此，请深入考虑一下马克思的想法。

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就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而言，是当时“和平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最有可能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286页。——编者注

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但在苏维埃俄国，自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自从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某些条件已经按照半世纪前本可在英国——假如英国当时已开始和平地转到社会主义——形成的那些条件的样式而形成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那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使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由于没有农民（在七十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了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就），工人即无产者在全国人口中完全占优势；（2）无产阶级在工会里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政治自由长期发展中受到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第一位已经转给德国了）——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去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目前我国已有某些基本前提（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从10月到次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有了保障。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虽然在居民中没有占绝对优势，虽然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但最贫穷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却是我们胜利的因素。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化水平，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能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末就会知道，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做到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就是说，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

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①；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以他记得马克思曾极其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便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极大的生产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例外）环境会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并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没有考虑到目前之所以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是由于现在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由于这种特殊情况，所以工人们目前才有必要对那些最有文化、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决心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相当认真地帮助安排大的和最大规模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犯两种实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

^① 这里也应该正视真实情况：我们还缺少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所必要的无情，而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决心。我们的决心是足够的，而是我们没有本领非常迅速地捉到人数相当多的破坏苏维埃措施的投机商、奸商、资本家。因为只有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获得这种“本领”！第二，我们的法庭不够强硬，对于营私舞弊的人，不判决死刑，而只判处半年徒刑。我们这两种缺点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和软弱无力。

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因而”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套中人”¹⁷⁶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适应”是永远不会有有的，无论在自然界发展中或在社会发展中，这样的适应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个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毛病——才能从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唱高调的人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表面上“格外”革命，但要从事那种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并估计到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

幸而各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类典型的清晰面貌，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疯狂地叫嚣，叫得喉咙哽塞地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不会深思一下，“妥协”的坏处是什么，它为什么理应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裁判。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曾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实行了妥协，这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我们的敌人即切尔诺夫之流和孟什维克来分掌政权，殊不知这些人在基本问题上，即在解散立宪会议、无情地击溃鲍加也夫斯基²³¹之流、充分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的没收工作等方面，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即无产阶级政党夺到手了，保持住了和巩固下来了，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所以现在，当根本谈不上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时，再来谈

论妥协，就无异象鹦鹉学舌一样，只是简单背诵那些念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字句罢了。现在，当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当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文化程度极高的人吸引过来，任用他们以便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竟说这是“妥协”，那就等于根本不善于思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

所以，——布哈林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因为卡列林之流和格耶之流对他献了一番“殷勤”，马上“害羞起来”，尽管这是一种好的表现，——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人来说，指出他们的政治上的战友，终究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例如，1918年4月25日的那一号《劳动旗帜报》¹⁷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傲慢地宣称：“我党现时的立场与布尔什维主义中的另一派（布哈林、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是一致的。”其次，同一天的孟什维克的《前进报》上载有知名的孟什维克伊苏夫的“提纲”：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自始就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背道而驰，在最近时期中已经日益公开地走上与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而带有明显的反工人的性质。在工业国有化的幌子下，实行培植工业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复国家生产力的幌子下，企图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计件工资制和泰罗制，实行黑名单和黑籍证制度。这个政策会使无产阶级丧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成果，而变成资产阶级任意剥削的牺牲品。”

这岂不是妙不可言吗？

为了履行各种允许俄国资本家侵占别国领土的密约而同克伦斯基一起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克伦斯基的朋友们，打算在6月11日解除工人武装的策烈铁里¹⁴³的同僚们，用响亮的词句掩饰资产

阶级统治的李伯尔唐恩²⁴²之流，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在指责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妥协”，“培植托拉斯”（即培植“国家资本主义”！），采用泰罗制。

真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把奖章授给伊苏夫，而把他的提纲当做资产阶级挑拨言论的标本在每一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内展览出来。现在，工人们根据经验已经到处看穿了李伯尔唐恩之流、策烈铁里之流和伊苏夫之流的真面目，用心去思索思索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这些走狗要挑拨工人们来反抗泰罗制和“培植托拉斯”，这对于工人们是极有益处的。

觉悟的工人会把李伯尔唐恩之流、策烈铁里之流这些先生的朋友伊苏夫的“提纲”，拿来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列提纲作一番细心的比较：

“由于恢复了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执行劳动纪律并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降低无产阶级的阶级自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它会束缚工人阶级，它会激起无产阶级落后阶层以及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阶级中间仇恨‘资本家怠工者’的心理极盛的情势之下，为了执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反对工人，这就就会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毁灭掉。”（《共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8页第2栏）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它表明“左派”怎样堕入了陷阱，中了伊苏夫之流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奸细们的挑拨诡计。这对于工人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工人们知道，正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主张执行劳动纪律，正是小资产阶级才拚命去破坏这个纪律。象上述“左派”提纲这种议论，是一种奇耻大辱，事实上完全背弃了共产主义，完全转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由于恢复了资本家的领导地位”，请看“左派共产主义者”想

用什么样的话来“辩护”。这种辩护是毫不中用的，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在有工人代表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形下，这些工人代表或工人委员会在监督领导人的每一行动，学习领导人的领导经验，他们不仅能够对领导人的措施提出控告，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的机关来撤换领导人。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只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执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由它修改和取消。第三，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做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家。工人们也知道得很清楚：真正的大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技师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才。因为工人们在跨出能被“左倾”词句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利用资本家来领导托拉斯，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每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到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最大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即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散漫和涣散现象。

只有丧失了阶级性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不了解这一点；奥新斯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中和在他们的杂志上，就表现为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写道：

“……企业组织和企业领导事务上的全部主动性，将属于‘托拉斯的组织者’；因为我们不是想教导他们，不是想把他们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向他们学习。”（《共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

14 页第 2 栏)

在这段话中所卖弄的讽刺锋芒是针对于我说的那句话：“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

在奥新斯基看来，这句话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组织者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如果这种言论是出于诗人所描写的“年方十五，不会多一点？²⁴³……”这种年龄的人的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了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的理论，竟讲出了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丝毫嗅不出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不。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末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

如果不是抱着把社会主义“教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幼稚目的，我们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他们的；对于他们，不是应该教授，而是应该剥夺（这种工作，在俄国正在异常“坚决地”进行着），他们的怠工行为应该粉碎，应该使他们这个阶层或集团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小孩子和幼稚无知的人，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办理可以为几千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俄国优秀的工人是懂得这层道理的。他们已经开始向资本家组织者学习，向工程师领导者学习，向技师专家学习了。他们已经

开始坚定而谨慎地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学起，然后再逐渐学习最难的東西。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这件工作进行得所以比较缓慢，是因为它比较困难。而纺织工人、烟草工人、制革工人，却不象丧失了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他们不害怕“国家资本主义”，不害怕“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这些工人在“制革总厂”、“中央纺织工业管理局”这一类中央领导机关内，同资本家坐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办托拉斯，办“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俄国先进工人们的这种工作已经同他们执行劳动纪律方面的工作一起开始进行，并且还在继续进行，他们并不大吹大擂，到处宣扬（大吹大擂对某些“左派”却是必需的），而是非常谨慎，循序渐进，并且估计到实际工作的教训。这个艰难的工作，这个实际学习建设大生产的工作，就是我们按照正确道路前进的保证，就是俄国的觉悟工人反对小私有者的散漫和涣散、反对小资产阶级无组织无纪律现象^①的保证，就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

六

在结束本文时，要作两点说明。

1918年4月4日我们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争论的时候（见《共

^① 最值得注意的，是提纲作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生活方面的意义，却只字不提。他们只讲“组织性”等等。但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仇视经济关系上的工人专政的小资产者也会承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种时候决不会“忘记”旨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

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4页注释),我直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你们解释一下,你们对铁路法令中哪些东西不满意,请拿出你们的修正提案。这是你们这些无产阶级苏维埃领导人的义务,否则你们的言论就只是空谈。

1918年4月20日《共产主义者》杂志第一期出版了,其中没有一个字讲到“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要如何修改或更正铁路法令。

“左派共产主义者”就以这种缄默斥责了自己。他们只限于用一些暗示性的攻击来反对铁路法令(第1期第8页和第16页),而对于“既然铁路法令不正确,那末应该怎样修改呢?”这个问题,却没有作任何明确的解答。

不言而喻,对于铁路法令(这个法令是我国的路线即坚定不移的路线、专政的路线、无产阶级纪律的路线的榜样)所作的这种“批评”,觉悟的工人会把它叫做“伊苏夫式的”批评,或者叫做空谈。

另一个说明。在《共产主义者》杂志第一期中,布哈林同志把我的《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称赞了一番。象布哈林这种人的评论,对我不论多么有价值,但是我应该凭良心说:这个评论的性质暴露了一个很可悲和很值得注意的事实:布哈林观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家问题上的意见可能有共同之处。布哈林恰恰“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构,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这连愤激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会愿意的。而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我们的革命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我的小册子里，还讲到了甚至最革命的小资产者都不愿意的、而觉悟的无产者却愿意的、我们革命还没有做到的东西。关于这个任务，明天的任务，布哈林却保持沉默。

我是更有理由对这一点发表意见的，因为第一，共产主义者应特别注意的是明天的任务，而不是昨天的任务；第二，我这本小册子，是在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写成的，那时，人们还不能以庸俗市侩的理由来非难布尔什维克，说什么“嗯，在夺得政权以后，当然要高唱纪律了”……

“……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国家与革命》第77—78页^①。可见，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讲到了“起码条件”）

“……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那时“人们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同上，第84页^②；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说到了“处世格言”）

“……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¹⁵⁷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白白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同上，第91页）^③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同上）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

① 见本卷第24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47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254页。——编者注

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同上,第95页)①。应当作好这种监督,不仅是为了对付“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而且是为了对付工人里面那些“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同上,第96页)②,对付“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同上)。

很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1918年5月5日

载于1918年5月9、10和11日

《真理报》第88、89和90号

署名:尼·列宁

按1918年莫斯科“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小册子原文刊印并根据《真理报》原文和1922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宁(弗·伊·乌里扬诺夫)《接近新题材的旧文章》小册子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7卷第299—329页

① 见本卷第258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58--259页。——编者注

论 饥 荒

(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

同志们！前几天你们的一位代表来见过我，他是党员，是普梯洛夫工厂工人。这个同志把彼得格勒极端严重的饥荒情形详细地讲给我听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许多工业省份，粮食问题也同样尖锐，工人和一般贫民也同样濒于痛苦的饥饿线上。

同时我们却看见以粮食和其他食品大肆投机的情形。饥荒并不是由于俄国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即粮食问题上，对劳动者的统治，即对工人国家、对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决战。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其中包括农村的富人、富农，破坏粮食垄断，破坏国家的粮食分配办法，这种办法是为了把粮食供给全体人民，首先是供给工人、劳动者和贫民。资产阶级破坏固定价格，进行粮食投机，每普特粮食赚一百、二百以至更多的卢布，破坏粮食垄断和合理分配粮食的办法，它所用的破坏手段，就是贿赂，收买和恶意赞助足以危害工人政权的一切罪行，而这个工人政权正在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根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懂得的。这是一切工人，一切贫农以至中农，一切度过贫苦生涯的人，一切靠工资生活过的人都同意的。十分之九的俄国居民赞成这个真理。这个简单的，十分简单和明显不过的真理，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

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泉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

但问题的实质却在于：甘心同意这个真理，发誓赞成这个真理，口头上承认这个真理，是一回事，而善于实现这个真理却是另一回事。在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中，当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遭受饥饿痛苦（在彼得格勒，在非农业省份，在莫斯科），而富人，富农和投机商却把千百万普特粮食隐藏起来的时候，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该认真地仔细地思考一下。

怎样才能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呢？十分显然，要实现这个原则，第一，必须实行国家的粮食垄断制，即绝对禁止任何私人的粮食贸易，必须把全部余粮按照固定价格交给国家，绝对禁止任何人保存和隐藏余粮。第二，必须最严格地计算一切余粮，以及有条不紊地把粮食从余粮区运往缺粮区，还要收购供消费、加工和播种的存粮。第三，为此必须在工人即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下，按公平合理的粮食分配办法把粮食分配给全体公民，不给富人任何特权和优待。

只要把这些克服饥荒的条件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那些否认为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为了使劳动者摆脱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而必须有国家政权（并且是一个对资产阶级极端严酷，对向政府捣乱者铁面无情的政权）的可鄙的无政府主义空谈家愚蠢到了怎样的地步。正是现在，当我国革命已经在认真地、实际地、具体地实现——这也就是这一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社会主义的任务的时候，正是现在，并且恰恰是在当前主要问题即粮食问题上，可以最明显地看见，必须有钢铁般的革命政权，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全国广大范围内组织收集食品、运输和分配食品的事业，并且要计算几千万、几万万人的消费，要估计到往后一年以至

若干年内的生产条件和结果(因为要估计到歉收的年份,要估计到为了增加粮食收成,常常要进行多年的工作来改良土壤等等)。

罗曼诺夫和克伦斯基遗留给工人阶级的国家,是一个被他们所进行的掠夺的、犯罪的、非常痛苦的战争弄到极端破产的国家,是一个被俄国和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抢劫一空的¹¹国家。只有最严格地计算每一普特粮食,只有绝对平均地分配每一磅粮食,才能使粮食够一切人吃。机器的粮食即燃料,也是极端缺乏的;如果不集中全力来严格无情地节省消费和实行合理分配,那末铁路和工厂就会停顿,全国人民都会受到失业和饥饿的危害。灾祸就在眼前,它已经向我们头上逼近。在万分困难的5月之后,还有更困难的6月、7月和8月。

国家粮食垄断制,在我国已由法律明文规定,可是实际上它随时随地都遭到资产阶级的破坏。农村中的富人,富农,土豪,这些抢劫了四周乡里好几十年的人们,宁愿靠投机、酿私酒来营利,因为这可以饱他们的私囊,至于造成饥荒的罪过,那他们就推到苏维埃政权身上。那些在政治上保卫富农的人,如立宪民主党人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孟什维克,也是同样的作法,他们既公开又秘密地为反对粮食垄断制,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工作着”。无气节者的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这里也表现出自己毫无气节;它为资产阶级的自私的叫喊号泣所蛊惑,它大叫反对粮食垄断,它提出“抗议”反对粮食专卖,它甘受资产阶级的恐吓,它害怕反对富农,疯狂地东奔西窜,提议抬高固定价格,允许私人贸易等等。

这个无气节者的党在政策上反映着实际生活中常有的一种情况:当富农挑唆贫农去反对苏维埃的时候,就设法收买贫农,譬如给某个贫苦农民一普特粮食,不要他付六个卢布,而只要他付三个卢布,让这个被腐蚀的贫农也去“享受”投机利益,也去以一百五十

个卢布卖出这一普特粮食“发发小财”，让他也变成大喊大叫的人，去反对那禁止私人买卖粮食的苏维埃。

凡是能够思索的人，凡是愿意稍加思索的人，都会明白，究竟斗争是按那条路线进行着：

或者是有觉悟的先进工人把贫民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建立铁一般的秩序，建立严厉无情的政权，即真正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获得胜利，强迫富农服从，并在全国内范围内实行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的办法；

或者是资产阶级依靠富农的帮助，依靠无气节的和昏头昏脑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间接支持，把苏维埃政权推翻，拥立一个亲德的或亲日的科尔尼洛夫，这个科尔尼洛夫就会强迫人民每日工作十六小时，每星期领得八分之一磅的面包，枪杀工人群众，在审讯室里拷打，象在芬兰和乌克兰那样。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国内状况危急到了极点。

凡是细心思索政治生活的人都不会不看见，立宪民主党人正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互相协商：究竟是亲德的科尔尼洛夫还是亲日的科尔尼洛夫“比较惬意一些”；究竟是帝制的科尔尼洛夫还是共和制的科尔尼洛夫，对于镇压革命更好和更可靠一些。

现在已经是一切觉悟工人，一切先进工人协商的时候了；他们应该即时振奋起来，懂得每一分钟的迟延，都有使国家陷于沦亡，使革命陷于覆灭的危险。

缝缝补补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诉苦是毫无结果的。各人企图为“自己”即为“自己的”工厂，为“自己的”企业“零星”弄一点粮

食和燃料的办法，只会助长混乱状态，只会方便投机商所干的自私自利的、黑暗龌龊的勾当。

彼得格勒的工人同志们！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给你们，原因就在这里。彼得格勒不是全俄国。彼得格勒的工人只是俄国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中的一支优秀的、先进的、最有觉悟的、最革命的、最坚决的、最少受空洞辞句诱惑、最少受无气节的绝望情绪影响、最少受资产阶级威吓的队伍。在各国人民生活中，当危急关头，甚至先进阶级的人数不多的先进队伍，也能把全体吸引到自己周围，燃起群众革命热情的火焰，完成伟大的历史功勋，这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彼得格勒的工人代表向我说：在他们普梯洛夫工厂里原来有四万工人，但其中大多数都是“临时”工人，不是无产者，而是不可靠的、软弱的人们。现在只剩下一万五千人，但都是无产者，都是经过斗争考验和锻炼的人。

正是这样的革命先锋队——在彼得格勒的以及在全国的——应当大声号召，应当一致奋起，应当认清，国家命运就操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必须表现出与1905年1月和10月、1917年2月和10月时同样的英勇精神，他们应当起来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粮食投机者，反对富农、土豪、破坏分子和贪污分子，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与燃料的事情上一切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

只有先进工人群情振奋，才能挽救国家和革命。需要有几万个先进工人，即受过锻炼的无产者，他们要具有很高的觉悟程度，能够向全国各地千百万贫民说明真象，并成为这千百万人的领袖，他们要具有十分坚毅的精神，能够无情地摒弃和枪毙一切受投机利益“诱惑”，——这是常有的事，——而从为人民事业奋斗的战士

堕落为劫掠者的人，他们要具有十分坚定的、忠于革命的赤忱，能够有组织地把在全国各地进行讨伐的一切重荷担负起来，以便树立秩序，巩固各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在各地监督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燃料的消费。

这比在几天中表现英勇精神，既不离开久居之地，也不作长途讨伐，而只限于热情迸发，举行起义去反对恶魔和白痴罗曼诺夫，或反对傻瓜和吹牛大王克伦斯基要困难得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长期坚毅的组织工作上表现英勇精神，比在起义中表现英勇精神困难得多，可是也高尚得多。然而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之所以有力量始终是由于它们能大胆公开地正视危险，不害怕承认危险，能清醒地估量哪些势力是站在“自己”营垒方面，哪些势力是站在“外人”即剥削者的营垒方面。革命在前进、发展和增长。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在增长。斗争的广度和深度也在增长。正确分配粮食和燃料，加紧设法获得粮食和燃料，由工人在全国范围内最严格地计算和监督这些事情，这就是进到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主要的入口。这已经不是“一般革命的”任务，而是共产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个任务上，劳动者和贫民应当向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战斗。

在这个战斗上值得献出一切力量；这个战斗的困难是巨大的，然而我们所奋斗的事业，即消灭压迫和剥削的事业也是巨大的。

当人民忍饥受饿，失业现象日益猖獗的时候，凡是隐藏一普特余粮的人，凡是使国家损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穷凶极恶的罪犯。

在这样的時候，——而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则永远如此，——每一普特粮食和燃料都是真正的圣物，比神甫们用来愚弄蠢人的圣物要高尚得多，因为神甫们素来是以升天堂来安慰在地上过着奴隶生活的人们的。为了从这种真正的圣物上把神甫们所

说的“神圣性”的一切残余抛掉，那就必须实际掌握这种圣物，必须做到在实际上正确分配这些圣物，必须把所有的余粮毫无例外地搜集起来，作为全国的存粮，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肃清隐藏余粮或尚未收集余粮的现象，必须用工人的坚决手腕做到使人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增加燃料采掘量，大大节省燃料，在燃料运输和消费方面建立极端严格的秩序。

需要先进工人进行大规模的“十字军讨伐”，到所有一切生产粮食和燃料的区域去，到所有一切运输和分配粮食和燃料的重要地点去，以便提高工作能力，使工作能力增加十倍，以便帮助各地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行计算和监督，以使用武力消灭投机、受贿和疏忽大意的现象。这个任务并不是新的任务。老实说，历史并没有提出新的任务，只是随着革命规模的增大，革命困难的增加及其全世界历史任务的意义的增高，而使旧任务的范围和规模扩大起来。

十月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大而不可摧毁的创举，就是先进工人以贫民领导者的资格、以农村劳动群众领袖的资格、以劳动国家建设者的资格“到民间去”了。彼得格勒派出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工人到农村去，其他无产阶级中心区也派出了许多优秀工人到那里去。同卡列金和都托夫作斗争的战斗队，以及征粮队并不是什么新奇事情。任务只是在于，由于灾祸逼近，情况艰难，而使我们必须去做比以前多十倍的工作。

工人成了贫民的先进的领袖，并不就成了圣人。他领导人民前进，可是他也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毛病。工人队伍中最有组织、最有觉悟、最守纪律和最坚决的工人愈少，则这支队伍也就愈容易涣散，而代表过去的小私有者自发势力，也就愈容易战胜代表未来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觉悟性。

工人阶级开始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

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资本家社会，从剥削者和土豪社会，从少数人龌龊地营私致富而使多数人遭受贫困的社会继承下来的。可是工人阶级是能够战胜——并且归根到底必然会战胜——旧世界，能够战胜它的毛病和弱点的，只要工人阶级不断地派出一批一批人数更多，经验更丰富，在困难斗争中受到更多锻炼的工人队伍与敌人作斗争就行了。

现在俄国的情形正是这样。单独奋斗，分散作战，决不能战胜饥荒和失业现象。必须有先进工人大规模的“十字军讨伐”，出发到幅员广大的全国各地去。必须派出人数数十倍的由觉悟的、无限忠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所组成的钢铁般的队伍。那时我们就能战胜饥荒和失业现象。那时我们就能把革命引升到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入口。那时我们也就能够进行胜利的防御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

尼·列宁

1918年5月22日

载于1918年5月24日

《真理报》第101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7卷
第365—372页

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 代表大会²⁴⁴上的演说

(1918年5月26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祝贺。(鼓掌)

同志们！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担负着一个最困难但也最光荣的任务。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胜利愈向前发展，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这个变革愈深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愈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作用就愈增大和提高。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将来只有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保持自己巩固的地位，我们愈接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纯粹行政机关，对于实际上只是做管理工作的机关的需要愈减少，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这种地位就愈巩固。将来彻底打垮剥削者的反抗，劳动者学会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以后，——这种原来意义的、狭义的管理机关，旧国家的机关，必定灭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种机关必定增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

同志们，所以我在研究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以及它与它有密不可分的工作联系的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没有丝毫的根据作出任何悲观的结论，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没有完成，没有组织就绪。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省和各地方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这样巨

大，简直无所不包，所以我们没有丝毫根据对我们大家看见的一切现象产生忧虑。有很多次——当然，在我们看来，也许次数过多——没有采用俗话说的“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办法。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组织经济，可惜并不象俗话所说的这样简单。

自从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阶级，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以后，我们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很明显，在组织任务极其重要和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当我们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方法来组织数亿人生活的最深基础的时候，这里当然不能象俗话“七次量衣一次裁”那样简单地来处理事情。实际上，我们不能预先量很多次，然后再裁剪已经完全量好的衣料。我们要在工作进程中考查这种或那种机关，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它们，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的经验，而主要是工作结果的经验来审查它们，我们要在工作进程本身中，而且要在剥削者进行剧烈斗争和疯狂反抗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接近完全拔掉资本主义剥削制最后几个坏牙，这些剥削者也就愈加疯狂），来建造我们的经济大厦。当然，在这种条件下，根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虽然我们有时甚至在一个短时期以内都要几次改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管理形式、管理规章和管理机构，——自然，这是资产阶级和高贵的自尊感受到侮辱的剥削者老爷们进行恶毒攻击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当然，过于接近和过于直接参加这种工作——有时三番五次地改变管理章程、管理准则和管理法规——的人，例如水运总局的人，自然有时觉得很愉快。对这种工作不会满意。可是如果稍微抛开因法令过于频繁改动而直接引起的不愉快，如果目光稍微放远些去看看俄国无产阶级暂时还只能依靠本身不足的力量去完成的那个伟大

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末立刻就会明白，甚至作更多次数的改动，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和整顿纪律的各种规定进行试验，都是必不可少的；就会明白，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我们从来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到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曾想到，说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的最大的思想家所给我们准确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条伟大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被历史判处死刑，它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已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当我们手持社会主义的旗帜，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政党，着手改造社会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当我们夺取了政权而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是，改造的形式和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来，以前地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历史的成千上万上等阶层人士的经验，还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依靠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所以我们知道，组织工作是苏维埃的主要的、根本的和基本的任务，它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经验、很多办法、很多变动和很多困难，——尤其是在怎样使人人各得其所这一方面，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经验，在这里要我们自己来定出每一个步骤，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错误愈严重，则我们愈是坚信：工会会员人数每增加一次，遵照传统和习惯生活的被剥削的劳动者从他们的营垒转到苏

维埃组织建设者营垒的人数每增加几千人，增加几万人，则能够做好工作并将工作纳入正轨的人数也会增加。

就拿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常遇到的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这项次要的任务来谈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至少，那些站在科学和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任务只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劳动的物质前提和技术前提才能实现，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它是建立在科学成就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培养大批受过科学教育的专家上的。我们知道，不实现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最近半世纪以来，有些社会主义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多次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必然实现，如果我们反复阅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那末，我们就知道，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指出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我们必须依靠敌视这一点的分子来实现它，因为资本愈是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工人所受的迫害也愈厉害。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都要利用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了解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十分真诚和完全忠实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被他们自己看不见的成千上万条线索将他们和那个垂死

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联系着。

我们不能不看到完成这些任务会遇到的困难。在一切谈论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我不记得任何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见，曾经指出过这种具体的实际的困难——这种困难是已经夺到政权的工人阶级在它给自己提出任务的时候遇到的，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这种事情用一般的公式和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很容易的，可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并不马上灭亡，而且它愈接近死亡，就愈加疯狂地进行反抗），这却是一个最吃力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进行试验，屡次修改局部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在国民经济的哪一个部门中，马上把专家由资本主义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顾问。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这也不会引起丝毫的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世界历史上的困难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我们并不闭目不看这事实：我们是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国家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甚至远远不象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四年空前的、艰苦的、破坏一切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谁指出明显的力量不相称的情况，而掉头不顾在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他就象鼠目寸光的、毫无生气的套中人¹⁷⁶一样，他忘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次比较巨大的改革，不经过很多次力量不相称的情况。力量是在斗争过程中随着革命的增长而增长的。当国家已经走上了进行最伟大的改革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国家和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功绩，就在于我们已实际地紧紧接近了那些以前还是

抽象地、在理论上提出的任务。这个经验是不会忘掉的。无论如何，不管俄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会有多么痛苦的周折，终究不能夺去工人们的这个经验，工人们现在已经联合在工会和地方组织内，正在实际从事在全国范围内安排全部生产的工作。这个经验已经作为社会主义的成就载入史册，未来的世界革命将根据这个经验来建造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

我还要指出一个也许是最困难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实际解决的。这就是关于劳动纪律的任务。老实说，在我们指出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而且应该满意地着重指出：正是工会，工会最大的组织，——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联合几百万劳动群众的最高工会组织，首先独立地着手去解决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要了解这个任务，就应该撇开那些个别的细小的挫折，撇开那些难以相信的困难，这些挫折和困难，单个看来，好象是不可克服的。应该站得更高，看到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更替。只有持这种观点才能够看清楚，我们已经担负起多么巨大的任务，才能够看清楚，这一次社会上最先进的代表——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把1861年以前农奴制俄国的少数地主解决过的一个任务（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的事情），亲自担当起来，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以前建立全国的联系和纪律，是少数地主的事情。

我们知道农奴主们是怎样建立这个纪律的。这就是使大多数人民遭到压迫、虐待和忍受空前的苦役的折磨。请回忆一下由农奴制度转到资产阶级经济的全部转变过程吧。你们已经看见的（虽然你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看见），以及你们从老一辈人那里听到的关于1861年以后向新的资产阶级经济的过渡，是由旧的农奴制下的皮鞭的纪律，由最无理性的、最横蛮、最无礼的虐待和强制

人的纪律，向资产阶级纪律过渡，向饥饿的即所谓自由雇佣的纪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纪律）过渡，这个过渡，在历史上看来还是很容易的，因为这是人类由一种剥削者转到另外一种剥削者，因为这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让位给另外一些也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因为这是在镇压被剥削的劳动阶级的广大群众的情况下，地主把这个位置让给资本家，即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少数人。这是一种剥削者的纪律代替另一种剥削者的纪律，这种更替，要经过几年的努力，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要经过几年的过渡时期，甚至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农奴主-地主们诚心诚意地认为：一切都会消灭，没有农奴制度是决不可能经营的；而新主人——资本家到处都碰到实际的困难，对于自己的经济束手无策；可以表明这个过渡的困难情况的一个物质上的标记，一个物证，就是当时俄国从国外订购了许多机器，以使用机器做工，用最精良的机器做工，而结果是既没有会使用机器的人，也没有指导者。当时，俄国各地的精良的机器都搁置不用，可以看出，从旧的农奴制的纪律转到新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纪律是多么困难。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这样观察问题，你们就不会让资产阶级及其走卒把你们引入歧途，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散布惊慌和失望的情绪，制造对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气氛，把全部工作描绘成毫无希望的事情，他们指出每一个别的无纪律和腐败的情况，并且因为这些个别情况而鄙弃革命，似乎世界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次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没有腐败的现象，没有违反纪律的现象，在群众制定新纪律的时候没有经过痛苦尝试的步骤。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第一个接近了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时候，新的纪律，劳动的纪律，同志关系的纪律，苏维埃的纪律，是真正由千百万

被剥削的劳动者制定的。我们并不打算也不指望在这方面迅速获得成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要占去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历史时代，这时，我们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内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而我们感到自豪的，就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全体劳动农民，正在尽力帮助这个破坏工作；这时群众们已经自动地和本着自己的首创精神而日益觉悟到：他们不应该等待上面的命令，而应该根据自己生活经验的指示去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新纪律，用人口达几千万、几万万的爱国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纪律，去代替那种建筑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上的纪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也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因为只有在我们实际解决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才能把那个正在被我们装殓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封棺埋葬下去。（鼓掌）

大会报道发表于1918年5月28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第106号

按1918年莫斯科出版的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书。
速记记录》一书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7卷
第382—389页

预 言

谢天谢地，现在大家都不相信神奇事情了。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现在到处不断有人表现出一种可耻的沮丧甚至绝望的情绪，在这种时候提一提下面一段已经证实的科学预言是有好处的。

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为西吉兹蒙特·波克罕所著《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一书（这本书就是1888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二十四册）写的引言中，曾论及未来的世界战争。

以下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三十多年前谈到未来世界战争时所说的一段话：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八百万到一千万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

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不会哭泣的（uns kann es recht sein）。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doch）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于伦敦²²⁶

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言！在这个明确的、简要的、科学的阶级分析中，每一句话的含义是多么丰富！现在陷于可耻的犹豫、颓丧和绝望状态的人，如果……如果这些惯于向资产阶级奴颜婢膝或甘愿被资产阶级吓倒的人会思考，还有一点思考能力，那末，他们该从这里吸取多少教训！

恩格斯所预料的事情有些是发生得不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在帝国主义以疯狂速度发展的三十年间，世界和资本主义当然不能不有某些变迁。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事情发生得同恩格斯所预料的“一字不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而阶级以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又仍然同以前一样。

……“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实际情形正是按这条路线发展的，并且发展得更远，更坏。有一部分“被抛到后面去了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及其毫无气节的“半反对者”，即考

茨基主义者，公然赞美他们的这种后退，成了叛变和出卖社会主义的人。

……“战争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工人阶级有许多“合法”阵地都被夺去了。但是它在患难中受到了锻炼，获得了虽然是残酷的但是有益的教训，即从事不合法组织，进行不合法斗争，准备本身力量去作革命冲击的教训。

……“王冠成打地滚”……有几顶王冠已经滚下来了，其中有一顶王冠等于整整一打别的王冠，那就是全俄专制君主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王冠。

……“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在四年战争以后的今天，这种绝对无法预料可以说是更加绝对了。

……“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在战争第四年末的时候，这种情形已经在被资本家拖入战争的最庞大、最落后的国家——俄国完全表现出来了。而且德奥两国饥荒的扩展，衣服和原料的缺乏，生产资料的消耗，难道不证明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里也正迅速地发展吗？

恩格斯只描写过“对外”战争所引起的结果；他没有说到对内的，即国内的战争，但是历史上还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说，对外战争还可以持续一个相当时期而不致于使资本主义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那末国内战争要不引起这种结果就显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

那些继续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我们的新生活派⁷⁸、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等等一类的人，恶意地指出这种“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的表现，把一切都归罪于革命的无产阶级，归

罪于苏维埃政权，归罪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空想”，这些人是——如果不谈他们为了私利而效忠于资产阶级的话——多么愚蠢，多么没有气节。“混乱状态”——按俄文绝妙的说法就是破坏——是由战争引起的。艰苦的战争不引起破坏是不可能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条件和伴侣的国内战争不引起破坏也是不可能的。谁一“逢”破坏就离开革命，离开社会主义，那他就不过是表示自己没主见，表示自己在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罢了。

……“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

恩格斯做的这个不容争辩的结论是多么简单明了，每一个稍微能思考数年艰苦的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的人，都是很容易认识的。而那许许多多不愿意或不善于思索这个极简单的结论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可怜的“社会主义者”，又显得多么惊人的愚蠢。

数年的战争不会使军队和人民群众野蛮化，这可以想象吗？当然不能。数年的战争产生的这种后果必然要延及几年，甚至延及整整的一代。我们的那些“套中人”¹⁷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小人，都附和资产阶级，把野蛮化或为制止特别厉害的野蛮化而不得不采取的严厉手段归罪于革命，其实朗若白昼地清楚，这种野蛮化现象完全是由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任何一个革命，不进行长期斗争，不采取许多严厉的高压手段，便不能摆脱战争的这些后果。

我国《新生活报》、《前进报》²³⁶或《人民事业报》⁸³的甜言蜜语的作家，决心“在理论上”容许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存在，只要这个革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不是在经过四年帝国主义杀人战争的鲜血横流的土地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不是在被这次杀人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痛苦不堪和野蛮化的千百万人中诞生

和成长起来的。

他们也听说过并且“在理论上”承认过必须把革命比做分娩，但是一到事情临头的时候，他们就可耻地畏缩起来，他们无耻之徒的啜泣，变成了重弹资产阶级恶意攻击无产阶级起义的老调。就拿那些描写分娩情形的文艺作品来看吧，拿那些想把分娩的一切艰难、痛苦和可怕的情景真实描绘出来的作品，如艾米尔·左拉的《人生乐趣》(«La joie de vivre»)或维列萨也夫的《医生随笔》来看吧。人的诞生是会使妇女遭到极大的损失，痛苦昏迷，血流如注，半死不活。但是，如果某个“生物”竟认为爱情、爱情的结果和妇女做母亲这件事的意义不过如此而已，那末，有谁能承认这个“生物”是人呢？谁会由于这一点而拒绝爱情和生育呢？

分娩有顺产，也有难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的¹⁵⁵。恩格斯分析世界战争的种种结果时，简单明了地描写了一个不容争辩的明显事实，即紧跟着战争而产生的、同战争相连的革命（尤其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在战争时期爆发的并且不得不在包围它的世界战争时期生长和支持下去的革命）是特别困难的一种分娩。

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特别慎重地说到在世界战争中灭亡的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出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只有一个结果〈世界战争的〉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这种思想在我们所分析的这篇引言的末尾说得更加清楚：

……“在悲剧结束时你们〈资本家和地主，帝王和资产阶级国家要人〉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难产使致命病症或致命结局的危险倍增。个别的人还可能死于这种难产，但是，从旧制度中诞生出来的新社会却不会死亡，只不过是诞生得更加痛苦和更加长久，生长和发展得更加缓慢罢了。

战争的结局还没有到来，而普遍的衰竭状态却早已到来了。至于恩格斯预言的战争的两种直接结果（或者是工人阶级已经争得胜利，或者是不顾一切困难而造成不可避免的胜利的条件），这两种条件在目前 1918 年年中的时候都已具备了。

在一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已经争得了胜利。在其余的国家里，随着闻所未闻的痛苦空前加剧使这种胜利成为“终于不可避免”的条件正在形成。

让“社会主义的”小人去预报凶兆吧，让资产阶级去咆哮震怒和发疯发狂吧。只有闭着眼睛不看和堵上耳朵不听的人，才觉察不到现在世界上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已经开始分娩的阵痛了。事变进程暂时把我国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列，它现在正经受着分娩开始的第一产程特别厉害的痛苦。我们有一切根据来极坚定地 and 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因为这个未来是在为我们准备新的同盟者，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较先进的国家里的新的胜利。我们可以自豪并且深以为幸的，就是我们最先在地球的一角打倒了资本主义这只野兽，它使地球沾满了血污，它把人类引到了饥饿和野蛮化的地步，现在不论它临死时挣扎得怎样凶狠残暴，但是必然会很快地灭亡的。

1918 年 6 月 29 日

载于 1918 年 7 月 2 日

《真理报》第 133 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7 卷

第 462—468 页

工人同志们！

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决战！

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包围了。但是，它一定会战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工人群众的热情已经高涨起来，这就是胜利的保证。同时，西欧革命火焰的闪耀和爆发日益频繁，这就使我们相信国际工人革命的胜利为期不远了。

目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外敌人是英法和日美帝国主义。这些敌人现在正向俄国进攻，掠夺我国的土地，强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从海参崴推进到（如果法国报纸所载属实的话）尼科耳斯克-乌苏里斯克。这些敌人收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将领和军官。这些敌人向和平的俄国进攻，其残暴的掠夺行为同德国人在2月进攻时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英国人和日本人不仅要侵占和掠夺俄国的土地，而且要推翻苏维埃政权，以便“恢复战线”，就是说，再把俄国拖入英德间的帝国主义（通俗一点说，就是强盗）战争中去。

英日资本家想在俄国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好来共同瓜分在战争中夺来的赃物，好让英法资本盘剥俄国工农，好从他们身上搜刮几十亿国债的利息，好来扑灭已经在我国燃烧起来并且将蔓延到全世界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

英日帝国主义野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占领和征服俄国。甚至我们的邻国——德国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它进攻乌克兰的“经验”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英日帝国主义者本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他们没有成功。首先起来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接着是莫斯科的工人，然后是整个中部工业区的工人，他们愈战愈齐心，愈顽强，愈奋勇，参战的人愈来愈多。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英日资本主义强盗进攻和平的俄国时，还指望同苏维埃政权的内部敌人结成联盟。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内部敌人是谁。那就是仇视工人和劳动农民（即不愿残杀自己同胞的农民）政权的资本家、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弟。

富农暴动遍及俄国。富农疯狂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斩尽杀绝。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富农获得胜利，他们就会同地主资本家结成联盟，无情地屠杀千千万万的工人，恢复折磨工人的苦役，取消八小时工作制，使工厂重新受资本家支配。

以前在欧洲的革命中，每当富农利用工人的软弱使共和制又退到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又退到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的时候，情形都是这样。我们在拉脱维亚、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亲眼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情形。到处是贪婪残暴的富农和地主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一般贫民。到处是富农以骇人听闻的血腥手段摧残工人阶级。到处是富农和外国资本家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工人。立宪民主党人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孟什维克一直是这样干的；只要回顾一下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²⁴⁵的劳绩就够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极端愚蠢和毫无气节，也这样干，他们在莫斯科的叛乱帮助了雅罗斯拉夫里的白卫分子，帮助了喀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白匪；无怪乎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受到了克伦斯基及其朋友法帝国主义者的赞扬。

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占人口少数的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

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和平共居是不可能的：富农可以而且不难同地主、沙皇、神父讲和，即使他们互相争吵，但是永远不会同工人阶级讲和。

因此，我们把反对富农的战斗叫做最后的决战。这并不是说，富农就不会再三举行暴动，也不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就不会再三向苏维埃政权进攻。所谓“最后的”战斗，这是说，我国最后的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起来反对我们了。

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和资本家多。但是富农在人民中间毕竟占少数。

譬如，按以前的俄国来说，即在强盗们夺去乌克兰等地以前，在我们俄国约有一千五百万农户。在这一千五百万农户中，大概有一千万户是贫农，他们靠出卖劳动力过活，受财主盘剥，没有余粮，被战争的重担弄得穷苦不堪。中农大约有三百万户。富农、财主和粮食投机商恐怕不超过二百万户。这些吸血者在战争期间靠人民的贫困发了财，他们抬高粮食和其他产品的价格，积蓄了成千上万的金钱。这些蜘蛛靠因战争而破产的农民，靠挨饿的工人长肥了。这些吸血虫吸吮劳动者的血液，城市和工厂的工人愈挨饿，他们就愈发财。这些恶魔过去和现在都把地主的土地抓到自己手里，他们再三盘剥贫苦农民。

要无情地向这些富农开火！消灭他们！仇恨和鄙视那些袒护富农的党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现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工人们必须用铁拳粉碎那些同外国资本家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劳动者的富农的暴动。

富农利用农村贫民的愚昧和分散，唆使他们反对工人，有时收买他们，让他们做粮食投机生意，赚百把卢布“发点小财”（同时又

从农村贫民手里抢去成千上万的卢布)。富农极力把中农拉到自己那边去,有时也把他们拉过去了。

工人阶级根本不应当同中农决裂。工人阶级不能同富农调和,但可以设法并正在设法同中农达成协议。工人政府即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通过了并严格执行了“土地社会化”法令;在这个法令里,我们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做了许多让步。

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把粮价提高了两倍(这是几天以前的事情),因为我们完全承认,中农的收入往往和目前的工业品价格不相适应,应当提高。

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会向中农解释这点,并耐心地、坚决地、再三地向他们证明,同沙皇、地主、资本家政权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给中农带来的好处是多得无法计算的。

工人政权从来没有欺压中农,也决不会欺压他们。过去沙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不仅常常欺压中农,而且简直是扼杀他们,抢劫他们,使他们破产,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都无例外,俄国也是一样。

同农村贫民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同他们完全融合在一起;对中农让步,同中农达成协议;无情地镇压富农,镇压这些吸血鬼,恶魔,抢劫人民的强盗,利用饥荒发财的投机分子。这就是有觉悟的工人的纲领。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政策。

写于1918年8月上半月

第一次发表于1925年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
第36—39页

给美国工人的信²⁴⁶

同志们！有一个参加过俄国 1905 年革命、后来在你们国家住过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向我建议，由他带一封信给你们。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美国革命无产者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世界大屠杀的最新最强的帝国主义。正是目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主，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同意了英日野兽们为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举行的武装进攻，不管这种同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公开的还是巧妙地掩盖起来的，都是一样。

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由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斗开始的；同那些因帝王、地主、资本家瓜分夺得的土地或利润而引起的许多掠夺战争（象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较起来，这种战争是很少见的。这是美国人民反对当时压迫美国、使美国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的英国强盗们的战争；这些“文明的”吸血鬼现在同样还在压迫印度、埃及和世界各个角落的亿万人民，使她们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去了一百五十年。资产阶级的文明带来了它的美好的果实。美国在发展人类联合劳动的生产力方面，在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方面，都在自由和文明的国家中间

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曾经给世界树立过反封建奴役的革命战争榜样的美国人民竟落到了这种地步：成为一小撮亿万富翁的现代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充当雇佣刽子手的角色，为了满足可恶的富豪们的愿望，1898年在“解放”菲律宾的借口下扼杀了菲律宾，²⁴⁷1918年又在“保护”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受德国侵略的借口下来扼杀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

但是，四年的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并没有白白过去。英德两国强盗集团的暴徒们对人民的欺骗，已被不可争辩的明显事实彻底揭穿了。四年战争的结果表明，在强盗分赃战争方面，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是：谁最富最强，谁就发财最多，掠夺最多；谁最弱，谁就被掠夺、蹂躏、压榨和扼杀。

英帝国主义强盗就拥有“殖民地奴隶”数量来说是最强的。英国资本家不但没有丧失“自己的”（也就是他们在数百年间掠夺来的）一寸土地，反而掠夺了德国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侵占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扼杀了希腊，并已开始掠夺俄罗斯了。

德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的”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说是最强的，但就拥有殖民地来说是较弱的。他们失掉了所有殖民地，然而却抢劫了半个欧洲，扼杀了大批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从交战双方来看，这是多么伟大的“解放”战争！两个集团的强盗们，英法资本家和德国资本家们，同他们的走狗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投靠“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一起，多么漂亮地“保卫了祖国”！

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在地理条件上处于最安全的地位。他们发财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向自己进贡的国家。他们掠夺了数千亿美元。每

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英国和它的“盟国”、德国和它的附庸国为了共同分赃、互相“帮助”（在压迫工人与迫害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方面）而缔结的龌龊的秘密条约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得的”军事订货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血迹，都有一千万死者和二千万伤者在英国或德国强盗为争夺更多赃物、英国或德国刽子手为争先摧残世界弱小民族而展开的所谓伟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圣的斗争中所洒下的鲜血。

如果说德国强盗在军事屠杀的残暴性上打破了纪录，那末英国强盗不仅在抢劫来的殖民地的数量上，而且在玩弄卑鄙龌龊的虚伪手法上，也打破了纪录。英法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报纸对俄国大肆造谣诽谤，同时却虚伪地把自己对俄国的掠夺进攻说成“保卫”俄国不受德国的侵略！

要驳倒这种卑鄙龌龊的谎话，用不着多费唇舌，只要指出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就够了。1917年10月俄国工人刚把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推翻，苏维埃政权，革命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就公开向所有交战国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的和约，完全保持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的和约。

正是英法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正是他们简直拒绝同我们商谈全面和约！正是他们出卖了各国人民的利益，正是他们延长了帝国主义的大屠杀！

正是他们投机取巧，想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因而拒绝了和平谈判，让德国资本家强盗为所欲为，强迫俄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

很难设想，还有比英法和美国资产阶级把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归“罪”于我们的这种虚伪手法更可恶的了。恰好是可以把布列斯

特谈判变为关于全面和约的全面谈判的那些国家的资本家们，现在竟来“责难”我们！靠掠夺殖民地对各国人民进行大屠杀发了财的英法帝国主义兀鹰，在布列斯特谈判之后又把战争延长了将近一年之久，可是他们却来“责难”我们这些曾向所有国家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布尔什维克，“责难”我们这些曾经撕毁、公布并公开谴责前沙皇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罪恶秘密条约的布尔什维克。

全世界的工人，不论他们住在哪一个国家，都欢迎我们，同情我们，向我们鼓掌欢呼，因为我们打破了帝国主义联系、帝国主义肮脏条约、帝国主义锁链的铁环，因为我们不惜最大牺牲去争取自由，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虽然遭到帝国主义者的摧残和掠夺，但仍然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

国际帝国主义匪帮因而憎恨我们，“责难”我们，帝国主义的一切仆从，包括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和孟什维克在内，也“责难”我们，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些帝国主义走狗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正如同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的同情一样，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为了把政权转到工人手中，为了开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而且应当不惜任何牺牲，甚至牺牲一部分国土，甚至在帝国主义面前遭受严重失败，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谁不用行动证明他有决心为了真正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使“他的”祖国忍受最大的牺牲，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英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夺取世界霸权，不惜彻底摧毁和扼杀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到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国家。那末，社会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使全世界劳动人民摆脱资本压迫，为了争取普遍的持久和平，难道

应当因为找不到一条没有牺牲的道路就观望等待吗？难道应当因为不能“担保”得到轻易的胜利就害怕开始战斗吗？难道应当把“自己的”、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祖国”的安全和完整置于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之上吗？应当百倍地鄙视抱有这种想法的国际社会主义的无耻之徒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奴才。

英法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凶恶的野兽们“责难”我们同德帝国主义达成了“协议”。呵，这些伪君子！呵，这些混蛋，他们被“他们”本国工人对我们表示同情吓得发抖，竟诽谤起工人政府来了！但是他们的伪善面孔一定会被揭穿。他们假装不懂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本国和外国的）成立协议来反对工人，反对劳动者，另一种是为了保卫战胜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工人，为了使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对立，而同一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成立协议来反对另一种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

实际上，每一个欧洲人都清楚地了解这种差别，而美国人民，正象我就要指出的，则在自己本国的历史中特别深刻地“体验了”这种差别。协议和协议不同，正如法国人常说的 *fagots et fagots*（东西和东西不同）。

当德帝国主义强盗在 1918 年 2 月率领军队进攻赤手空拳的、把军队复员了的、在国际革命没有完全成熟就过早相信国际无产阶级会团结一致的俄国时，我毫不犹豫地和法国保皇党人达成大家都知道的“协议”。一位口头上同情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忠心为法帝国主义服务的法国上尉沙杜尔，领了一个叫德·卢贝尔沙克的法国军官来见我。德·卢贝尔沙克向我声明：“我是保皇党人，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德国失败。”我答道：这是很自然的（*cela va sans dire*）。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和德·卢贝尔沙克达成“协议”，利用愿意帮助我们的精通爆破技术的法国军官去破坏铁路线以阻止

德国人的进犯。这是每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赞同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协议”的范例。我们和法国保皇党人握手，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当中每一方都很想把自己的“伙伴”绞死。但是，我们的利益暂时是一致的。为了俄国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我们利用了其他帝国主义者同样是强盗的相反利益来反对进攻的德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俄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加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削弱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我们采用了在一切战争中都必须采用的最合理的手段：随机应变，实行退却，以便等待在一些先进国家中迅速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起来。

不管英法和美国帝国主义豺狼怎样嗥叫，不管他们怎样诽谤我们，不管他们怎样花费千百万金钱收买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和其他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报纸，如果英法军队向俄国大举进攻，我将一秒钟也不迟疑地去和德帝国主义强盗缔结这样的“协议”。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策略将得到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一句话，整个文明世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赞同。这样的策略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削弱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正在战胜国际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阵地。

而美国人民早就运用过这一策略，并给革命带来了好处。当美国人民进行反对英国压迫者的伟大解放战争的时候，压迫美国人民的还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现在的北美合众国的一部分领土在当时就是属于他们的。美国人民在争取解放的艰苦战争中，为了削弱压迫者，为了加强反对压迫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人们，为了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也曾和一些压迫者缔结“协议”去反对另一些压迫者。美国人民利用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纠纷，有时甚至和法国人及西班牙人这些压迫者的军队并肩作战，反对英国压迫者。美国人民先战胜了英国人，然后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

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一部分是赎回的)。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²⁴⁸。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宽阔、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围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滚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阵营，象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虽然少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这些老爷喜欢跟着资产阶级责难我们，说我们造成革命“混乱”，“破坏”工业，造成失业和饥荒。那些欢迎和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或同继续进行这一战争的克伦斯基达成“协议”的人们发出的这种责难是多么虚伪呵！这一切灾祸正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战争所引起的革命，不能不遭到毁灭性的反动的对各国人民进行的多年大屠杀遗留下来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责难我们“破坏”工业或造成“恐怖”，这不过是摆出一副伪善的面孔，或者是暴露出自己极其迂腐，不能了解被称为革命的那种尖锐到极点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

实质上，这一类“责难者”即使“承认”阶级斗争，也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往往陷入各个阶级的“协议”和“合作”的小市民幻想中。因为在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始终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在一切国家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没有极严重的破坏，没有恐怖，没有为了战争利益而对形式的民主实行限制，国内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甜言蜜语的牧师，不管是基督教牧师，或是沙龙的议会的社会

主义者之类的“世俗”牧师，才会看不见、不了解和感觉不到这种必然性。只有僵死的“套中人”¹⁷⁶才能因此避开革命，而不在历史要求用斗争和战争来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时以最大的热情和决心投入战斗。

美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美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继承了这种传统，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完全同情我们布尔什维克。这种传统就是十八世纪的反英解放战争，其次是十九世纪的国内战争。1870年，美国在某些方面，如果只拿某些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来说，是落后于1860年的。但如果有人根据这点而否定美国1863—1865年国内战争的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那他是多么迂腐、多么愚蠢呵！

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懂得，为了推翻黑奴制度，为了推翻奴隶主的政权，就是使全国多年进行国内战争，遭到同任何战争分不开的无穷的破坏、摧残和恐怖，也是值得的。可是现在，当问题涉及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无比伟大的任务时，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辩护人，以及被资产阶级吓倒的和回避革命的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却不能够和不愿意了解国内战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

美国工人是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他们将同我们一起，拥护反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全世界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史更加强了我的这一信念。此外，我还记起美国无产阶级最敬爱的领袖之一尤金·德布兹的话，他在给《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²⁴⁹——似乎是在1915年末——写的一篇文章《我将为什么而战》(«What shall I fight for»)里(1916年初，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一次公开的工人大会上，我曾引用过这篇文章)^①说道：

①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8页。——编者注

他，德布兹，宁愿被枪杀，也不愿投票赞成现在的罪恶的反动战争的军事拨款；他，德布兹，只知道一种从无产者的观点看来是神圣的合理的战争，那就是反对资本家的战争，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的解放战争。

威尔逊——美国亿万富翁的头子，大资本家的走狗——把德布兹逮捕下狱，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让资产阶级去残酷地迫害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吧！它愈是残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日子就会愈快地到来。

有人责难我们，说我们的革命造成了破坏…… 这些责难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中几乎摧毁了欧洲全部文化、使欧洲陷入野蛮和饥饿境地的资产阶级的走狗。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要求我们，不要在这些破坏的基础上，不要在文化的废墟中间，不要在战争造成的废墟中间进行革命，不要同那些被战争弄得粗野的人一起进行革命。请看，这个资产阶级多么人道、多么正直呵！

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 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利益而实行恐怖来反对封建主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实行恐怖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的时候，恐怖就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了！当一批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批剥削者少数而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广大的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了！

国际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战争中，即在英国和德国强盗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中杀死了一千万人，使两千万人成了

残废。

如果我们的战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战争，要在世界各国一共付出牺牲五十万人或一百万人的代价，资产阶级就会说，前一种牺牲是合理的，后一种牺牲是罪恶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现在无产阶级已经在帝国主义战争惨祸中十分清楚地领会到一切革命教导给我们的伟大真理，领会到工人最好的导师、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遗留给工人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当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感到惋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坚决彻底。

我们知道，在一切国家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疯狂反抗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种反抗将随着革命的增长而增长。无产阶级一定会摧毁这种反抗，在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斗争过程中成熟起来，最后取得胜利，取得政权。

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声喊叫我们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一直受压迫，受折磨，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会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正如我有一次指出的，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①。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声喊叫我们犯了错误，而在一百个错误后面就有一万个伟大的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显著的，是隐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绩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这些行动显得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即使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是不合事实的），即使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件工作中，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才能学会不要资本家而独立进行管理，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碍而到达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的农民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在1917年10月25日（旧历）的一个夜里一举而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并且现在不断克服着莫大的困难，自己纠正自己，实际地解决着极困难的任務；创造新的经济生活条件，同富农作斗争，保证土地掌握在劳动者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富人手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大农业。

我们的工人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现在在几个月当中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大工厂收归国有，并且日常地辛勤地努力学习管理一切工业部门的新业务，整顿国有化企业，克服保

守、自私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巨大反抗，一步一步地为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工会对其会员的新的权力奠定基础。

我们的苏维埃，远在1905年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在不要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人民群众第一次为亿万人解决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让学究们或不可救药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或议会制偏见的人们，在看到我们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时候，去摇头晃脑表示怀疑吧。这些人在1914—1918年的大转变时期既没有忘掉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民主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最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相结合，——这样的结合是不能一下子就实现的，是不能放在保守的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形式里面的。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具有特殊姿态的苏维埃共和国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并不奇怪，这个世界不是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缺的，不是象密纳发那样一下子就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的。²⁵⁰

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大书着形式上的平等和集会权利，而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的宪法却抛弃形式上平等的虚伪词句。当资产阶级共和派推翻帝制时，他们没有关心君主派同共和派的形式上的平等。当问题涉及推翻资产阶级时，只有叛徒和白痴才会极力为资产阶级争取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如果一切好房屋都被资产阶级占据着，“集会自由”对工人和农民来说就一文

不值。我们的苏维埃把城市和乡村中的一切好房屋从富人手里夺了过来，并把所有这些房屋交给了工人和农民，作为他们集会结社之用。这就是我们的劳动者的集会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意义和内容！

正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深信，不管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会遭到什么灾祸，它都是不可战胜的。

它是不可战胜的，因为疯狂的帝国主义的每一个打击，国际资产阶级使我们遭受的每一个失败，都会使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斗争，以重大的牺牲为代价受到教育，受到锻炼，造成新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

我们知道，你们美国工人同志们的帮助也许不会很快到来，因为革命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速度进行的（也不能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它近来成熟得多么快，在最近几个星期内还是不会爆发的。我们指望着重不可避免的国际革命，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就象傻瓜一样指望革命必然会在一定的短期内发生。我们国家有过两次大革命（1905年和1917年），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或协约来进行的。我们知道，环境把我们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队伍推到前面，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功劳，而是由于俄国特别落后；我们知道，在国际革命爆发之前，个别革命遭到一些失败是可能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坚信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人类不会被帝国主义大屠杀摧毁，而一定会战胜它。第一个打碎帝国主义战争镣铐的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在打碎这个镣铐的斗争中遭受了重大牺牲，但是我们还是打碎了它。我们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旗帜。

只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没有来援助我们，我们就

好象被围困在碉堡里面。但这些队伍是存在的，它们比我们人数众多，它们随着帝国主义的继续残暴而日益成熟、壮大和巩固起来。工人们正在同龚帕斯之流、韩德逊之流、列诺得尔之流、谢德曼之流、伦纳之流的社会主义叛徒决裂。工人们正在慢慢地、但一直向前地实现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毁灭的文化和正在毁灭的人类。

总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

尼·列宁

1918年8月20日

载于1918年8月22日
《真理报》第178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
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
第43—57页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政治喧嚷——占的篇幅太多了，新生活建设方面种种事实的报道占的篇幅太少了。

在谈论资产阶级的走狗孟什维克怎样实行可耻的叛变，英国和日本怎样为了恢复资本的神圣权利而发动侵略，美国亿万富翁怎样咬牙切齿地痛骂德国等等常见的、明显的、众所周知的、群众已很熟悉的现象的时候，为什么不用一二十行而要用三四百行呢？谈论这些是需要的，指出这方面的每一件新事实也是必需的，但不要写文章，不要重复，只须用几行，用“电讯体裁”来抨击那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定论的旧政策的新表现就可以了。

在“资产阶级的美好的旧时代”，资产阶级报刊没有谈过“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部情况。这种习惯作法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它。但我们还没有把它抛弃。我们报纸的风格还没有改变得适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之间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这不是指“一般的”议论、学者的评述、知识分子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

的废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考查和研究新生活实际建设的各种事实。在新经济建设中，大工厂、农业公社、贫农委员会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否真有成就？究竟有哪些成就？这些成就得到证实没有？这里有没有无稽之谈、吹牛和知识分子的诺言（“正在整顿”、“计划业已拟就”、“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现在我们可以担保”、“无疑地会得到改善”，以及其他“我们”所擅长的骗人词句）？成就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这些成就？

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散漫、涣散、肮脏、胡闹、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在哪里呢？这种黑榜还没有。然而这样的工厂是有的。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不作声地容忍这样的工厂，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废物。我们不善于象资产阶级那样在报纸上进行阶级斗争。请想想，资产阶级是怎样出色地在报刊上攻击自己的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侮辱和迫害他们的。而我们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反对那些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继续用旧眼光看苏维埃国家（替“它”做的工作要少些，坏些，从“它”那里捞的钱要多些）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吗？即使是在国营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沃和普梯洛夫等工厂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当众惩处了多少？

报刊对于这些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是用官僚式的敷衍态度，不象革命报刊，不象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关报，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来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一定会被铁拳打得粉碎。

对战争也是这样。我们是否痛斥过胆小的将领和麻痹分子

呢？我们是否向全国公开斥责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呢？我们是否“抓到了”一批由于笨拙无能、粗心大意、动作迟缓等等而应该被大张旗鼓地赶出军队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具体的坏人进行认真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很少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却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部队内部的日常生活，而这方面新鲜事物最多，最需要注意、宣扬和社会批评，最需要指责坏人坏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学习。

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检查这种新事物含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载于1918年9月20日

《真理报》第202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

第81—83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 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今天，我们举行全世界工人革命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的揭幕典礼。

千百年来，人类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尽了苦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所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的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却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工厂联合了他们，城市生活教育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言已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大屠杀的不堪言状的惨祸，到处激起被压迫群众的英勇精神的高涨，百

倍增强他们为解放而斗争的力量。

让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再三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较先进的国家的工人在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在共同的斗争中，资本的枷锁一定会被打得粉碎，社会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简要报道载于1918年11月9日

《真理报》第242号

全文第一次载于1924年4月3日

《真理报》第76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

第147—148页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 游艺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11月7日)

(热烈鼓掌)同志们,在庆祝我国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我想谈一谈肃反委员会的艰巨工作。

我们不仅听到敌人而且听到朋友常常攻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负起了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担负了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自然就难免犯许多错误,肃反委员会的错误自然就最引人注目。庸俗的知识界抓住这些错误,而不愿深入研究问题的本质。在指责肃反委员会错误的叫声中,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不善于从大处着眼提出问题。我国有些人抓住肃反委员会的个别错误,大哭大闹纠缠不休。

而我们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象在所有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问题当然不在于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工作性质;这种工作的要求是坚决、迅速而主要是忠诚。我考察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把它的工作同人们的攻击对照了一下,我说:这些攻击是一文不值的庸俗论调。这使我想起了考茨基关于专政的说教,这种说教等于是支持资产阶级。我们可以根据经验说,剥夺资产阶级是通过艰巨斗争即通过专政而实现的。

马克思说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专政。¹⁵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愈厉害，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愈疯狂。我们知道法国在1848年是怎样迫害无产者的，我们真不懂得，那些责备我们残酷的人，为什么连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都忘记了。我们没有忘记士官生在十月的暴动，我们不应该忘记正在策划中的一系列的暴动。我们必须一方面学习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一方面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芬兰的白卫军不顾自己的“民主”，无耻地枪杀工人。群众中间已经树立了必须实行专政的思想，虽然实行专政是很艰巨的、困难的。异己分子想混入肃反委员会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要用自我批评把他们赶出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在于肃反委员会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要解放群众，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其他办法。肃反委员会就是做这个工作，它对无产阶级的功绩也就在这里。

简要报道载于1918年11月9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第244号

按记录的打字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3卷
第151—152页

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今天《真理报》¹⁷ 登载了皮梯利姆·索罗金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特别注意它。这封信原来登载在《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²⁵¹，皮梯利姆·索罗金在信中声明他退出右派社会革命党¹²，并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他写这封信的动机归结起来就是，他很难指出一个自救救人的政治方案，因此他“拒绝过问任何政治”。皮梯利姆·索罗金写道：“过去一年的革命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政治家可能犯错误，政治可能对社会有益，也可能对社会有害，但科学和国民教育工作永远是有益的，永远是人民需要的”…… 信末署名：“彼得堡大学和精神性神经病研究所副教授、前立宪会议议员、前社会革命党党员皮梯利姆·索罗金”。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个人文献”。皮·索罗金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的那种真诚坦率精神，是很少见的。几乎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家在确信自己的路线是错误的以后，总是想掩饰自己的转变，冲淡它，并“杜撰”一些不相干的理由等等。公开而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皮梯利姆·索罗金说科学工作“永远是有益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方面也常会犯错误，俄国著作界中就有这种例子，一些显然不是反动的人物顽强地宣扬反动的哲学观点。从另一方面看，一位担任过人所共知的重要政治职务的名人公开声明

拒绝过问政治，这也就是政治。如果一种政治错误是对群众有影响的整个政党所犯的错误，老实地承认这种错误，对许多人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正是在目前，皮梯利姆·索罗金的这封信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它给了我们一个应该好好思索和领会的“教训”。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决定的力量，介于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经济范围的一切社会阶层，必然在这两种决定力量之间摇摆不定；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知道的真理。但是从书本上承认这个真理到能够在现实的复杂环境中根据这个真理做出应有的结论，这中间有很长的距离。

皮梯利姆·索罗金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个非常广泛的社会政治流派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流派，他们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所抱的态度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这一点已经由1917年2月以来的俄国革命事件特别有力特别清楚地证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变种，这就是该流派的经济实质和主要政治特征。先进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流派在青年时期常常是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

试问，几个月以前，是什么东西特别有力地促使这一流派的代表离开布尔什维克、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呢？现在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从仇视转为中立呢？非常明显，转变的原因有二：第一、德帝国主义的破产，这个破产是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有关的，也是跟英法帝国主义被揭露有关的。第二、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的破灭。

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原因。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遭到特别

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它不得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分开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希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了解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忍受而且必须忍受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没有受过长期罢工和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的广大劳动群众，不可能相信这一革命已经成熟，不能绝对忠于这一革命。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策略至多不过是幻想、妄想和冒险，不过是为了希望其他国家发生革命的虚无缥缈的想法而牺牲千百万人民的最明显的实际利益。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小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加爱国。

而实际情况正象我们所说的那样。

似乎是唯一的敌人的德帝国主义垮台了。似乎是“梦呓”（借用普列汉诺夫的著名用语）的德国革命成为事实了。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描绘成民主的朋友和被压迫者的保护者的英法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一只野兽；它强迫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人民接受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的条件，现在又利用“自由”共和的法美两国的军队来充当宪兵和刽子手，摧残弱小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世界历史无情地、彻底地、公开地揭穿了这个帝国主义。世界历史向那些只知道祖国的直接（并且是按旧的方式理解的）利益的俄国爱国者表明，把俄国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无法作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和美国帝国主义必然会摧毁俄国的独立和自由。

英国的谚语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近几个月来，有许多事实说明世界历史在发生极大的转变。这些事实迫使俄国小资产阶级

民主派首先从仇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转为支持，尽管由于我们党内的斗争历史养成了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使民主派爱国分子远远地离开我们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使他们不得不倒向我们的世界客观条件已经出现了。皮梯利姆·索罗金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要转变的表现。谁不善于估计和利用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蹩脚的社会主义者。

其次，相信一般“民主”万能，不了解它在效用上和必要性上都是受历史限制的资产阶级民主，——这种现象在各国保持了几十年、几百年，而在小资产阶级中间特别牢固。大资产者有丰富的阅历，他知道民主共和国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其他任何国家形式一样，不过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大资产者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真正操纵者和最深处的（因此时常是最隐蔽的）推动力有极亲密的关系。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小资产者较难懂得这一真理，他们甚至抱着幻想，以为民主共和国就是“纯粹民主”、“自由的人民国家”、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如此等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远离尖锐的阶级斗争、交易所和“真正的”政治，必然坚持这些偏见；以为只靠宣传就能在短期内根除这些偏见，那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现在，世界历史在飞快奔驰，用无比沉重的铁锤和空前巨大的危机摧毁一切习惯了旧东西，使任何根深蒂固的偏见都站不住脚。“一般民主主义者”天真地信赖立宪会议，天真地把“纯粹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立宪会议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西伯利亚和南方的经历，打垮了最牢固的偏见。威尔逊的理想化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

是最疯狂的帝国主义形式，是最无耻地压迫和摧残弱小民族的形式。一般中间状态的“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道：“我们何必要什么最高的国家形式，什么苏维埃政权！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普通的民主共和国就行了！”当然，在“通常的”比较和平的时期，这种“希望”是可以保持好几十年的。

现在，世界事变的进程，俄国一切君主派同英、法、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最严酷的教训，都实际地表明：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根据帝国主义提到历史日程上的问题看来，这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因此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要就是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上一切先进国家中获得胜利，要就是摧残一切弱小民族、复活世界反动势力并巧于利用民主共和国形式的最反动最疯狂的英美帝国主义获得胜利。

二者必居其一。

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不久以前，这种看法还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盲目无知的狂想。

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皮梯利姆·索罗金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的征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转到我们这边来，一部分仍然保持中立，一部分有意识地归附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⁴，把俄国出卖给英美资本并且力图用外国刺刀来扑灭革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首先从仇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转为支持；善于估计和利用他们的这种转变，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化、僵硬化的特性，甚至在提出这个口号的条件已经变化时还会对许多人发生作用。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不学会与它作斗争和战胜它，就不能保证党

的政策的正确。有一个时期，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断然决裂，这在历史上是必需的；当这些民主主义者投入敌人怀抱并去恢复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同他们进行尖锐的斗争是不行的。这个斗争口号现在已经完全凝固和硬化了，它妨碍我们正确地估计和适当地利用这样一个新的时机；这个民主派已经开始转变，倒向我们，这个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局势的极深刻的变化。

只是支持这个转变，友好地欢迎倒向我们这边的人是不够的。一个意识到自己的任务的政治家，如果深信这种转变具有重大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应该设法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个别阶层和集团中促成这种转变。革命的无产者必须知道应该镇压谁，应该善于同谁（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达成协议。对那些把俄国出卖给“联盟”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不实行恐怖和镇压，是荒唐可笑的。对他们采取“说服”办法，一般地从“心理上影响”他们，是十分滑稽的。但是，当局势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的时候，还一味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恐怖的策略，那是同样荒唐可笑的，甚至更加荒唐可笑的。

无产阶级到处都碰到这样的民主派。在农村，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地主，粉碎剥削者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反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牢牢地依靠半无产者，依靠“贫农”。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过去动摇，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争取动摇者的任务和推翻剥削者、战胜凶恶敌人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因为正是现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农必然转到我们方面来。

对于家庭手工业者和一般手工业者，对于具有最典型的小资

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或具有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对于许多职员、军官，特别是对于一般知识分子，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毫无疑问，我们党内往往有人不会利用他们的转变，这种不会可以克服，而且必须克服，要变不会为会。

我们在绝大多数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者中间，已经有了牢固的支柱。必须善于团结那些无产阶级性最少、小资产阶级性最多的正在转向我们这边的劳动阶层，使他们参加共同的组织，服从全无产阶级的共同纪律。目前的口号不是同他们进行斗争，而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说服动摇者，利用中立者，教育（利用无产阶级的普遍影响）那些落后的或者最近才开始摆脱“立宪会议”或“爱国民主主义”幻想的人。

我们在劳动群众中已经有了相当牢固的支柱。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害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一分钟也不放松对他们中间的可恶的怠工分子和白卫分子进行斗争。但是当前的口号是善于利用他们的转变。有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的坏人“混进”了苏维埃政权，必须赶走他们，用昨天敌视我们而今天已保持中立的知识分子替换他们，这是目前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一切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任务，也是全体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员的任务。

当然，同中农、同工人中昨天的孟什维克、同职员或知识分子中昨天的怠工分子成立协议，正如在复杂的剧烈变化的环境中进行各种政治活动一样，是需要本领的。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争取更多的东西，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过渡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般的进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进步。

前几天，我接待了信用合作社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把反对信用合作银行同共和国人民银行合并的代表大会决议²⁵²给我看了。我对他们说，我主张同中农成立协议，我非常重视合作社工作者开始从敌视布尔什维克转为中立，但是协议的基础只能是他们同意特种银行同共和国统一的银行完全合并。当时代表们更换了一个决议，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另一个决议，把反对合并的内容都删掉了，但是……但是提出了组织合作社工作者特种“信用协会”的计划，这个协会事实上同特种银行毫无差别！这是可笑的。改换字眼当然只能安慰或欺骗傻瓜。但是这样……一个“企图”的“失败”，丝毫也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我们已经实行而且还要实行同合作社工作者、同中农成立协议的政策，打破要改变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一切企图。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打几次胜仗，这些民主派就会张皇失措，散布恐慌情绪，投降“胜利者”，卑躬屈膝地迎接他们。当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即使现在，只要英、美、克拉斯诺夫白卫分子获得局部性的胜利，他们也还会动摇起来，张皇失措，更多地散布恐慌情绪，实行叛变，倒向帝国主义等等。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所奠定的、得到半无产者支持的苏维埃政权的纯粹无产阶级基础，永远是牢固的。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我们的军队不会惊慌，我们的部队不会动摇。但是，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深刻的变化使得非党的、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派必然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而且一定要学会利用这一转变，支持这一转变，在一定的集团和阶层中促进这一转变，尽一切可能同这些分子达成协议，从而促

进社会主义建设,减轻由于困苦、愚昧、无能而造成的困难,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写于1918年11月20日

载于1918年11月21日

《真理报》第252号

署名:尼·列宁

按报纸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

第167—175页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²⁵³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Wien, 1918, Ignaz Brand, 共六十三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象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主义者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摆在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的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战争一开始后,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1914—1916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²⁵⁴和《共产党人》杂志²⁵⁵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曾收集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反潮流》(著者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1918年彼得格勒版,共五百五十页)一书中。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1915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就是说,变成承认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学说,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俄国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

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关于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⁵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①（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虚伪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

^① 见本选集第2卷第680页。——编者注

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①

最后，我在1917年8月和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中，我特别谈到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变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②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他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作了机会主义的歪曲，这种歪曲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作了详细的揭露。

这几点预先说明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和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 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

^① 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808—81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4页。——编者注

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是这样提问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3页）。

我们要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¹²称为社会主义者，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即根据字眼，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了解 and 运用马克思主义呵！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关于“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的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斯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象个一味背诵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硬是背朝着二十世纪，面向着十八世纪，在许多章节中千百次枯燥无味地反复咀嚼着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君主专制、同中世纪制度的关系的滥调！

真是象在梦里嚼树皮！

这根本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11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是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

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拚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们的这位废话专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六十三页中的二十页，来大谈其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是很愿意听的，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终究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正在于此，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第二十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六十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这样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¹⁵²

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木箱，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

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四十年间，考虑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经验时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大战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突飞猛进，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20页）

我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任何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严肃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下个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清楚而直接。考茨基却不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不愿意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谁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间的民主，即对奴隶主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没有。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虚假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给专政下定义。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话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象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

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指出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法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爱从二十世纪转向十八世纪，又从十八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空论专制以避免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骗子的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木箱”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实质上同这一样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象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的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

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象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二十一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象“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所谓“状态”同“管理形式”有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我们竟必须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谈论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粗糙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分明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²⁵。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怎样可怜的遁词。

遁词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和平变革，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不是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制度，而有些在这方面是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具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伪造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的回答便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稍微知道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序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没有这种制度！（而现在，这种制度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他说：“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拚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无耻地伪造历史，竟“忘记了”一件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制度。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问题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遁词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第21页），“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

考茨基的这个论据，异常荒唐可笑，真使人感到有 *embarras des richesses*（驳不胜驳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去了。在凡尔赛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说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都参加了公社是造谣。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营垒，

其中一个营垒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积极的资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全民投票”的“纯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吗？

第二、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既然法国的命运决定于巴黎，怎能谈得上“纯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当马克思认为公社没有夺取属于全法国的银行是一个错误的时候²⁵⁶，难道他是从“纯粹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出发的吗？？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们“聚众”发笑的国家里写书，不然考茨基真是会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纯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估计：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²⁵⁷

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法国以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

够了，要把考茨基的谬论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

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¹¹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曾经消灭军队和官吏制度，消灭议会制，破坏“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傻头傻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

难怪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8月4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一具臭尸了！

遁词三。“如果我们说专政是管理形式，我们就不能说阶级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是“组织”或“政党”。

“糊涂顾问”先生，你糊涂了，你糊涂透了！专政不是“管理形式”，说专政是管理形式，这是可笑的胡说。马克思讲的并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阶级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对的；这种废话，只有除了资产阶级议会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执政党”什么也不注意的“议会迷”才说得出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让考茨基看到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例子，例如中世纪的地主便是这样，虽然他们的组织程度还不够。

总之，考茨基史无前例地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卑鄙地空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既然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概念作了这样的“解释”，使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消失了，他也就是在对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斯坦同

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是个后生小辈了。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弄得一塌糊涂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的论调，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蔽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

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表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见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¹⁰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必须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²⁵“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见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²⁵⁸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¹⁰⁵（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咀嚼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加了着重号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普

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 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¹²³（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其中每一个论点都在打他的嘴巴，揭发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连了解这些真理的影子都没有。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处处可以看见每个诚实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象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的、最带共和色彩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呵，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无耻。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但这是事实！在公元1918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象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象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象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无耻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颂扬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

的这本小册子第十五页。而在第十六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甚至把十八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²⁵⁹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呵！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无微不至呵！呵，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呵！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用犹大的接吻²⁶⁰奖赏他，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十八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对国际主义者的残害，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横加残害。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残害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²⁶¹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的英国的爱尔兰和阿尔斯特事件²⁶²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以及策划对布尔什维克的残害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二十世纪的这些事实，而向工人讲述十八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

(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1912—1914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象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历史局限性和条件性**。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准备群众进行革命，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正是对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象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 and 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侵略战争和签订“分割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分割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结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看不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看不到。在资产阶级民

主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著，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感触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财富特权，资产阶级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千万座好房子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紧张而又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

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受盖满灰尘的资产阶级书籍蒙蔽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一般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象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大厦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会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哪怕是找到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的人，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而不是对富人的民主，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感触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

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了解每个工人都了解的这一明显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或“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象夏洛克¹⁵⁶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1)“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14页)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必须说：剥削者必然要把

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是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必须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一般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2）“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 21 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噜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第 22 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现在我们不妨

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¹³¹……

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²⁵⁷……

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必须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²⁵……

考茨基和马克思、恩格斯，正如自由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也就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和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

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是骗人的和虚伪的）当做事实上的平等！小事情！

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但它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代代又受教育，又过富裕生活，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惶恐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丰富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

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严重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向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拚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到处诉苦，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

全……就象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拚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呵！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象奥吉亚斯的牛圈²⁶³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 * *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害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和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做《反对布尔什维克》，那末，小册子的名称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接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给自己的小册子加了这样的标题：一般《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六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显了原形，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不应该谈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应该谈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

不能既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也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应该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及其发展的特殊道路。这一点我将在以后说明。预先就担保说，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全部或大部分一定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限制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全部或大部）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各样的话，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话。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的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 * *

现在我们来谈谈俄国革命的经验，谈谈导致解散立宪会议和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和立宪会议之间的分歧。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一个著书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真正研究过这个现象（而不是象重弹孟什维克老调的考茨基那样重复小资产阶级对专政的哀怨），就会先给专政下个一般定义，然后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苏维埃，并把苏维埃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加以评述。

既然考茨基对马克思的专政学说作了一番自由主义的“加工”，当然不能期望他会说出什么有重大意义的东西。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样研究什么是苏维埃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十分有意义的。

他在回想1905年苏维埃的产生时写道：苏维埃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所有组织形式中最能包罗一切的(umfassendste)组织形式，因为它包括了全体雇佣工人”(第31页)。1905年苏维埃还只是地

方团体，而在1917年却成了全俄国的联合组织。

考茨基继续说：“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还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要反对金融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原文为 *versagen*；这个德文词的意思介于“不够”和“无力”之间，比前者稍强，比后者稍弱）。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产生一些任务，用这种方法不能解决，而只有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实力手段集中起来，才能顺利解决。”（第32页）

接着他谈到群众罢工，谈到“工会官僚”同工会一样是必要的，但它“不适于领导那些日益成为时代标志的强大的群众战斗”……

考茨基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指新历，按我国旧历为10月）革命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消灭了俄国人民在3月（指新历，按我国旧历为2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与此相适应，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第33页，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

凡是看过俄国孟什维克著作的人，立刻会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样盲目照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施泰因之流的言论。正是“盲目”照抄，因为考茨基为了迎合孟什维克的偏见，竟把事实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顾到向他的情报员，如柏林的施泰因或斯德哥尔摩的阿克雪里罗得打听一下，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人和苏维埃作为国家组织的意义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做了这样简单的查问，他就不会写出这段令人发笑的话来，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提出

的，例如我的1917年4月4日的“提纲”^①就提出过，就是说，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更不必说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了）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来的考茨基的这段议论，就是整个苏维埃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于苏维埃是应该力求成为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已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年同月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又声明他们不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满足，他们要求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工农共和国），或者不应该力求这样做，不应该夺取政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而应该照旧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马尔托夫就是这样说的，他是用天真的愿望来粉饰这样一件事实：在孟什维克领导下苏维埃是使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复马尔托夫的话，抓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理论争论中的片断，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将这些片断搬到一般理论问题、一般欧洲问题上去。结果弄得一团糟，使俄国每个觉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议论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们向欧洲所有的工人说明事实真相，考茨基也一定会遭到他们（除了极少数顽固不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同样的嘲笑。

考茨基象熊那样给马尔托夫帮了倒忙²⁶⁴，十分明显地把马尔托夫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请看考茨基究竟说了些什么。

苏维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要反对金融资本，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苏维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① 见本卷第13—18页。——编者注

好极了。“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是不是要解决这两个阶级中哪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呢？

决不是。根本不是。

在“决”战中，包括全体雇佣工人的苏维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

国家是什么呢？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总之，被压迫阶级，现代社会中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应该努力去进行“资本同劳动的决战”，**但不应该触犯资本用来镇压劳动的机器！不应该摧毁这个机器！不应该用自己的包罗一切的组织来镇压剥削者！**

考茨基先生，好极了，妙极了！“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就象一切自由派承认它那样，就是说不要推翻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里，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已经很明显了。这实际上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什么都会允许，就是不允许受它压迫的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在这里，考茨基已经完全无法挽救他那调和一切、用空话搪塞各种深刻矛盾的立场了。

考茨基或者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或者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事实都是十分明显的。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²⁶⁵。现在，一个妄想继续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起

来并同资本进行“决定性斗争”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²⁵⁸，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这是资产者也“同意”的，既然工人反正都要斗争，那就只好设法挫折他们的剑锋了），——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谁真正同意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谁多少考虑过这个真理，谁就决不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说什么能够战胜金融资本的无产阶级组织不应当变成国家组织。正是在这一点上显出了小资产者的原形，在小资产者看来，国家“终究”是一种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可以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去同那不仅统治着无产阶级而且统治着全体人民、全体小资产阶级、全体农民的资本实行决战，却不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把自己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呢？因为小资产者害怕阶级斗争，不能把它进行到底，进行到取得最主要的东西。

考茨基完全糊涂了，他充分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你们看，他亲口承认，欧洲正去迎接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而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因此？……

考茨基不敢进一步去想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因此，只有反动派，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只有资产阶级的走狗，才会在现时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空谈纯粹民主，把脸朝着陈旧的过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

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拿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别可笑的窘境，因为他重复马尔托夫的论据，却没有觉察到马尔托夫的这个论据是以考茨基所没有的另一个论据为依据的！马尔托夫说（而考茨基则跟着他重复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社会主义，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把苏维埃从斗争机关变为国家组织，为时尚早（应读作：在孟什维克领袖们帮助下，把苏维埃变成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机关，倒是适时的）。而考茨基却不能公开说，欧洲还没有成熟到社会主义。考茨基在1909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写道：现在不能害怕过早的革命，谁害怕失败而拒绝革命，谁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接否认这一点。结果得出了一个把小资产者的愚蠢和怯懦彻底暴露出来的谬论：一方面，欧洲已成熟到社会主义，正在走向资本同劳动的决战；而另一方面，战斗组织（即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组织），被压迫者的先锋队、组织者和领袖无产阶级的组织，却不能变成国家组织！

* * *

苏维埃作为战斗组织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变成国家组织这一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比在理论方面还要荒谬得多。甚至在没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寻常的斗争热情，也会使资产阶级经常搬出他们的老一套，说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

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象苏维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劳动的贫苦的农村居民的组织，由于斗争的进程，由于简单的攻守“逻辑”，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想站在中间立场，“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在俄国，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说教已经遭到破产，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苏维埃稍微广泛地发展起来，能够联合并巩固起来，这样的说教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破产。对苏维埃说，斗争吧，但不要亲自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不要变成国家组织，这就是宣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要是以为在剧烈的斗争中，这种立场除了可耻的破产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那就很可笑了。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他装做在理论上完全不同意机会主义者的样子，其实他在实践上，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方面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问题。他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这部著作满篇都是指责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民主”（见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话）。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经实际地摆在革命面前了。现在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考察这个问题的。

他引用了我所写的发表在1917年12月26日《真理报》¹⁷上的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①。这似乎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讨论问题的最好证明了。但是，请看考茨基是怎样引证的。他没有说这个提纲有十九条，没有说这个提纲既提出了有立宪会议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分歧的历史问题。所有这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谈，他只简单地对读者说，“其中〈在这个提纲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但在立宪会议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五条）；二、一般说来，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三条）。

考茨基只完整地引用了这个提纲第三条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论点：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有立宪会议这一花冠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②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普通”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

“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占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象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① 见本卷第 377—381 页。——编者注

^② 附带说一下，考茨基多次引用了“最无痛苦地”过渡这几个字，大概他想借此来讽刺一下。可是他用的方法不中用，所以在几页之后，他就作假，把引文伪造成“无痛苦地”过渡！当然，用这种方法把荒谬的话加到论敌身上是不困难的。作假也能帮助从实质上回避论据，只有把全体贫农组织起来（成为苏维埃），只有国家政权的中坚（无产阶级）帮助这种组织，才有可能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考茨基的书第三十一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占少数之后凭空想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了巴·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1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²⁶⁶（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⁵⁶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①。

既然如此，那末考茨基硬要德国读者相信：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占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该叫做什么呢？有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②难道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要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书谈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巴·阿克雪里罗得这班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用自以为客观的态度来掩盖他给那些因失败而不满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49页。——编者注

② 附带说一下，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谎话是很多的！这是心怀愤恨的孟什维克的诽谤性的小册子。

但这只是花朵。果实还在后面哩。

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在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这个问题上的决议和声明的译文。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三十页上是直接提到我的1917年12月26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呢？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三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二条。

第二条是：

“革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着重号是我加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这样避开了理论问题。

说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共和国低于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共和国，这对不对呢？这就是问题的中心，而考茨基却避而不谈。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所说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记了”。他还“忘记了”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特别明白易懂地表达了马克思的相同的思想：“巴黎公社已

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²⁵

请看，这就是第二国际最卓越的理论家，他写了专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书，专门谈到了曾经直接地多次地提出比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国家形式问题的俄国，却闭口不谈这个问题。这实际上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附带说一下：在这里，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国孟什维克跑的。在孟什维克中间，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引文”的人，多得不可胜数，然而从1917年4月至1917年10月，再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竟没有一个孟什维克作过一次尝试去研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只好默不作声吧。）

很明显，同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主要问题即巴黎公社类型国家问题上却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谈论解散立宪会议，简直是对牛弹琴。只要在本书附录中把我的关于立宪会议问题提纲全文刊印出来就够了。从这个提纲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1917年12月26日就已从理论上、历史上和政治实践上提出来了。

既然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他也许会作为历史学家来考察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斗争的问题。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即使作为历史学家也离开了真理，忽视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成了一个逢迎献媚的奴才。他想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曾怎样试图缓和同立宪会议的冲突。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要否认的；现在我把提纲全文刊印出来，提纲

上明显不过地写着：盘踞在立宪会议中的动摇的小资产者先生们，或者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或者是我们“用革命手段”战胜你们（提纲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向来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

考茨基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的。在我的提纲内屡次明白地说过，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见提纲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形式主义的民主观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考茨基也许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是一个阶级的机关。但是现在考茨基需要（为了进行背弃革命的卑鄙勾当）忘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提出俄国立宪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关的问题。考茨基不分析具体环境，不愿看看事实，根本不向德国读者说：我的提纲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提纲第一条至第三条），不仅谈到了使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提出的名单同1917年12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具体条件（提纲第四条至第六条），而且谈到了1917年10月至12月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提纲第七条至第十五条）。我们根据这段具体历史得出了结论（提纲第十四条）：“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⁴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

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历史学家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听说过，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立宪会议的阶级内容问题，在我的提纲中已经直接提出和解决了。也

许我解决得不对。假使有人对我们的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来不应该写些十足的蠢话（这种话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说有人在阻碍批评布尔什维主义，而应该进行这种批评。可是问题正在于考茨基没有进行这种批评。他甚至没有提出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因此，无法同考茨基展开争论或辩论，只好向读者表明：为什么只能把考茨基称为叛徒。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有它的历史，这个历史，甚至是不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回避的。考茨基连这个实际历史也不愿涉及。他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现在只有心怀恶意的孟什维克才隐瞒这个事实）：苏维埃即使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在1917年2月底至10月，也是同“全国的”机构（即资产阶级的机构）有分歧的。实际上，考茨基所持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的观点；不管考茨基怎样否认；但他的这种观点终究是一个事实，这已经为他的整本小册子所证实了。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这就是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干过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资格的分子”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1917年2月至10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件事实，历史学家考

茨基把事情说成似乎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企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经验，才使人民相信这些企图一定会落空，才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象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连续不断的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是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的焦点和中心。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1917年2月28日（旧历）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了两次代表俄国绝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更不用说许许多多县、市、省、区域等地方代表大会了。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召集一个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⁸¹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⁷³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年1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年10月）¹⁸⁶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会²⁰²，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

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可见，单是苏维埃外表上的历史，就表明了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表明了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人数	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人数	布尔什维克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	675	343	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	710	434	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	1 232	795	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	1 164	773	66%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象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苏维埃宪法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这种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预先说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

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峙，进行种种阴谋活动来反对它。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仇视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资产阶级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切造成了从苏维埃中正式排除资产阶级的情况。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唾弃历史事实和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地……甜蜜、天真，如果这话是小孩说的，倒很可爱，但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蠢才的人说出这种话来，就不免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33页）……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一般从实际生活的观察中清楚地知道，竟有那种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意志的资本家和地主。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34页及其他许多页）。

呵，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你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象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

不是以果戈里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²⁶⁷的态度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根据“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象“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傻头傻脑地把组织都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反革命暴动并且付给怠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做合法的“反对派”。呵,多么深奥的思想呵!

考茨基只是对问题的形式的法律的方面感到兴趣,所以你一读到他对苏维埃宪法发表的议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尔的话来:法律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考茨基说:“实际上,单把资本家变为无权的人是不行的。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有产者吗?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进步、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也会使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三大部门中从业的人及其家属,属于职员和雇佣工人这一类的约有三千五百万人,属于独立经营者这一类的有一千七百万人。可见,党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可以成为多数,但在全体居民中间则占少数。”(第33页)

这是考茨基的典型议论之一。这难道不是资产者反革命的抱怨吗?考茨基先生,你明明知道,俄国极大多数农民不雇用工人,因而也没有被剥夺权利,你为什么把全体“独立经营者”都算做没有权利的人呢?这难道不是捏造吗?

你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引用你所熟悉的、1907年德国同一个统计关于农业中各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数字呢?你为什么不把表明剥削者有多少、表明剥削者在“农户”总数中只占少数的德国统计材料,给那些读你的小册子的德国工人看看呢?

这是因为你的叛徒立场使你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

媚的奴才。

你们看，资本家原来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于是考茨基在好几页上攻击苏维埃宪法的“专横”。这位“严肃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其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律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解释法律的书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呵，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的意义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一般农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纯粹。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了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被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炽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所有的喝血的匪帮，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

就跑出来狂吠什么“专横”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聪明的老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的1918年4月28日的演说^①中引了一句话：……“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于是“纯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大概每个选民会议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达到了最高的程度。”（第37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巧看见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勤勉工人就大喊大叫，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一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个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

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尊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傻头傻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温和适度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们这位极其博学的犹大什克·果洛夫廖夫²⁶⁸义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说，1918年6月1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代表们从苏维埃内开除出去。义愤填膺的犹大什克·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了某种罪

^① 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本卷第493—529页。——编者注

行的某些个人…… 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的不受侵犯权。在这里，从苏维埃内开除出去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 37 页)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的确是不可容忍地抛弃了纯粹民主，而我们这位革命的犹大什克·考茨基就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规则干革命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应该先答应给萨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恩²⁴²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派”²⁶⁹)以不受侵犯权，然后再制定刑法，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应受惩治”，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有权根据这种刑法并依照“纯粹民主”把“某些个人”从苏维埃内开除出去。不言而喻，通过萨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恩之流，或依靠他们的鼓动，从英法资本家手里领取金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帮助之下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在我们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安然坐在那里，并且会象最纯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反对派”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的人们的选举权，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愤。他写道：“有一个帮工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第 36 页)

这是多么背弃“纯粹民主”呵！这是多么不正义呵！固然，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小业主是最没良心和最贪婪地剥削雇佣工人的人，但犹大什克·考茨基所指的，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谁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某些个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剥削者。人们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考

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纯粹”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赫特臆造出来而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他以被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者”剥夺了最后一文钱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节俭的阿格尼斯”）为例。有一个时期，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赫特的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倍倍尔还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说，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²⁷⁰；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有一个帮工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任何一个选举大会”，象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只要他（作为例外）不是剥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相信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与其冒险让工人欺侮“节俭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给一切雇佣工人的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 *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①欢迎的卑鄙的叛徒坏

^① 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²⁷¹（1918年10月22日第293号）的社论。这篇社论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十分满意。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²⁷²在一篇专论上说，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

蛋去痛骂我们的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的苏维埃宪法吧。这样很好，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压迫阶级群众，革命无产者的觉悟的忠实的领袖，一定会赞成我们。只要让这些无产者和这些群众知道了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们立刻会说：这才真正是**我们的人**，这才真正是工人政党，真正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象上述一切领袖们欺骗我们那样用改良的空话欺骗工人，而是真正同剥削者进行斗争，真正实行革命，在实际上为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既然苏维埃在一年的“实践”之后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这些苏维埃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卖身给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既然这些苏维埃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不是小资产阶级同资本家妥协的机关，不是进行议会空谈（如考茨基、龙格和麦克唐纳之流的空谈）的机关，而是同剥削者作你死我活斗争的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几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书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以便声讨这个早已成了“臭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 * *

考茨基先生在书末（第61页和第63页）痛哭流涕地说：“新理论〈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不敢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象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也找到了拥护者。”“如

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论”，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群众在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教训，日益讨厌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们”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们却忽然要拒绝它！

“我们”，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看做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¹⁵⁰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中，任何人都会看到，只有这种观点才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国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论，他们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议会制，抹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贯彻到底。

“我们”对资产阶级说过：你们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谈民主，同时却到处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们抓住你们的话，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使群众作好准备去进行革命，打倒你们这些剥削者。如果你们剥

削者企图反抗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无情地镇压你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和还要说的话，这就是被压迫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同我们在一起的原因，也是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

什么是国际主义？

考茨基极端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他宣布谢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既然为孟什维克辩护（他没有公开说支持他们，但是完全宣扬他们的观点），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国际主义”是哪一类货色了。考茨基不是单一个人，而是在第二国际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一个流派（法国的龙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诺勃斯、格里姆、格拉贝和奈恩，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等）的代表，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强调孟什维克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得会议³⁴（这无疑是一张文凭，不过……这是一张陈腐的文凭），并且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维克观点描述如下：

……“孟什维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接受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依照这个观点，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备战状态。布尔什维克却要求无论如何要立刻媾

和，必要时准备单独媾和，他们为了力图强迫实现这一点，而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第 27 页）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而应该满足于立宪会议。

总之，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就是：向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要求改良，但在所有交战国没有接受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以前，继续支持这个政府，继续支持它所进行的战争。无论屠拉梯分子也好，考茨基分子（哈阿兹等）也好，龙格之流也好，都屡次表示过这种观点，他们说：我们是主张“保卫祖国”的。

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不善于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区别开来，这是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十足的糊涂观念。从政治上说，这是用市侩民族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是转到改良主义方面，背弃革命。

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认“保卫祖国”就是为现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不管此刻敌军是在我国境内或在他国境内，这次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论是在君主国或在共和国），既然如此，那末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强盗资产阶级，就是完全叛变社会主义。在俄国，即使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争也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进行这个战争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前沙皇同英法资本家订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孟什维克把这次战争称为防御的或革命的战争，就是厚颜无耻地欺骗人民，而考茨基赞同孟什维克的政策，就是赞成欺骗人民，赞成小资产者愚弄工人，把工人束缚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车上，来为资本效劳。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并向群众灌输这种荒谬思想。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

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比较，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找到阶级的现实。要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依靠骗子、空谈家或市侩庸人提出一些甜蜜的“口号”，只有实际打倒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这次战争有千丝万缕的（甚至千绳万索的）经济联系的阶级，只有真正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起来掌握政权。不然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和平。

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对外政策，宣布这个政策是国际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的政策，第一、这样他就充分暴露了齐美尔瓦尔得多数，即机会主义多数的腐朽（难怪我们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当时就同这个多数分开了！）；第二、——这是最重要的——考茨基从无产阶级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立场，从革命的立场转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

无产阶级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争取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例如在1909年写《取得政权的道路》的时候，他坚持的正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这一思想，他说过革命纪元正在临近。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直接而明确地指出，德英两大集团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次战争果然在1914年爆发了）将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可是当1918年由于战争而爆发革命的时候，考茨基却不去说明革命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彻底考虑革命的策略以及准备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策略叫作国际主义。难道这不是叛徒行径吗？

考茨基赞扬孟什维克主张军队保持备战状态，责备布尔什维

克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这也就是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因为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保持备战状态，就意味着而且实际上就是保持资产阶级（虽然是共和派资产阶级）指挥的军队。大家知道，而且事变的进程也明显地证实，这个共和派军队由于保留了科尔尼洛夫的军官而保持了科尔尼洛夫的精神。资产阶级的军官不能不是科尔尼洛夫派的，不能不倾向于帝国主义，倾向于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照旧保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基础，保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基础，修补细节，粉饰小事（“改良”），——孟什维克的策略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顽固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顺从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同时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在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了的：“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¹⁴² 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²⁷³。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纯粹是胆小的市侩对此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在艰苦的内战中逐渐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和巩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

基却忘记了这一点。

既然考茨基赞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么权利称谢德曼分子为“政府派社会主义者”呢？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加入他的内阁，也就同样是政府派社会主义者了。只要考茨基试图提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统治阶级的问题，他就绝对回避不了这个结论。然而考茨基避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提出的关于统治阶级的问题，因为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叛徒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这样推论说：社会主义是以民族平等自由、民族自决为前提的，所以当我们国家遭到进攻或者敌军侵入我国领土时，社会主义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保卫祖国。从理论上讲，这种推论或者完全是侮辱社会主义，或者是骗人的遁辞；而从政治实践上看，这种推论同那些对战争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对革命政党在反动战争期间的任务连想也不会去想的十分无知的庄稼汉的推论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还一般地反对对人使用暴力。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对民族使用暴力的问题也是这样。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战争的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问题。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

战争。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计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种估计。谁不这样看战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威廉统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统治下的法国人说，敌人侵入了我国，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义务保卫祖国，那末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推论，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推论，不是革命无产者的推论，而是市侩民族主义者的推论。因为在这种推论中，工人反对资本的革命阶级斗争不见了，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着眼对整个战争的估计不见了，就是说，国际主义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偏狭的顽固的民族主义。我国受欺凌了，其他一切我都不管——这就是这种推论的结论，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这正象一个人看到对个人使用暴力，就说：社会主义是反对暴力的，因此，我宁可叛变，也不坐牢。

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说：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就要起来自卫，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因为这种人只看见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看得高于一切，而没有考虑到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锁链的一环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市侩和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正是象考茨基派、龙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那样推论的：敌人进入我国了，其余一切我都不管^①。

^① 社会沙文主义者（谢德曼之流、列诺得尔之流、韩德逊之流、龚帕斯之流等等）在战争期间根本不谈“国际”。他们认为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赞成本国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市侩和平主义者）表现出一切“国际主义的”情感，奋起反对兼并等等，但实际上继续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两类人的差别很小，正象凶言恶语的资本家和花言巧语的资本家的差别一样。

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个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末一切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的唯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观点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伶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推论。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当考茨基从赞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国的哈阿兹派）的策略转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时，他的叛徒行径就更加明显了。请看他的批评：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欧洲普遍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既然这样假设，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使俄国人民遭受多少苦难，损失（原文是 *Verstümmelungen*，即残缺或割裂）多少领土，以及将怎样解释民族自决，当然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成为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的手段。

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设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

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种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这究竟是要谁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行动负责呢?”(第 28 页)

往下考茨基再三补充说,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所期待的革命的来到估计错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第 29 页),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革命这一张牌上”。

我们故意摘引这样长的一段话,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怎样“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用卑鄙的反动的市侩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

第一、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使用的手法。如果布尔什维克真是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那当然是愚蠢的。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蠢事。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①中直接排斥了这种愚蠢思想,我说,我们指望美国革命,但并不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²¹¹论战的时候(1918年1月至3月),屡次发挥了这种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小小的……很小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面的。考茨基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内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捏造!

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

^① 见本卷第 586—599 页。——编者注

个革命的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须采取的，其所以必须，因为只有这种策略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估计了战争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客观情况，只有这种策略才符合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考茨基用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可能犯但并没有犯的一种错误的小问题，偷换了关于整个革命策略的基础的大问题，从而安然无事地背离了整个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论上甚至不能提出关于革命策略的客观前提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点。

第二、如果欧洲有革命形势存在，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指望欧洲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势时和没有革命形势时是不能一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他就会看到，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反对他的。在战前很久，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欧洲战争一定会造成革命形势。当考茨基还不是叛徒的时候，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明确地承认过这一点。用整个第二国际的名义发表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难怪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即动摇于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中派”）都象害怕火一样，害怕巴塞尔宣言中有关的声明！

可见，期待欧洲革命形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痴心妄想，而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见。考茨基大谈布尔什维克“向来相信暴力和意志的万能”，以此来回避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正是用无聊的空话来遮盖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势问题的可耻行为。

其次，革命形势是不是真正到来了呢？这个问题考茨基也没

有能够提出来。经济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在各地造成的饥荒和经济破坏，这就是革命形势。政治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15年起，在所有国家里清楚地显露出陈旧腐朽的社会党分裂的过程，无产阶级群众离开社会沙文主义领袖向左转，转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绪、革命领袖方面来的过程。

1918年8月5日考茨基写他的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只有害怕革命、叛变革命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些事实。现在呢，在1918年10月底，大家都看见，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在极迅速地发展。希望人家照旧把他看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分近视的庸人（象1847年的被马克思所讥笑的庸人一样），看不见日益迫近的革命！！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点。

第三、在欧洲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革命策略有什么特点呢？变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这个问题。考茨基象一个典型的庸人市侩或无知的农民那样推论：“欧洲普遍革命”来到了没有呢？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正象现在有时混进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队伍里的坏蛋一样）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考茨基丝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侩的地方，在于他有本领向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说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

考茨基把谬论加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指望欧洲革命将在一定时期内到来，而把一切都押在这一张牌上。这种谬论正是

反对考茨基自己的，因为从他的话里正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欧洲革命在1918年8月5日以前到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正确的了！考茨基指的正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日子。而在8月5日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出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正在到来，于是考茨基的全部叛徒行径，他伪造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行为，他在用革命观点推论问题、甚至用革命观点提出问题方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无遗了！

考茨基写道：有人责备欧洲的无产者叛变，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你错了！你拿镜子照一照，就会看到这个矢所对准的“的”究竟是谁。考茨基做出天真的样子，假装不知道，是谁在这样责备，这个责备又是什么意思。其实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国的“左派”，斯巴达克派³⁵，即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在责备，而且现在还在这样责备。这种责备表示一种明确的认识：德国无产阶级扼杀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斯兰，也就是背叛了俄国的（和**国际的**）革命。这首先和主要不是责备一向受压抑的**群众**，而是责备谢德曼和考茨基这类**领袖**，因为这些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的天职，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反对群众的保守心理，因为这些领袖的活动实际上**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永远蕴蓄着的革命本能和志向。谢德曼分子公开地、粗暴地、无耻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考茨基派和龙格派也是这样干的，不过他们犹豫动摇，畏首畏尾地望着此刻强有力的人物。考茨基在战争期间写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发扬革命精神，而是扑灭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责备”欧洲无产者出卖了俄国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这一

点简直可以成为德国正式社会民主党“中间”领袖的市侩愚钝的历史纪念碑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书报检查条件下，这种“责备”几乎是没有什么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能用来号召德国工人的唯一的形式，他们号召德国工人抛弃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睬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

考茨基不了解这一点。他哪里能了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呢？能不能指望一个根本背弃革命的人会权衡和估量革命在一种最“困难”场合的发展条件呢？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只保卫“自己”祖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对其余一切加以“唾弃”的狭隘民族主义愿望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的（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认的）估计上面。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大量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这决不是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功劳，而是由于各地群众对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有具体的，实践上的不同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彻底粉碎了谢德曼和考茨基、列诺得尔和龙格、韩德逊和麦克唐纳之流的陈旧腐朽的国际；现在这些人梦想“统一”，使死尸复活，可是步调不一，互相妨碍。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第三国际的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

无产阶级的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计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计到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经验。

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先从拉丁文译成俄文，以后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经验、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组织习惯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整整一年内，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更高更广得不可计量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创造活动。

布尔什维主义在实际上强有力地促进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是迄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没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日益清楚地看到，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没有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制，这种策略不能成为供世界各国效法的模范；同时，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

不仅全欧洲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在成熟着，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则帮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能作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个国家，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就假设世界帝国主义通过德帝国主义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勾结，明天摧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就假设没有这种最坏最坏的情形，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

上面已经说过，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做《附和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理论”，就是说，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旧歪曲（即1905年被考茨基驳倒的歪曲！），现在又被我们这位理论家捡了起来。不管这个问题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枯燥无味，我们还是得谈一谈。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以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可见，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说，这是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束缚”。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同一般农民的联合，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布尔什维克当时就补充说，接着是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我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①一书，重新刊载于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

1905年考茨基间接参加了这次争论，他就当时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询问，发表了实质上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结果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刊物上的特别讥笑。现在考茨基只字不提那时的争论（害怕他自己的话揭露他自己！），从而使德国读者根本无法了解问题的实质。考茨基先生在1918年不能告诉德国工人，他在1905年曾怎样主张工人要同农民联合，而不要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他当时根据什么条件维护过这种联合，他为这个联合拟定了什么纲领。

开了倒车的考茨基，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傲慢地大谈“历史唯物主义”，为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引证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来反复咀嚼孟什维克的陈旧的自由主义观点；同时又用引文证明关于俄国落后的新思想，从这种新思想得出的却是旧结论，其精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应该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这根本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较1789—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说的一切²⁷⁴！

谈到考茨基的“经济分析”的主要“论据”和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他的头几句话就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已混乱或浅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们这位“理论家”一本正经地说：“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正是小农生产。以此为生的居民约占五分之四，甚至可能占六分之五。”（第45页）第一、可爱的理论家，你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当然，不超

^① 见本选集第1卷第511—627页。——编者注

过总数的十分之一，而在城市中还更少，因为城市的大生产较为发达。就拿大得不可思议的数字来说，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产者是被剥削者，没有选举权，那也可以看出，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占百分之六十六的布尔什维克是代表大多数居民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大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拥护苏维埃政权，就是说，基本上是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到1918年7月，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冒险的暴动，于是从他们原来的党内分裂出来的两个新党就同他们分开了，这两个新党是“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²⁷⁵（组成这两个新党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曾经由旧党提出来担任国家要职，例如属于前一党的有查克斯，属于后一党的有柯列加也夫）。可见，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无意中推翻了！——他所说的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似乎是少数居民这种可笑的童话。

第二、可爱的理论家，你是否想过，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呢？这个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记了”，因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复的孟什维克的全部“理论”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

现在来看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的“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吧。

考茨基说，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政，这是无可争论的。“但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第34页）

“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人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说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第35页）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满意这个很深奥很机灵的推论，他企图挖

苦人说：“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最无痛苦的实现，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第 35 页）

我们这位理论家引用了半自由主义的马斯洛夫的许多非常深奥的话，来极详细地证明一种新思想：农民从利益上关心粮价高，关心城市工人的工资低，等等。附带说一下，对于战后时期的真正新现象注意得愈少，这种新思想就叙述得愈是枯燥无味；这些现象就是：例如农民出卖粮食不是要钱而是要商品，农民的农具不够，而且用多少钱也买不到所需数量的农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特别讲到。

总之，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责备无产阶级政党，说它把专政、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交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手里了。考茨基先生，妙极了！据你的高见，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家想必是记起了“开口如银，闭口如金”的格言，觉得还是默不作声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论中露出了马脚：

“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第 48 页）

多么厉害的讽刺呵！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我国在四年大破坏的战争之后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

再往下看吧：

……“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有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有农民的余粮。这种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第 48 页）

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区以外（现在这种办法在我国已推行到全国了），自然是愤慨得很。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带着庸人的无与伦比的、令人赞叹的冷淡（或愚钝）态度，用教训的口吻说道：……“这些办法〈剥夺富裕农民〉把不安和内战的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把内战带进“生产过程”，这真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 49 页）

是的，是的，为了那些隐藏余粮、破坏粮食垄断法、使城市居民挨饿的剥削者和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当然是该叹息和流泪的。考茨基、海因里希·维贝尔（维也纳）、龙格（巴黎）和麦克唐纳（伦敦）之流先生们，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都主张工人阶级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坏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援引“生产过程”来掩盖这种为资本家效劳的卑鄙齷齪的行为……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向资产阶级阿谀献媚呢？

请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竟说了些什么。他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农民专政冒充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责备我们把内战带进农村（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功绩），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往农村，去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帮助贫苦农民，剥夺投机者、富有农民违反粮食垄断法而隐藏起来的余粮。

一方面，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纯粹民主，主张革命

阶级即被剥削劳动者的领袖服从多数居民（因而也包括剥削者在内）。另一方面，他反对我们，说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的，其所以是资产阶级性的，是因为农民整个说来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他同时又自以为是在维护无产者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头等的糊涂和混乱。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片断的自由主义学说，是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富农献媚。

这个被考茨基弄得一团糟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就完全阐明了。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拚命想在这一点上“揭露”我们，结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的观点是混乱的，揭露了他害怕回忆起他在1905年还不是叛徒时所写的东西。

可是，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

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用假学者的态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来暗中对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顺便指出,苏维埃所以是最高的民主制形式和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的含义)¹²⁰、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房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家强加在劳动群众身上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认的那些事实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有钱人、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这是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有考茨基那样的傻瓜或叛徒,才会认为这两种人是社会主义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独立行动。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分析俄国革命时,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帮助资产阶级掩盖它的统治、欺骗群众的“民主”概念来支吾搪塞,忘记了“民主”实际上有时表现资产阶级专政,有时表现服从这个专政的市侩的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等等。照考茨基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资产阶级政党,有领导无产阶级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布

尔什维克),但是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阶级根源,即没有小资产阶级根源!

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启发了群众,促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一切“下层”、一切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离开了这样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优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能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

这个过程在1918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反革命暴动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波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有钱人、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反映了群众的动摇,并且正是在1918年夏天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走在一起(在莫斯科举行暴动,普罗相²⁷⁶占据了电报局——占据了一小时!——向全国宣告布尔什维克已被推翻;后来,讨伐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集团军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又实行叛变等等);另一部分人,即上面讲过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城市缺粮情况的严重,日益尖锐地提出了粮食垄断问题(理论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经济分析中重弹十年前马斯洛夫的旧调,“忘记了”粮食垄断这件事!)

地主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民主共和制的旧国家，常常把实际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武装队伍派到农村去。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他不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尤其是资产阶级议会赞成这样做的时候！在1917年夏秋两季，阿夫克森齐也夫、谢·马斯洛夫同克伦斯基分子、策烈铁里等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逮捕过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一事实考茨基“没有听说过”，他对这事实只字不提！

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民主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这个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说真话，不能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公开直接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话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维埃吸引他们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苏维埃共和国从两个首都把武装工人队伍，首先是把比较先进的武装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去。这些工人把社会主义带到农村，把贫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况和到过农村的人都说，我国农村本身只在1918年夏秋两季才经历“十月”（即无产阶级）革命。转折点到了。富农暴动的浪潮被贫农的奋起、“贫农委员会”²⁷⁷的发展所代替。在军队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员，工人出身的军官、师长和集团军司令多起来了。正当傻瓜考茨基被1918年的七月危机²⁷⁸和资产阶级的狂吠所吓倒，象“小公鸡”那样跟着资产阶级跑，写了一整本小册子，深信布尔什维克正处在被农民推翻的前夕，正当这个傻瓜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退出看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范围“缩小了”（第37页）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拥护者的实际范围却在无限地扩

大，因为千百万农村贫民正在觉醒起来，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摆脱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监护和影响。

我们失去的是几百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富农，得到的却是几百万贫农^①。

在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一年以后，穷乡僻壤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它的影响和帮助下发生了，最终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最终地证明了国内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反对布尔什维主义。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

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不能把农村贫民团结起来反对富有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有钱人、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要附带说一句，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不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没有准备和实行这种分化，在1917年10月至11月就立刻试

^① 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8年11月6—9日）上，有表决权的代表九百六十七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九百五十人，有发言权的代表三百五十一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三百三十五人。加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七。

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行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¹⁶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了解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了解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在这个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把一切都弄乱了，而在实践上简直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 *

另一个极有意义极重要的问题，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样混乱，也许更加混乱。这个问题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改革这一极困难的也是极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动，在原则上是否提得正确，其次，实行得是否适当？西欧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过最重要的文件，对我们的政策提出批评，我们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也是对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帮助。但考茨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极大的理论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实际上则是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空洞的、恶毒的、庸俗的攻击。让读者去判断吧，

“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马上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了”……（不对，考茨基先生，把你认为是“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各个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革命历史证明，资产者同小资产者即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²⁷⁹执行的是保持大地产的政策。谢·马斯洛夫的法令和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²⁸⁰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就战胜不了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地主。）

……“但是这应当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不同的解决办法……〈考茨基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者”的“一致”，而不管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是谁。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一定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却忘记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一直在这些企业里当雇佣工人的农民，由他们用协作社的形式经营这些大田庄。但是采取这个办法要有农业工人，而俄国则没有农业工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考茨基仍象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意识到，另一方面，应该承认。他把各种解决办法排在一起，不去考虑——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地考虑——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些怎样的过渡。俄国有农业雇佣工人，但人数不多，至于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怎样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协作耕种制的问题，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考茨基经常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末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良。

对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一点，考茨基则默不作声。更坏的是，他还玩了一套难以置信的伪造手法，在摘引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时，把最重要的地方丢掉。

考茨基说“小生产力求生产资料的完全私有”，说立宪会议是能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权威”（这种论断在俄国只会令人捧腹大笑，因为大家知道，工农认为有权威的只是苏维埃，立宪会议已经

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地主的口号)。他接着说:

“在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规定: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

考茨基仅仅引了这两条之后就作出结论说:

“把立宪会议提出来,始终不过是纸上空文。实际上各乡农民可以任意处理土地。”(第47页)

请看,这就是考茨基的“批评”的标本!这就是十分近乎伪造的“科学”作品。他向德国读者暗示:布尔什维克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向农民投降了!布尔什维克让农民各自(“各乡”)任意处理土地了!

其实,考茨基引用的1917年10月26日(旧历)颁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两条,而是五条,再加上“委托书”八条,同时还指出这个委托书“应该作为指南”。

法令第三条说,产业转“归人民”,必须编造“全部没收财产清册”,并“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委托书中说,“土地私有制永远废除”,“具有高度农业文化的农场所占的土地”“不得分割”,“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不付赎金只给国家或村社使用”,“一切土地都是全民的土地”。

其次,在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的同时,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现在已纳入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①。宣言第二条第一项说,“废除土地私有制”,“模范田庄和模范农业企业属于国家财产”。

^① 见本卷第404—406页。——编者注

可见，把立宪会议提出来，并没有成为纸上空文，因为另一个在农民看来有无比巨大权威的全民代议机构负起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责任。

其次，1918年2月6日(新历19日)公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这个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全部私有农具和耕畜交给苏维埃政权处理，由联邦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法令对处理土地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

“减少个体经济，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来说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十一条第五项)

这个法令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时对“谁有权使用土地”这一基本问题作了下列回答：

(第二〇条)“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地面的为：(一)用于文化教育方面：(1)国家即苏维埃政权(联邦、区域、省、县、乡、村的)机关。(2)社会团体(应受地方苏维埃政权监督并经其允许)。(二)用于经营农业方面：(3)农业公社。(4)农业合作社。(5)农村团体。(6)单个家庭和个人”……

读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实，他以完全虚假的形式向德国读者介绍了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

考茨基甚至未能提出理论上重要的基本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

(1)平均使用土地以及

(2)土地国有化。这两种办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系。

(3)公共耕种制是从分散的小农业到公共的大农业的过渡；苏维埃法令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能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下列两个基本事实：(一)布尔

什维克在估计 1905 年的经验时(例如见我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著作^①)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具有民主进步、民主革命的意义,在 1917 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确定地说过这一点。(二)布尔什维克在实行土地社会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是这个法令的“灵魂”)时十分明确肯定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我们认为有责任实行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而大多数劳动者的主张和要求应该由他们自己抛弃,因为这种要求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跳过”。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帮助农民抛弃小资产阶级口号,使他们能尽量迅速、尽量容易地从这种口号过渡到社会主义口号。

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学分析帮助工人革命,就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具有民主革命的意义,具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意义,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第二、布尔什维克投票通过(并十分忠实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资产阶级法令,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从理论上,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考茨基永远也无法否认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这个革命不能超过这一点。当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它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众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解决办法是不够的,必须超出这个范围,过渡到社会主义。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农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止摆脱了地主、摆脱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农民去实现这种理想。无产者对农民说:我们要帮助你们达到“理想

^① 见《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200—409 页。——编者注

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产者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同时我们要向你们指出,这种办法是不够的,必须过渡到公共耕种制。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样试图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这种领导的正确性,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考茨基宁愿回避问题……

其次,考茨基公开欺骗德国读者,对他们隐瞒了这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中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了它们直接的优先权。

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这就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糊涂了,连一个问题也不能提出!一方面,他不敢说无产阶级在平均使用土地问题上应该同农民分离,因为他觉得这种分离是荒谬的(而且考茨基在1905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曾明确而直接地坚持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深表同情地引用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自由主义庸俗言论;这位马斯洛夫“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却不说小资产阶级争取平等、争取平均使用土地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看来是进步的 and 革命的。

考茨基真是混乱到极点了。请看,他(1918年)坚持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他(1918年)要求不要超出这个范围!同一位考茨基又认为把小块土地租给贫苦农民(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这种小资产阶级改革含有“某些社会主义成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还暴露出他象庸人那样不善于考虑一定政党的实际政策。他摘引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却不愿意看到孟什维克党 1917 年的实际政策；当时孟什维克党同地主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实际上坚持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主张同地主妥协（证据就是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和谢·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没有看见，彼·马斯洛夫关于小资产阶级平等的反动性和空想性的言论，实际上是掩盖孟什维克主张农民同地主妥协（即让地主欺骗农民）而不许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

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估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门户。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考茨基枉费心地重复着自由派的蹩脚的讥讽：“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影响下过渡到集体生产。”（第 50 页）

多么机智呵！

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大国的小农都没有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

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没有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用宣传、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贫苦农民的条件下，碰到过贫苦农民同富有农民公开的阶级斗争以至内战。

无论何时何地，投机者和有钱人没有在农民群众这样破产的情况下这样大发战争财。

考茨基重弹老调，咀嚼陈旧的东西，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任务连想也不敢想。

请问可爱的考茨基，如果农民缺乏经营小生产的工具，而无产

阶级国家帮助他们取得集体耕种土地的机器，这难道是“理论说服”吗？——

现在来讲土地国有化问题。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否认我们实行的办法是土地国有化。他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既然我们还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土地私有制的废除就是土地国有化。“社会化”一词不过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愿望和准备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国有化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考茨基在这里也是甚至不能提出理论问题，更糟的是他故意回避这个问题，虽然从俄国文献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早就有过关于土地国有、土地地方公有（将大田庄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土地分配的争论。

考茨基硬说，将大田庄交给国家，然后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就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这简直是嘲笑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指出，这里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这里也没有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听信了孟什维克的话。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考茨基为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辩护，责备布尔什维克不该妄想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自己又拿自由主义的改革冒充社会主义，而且不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底完全肃清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中世纪制度！结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维克顾问一样，不是维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维护害怕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

实际上为什么只把大田庄收归国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呢？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用这种办法可以保持最多的旧东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彻底），最容易恢复旧东西。激进资产阶级，即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就是土地国有的口号。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差不多在二十年前，曾写过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杰作，他不会不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土地国有正是彻底的资产阶级口号²⁸¹。考茨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战以及他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

被考茨基不恰当地选为自己的顾问的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曾认为俄国农民不会赞成全部土地（包括农民土地在内）的国有化。马斯洛夫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论（这个理论重复着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意见），即否认绝对地租、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或如马斯洛夫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事实”）的观点有联系的。

其实，早在1905年革命中就已经表露出，俄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无论村社社员或单独农户，都赞成全部土地国有化。1917年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就实现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企图（正同考茨基凭空责备我们的相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首先帮助农民中最激进、最革命、最接近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现了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的办法。从1917年10月26日起，即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国土地私有制就被废除了。

这就造成了从发展资本主义来看是最好的基础（如果考茨基不背弃马克思学说，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也建立了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

正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才为促进和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见，考茨基献给读者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混乱思想，他责备布尔什维克不了解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己却暴露出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他闭口不谈土地国有化，同时把最不革命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当做“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现在我们来谈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对过渡到公共耕种制的必要性估计得怎样。考茨基在这里又玩弄了一套近乎伪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关于向集体耕种制过渡的任务的“提纲”！我们这位“理论家”引了其中一条之后，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任务，并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堕落到象考茨基那样在写作方面招摇撞骗。他摘引“提纲”，而不提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他谈论“理论说服”，而不提既掌握工厂、又掌握商品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1899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国家拥有把小农逐步转到社会主义的手段时所写的一切，被1918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干干净净。

当然，几百个由国家维持的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即由国家出资、由工人协作社耕作的大农场）是很少的。可是考茨基回避了这个事实，这难道能够叫做“批评”吗？

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最充分地保证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胜利会使土地国有化退到土地分配（关于这一点，我在论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内作了专门的分析）。此外，土地国有化使无产阶级国家有最大可能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

总之，考茨基在理论上真是一塌糊涂，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是向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卑躬屈膝。他的批评真是漂亮极了！

* * *

考茨基对工业所作的“经济分析”是用下面这段妙论开场的：

俄国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呢？“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厂矿拿来当作自己的财产（直译就是把厂矿据为己有），就是在每个工厂里独自经营，那是可以这样设想的。”（第52页）考茨基又补充说：“正是今天，8月5日，当我写这些话时，莫斯科报道了列宁8月2日的一篇演说，据报道，列宁在演说中提到：‘工人会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第52—53页）

我们把这段议论全部抄下来，好让从前尊敬过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国工人亲自看看投降资产阶级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只要想想，8月5日俄国已经颁布了许多关于工厂国有的法令，没有一个工厂被工人“据为己有”，所有工厂都转归共和国所有，可是在这个8月5日，考茨基竟用明显的欺骗手法解释了我的演说中的一句话，想使德国读者相信俄国把工厂交给了各个工人！

接着考茨基在好几十行里反复咀嚼，说不能把工厂交给单个工人！

这不是批评，而是资本家雇来诬蔑工人革命的资产阶级奴仆所使用的手法。

工厂应该交给国家，或者交给公社，或者交给消费合作社，——考茨基再三地这样说，最后他补充道：

“在俄国，人们现在也企图走这条道路”…… 现在！！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8月吗？难道考茨基不能请他的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或其他俄国资产阶级朋友们至少译出一个工厂法吗？

……“在这方面走得多远，现在还看不出来。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方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但是这一方面现在还完全处于朦胧状态。法令是多极了……（因此考茨基忽视了或对读者隐瞒了法令的内容！）可是关于这些法令的效力，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全面的、详尽的、可靠的、报道迅速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建立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根本无从核对。这也是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第53页）

看，就是这样写历史的！考茨基从资本家和都托夫分子的“自由”报刊上会得到关于工厂交给工人的消息…… 这个超阶级的“严肃的学者”真是妙不可言！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是苏维埃政权设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愿意提起。他以套中人¹⁷⁶的顽固态度，口口声声说：给我和平的民主，没有内战、没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统计（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统计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统计人材，当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统计，还是不可能的）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没有革命、没有激烈斗争、没有暴力的革命。这同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

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请把这种“社会主义者”同庸俗的自由主义官僚区分区分看！

考茨基根据这种“实际材料”，也就是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故意避开无数事实，得出“结论”说：

“俄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真正实际果实（不是法令），是不是会比它从立宪会议——也同苏维埃一样，其中大多数代表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多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第 58 页）

这岂不是妙论吗？我们奉劝考茨基的信徒们把这段名言拿到俄国工人中间更广泛地加以传播，因为考茨基提供不出更好的材料来说明他在政治上的堕落了。工人同志们，克伦斯基也曾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历史学家考茨基满足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据为己有”的称号。至于证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时期支持过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抢劫行为的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至于正是这些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在立宪会议中占了多数的事实，考茨基则很客气地隐讳不谈了。这还叫做“经济分析”呢！

最后还要举一个“经济分析”的范例：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九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第 41 页）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使我们听惯了这种议论。俄国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说：九个月过去了，你们拿出普遍福利来吧，就是说要在四年破坏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没有丝毫差别，连一点差别的影子也没有。用“社会主义”做招牌的甜言蜜语，不过是重复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都托夫分子和克拉

斯诺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话罢了。

* * *

上面这些，是我在1918年11月9日写的。当天夜里收到了从德国来的消息，说已经开始的革命首先在基尔和北方沿海一带的其他城市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已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随后在柏林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了。

因此，给这本论考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写个结束语，就成为多余的了。

1918年11月10日

附录一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①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我读了考茨基的这本书之后,才看到了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1918年巴黎版)。使人禁不住要把这两本书比较一下。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思想领袖;王德威尔得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是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完全破产,他们两人都以老练的记者的圆滑手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事实。前者特别清楚地表明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粗笨,好发空论,笨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后者是在罗曼语国家——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典型人物,这种机会主义比较圆滑,不那样粗笨,伪造马克思主义也伪造得更精巧,所用的基本手法则与前者相同。

他们两人都根本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

^① 见本卷第377—381页。——编者注

说,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问题谈得多些。他们两人都抹杀这两个问题极其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他们两人丝毫没有那种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没有那种使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揶揄区别开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丝毫没有说明革命的任务不同于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在消灭雇佣奴隶体系或秩序、制度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分享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极小部分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中所起的作用。

现在我们举出王德威尔得几个最重要的论断来证实这种估计。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是非常积极的。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区别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话,说过不知多少,因为他们的实践已经把这一点纳入纯粹议会斗争的范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认为必须对部分过时的《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即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打碎这个机器。¹¹⁹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约而同地恰恰闭口不谈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最重要东西,恰恰闭口不谈使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改良的东西。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考茨基用粗笨的伪造手段做到这一点。王德威尔得则用更巧妙的手段干着同样的勾当。他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

这一章即第四章中，用《b》节专门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问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我再说一遍：他恰恰是把最主要的地方，即关于打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地方丢掉了），并作出结论说：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象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巴黎公社，但这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中心里获得胜利。

这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因为目前已经看得很明显，许多国家在战后时期必将发生空前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说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革命的困难更不用说了——真是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证明：在无产阶级没有充分的准备来利用那由于情势的发展而会落到自己手里的政权以前，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第73页）

涉及问题实质的，不过如此而已！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代表人物！1912年，他们签署了巴塞爾宣言，在宣言中直接谈到后来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直接以这种革命相威吓。但是，当战争已经发生、革命形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这些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却开始拒绝革命了。请看，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只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议的假设！这同考茨基关于苏维埃在欧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议论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要知道，一切有学识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议论的，他们现在一定会同意说：新的公社“并非不可思议”，苏维埃将起很大的作用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应该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新的国家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的说明，王德威尔得却把这一切完全抹杀了。

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实践家和政治家应当说明，现在只有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拒绝下列任务：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类型的、苏维埃类型的或者第三种类型的革命）的必要性，说明准备这种革命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驳斥反对革命的市侩偏见等等。

无论考茨基或王德威尔得都根本不做这件事情，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

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吧。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里，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认并赞成这个真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问题：当无产阶级取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镇压哪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这个阶级，并且采用什么手段去镇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认、赞成并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见他的书第72页），但是……他只字不提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资本家先生们）问题！！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他们完全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问题。他们的叛徒行径也就在这里。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意识到，另一方面，应该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编的词典——不待说是渊博的著作！——参看王德威尔得的书第87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抄袭这个渊博的庸俗论调，称赞这种论调，把这种论调和马克思的言论列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说，“国家”一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

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ê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的代表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过于绝对的论断,会冒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第156页)

请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在阐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时,否认绝对真理。折衷主义者不要“过于绝对的”论断,为的是暗中贯彻市侩庸人的希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过去后,接着就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都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径。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辩证法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与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

渡”这两者区分开来。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的折衷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作为一个折衷主义者和诡辩家，比考茨基巧妙些，精细些，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语，可以避开任何革命问题，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因为，有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资产者想“一般”否认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王德威尔得写道：“我同意盖得的意见，如果不预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1. 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变成门格尔所说的劳动的人民国家。
2. 把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象圣西门所说的，把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分开。”(第 89 页)

王德威尔得把这段话加上了着重号，来特别强调这些论点的意义。其实这是最纯粹的折衷主义的糊涂观念，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决裂！要知道，“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语，不过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斥责为无稽之谈的“自由的人民国家”²⁵的旧调重弹。“劳动的人民国家”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词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论，而没有觉察到从这里只能得出一堆糊涂观念。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涂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忽视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视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其次，只有在任何国家都消亡了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失而让位给对物的管理。王德威尔得用这种比较遥远的未来，去遮盖和模糊明天的任务——推翻资产阶级。

这种伎俩还是等于替自由资产阶级效劳。自由主义者同意谈谈在对人用不着管理的时候将会是怎样的。为什么不能谈谈这种无害的空想呢？至于无产阶级镇压抗拒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那就闭口不谈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是王德威尔得恭维无产阶级。恭维是不难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善于恭维自己的选民。但掩藏在“恭维”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王德威尔得详细地转述了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言论，说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这里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直接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市侩折衷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

写于1918年10—11月

1918年莫斯科“共产党人”

出版社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手稿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
第209—306页

论“民主”和专政

莫斯科收到的几期柏林出版的《红旗报》和维也纳出版的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呐喊报》(Weckruf)²⁸²向我们表明，拥护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遭到了德奥革命无产者的真正代表的应有的反击。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两个标志着第三国际的活力和成长的机关报。

显然，现在不论在德国或奥地利，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这个问题：是立宪会议呢，还是苏维埃政权？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的所有代表人物，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拥护立宪会议，并称自己的观点是捍卫“民主”(考茨基甚至说到“纯粹民主”)反对专政的。对于考茨基的观点，我已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刚出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小册子中做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把这个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简要地阐述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已实际地提到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程上了。

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来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整个国家权力机关吧！让一小撮剥削者继续利用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吧！很明显，资产阶级总是喜欢把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选举叫做“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选举，用这些字眼掩盖真相，掩盖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掌握在剥

前者手里，所以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绝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对资产阶级来说，向人民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好处和有必要的；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重复这个论调，实际上是抛弃无产阶级观点，转到资产阶级那边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次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这是在1872年），认为必须使工人特别注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¹¹⁹叛徒考茨基写了一本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对工人隐瞒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根本歪曲马克思主义；当然，谢德曼之流的先生们对这本书赞扬备至是完全应该的，正如资产阶级代理人赞扬跑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是完全应该的一样。

工人和一切劳动者被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和四年掠夺战争弄得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资本家和投机商却继续掌握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权力机关，在这种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笑被剥削劳动者，就是侮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利用这个在历史上比封建制度前进了一大步的民主，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它的历史条件性和局限性，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国家在君主制度和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都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资产阶级不得不说假话，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说成“全民政权”或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可惜现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在帮

他们的忙)支持这种谎言、这种假话。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揭穿这种假话,直接而公开地向工人和劳动群众说明真相:民主共和制、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即富人的民主的骗局、虚假和伪善,才能实行穷人的民主,使工人和贫农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而现在(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事实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好处的。

例如拿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来说。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硬要工人相信,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民主”的。这是撒谎,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农村的长工和短工实际上被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考茨基和伦纳之流先生们就是在捍卫这种权利,可惜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投向他们了)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机关即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法官等等摒弃于民主之外。目前德意志“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撒谎,就是骗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保持自己的地主宅第和最好的建筑等等的“所有权”的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高楼大厦、印刷所、纸库拿过来供劳动者使用。

于是,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和他们一道的还有外国同路人如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大吼大叫,说这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

粹的”民主!

我们的回答是：胡说。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居民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大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因为资本歪曲和缩小了一切民主,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制的资产阶级民主。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根本消亡的唯一道路。

资产阶级的伪善的朋友们或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天真的小资产者和庸人们问道：为什么不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粹”民主呢？

我们回答说,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小业主必然是动摇的、软弱的,必然是空喊“纯粹”民主即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主的愚蠢幻想家。要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除了被压迫阶级的专政而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和“训练”出来、能够率领那些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而摇摆不定的劳动群众前进(带领他们前进或至少使他们“中立”)的唯一阶级。只有甜蜜蜜的市侩和庸人才会幻想不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就可以推翻资本的压迫,并用这种幻想欺骗自己和工人。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反抗还没有公然展开,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始剥夺剥夺者。剥夺一经开始,反抗就会是激烈的、疯狂的。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对自己和工人隐瞒这一点,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最紧要的关头离开了阶级斗争和推翻资产阶级

压迫的立场，而走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走上了“社会和平”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调和的立场。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²⁸³。革命在迅速地教导人们。德奥的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农很快就会明白，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一定会唾弃这些“社会叛徒”，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主义叛徒，正象俄国无产阶级唾弃了同样是一些小资产者和庸人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¹²一样。无产阶级一定会看出，——上述这些“领袖”的统治愈厉害就会愈快地看出，——只有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关于这种国家，马克思谈得很多，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歪曲和背叛了马克思）或苏维埃式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枷锁和战争。

1918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1月3日
《真理报》第2号
署名：尼·列宁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
第348—352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²⁶⁴

(1919年3月2—6日)

1

代表大会开幕词

(3月2日)

我受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首先请全体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致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证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已经破灭。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在德国，国内战争都已经成为事实。

资产阶级在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吓得丧魂落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了。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斗争的伟大意义。现在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这个名词是群众不了解的拉丁字。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字已经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

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³⁵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厂工会委员会²⁸⁵，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现在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

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特别重要的是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生长起来，取得统治地位。今天我在一份反对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北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表示要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胜利了。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霸道，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同志们！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地欢迎你们。现在我提议选举主席团。请提名。

第一次用德文载于1920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Der I.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Protokoll»)一书

第一次用俄文载于1921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按记录俄文版原文刊印并
根据德文版原文作过校订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3月4日)

1. 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拚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最主要的是斥责专政和维护民主。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²⁰⁰，都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这种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这种论据是虚伪的。

2. 首先，这个论据运用“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倒向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种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3. 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的一贯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

“一般专政”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还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和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拥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4. 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极科学极确切地表达了的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²⁵⁸。现在高叫反对专政维护民主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没有一个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却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赐给了劳动者，似乎资产阶级放弃了反抗并准备服从大多数劳动者，似乎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什么资本压迫劳动的国家机器。

5. 一切想以社会主义者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是热烈地真诚地同情它的；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性和局限性，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

的马克思，在分析公社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只是每几年一次来解决哪一个有产阶级的代表应该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 und zertreten)人民¹⁵³。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显然在继承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复着资产阶级的“一般民主”的废话。公社不是议会机关。

6. 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人的、警察的机构，并用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来代替它。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嘲弄真理地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样，就十分清楚地再三证明了，高叫维护“一般民主”，事实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7. “集会自由”可以作为“纯粹民主”的要求的标本。任何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会一下子懂得，在剥削者反抗推翻他们和保卫自己特权的时期和情况下，允许剥削者有集会自由是荒谬的。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当资产阶级还革命的时候，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合起来”策划复辟的保皇党人和贵族。如果早已反动的资产阶级现在要求无产阶级不管资本家怎样反抗对他们的剥夺都预先保证剥削者有“集会自由”，那末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清楚地知道，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还有资产阶级

的政权机构保护他们开会。而城乡的无产者和小农，即绝大多数的人民，既没有建筑，也没有空闲时间，又没有人保护。只要情况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一种欺骗。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实际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和豪华的私人建筑，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或资本家军官和听其摆布的士兵来保护他们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谈论集会自由，谈论平等，才不是对于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笑，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8.“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千万次承认过，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有统辖报刊的权力（在世界各地，民主主义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权力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厉害，愈无耻，例如美国也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欺骗。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取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使资本没有雇用作家，收买出版机关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做“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用金钱制造所谓舆论的自由叫做出版自由。“纯粹民主”的拥护者实际上是使富人掌握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的贿赂制度的拥护者，是人民的骗子，他们用漂亮、美丽和虚伪透顶的辞句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靠别人发财的可能性，没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劳动者（或大

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实现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9.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标榜一时的“纯粹民主”事实上究竟是什么东西。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也就愈明显,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专政也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²⁶¹,在自由民主的美利坚共和国发生的资本家的雇佣军队对罢工工人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几千件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费尽心机企图掩盖这样一个真理: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觉到资本的权力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公开表现出来。

10.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使德国富翁集团或英国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遭到屠杀,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中,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失败后,协约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最有力地使劳动者睁开了眼睛,把资产阶级民主的假花摘了下来,向人民揭露了战争期间大肆投机和发战争财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和平等”之名进行了这次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和平等”之名发了空前多的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向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了了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

11. 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获得的最初几个月的充分的共和制自由,向德国工人和全世界表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

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不仅是因为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已暴露无遗了。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时，军官和资本家杀害了被捕者即被国家政权监禁的人竟能逍遥法外，这就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被害表示愤慨而不明白这个真理的人，不是无知，就是伪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中的“自由”，就是杀死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而能逍遥法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主义的发展，不是削弱阶级斗争，而是使它更加尖锐化。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达到沸点了。

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放逐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监禁他们，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也有残杀布尔什维克的暴行，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称为野蛮的罪恶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这简直是可笑的。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12.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只有它才能消除引起战争和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这个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

或无产阶级专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这是小资产者的反动的悲叹。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更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商品经济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没有别的阶级，只有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所发展、扩大、团结、巩固起来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13. 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不懂得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运用程度。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 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它同任何专政一样，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极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机关发生变化；而且，一般说来，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能在世界上空前广泛地实际享有民主。

实际上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厂工会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意味着并实现着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实际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大概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哪怕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全部国家权力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 资产阶级民主随时随地都答应一切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这种平等，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或无产阶级专政却立刻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反对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 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议会制是设法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设法使劳动群众接近管理机构。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合一以及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17. 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合起来，真正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

阶级的武装,不这样,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8. 苏维埃国家组织适合于资本主义造成的最集中最进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

19. 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的、法官的机关,这些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都保存着,而且必然保存着,它们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

20. 消灭国家权力是以马克思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即平等和自由是不能实现的。只有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实际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经常参加国家管理,为国家的完全消亡作好准备。

21. 下列事实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完全不了解新式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黄色国际的参加者在柏林出版的报纸《自由报》²⁸⁷上刊载了“独立党”的告无产阶级书。这篇告无产阶级书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Träger und Schützer der Revolution)的苏维埃,建议使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撤销国民会议决议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拥护民主而不了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

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的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新式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可抑止的力量的懦怯的让步。

22. 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斥责布尔什维主义，但他们由于害怕工人群众，没有敢正式表决相应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做得对的。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是串通一气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¹² 抱怨布尔什维克通缉他们，企图隐瞒这样一件事实：他们遭到通缉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斥责布尔什维克，这是非常自然的。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捍卫“纯粹民主”，而是因为明明知道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而起来捍卫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做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还会把这点更详细地告诉我们。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没有一个字谈到苏维埃政权的意义。而我们在俄国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有两年了。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我们讨

论这个问题已经将近两年了，并且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①。

2月1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这些独立党人的最大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做国家组织。考茨基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重复了同样的论调。2月9日刊出了鲁道夫·希法亭这位也被认为是第二国际最大权威理论家之一的文章，他建议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从法律上联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被独立党全党通过，并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大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是国家组织，尽管这样，但是又动摇起来了！这就证明，这些老爷真是一点也不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这还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必定有引起这种动摇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却向我们提出了伯尔尼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而决议中根本没有谈到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在任何一次演说中有任何一个字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我们看来，这班老爷，作为社会主义者和理论家，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际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中发生了大变动的明证，——因为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7—128页。——编者注

织的独立党人，忽然荒谬地提议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中间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的落后群众正向我们走来，已经靠近我们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观点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代表着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的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经历过一种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完全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一片呼声：“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而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就唱起另外的调子来了：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各式各样的孟什维克理论家提出几乎同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形成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的传播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出现“是苏维埃，还是国民会议，还是立宪会议，还是资产阶级议会制”问题，首领们张皇失措到极点，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将近两年之后，我们不应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传播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波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已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根本没有听说过布尔什维主义的外国人，很难对我们争论的

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所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加以驳斥，反过来也是一样。当然在斗争的时候，也不能不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详细的决议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个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²⁸⁸上。在这个决议中，孟什维克简短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并列举了所有这些区域。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也谴责了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通缉孟什维克，当他们在战争中反对我们、反对我们红军和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的时候，我们甚至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答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孟什维克的虚伪罢了。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历史事实是：一些没有被正式宣布为疯子的人，怎么能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反对他们，而闭口不谈他们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大家都拚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通缉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请外国同志们注意这个决议，因为这个决议是一个历史文件，它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倾向这边、时

而倾向那边的阶级；这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都是这样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没有中间阶层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遗憾得很，这些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相当长久地存在下去。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通过一项应当专门提出下列三点内容的决议。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群众解释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是不够了解的。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最初八个月中，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明白苏维埃能否成为国家机关。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循着理论而是循着实际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过也没有说过我们不承认立宪会议。只是在后来，苏维埃组织已遍及全国并夺得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是更加尖锐了。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从这里获得坚强的信心，相信西欧各国革命的进展会更加迅速，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却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将十分迅速地展开，工人群众的意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怀有议会主义精神和资产阶级偏见。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传播。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

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将要胜利的最重要的证据。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只能被阻止一个短时期。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廷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红旗报》上有一篇文章²⁸⁹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只需要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廷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建立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就是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巨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的时候，而且不是象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胜利才会有保证的。我们比较容易地获得了胜利，是因为在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革命后第一天，我们政府颁布法令，承认了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所提出的全体农民的老要求。我们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取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经过了半年，我们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奠定了阶级斗争的基础，在每个农村中建立贫农、半无产者委员会，有系统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的落后，这种现象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欧，情况就不同了，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当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广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

中，主要任务是在苏维埃中争取共产主义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党，我们力求并且应当力求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那时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共产主义革命。否则，胜利就不会这样容易得到，而且不会持久。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通过。

提纲载于1919年3月6日
《真理报》第51号

报告第一次载于1920年
德文版和1921年俄文版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记录》

提纲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报告按记录俄文版原文刊印
并根据记录德文版原文作过
校订

3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根据这个提纲和各国代表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布，在还没有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国家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如下：

(1) 向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说明，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必然性的历史意义，新的无产阶级民主一定会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

(2) 在一切工业部门工人中间，在陆海军士兵和贫雇农中间推广和组织苏维埃。

(3) 在苏维埃内部确立巩固的共产主义者多数。

载于1919年3月11日
《真理报》第5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4

大会闭幕词

(3月6日)

我们能够不顾警察的一切阻挠和迫害召开了大会，我们能够
在没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就目前革命时期所有的
迫切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决定，这是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已经
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问题实际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开始在实
际地加以解决。

我们在这里只是把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赢得的东西记载
下来。

不仅在东欧各国，而且在西欧各国，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
胜国(例如在英国)，拥护苏维埃的运动都日益广泛展开，这个运动
无非是以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是走向
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的最大的一步。

尽管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肆意横行，尽管他们放逐、监禁、
甚至杀害斯巴达克派和布尔什维克，这一切再也不能帮助他们了。
这只能使群众受到教育，使他们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中解
放出来，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
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热烈鼓掌)

第一次载于1920年德文版
和1921年俄文版《共产国际
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

按记录俄文版原文刊印并根
据记录德文版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
第431—452页

俄共(布)党纲草案

1

俄共党纲草案草稿²²¹

纲要：党纲由下列部分组成：

1. 引言。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已经开始并在各地迅速发展。要了解这个革命，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向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发展的不可避免性。2. 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分转述普列汉诺夫起草的、我们旧的马克思主义党纲²²⁵的主要部分，以便附带阐明我们的世界观的“历史根源”。3. 帝国主义。根据1917年5月的党纲草案。4.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和新国际。根据1917年5月的草案改写。5.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根据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的草案^①。6. 这些任务在政治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7. 在民族、宗教、教育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8. 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9. 在农业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10. 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具体化(施米特正在写)。11和12. 对其他方面的补充(还没有写)。

这个草稿有许多地方还写得不够好，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同时有些地方暂时以解释性的措辞代替了纲领性的措辞。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6—430页和第27卷第139—144页。——编者注

(1)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农或半无产阶级的赞助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首先需要弄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即基本性质及其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其次需要弄清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并把无产阶级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

* * *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并且已经引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旧的马克思主义党纲曾用下述原理予以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大部分的商品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资料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经常地或定期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革新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而在某些地方则是相当完全地、相当显著地、相当痛苦地依赖于资本。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过程中日益大量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依赖不断增大,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

(8)这样一来,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技术革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使社会更加不平等,使贫富之间的距离扩大,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无法生活,遭到失业和各种困难。

(9)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团结精神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革新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可能性,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一切被压迫的

人们,消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

(11)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抗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露剥削者的利益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解释当前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向其余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逐步具有无产阶级的观点。”

* * *

(12)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13)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

(14)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联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飞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的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

惧、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如何困难或可能遭到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 * *

(16)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坚决地从原则上与在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的上层内取得胜利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性歪曲的派别实行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一方面，实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派别，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这个派别用“保卫祖国”的口号做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几乎一切先进国家都掠夺殖民地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拿出一小部分掠夺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保证他们在平时可以过普通的小市民生活，并雇用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

(18)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相当广泛而具有国际性，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坚持与前者的统一，企图复活已经破产和腐朽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

革命的国际，这个国际实际上是由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以前的社会主义政党组成为共产党而建成的，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现时的基本任务是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把一切工厂、铁路、银行、船只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

利用城市工人同贫农的联盟，以便逐步而坚定地过渡到共耕制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由于这个联盟，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关于由小农经济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已站在无产者方面的现代农民思想家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土地社会化）的法令已经颁布；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高得多和进步得多的民主形式，同时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1905年和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实的、唯一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国家型式；

全面地和充分地利用已在俄国燃起的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以便制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干涉俄国内政或联合起来直接侵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企图，使革命蔓延到比较先进的和所有一切的国家中去；用一系列逐步而积极的措施彻底消灭私人贸易，组织统一的经济整体（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这样一个整体）中的各生产公社和消费公社之间的正确的和有计划的产品

交换。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政治方面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为了从政治上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议会制曾经是(必需的)必要的，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的情况下，任何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步骤都是为剥削者、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绝对反动行为。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机器。

苏维埃共和国——过渡到完全消灭国家的新型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如下：

(1) 建立和发展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全面的和群众性的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设置无数的实际障碍，使他们无法组织起来，而且这些障碍总是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全面地促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组织起来，并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经常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使绝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象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2) 苏维埃的国家组织使那一部分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社会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斗争中受到最大锻炼的劳动者,即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实际的优越地位。这种优越地位应当被积极而有系统地利用来消除资本主义为了把工人分裂成互相竞争的集团而在他们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影响,组织和教育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

(3) 资产阶级民主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而实际上巧妙地掩盖剥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够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群众。苏维埃国家组织粉碎这种欺骗和伪善,实现真正的民主即一切劳动者的真正平等,使剥削者不能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全部世界史、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拚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苏维埃国家组织适合于镇压这种反抗,否则就谈不上战无不胜的共产主义革命。

(4) 在苏维埃式的国家制度下,劳动群众对国家的机构和管理的影响,即更高的民主形式,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召回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最好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5) 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国家机构同资本主义所联合起来的先进无产者群众的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系,除了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外,也为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

(6)苏维埃组织使我们建立了一支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农武装力量。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即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

(7)苏维埃组织无比深入地 and 广泛地发展了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即居民参加对负责人员的选举。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因为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而实际上又加以限制。同时苏维埃组织也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这一制度巴黎公社已开始废除，其狭隘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苏维埃把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这道围墙，因为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生意人在金融上和交易所的勾当，保障资产阶级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制度下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接在一起的，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破坏这座官僚主义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几乎是超过人力地极端紧张地忙于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9)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过渡到完全消灭国家的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执行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使这些工作不断变换，包括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整个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人民自动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10)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而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预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压迫。苏维埃政权应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即在实际上使被剥削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

在民族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俄共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使各民族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接近和融合起来。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在先前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中正在迅速消失，正在随着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而消失，但这种不信任并不是在所有民族和所有劳动群众阶层中都已完全消失。因此，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关心地实行民族的真正平等和分离的自由，以便摧毁这种不信任的基础，而使各民族的苏

维埃共和国结成一个自愿的最紧密的联盟。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协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启发他们去反对中世纪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协助那些在此以前受压迫的或不平等的民族发展语言和文学。

在宗教政策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俄共）的任务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过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避免加剧宗教狂。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从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

现时这方面的最迫切的任务是：

- (1)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
- (2)把教学工作和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
- (3)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
- (4)加强对教师的鼓动和宣传工作。

(5) 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教师。

(6) 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 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 苏维埃政权对工人和劳动农民的自修和深造给以全面的帮助(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8) 开展最广泛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 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 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 把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 即变为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

(2) 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全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克服资本主义、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 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 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慢慢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 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 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 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 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这样得到迅速的发展, 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我们在工会运动上决不能墨守成规。一方面应当用实际试验的结果来检查每一

步骤,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工会应该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其他国家管理部门更加接近,更加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工会更应当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在工人先锋队的监督下把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普及到比较落后的工人中去。

(3)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进行长期的工作来教育群众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外,还要迅速地、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通常是必然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的科学技术专家。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以为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就能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还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代,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

同时,要不断努力,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而且不要因为不可避免的个别失败而惶惶不安,要耐心地启发有科学素养的人,使他

们意识到把科学用来使个人发财、使人剥削人是极其卑鄙的，意识到使全体劳动群众了解科学是更崇高的任务。

(4)要实现共产主义，绝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因为这种散漫性和分散性是资本有力量和劳动没有力量的根源之一。反对行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反对行会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与消灭城乡对立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进行这一斗争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不预先大力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要广泛地开展这一斗争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开始时不妨在地方的小范围内试办，以便把各行业各地区要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措施的效果加以比较。苏维埃政权应当采取比以前更广泛更有系统的办法，在工会的参加下，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来完成一定的社会工作。

(5)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合作社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过渡手段。利用合作社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同类的任务，因为领导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合作社机构的是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经营作风的人。俄共应当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指导他们，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发挥联合在合作社中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做到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融合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要经常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有占优势的影响，并在各地实际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

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生产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遗毒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建立有钱一定要存入银行的制度等等。准备和实行诸如此类的措施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其中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在财政方面，俄共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下，将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取消了土地私有制和大多数工厂及其他企业已收归国有以后，这种情形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建立在这上面；把各种不同的国家垄断组织的收入的一定部分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地组织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这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农村方面

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剥夺了地主和实行了承认大规模地共同经营土地的优越性的土地社会化法令以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在这方面寻找和试行各种最合理最实际的过渡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的基本路线和指导原则仍旧是力求依靠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首先应该把他们组织为独立的力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

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组织贫农委员会是这方面的步骤之一；建立农村党支部，改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以清除富农分子，建立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诸如此类的措施应当严格地予以执行。

俄国共产党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国共产党对中农的政策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决不把镇压手段扩大到他们身上；中农就其阶级地位来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盟者，或者至少是中立者。因此，尽管有不可避免的局部的失败，尽管中农动摇，但必须力求同他们成立协议，关心他们的一切愿望，在确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法时向他们让步。执行这一政策时，摆在首要地位之一的是反对那些打着共产党员招牌、实际上执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政策而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政策的苏维埃政权代表的违法乱纪行为，并在工会帮助下或采取其他办法建立更严格的监督，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驱除出去。

至于向共产主义的农业过渡的办法，俄共将用实践来检验已为实际生活所创造的三个主要措施，即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即协作社），注意更广泛更正确地运用它们，特别是注意发动农民自愿参加这些新式共耕组织的方式，组织劳动农民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同志纪律。

在粮食政策方面，俄共坚持要巩固和发展国家垄断，同时也不拒绝在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的条件下，为了把工作组织得很好而利用合作社和私商或商业人员，实行奖金制度。有时不得不做出的部分让步纯粹是由极困难的状况引起的，但这种让步决不会造成放弃实行国家垄断这一坚定的意向。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实

行国家垄断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和实际地考验一系列的过渡措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达到下述目的：普遍地组织把一切余粮交给国家的生产消费公社并使其正确地发挥作用。

2

俄共(布尔什维克)党纲草案

(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农或半无产阶级的赞助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通过帝国主义和加速其灭亡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

* * *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的旧党纲曾用下述原理予以正确的(如果不算社会民主党这个不确切的名称)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大部分的商品生产资料 and 商品流通资料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经常地或定期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

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革新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而在某些地方则是相当完全地、相当显著地、相当痛苦地依赖于资本。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日益大量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依赖不断增大，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

(8)这样一来，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技术革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使社会更加不平等，使贫富之间的距离扩大，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无法生活，遭到失业和各种困难。

(9)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团结精神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革新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可能性，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消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

(11)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抗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露剥削者的利益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解释当前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向其余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逐步具有无产阶级的观点。”

* * *

(12)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消灭着自由竞争，在二十世纪造成了下列情况：资本家的强大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银行资本与大量积聚的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资本加紧向外国输出；各富强国已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把愈来愈多的资本主义列强集团包罗在内的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个金融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空前剧烈的时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13)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争夺销售市

场、投资范围、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联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飞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的压迫的加重，帝国主义国家奴役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和破产，——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如何困难或可能遭到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 * *

(16)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坚决地从原则上与在正式“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内取得胜利的、对社会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性歪曲的派别实行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一方面，实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派别，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这个派别用“保卫祖国”的虚伪口号做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

形成，是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拿出一小部分掠夺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上层分子，保证他们在平时可以过普通的小市民生活，并雇用这个阶层的领袖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特别是现在，当他们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武力来镇压本国和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

(18)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坚持与前者的统一，企图复活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这个国际实际上是由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以前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共产党而建成的，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这个国际不仅在其名称上回复到马克思主义，而且正以其全部思想政治内容，以其一切行动来实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歪曲清除干净。

* * *

载于1919年2月25日
《真理报》第43号

按列宁修改过的打字稿刊印

3

党纲政治部分的补充

同时,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做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是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剥削者,只是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之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遍选举权。

4

党纲政治部分的摘录

苏维埃宪法保证工农劳动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召回代表，同时消灭自巴黎公社时起就已暴露的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议会脱离群众等等。

苏维埃宪法也以下列办法使国家机构同群众接近，即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本单位不按地域划分，而按生产单位(工厂)划分。

在苏维埃制度下，由于国家机构同群众更为紧密的联系，可以建立²⁹⁰……

5

党纲中关于民族关系方面的条文

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决不是象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从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是不能实现的），而是坚定不移地真正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接近和融合起来。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完全解放殖民地民族和其他受压迫的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使他们有分离的自由，这样才能保证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劳动群众的不信任和被压迫民族工人对压迫民族工人的愤恨完全消失，而代之以自觉自愿的联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压迫民族的工人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例如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对犹太人，鞑靼人对巴什基里亚人等等），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

6

党纲中关于民族问题条文的 最后草案的补充²⁹¹

对于谁是民族分离意志的代表者这一问题，俄国共产党抱着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进到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等等。在任何情况下……

7

党纲中关于军事方面条文的引言

在军事任务和军事工作方面，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这样形成的。

正如我们党早已预见到的那样，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不能以公正的和约而结束，而且一般地不能以资产阶级政府简单地缔结一个稍许稳定的和约而告终。民主派、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已为事变进程完全推翻。相反地，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变为而且正在我们眼前变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反对剥削者、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随着无产阶级日益猛烈的进攻而增长并由于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而特别加剧起来的剥削者的反抗，以及资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国际的组织性，这一切必然会使个别国家的国内战争同无产阶级国家和维护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由于这些战争的阶级性质，防御战和进攻战之间的区别已完全失去任何意义。

总的说来，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从1918年底特别迅速展开的这一国际性的国内战争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经阶段。

因此，俄共坚决摒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除武装的反动的市侩幻想，**坚决反对**实际上只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一切类似

的口号，而提出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的口号、彻底地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的口号、既在国内战争中也在国际的革命战争中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的口号。

根据一年多的军事工作的实际经验，根据全体劳动群众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之后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实际经验，俄共得出了以下的基本结论：

8

党纲中关于法院条文的第一段

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共产党要抛弃民主口号，彻底废除如旧式法院这类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关，而代之以阶级的工农的法院。无产阶级把全部权力拿到自己手里以后，要抛弃以前那种模糊不清的“由人民选举法官”的公式，而提出“仅仅由劳动者选举劳动者出身的法官”的阶级口号，并把这个口号贯彻到整个法院组织中去。共产党只是把不靠雇佣劳动谋取利润的工农代表选进法院，对妇女同样看待，使男女无论在选举法官或履行法官职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了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以后，党向苏维埃选民选出的法官提出以下的口号：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这种法令没有或不完备时，遵循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扫除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

9

党纲中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 1917 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现时这方面的最迫切的任务是：

(1) 在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帮助下，进一步发挥工人和劳动农民在教育方面的主动性；

(2) 不仅象现在这样把教师的一部或大部彻底争取过来，而是要把全体教师彻底争取过来，驱逐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保证老老实实地执行共产主义的原则；(政策)

(3) 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

(4) 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5) 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

(6) 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 (或附于(2)内) 使教师同俄共宣传鼓动机关有密切的联系。

10

党纲中关于宗教关系的条文

俄共对宗教的政策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过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措施。

党力求完全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同时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为此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

11

党纲中经济部分的条文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 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把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变为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

(2) 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全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克服资本主义、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慢慢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苏维埃政权之下这样得到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

8. 292 发展生产力的这一任务要求迅速地、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多半不可避免

地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以为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就能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开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

同样地必须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资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

苏维埃政权应当采取比以前更广泛更有系统的办法，在工会的参加下，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来完成一定的社会工作。

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把各种不同的原则结合起来的过渡社会形态的现时期中，特别重要的是苏维埃粮食机关要利用合作社

这种由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实行计划分配的唯一群众性的机构。

俄共认为，按共产主义原则进一步发展这种机构而不把它抛弃，在原则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应当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指导他们，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发挥联合在合作社中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做到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融合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要经常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有占优势的影响，并在各地实际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遗毒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建立有钱一定要存入银行的制度等等。准备和实行诸如此类的措施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其中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在财政方面，俄共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下，将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取消了土地私有制和大多数工厂及其他企业已收归国有以后，这种情形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建立在这上面：把各种不同的国家垄断组织的收入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地组织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这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12

党纲中关于农村的条文

苏维埃政权在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已着手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办法是建立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大经济)，鼓励农业公社(即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自愿联合，自愿组织)和共耕社；无论谁的土地，凡未播种的，一律由国家组织播种工作；由国家动员一切农艺人材来大力提高农业技术等。

俄共认为，这些措施是使绝对必须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唯一方法，力求尽可能完满地实现这些措施，把它们推广到国内较落后的地区，并在这一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办法。

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厚的根源之一，而在目前危机如此深重的时代，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着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威胁，俄共认为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同时认为除上述措施以外，必须广泛地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加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建设，扩大苏维埃政权为此而成立的全国性的“工人协助委员会”的活动等等。

俄国共产党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为独立的力量，建立贫农委员会、农村党支部、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俄国共产党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的政策反抗。

俄国共产党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是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成立实际协议，在确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时向他们让步。

1930年第一次发表

《党纲草案关于民族问题的条文》

1925年第一次发表

《俄共党纲草案草稿》全文第一次发表

按手稿和打字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75—115页

关于党纲的报告

(1919年3月19日在俄共(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²⁹³上)

(鼓掌)同志们,根据我们和布哈林同志谈好的分工,我的责任是说明委员会对于一系列具体的、争论最多的、当前最使党感兴趣的条文的看法。

我首先简单地谈谈布哈林同志在他报告结尾时说到的、同时也是我们委员会内部争论过的那几点。第一点就是纲领总论部分的结构性质。委员会大多数为什么不同意从党纲内删掉谈及旧资本主义的条文,在我看来,布哈林同志对这一点叙述得不完全正确。照布哈林同志的说法,似乎委员会的大多数怕别人非难,怕别人责备他们不够尊重旧东西。毫无疑问,照他那样说来,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立场是太可笑了。但这与事实相去很远。委员会大多数不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这种做法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资本主义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把金融资本主义描写成似乎没有任何旧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是把涉及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切说明作了不正确的概括。

这是不正确的。这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时代是特别不正确的。恩格斯在一篇论未来战争的文章中就已写道,未来战争引起的破坏要比三十年战争厉害得多,人类将要

大大野蛮化，我们的人造的工商业机构将要遭到破产²²⁶。战争开始时，社会主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曾吹嘘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嘲笑我们是“狂热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看啊，这种预言并没有实现。事变证明，这仅仅对于很少几个国家、对于很短时期才是正确的！”可是现在，不仅在俄国，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各战胜国也开始了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大破坏，其表现往往是取消这类人造的机构，恢复旧资本主义。

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说，可以试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作一完整的描写，那时我们反驳过他，在这里我也要予以反驳：你去试一试，你就知道是不会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曾做过一次这样的尝试，结果他自己也只好把它放弃。我完全相信，假如有人能做到这点，那末最合适的是布哈林同志，因为他对这个问题做过很多的很详细的研究。我敢断言，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因为任务是不正确的。我们俄国现时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时期。同时，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隔绝的俄国许多地区内，资本主义往往正在复活，开始发展。要想跳出这种状况是不行的。假若照布哈林同志所想的那样来写党纲，这个党纲便会是不正确的。它至多是把关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描写重述一遍，但决不是现实的再现，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中恰恰没有这种完整性。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党纲是不漂亮的（但这当然是不重要的），可是另一种党纲简直会是不正确的。不管这种庞杂性、这种由不同材料组成的结构如何令人不快，如何不够整齐，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还跳不出这种状况。当我们跳出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制定出另一个党纲。可是那时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了。硬要那时也象现在一样，那是可笑的。

我们现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许多最基本的现象已经复活。就拿运输业的破产来说吧，这是我们很好地，或者确切些说，很痛苦地感觉到的事情。这是其他国家甚至战胜国也有现象。而在帝国主义制度下，运输业破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退回到最原始的商品生产形式。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投机商贩。这个词外国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而现在呢？你们去和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谈谈吧。原来在德国和瑞士也开始有这类的词了。可是你们不能把这个范畴归到任何无产阶级专政中去，而一定要归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商品生产的低级阶段上去。

用制定漂亮完整的党纲的办法来跳出这个可悲的现实，就等于跳到九霄云外，制定出不正确的党纲。决不是象布哈林同志所委婉地暗示的那样，由于尊重旧东西，才迫使我们把旧党纲中的一些条文插进这里来。在他看来，1903年在列宁的参加下写成的党纲²²⁵，无疑是不好的党纲，但因老年人最爱回忆过去，为了尊重旧东西，他们也就在新时代制定的新党纲中重复旧东西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傻子倒是可以拿来讥笑一顿。我敢断言，事情并不是这样。1903年所描写的那个资本主义，正好由于帝国主义的瓦解和破产，还继续存在于1919年的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中。例如这样的资本主义在离莫斯科不很远的萨马拉省和维亚特卡省就可找到。当国内战争把国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状况，不能很快摆脱这种投机倒把。因此把党纲结构改成另一个样子，便不正确。党纲应当说出实际情况，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

布哈林同志在理论上完全了解这一点，他说，党纲应该具体。但了解是一回事，实际来做又是一回事。布哈林同志的具体性是

对金融资本主义的书本叙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每个农业省份内，我们都看到自由竞争与垄断工业同时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写出这样的制度，就是写出脱离实际生活的不现实的制度。既然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是普遍的小生产的上层建筑²⁹⁴，那末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认为存在着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就是把愿望当做现实。

这是很容易犯的一种很自然的错误。假如在我们面前真的把资本主义完全改造过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千百万倍了。那就会造成一种制度，使一切都服从于一个金融资本。那时只要把上层拆掉，把其余一切交给无产阶级就行了。这倒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惜这是现实中所没有的。现实的发展情况要求另一种做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当帝国主义崩溃的时候，便发生上层的破坏和根基的暴露。因此，我们的党纲要想成为正确的党纲，就应该说出实际情况。存在着旧资本主义，它在许多部门中成长到了帝国主义。它的趋向只是帝国主义的。各种根本问题只能从帝国主义存在的观点来考察。没有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可以不顾这种趋向而解决。现在党纲说的不是这一点。在现实中，旧资本主义还有极大的基地。存在着帝国主义上层建筑，它引起了战争，并从这次战争中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要想跳出这个阶段是办不到的。这个事实说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速度本身，并且在许多年内仍然会是事实。

西欧革命也许会顺利一些，可是为了改造全世界，为了改造大多数国家，毕竟还需要很多很多年。这就是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

过渡时期中，我们无法跳出这种五花八门的现实。尽管这个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现实如何不漂亮，但是决不能把它抛弃。用另一种方式制定的党纲便会是不正确的党纲。

我们说我们走到了专政，可是应当知道我们是怎样走到的。旧事物千头万绪地拖住我们，缠住我们，不让我们前进一步，或者迫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前进，正象我们现在这样。所以我们说，为了懂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就必须说出我们是怎样走来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引我们来的是帝国主义，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例如对中农态度的问题。的确，在纯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怎么能有中农呢？要知道甚至在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没有中农的。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几乎是中世纪现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那我们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并且还会碰很多钉子。如果我们要改变对中农的态度，那也就要在理论部分费劲地说说，中农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中农。中农是小商品生产者。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常识，是必须说到的，因为我们终究还没有了解这个初步常识。如果把这一点置之不理，就说“我们已经研究了金融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来研究这种初步常识！”——那是极不严肃的。

对于民族问题的态度我也要这样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把愿望当做现实。他说，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一起。我们无产者竟来承认某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这是毫无道理的！不对，请原谅，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把这一条删掉，你的东西就会是幻想。你借口民族内部在发生分化，即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分离开来。但是，我们且

来看看这种分化是怎样的。

例如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性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低于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性方面，在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高于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³⁵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你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干吗要民族自决权！”他在1917年夏季提议取消最低纲领而只留下最高纲领时，我曾驳斥过他，现在我应当把驳斥他的话再说一遍。我当时回答说：“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只要我们夺得政权，再稍微等等，我们就要这样做的^①。果然我们夺得了政权，也稍微等了一些时候，现在我同意这样做了。我们已经完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已经打退了威胁我们的第一次进攻，现在这样来做是适宜的了。关于民族自决权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这就是说，你所愿意承认的是除了俄国以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

看看芬兰吧。芬兰是民主国家，是比我们发达一些、文明一些的国家。那里正在发生无产阶级分离、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特殊，比在我国痛苦得多。芬兰人受过德国专政的压迫，现在又受着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9—153页。——编者注

协约国专政的压迫。可是，由于我们承认了民族自决权，那里的分化过程就容易些了。我在斯莫尔尼把正式文件交给起过刽子手作用的芬兰资产阶级代表斯文胡伍德（译成俄文，就是“猪头”的意思）时的情景¹⁹⁸，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很客气地握了我的手，我们彼此恭维了几句。这是多么不好呵！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芬兰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欺骗劳动群众，说大莫斯科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要消灭芬兰人。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昨天我们对于巴什基里亚共和国不也是这样做的吗²⁰⁵？当布哈林同志说“对于某些民族可以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甚至记下来了，他所开的名单中有霍屯督人、布西门人、印度人。听他这样列举时，我就想：布哈林同志怎么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记了巴什基里亚民族呢？布西门人在俄国是没有的，关于霍屯督人，我也没有听说他们想要成立自治共和国，但是在我国有巴什基里亚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是不能拒绝承认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居住在旧俄帝国境内的民族都不能拒绝这点。就假定巴什基里亚人推翻了剥削者，而且是我们帮助他们这样做的。但这只是在革命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且要做得很谨慎，以免我们的干预会阻碍我们所应当促进的无产阶级分化出来的过程。试问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有什么办法呢？在我们俄国，居民有过和神父周旋的长期经验，所以他们才帮助我们把这些神父赶走。但你们知道，婚姻法至今还执行得很差。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完全服从自己的毛拉的。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分子分开，这种发展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布哈林同志不愿意等待。他忍耐不住：“干吗要等待！既然我们推翻了资产阶级，宣布了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干吗我们还要这样做！”这是带鼓舞性的号召并含有对我们道路的指示，但如果我们在党纲中只宣布这样一点，结果便会不是党纲而是宣言了。我们可以宣布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完全鄙视那些该受万分鄙视的资产阶级，可是在党纲中应当绝对确切地写出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我们的党纲才是无可争辩的党纲。

我们站在严格的阶级观点上。我们写在党纲上的东西，是承认在我们谈论一般民族自决的时代以后所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共和国。当这种共和国出现之后，而且只有按它们出现的程度，我们才能写出象我们写在这里的条文：“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苏维埃类型还不是象在俄国那样存在的苏维埃，但是苏维埃类型正在成为国际的类型。我们只能说到这里。再往前去，哪怕是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就会不正确了，所以在党纲里也就不能这样规定。

我们说：必须考虑到这个民族是处在从中世纪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或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到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道路上的哪一个阶段。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不值得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门人专门提出来。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至少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五，都适合于这种论断，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处在从中世纪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或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到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道路上。这是必由之路。再多说一点便不行，因为再多说，就会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勾去民族自决而写上劳动者自决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没有考虑到各民族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困难，如何曲折。在德国，分化的情形和我国不同。在某些方面快些，而在某些方面则慢些，并且要经过流血的道路。

在我国，把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这种怪思想是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过的。要知道我们还得和这些民族比邻居住。现在谢德曼分子已经在说我们想占领德国。这当然是很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报刊，这些发行千百万份的报刊，向全世界叫喊这一点，而威尔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予以支持。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拥有很大的军队，想用占领的手段在德国培植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优秀人物——斯巴达克派——告诉我们，有人挑拨德国工人反对共产党员说，你们看，布尔什维克那里的情形多么糟！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很好。于是我们的敌人在德国就用这种理由去影响群众，在德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造成和俄国一样的混乱状态。我们的混乱状态是我们的慢性病。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只要德国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工人，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建立自己的制度”这一流言的影响，“劳动者自决”的公式就不会使情况好转。我们应当做到，使德国社会主义叛徒们无法说布尔什维克强迫人家接受他们的万能制度，似乎这种制度可以由红军的刺刀带到柏林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自决原则，人家就会做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党纲不应当说劳动者自决，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党纲应当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既然各个民族还处在从中世纪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或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到无产阶级民主制道路的不同阶段上，那末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曲折。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这会促进劳动者的自决。在芬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开的过程是非常明显、强烈和深刻的。那里的一切绝不会和我国相同。如果我们说不承认什么芬兰民族，而只承认劳动群众，那就是

空洞到极点的废话。不承认实际情况是不行的，因为它会强迫你承认它。在不同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循着不同的道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极端谨慎。尤其是对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要特别谨慎，因为对一个民族不信任是最坏的事情。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在自决。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²⁰⁸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三百三十三人，共产党员二百九十七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历来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1917年的8月或9月。但是第一、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第二、现在的情形是，比我国工人先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波兰工人，大多数都持有社会护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必须等待。这里决不能说劳动群众自决。我们应当宣传这种分化。这点我们已经在做，但毫无疑问，现在不能不承认波兰民族自决。这是很明显的。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和我国一样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可是前进的方式却不相同。在那里，人们恐吓工人说：向来压迫波兰人的大莫斯科主义者、大俄罗斯人，想在共产主义名称的掩盖下，把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移植到波兰来。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移植的。我向一个优秀的波兰共产党员同志说，“你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他回答我说，“不，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不过要比你们做得好些”。对于这种说法，我根本无法反驳。应当让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个谦虚的愿望：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不能不估计到那里所走的道路的一些特殊性，决不能说：“打倒民族自决权！我们只让劳动群众有权自决。”这种自决过程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现在除了俄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自决，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提议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我们拟定的计划，现在我来谈谈我应当说明的以下几点。我把小私有者和中农问题放在第一位。关于这一点，党纲第四十七条说：

“俄国共产党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是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成立实际协议，在确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时向他们让步。”

我觉得，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中农问题多次说过的。这一条文的缺点只是不够具体。在党纲内，我们未必能写得更具体些。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必须提出纲领性的问题，而且对于中农问题要予以极大极大的注意。我们握有的材料表明，某些地方发生的暴动显然是有一个总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显然是和白卫分子决定在3月举行总进攻并组织一连串的暴动的军事计划有联系的。大会主席团拟定了一个就要向你们提出的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²⁹⁷的草案。这些暴动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¹²和一部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曾在布良斯克组织暴动）是白卫分子的直接代理人。白卫分子总进攻，农村暴动，铁路交通断绝，——难道这样还不能把布尔什维克推翻吗？这里，中农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特别重大。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不仅应当特别强调我们对中农让步的态度，而且要想出许多尽量具体的、使中农直接得到一些好处的办法。为了自卫，为了反对我们的一切敌人，这些办法是迫切需要的，这些敌人知道中农动摇于我们和他们之间，因而竭力诱使中农离开我们。就我们的现状看来，我们拥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这些革命会给我们以无产阶级后备力量，会减

轻我们的困难而大大巩固我国目前还很薄弱的无产阶级基地。这可能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但我们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发生。你们知道，现在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因此，中农问题现在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

其次，我想谈谈合作社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纲第四十八条。这一条已经有些陈旧。我们在委员会写这一条时，我国只有合作社而没有消费公社，但几天之后便通过了把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合并为统一的消费公社的法令。我不知道这个法令是否已经公布，到会的大多数人是否已经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法令明后天一定会公布的。这一条在这一方面已经陈旧，但我觉得它仍然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从法令颁布到执行是有一定距离的。从1918年4月起我们就已努力来处理合作社的事情，虽然我们已取得很大成绩，但这还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成绩。在把居民联合在合作社里的事业上，我们有时达到了这样的规模：许多县份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村居民已经联合起来。但这些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已存在的合作社，浸透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而领导它们的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还无法使这些合作社服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法令，在建立消费公社的意义上说，是前进了一步，法令中指出，全国的各种合作社必须合并起来。但是这个法令，即使我们全部执行，也会把工人合作社保留为将来消费公社中的自主部分，因为实际熟悉情况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们证明说，工人合作社这种较为发展的组织应当保留，因为它的活动是需要的。我们党内合作社问题上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合作社里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过摩擦。我觉得，在原则上，这个问题无疑地应当这样来解决：这种机构是资本主义在群众中准

备起来的唯一机构，是在还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农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唯一机构，因此，无论如何要保留它，发展它，而决不能抛弃它。在这里，任务是困难的，因为充当合作社领导者的大半是资产阶级专家，而且往往是真正的白卫分子。由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仇恨，正当的仇恨，由此就产生了反对他们的斗争。当然，这个斗争应该进行得很巧妙，要消灭合作社工作人员中的反革命阴谋，但这不应当成为反对合作社机构的斗争。我们一面要排除这些反革命分子，同时应当使机构本身服从我们。这里的任务同对待资产阶级专家是一样的。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是我想要谈到的另一个问题。

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引起不少的摩擦和分歧。前几天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做报告时，递给我的条子中有几个问题是关于工资的。有人问我：难道在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工资可以高到三千卢布吗？实际上我们在党纲里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方面的不满已经很厉害了。在军队中，在工业中，在合作社中，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来把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时，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而要这样来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把机构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我们在党纲中故意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很详细，以便予以彻底解决。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

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根本不是法律妨碍了这一点，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还促进了这一点。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本届代表大会应当对资产阶级专家问题做出极明确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会使那些无疑是听从这次代表大会意见的同志们有可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信进行工作，并知道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样的决定会帮助那些处处碰到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至少来参加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斯巴达克派的代表同志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告诉我们说，在工业最发达、斯巴达克派在工人中的影响最大的德国西部，虽然斯巴达克派还没有获得胜利，可是许多最大的企业的工程师和经理已经来向斯巴达克派说：“我们跟你们走。”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形。显然是那里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较高，技术人员较无产阶级化，也许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造成了这种与我国有些不同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继续前进中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应当不等待其他国家的援助立刻提高生产力。要做到这点，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是不行的。应当这样肯定不移地说。当然，这些专家大多数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会工作。想用棍子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很好的经验。可以迫使他们不积极地参加反革命，可以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伸手拾白卫分子的宣言。在这一方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很坚决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

也做得很够了。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这一点。但是，要用这种办法来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习惯于文化工作，他们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推进了文化工作，就是说，他们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推进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中的有组织的先进阶层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在群众中帮助推行文化工作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当医生看到无产阶级发动劳动者来进行防疫工作时，他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我们。我国这个由资产阶级的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合作社专家所组成的阶层是很广大的，当他们实际看到无产阶级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这种事业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那时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些了。那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吸收到我们机构中来，成为它的一部分。为了这点，必须做些牺牲。为了这点，哪怕付出二十亿卢布也算不了什么。害怕这种牺牲就是幼稚，就是不懂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运输业的解体，工业和农业的解体，直接威胁到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我们在这里应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经济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亿，却可能丧失甚至用几十亿也不能补偿的东西。

当我们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同志谈论工资问题时，他举出了以下的事实。他说，我们在平衡工资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任何资

产阶级国家没有做过而且在今后几十年中也不能做到的。例如战前的工资：粗工每天一卢布，每月二十五卢布，而专家每月是五百卢布（不算那些拿几十万卢布的人）。专家领的工资比工人多到二十倍。我们现在的工资幅度是从六百卢布到三千卢布，相差只有五倍。在平衡工资方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当然，我们现在给专家的工资是过高的，但为了向他们请教，多给一点不仅值得，而且是应当的，从理论上讲也是必要的。我以为这个问题在党纲上规定得十分详细。必须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仅要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使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回到各地后，向自己组织做报告时，在各人的全部活动中，都能贯彻这一点。

我们已经在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中争取到了巨大的转变。如果说我们昨天谈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化，今天就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在这种变动中，我们执行的完全是既定方针。这种变动贯彻着一条最坚决的路线：消灭反革命，利用资产阶级文化机构。孟什维克是社会主义的比较坏的敌人，因为他们披着无产阶级的外皮，而实际上是非无产阶级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只有极少数的上层分子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个阶层本身是由小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阶层在靠近我们。我们要把整个阶层争取过来。每当他们靠近我们时，我们总是说“请来吧”。每动摇一次，这个阶层都有一部分人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⁷⁸是这样，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所有这些动摇分子也会是这样，他们还会长久地左右摇摆，垂头丧气，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对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通过这一切动摇，我们会得到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参加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队伍，而排除那些继续拥护白卫军的分子。

按照分工我应当说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僚主义和吸

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的问题。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种埋怨无疑是有根据的。我们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那种彻头彻尾都是官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机构（甚至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始终是这样的机构）已被我们彻底摧毁。单就法院来说吧。的确，这里的任务比较容易，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因为根据劳动阶级的革命法律意识来裁判是谁都会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把一切贯彻到底，可是在许多方面已把法院照应有的那样建立起来了。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机关，它们不仅能够吸收男子而且能够吸收妇女、吸收最落后最不活动的分子参加工作。

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种机构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要这种机构。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很大的考验，它迫使官僚们绞尽脑汁，真正做事情，而不象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因此把他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文化人材不够。这些官僚可以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

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我们应当取得后援。就各种征象来看，国内的这种后备力量正在增长。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的确非常巨大。一切征象表明，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后备力量，用以代替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那些劳累过度的人。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于是官僚们占据了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每个人民委员都实行的这类办法，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谈了。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剥夺选举权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西欧纯粹民主主义者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

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在实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摆脱由于群众文化程度不够而碰到的困难。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容许无产阶级专政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这在理论上完全可以想象，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宪法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的模范。我们只是说，谁认为不必镇压资产阶级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镇压资产阶级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并不是必要的。我们不愿意给资产阶级以自由，我们不承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但我们在党纲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这类办法，象工人和农民不平等一样，根本用不着列入宪法中。宪法是在这些办法实现之后才把它们写下来的。苏维埃宪法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拟定的，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就拟定的，其实是反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按照实际生活所拟定的那样来拟定了这个宪法。组织无产阶级比组织农民快得多，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往后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工农平等。在十月革命以前或以后，谁也没有把资产阶级赶出苏维埃。资产阶级自己离开了苏维埃。

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丝毫不会说我们的行动不对，但要完全确切地列举出真正的事实。我们的宪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曾不得不把这

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们的组织弱。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需要这种限制了。在革命后过了十七个月的现在,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在讨论党纲时必须谈到并供大家今后讨论的主要几点。(鼓掌)

载于1919年3月22日《真理报》

按速记记录和《真理报》原文校对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共产党人”出版社1919年莫斯科版)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9—158页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1919年3月23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²⁹³上)

(鼓掌多时)同志们,我应当道歉,我未能参加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农村工作问题组²⁹⁸的一切会议。因此,一开始就参加该组工作的同志们的发言,也就是对我的报告的补充。该组终于拟定了一个提纲,交给了委员会,并且有人要向你们报告提纲的内容。我只想说说这个问题的一般意义,这个问题在该组工作结束后是怎样提到我们面前的,以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现在是怎样提到全党面前的。

同志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这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这是十分自然的。革命总是触动而且不能不触动最深刻的生活基础和最广大的群众,所以在革命时期,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甚至最接近群众的政府,也绝对不能一下子把握住生活的各方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现在我们来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并特别注意中农状况,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发展来看,这没有什么奇怪和反常的地方。当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解决两个敌对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开始。基本任务是使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保证工人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这种根源无疑是阻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障碍。我们都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来不怀疑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能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许多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孟什维克阵营中的人)硬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期间可能有一般民主的统治。百般附和社会革命党人¹²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好象并不是资产阶级看怎样对自己有利才实行或取消民主!既然这样,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一般民主。令人惊讶的,只是这类马克思主义者或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我们的孟什维克)如何迅速地揭穿自己,如何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面目。

马克思一生中攻击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马克思讥笑得最厉害的是关于自由平等的空话,因为这些空话所掩盖的是工人饿死的自由,是出卖劳动力的人和好象是在自由市场上自由平等地购买工人劳动等等的资产者之间的平等。马克思在他的所有经济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点。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专门阐明这一真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领导者,推动者;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中,未必找得到一章不是阐明这个问题的。可以说,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人都曾无数次地向工人赌咒发誓,说他们了解这个真理。但是一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真正为争夺政权而进行决战的时候,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世界老社会党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个真理,纯粹机械地重复一般民主主义的庸俗词句。

在我国,有人为了使这些话表现得似乎更为“有力”,往往说到“民主派的专政”。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从历史上明明知道,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是对起义工人的镇压。从1848年起

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不晚于 1848 年，但个别例子在此以前也可找到。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广泛而自由地开展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最尖锐的斗争。我们在实践中深信这一真理是正确的。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真理，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真理，正因为这样，在一切根本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从 1917 年 10 月起所采取的步骤都是很坚定的。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解决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群众反对资产阶级。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似乎我们就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了。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

自然，在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革命家是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实行无产阶级统治，打败资产阶级来保证这个统治，保证资产阶级不能复辟。我们深深知道，资产阶级至今还占有优势，他们在其他国家内还有自己的财产，有时甚至在国内还握有大量金钱。我们清楚地知道，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放弃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

但这还远不是一切。资产阶级最重视的原则是：“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从金钱的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始终是国际的，他们现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比我们强。资产阶级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资产阶级看到了匈牙利革命这样的例子（昨天我们很荣幸地把匈牙利革命的消息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又得到了证实这一点的消息），它已经开始懂得它的统治在动摇。它已经不能自由行动。但是现在，如果估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财富，就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

在物质方面还比我们强。

正因为这样，在过去，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这是十分自然的、合理的、必需的，而且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我们应当把其他阶层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应当把整个中农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我们在农村工作问题组中得出的共同结论，而且我们相信全党工作人员都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只不过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罢了。

当然，也许会有人不去考虑我国革命的进程，不去思索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任务，反而利用苏维埃政权的每一步骤来讥笑，进行所谓批评，象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那样。这些人至今还不了解，他们应当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对于这些人多次容忍，甚至多次宽大，我们还再一次地让他们能够感受我们的这种宽大，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结束这种容忍和宽大了。如果他们再不作出选择，我们就要十分严肃地向他们提议，叫他们到高尔察克那里去了。（鼓掌）我们并不期望这些人会表现出了不起的智力。（笑声）但是可以期望，这些人亲身尝到高尔察克的残暴滋味以后，定会懂得，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在我们和高尔察克之间作一选择。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有许多幼稚的人抱着愚蠢的想法，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现象，那末现在，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应当懂得，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所造成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

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谁读了一切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著

作而不懂得这点，那他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丝毫也不懂得社会主义，而只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罢了。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他们一个短短期限去考虑，要求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所以提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现在说，将来也会说：“布尔什维克提出中农问题，是想讨好中农。”我深深知道，这类论据以及更坏的论据在孟什维克报刊上有广大的地盘。我们唾弃这些论据，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认为敌人的胡说什么意义。这些一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跑来跑去的人可以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们走着自己的道路。

决定我们道路的首先是对阶级力量的估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日益发展。只要这个斗争没有结束，我们就要集中力量，把它进行到底。这个斗争现在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斗争中，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我们的农村建设已经超出一切为了夺取政权这一基本要求的范围。

这一建设经过了两个主要阶段。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我已经说过，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1918年夏天才开始的。假使我们不掀起这个革命，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不完全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城市中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管理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在农村中划出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成分，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资产阶级；这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主要的，不承认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这个阶段基本上也已结束。我们最初为此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即贫农委员会，已经非常巩固，我们已有可能用

正式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替它们，就是说，改组农村苏维埃，使它成为阶级统治的机关，成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大家当然都知道，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的法令，这些措施是根据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对过去阶段所做的总结。

主要的事情，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我们已经做到了。正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更复杂的任务，即对中农的态度，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谁以为提出这个任务，就好象我们政权的性质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了，就好象我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即使是认为部分的改变，稍微的改变），谁这样想，谁就是完全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我相信，在我们党内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只是想警告同志们，在工人政党之外是会有这种人的，他们是会这样说的，他们这样说，并不是从某种世界观出发，而只是为了破坏我们的事业，帮助白卫分子，简单地说，就是唆使中农反对我们，因为中农一直是动摇的，他们不能不动摇，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是动摇的。为了唆使中农反对我们，他们会说：“看，他们讨好你们了！可见他们重视你们的暴动了，他们动摇了”，等等，等等。必须使我们所有的同志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反对这种煽动。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同志是会武装起来的。

十分明显，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而迫切的任务。怎样确定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呢？同志们，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困难，大多数工人已经领会了这种理论。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例如考茨基曾写了一本论土地问题的书，那时他还正确地叙述马克思学说，并被公认为土地问题的权威，他在这本书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说：社会主义政党的

任务是中立农民，就是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使农民不去积极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我们。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时期内，农民总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注意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它的政治统治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指望中农立刻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但如果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经过一个时期，这种动摇就会停止，农民就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同马克思一道奠定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党时时刻刻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奉为指南的学说）基础的恩格斯就已经把农民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这种分类直到现在还适合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恩格斯说：“甚至对于大农，也许不是到处都要用暴力镇压。”至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用暴力对待中农（小农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的。恩格斯在1894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在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就是这样说的²⁹⁹。这个观点所表明的真理有时被人们遗忘了，但在理论上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是完全剥夺。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农，我们也不能象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农。在我们党纲中是做了这种区分的。我们说：镇压富农的反抗，镇压富农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和对待中农的基本区别，就是完全剥夺资产阶级，同不剥削别人的中农结成联盟；这个基本路线在理论上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遵守这条路线，在地方上，人们还没有学会遵守这条路线。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从各方面着手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中农问题就提到第一位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建设共

产主义在大农国和在小农国是不同的。这是最初步最起码的常识。从这个常识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我们就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农身上。

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对中农的态度。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但我们深深体验到，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我们已经接近到法国大革命时出现的这种区别，那时法国国民议会宣布了许多规模巨大的措施，但它没有实行这些措施的应有的支柱，甚至不知道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时应该依靠哪一个阶级。

我们处于无比幸运的环境。由于整整一世纪的发展，我们知道依靠什么阶级。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阶级的实际经验还非常不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来说，基本任务是很清楚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把政权交给工人。但是怎样做呢？大家都记得我们克服了哪些困难，犯了多少错误，才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到工人管理工业。而这还是我们的阶级即我们经常接触的无产阶级内部的工作。现在我们要确定我们对新阶级即城市工人所不熟悉的阶级的态度。必须确定对那个没有一定的稳固立场的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反对社会主义，——要确定这两个阶级间的关系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农这样一个阶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他们是不剥削其他劳动者的。他们在数十年内受尽千辛万苦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因此，我们对待这个动摇的阶级是有很大困难的。根据我们一年多的经验，根据我们半年多在农村中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根据农村中已经发生的阶级分化，在这里我们首先不要性急，不要搬教

条，不要把我们正在制定和还没有制定出来的东西当做完善的东西。下面发言的人会向你们宣读农村工作问题组选出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决议，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这一点已提出应有的警告。

从经济上看，显然我们需要帮助中农。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经验少，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不高，由于我们可以派到农村去的文化和技术力量不够，由于我们处理农村问题往往软弱无力，于是我们的同志往往使用强迫手段，把整个事情搞坏。就在昨天，有一个同志交给我一本俄共（布尔什维克）下新城委员会印行的《下新城省党的工作手册》，在这本小册子里，例如在第四十一页上，我看见有这样一句话：“关于特别税的法令是要把全部负担放在富农、投机商和一般中农身上。”³⁰⁰这真可以算“了解”这个法令了！也许是印错了，但这种错误是不容许的！也许是工作匆忙，但在这种事情上任何匆忙都会造成很大的危险。也许是根本不了解，这是最坏的推测，我不想这样来推测下新城的同志。很可能，这不过是一种疏忽罢了。

有一位同志在委员会内谈到实践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次，许多农民围住他，每个人都问：“请你确定一下，我是不是中农？我有两匹马和一头奶牛。我有两头奶牛和一匹马”等等。你们看，这个派到县里去的鼓动员必须有一只准确的温度计，把它放到农民身上测量一下，然后告诉他是不是中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这个农民的全部经营史以及他同上层和下层农民的关系，而我们要确切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

这里需要很多实际本事，需要熟悉地方情形。这种本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难过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来不是空想家，我们从来没有想用纯洁的共产主义

社会中产生和培养出来的纯洁的共产主义者的纯洁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童话。我们要用资本主义的破砖碎瓦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且只有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受过锻炼的那个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很清楚地知道，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反对本身的缺点。无产阶级优秀的先进的部分，既然几十年内在城市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也就在这个斗争中学到了城市和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这种文化。你们知道，甚至在先进国家中，农村总是愚昧无知的。当然，我们会把农村的文化提高，但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同志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而地方上来的人的每一句话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机关人员（这些人的话我们听得很多了），他们是实际观察过农村工作的人。正是他们的话，对我们农村工作问题组特别宝贵。我相信，他们的话现在对整个党代表大会也是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些话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法令中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去把我们对中农的态度弄得尽量明确些。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明确性在生活中是没有的。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要想立刻一下解决是办不到的。有人说“用不着写这样多的法令”，并责备苏维埃政府，说它只会写法令，而不知道怎样实行这些法令。实际上这些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怎样跑到白卫分子方面去了。假使我们以为写上几百个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会是十足的傻瓜。但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上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是宣传一般真理，现在我们是用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

是用行动做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的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去做实际事情。法令，这是号召人们去做大量实际事情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使这些法令有许多不合适的东西，有许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可是这些法令中有实际工作材料，而法令的作用在于使跟着苏维埃政权走的千百万人去执行实际步骤。这是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行动的尝试。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从法律、法令和决议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无论如何都要立刻一下实现的绝对的决议。

必须避免会在实际上助长某些违法乱纪现象的一切事情。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思想，极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实际上这有时使农民们说：“苏维埃政权万岁，但要打倒康姆尼！”（即共产主义）。这样的事不是捏造，而是来自实际生活，来自各地同志的报告。我们不应当忘记：任何放肆，任何鲁莽急躁，都会造成莫大的害处。

以前我们不管怎样都要拚命跳跃，赶紧摆脱使我们遭到破产的帝国主义战争，需要拚命努力把资产阶级和要打倒我们的力量打垮。这一切是必需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农，那就是愚蠢，迟钝，毁灭我们的事业，只有别有用心分子才会这样做。现在的任务完全不同。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象从前那样粉碎明显的剥削者的反抗，战胜他们，推翻他

们。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主要任务，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更复杂的任务。在这里暴力毫无用处。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

在夺取政权时，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那时全体农民的共同任务就是同地主作斗争。但是直到现在，农民对大农庄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庄，那我又要当雇农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对大农庄的这种看法，是同他们的仇恨、同他们对地主怎样压迫人民的回忆分不开的。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这里没有上层可以拆去，而留下整个基础和整个结构。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上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当然，如果农村里出现了鲁莽的人，那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从城里跑到农村去，去了以后，吹上一通，闹几次知识分子的有时是非知识分子的意气，然后吵翻了，一走了事。这是常有的情形。这班人不会受人尊敬，只会引起讥笑，而且讥笑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指出，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农民的学生，而

不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一些人对农业及其特点一窍不通，他们跑到农村中去，只是因为听说公共农庄好，只是因为厌倦城市生活而想到农村工作，并且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经济方面对中农采用暴力。

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过渡到最好的制度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规则。（全场鼓掌）这就是我们在决议草案中所力图说明的规则，因为在这一方面，同志们，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过去我们没有经验。同剥削者作斗争本身也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如果有人因此责难我们，那我们就说：“资本家先生们，这是你们自己的罪过。假使你们不这样野蛮地、这样狂妄地、这样无耻地拚命反抗，假使你们没有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那末，革命也就会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现在，打退了各方面的疯狂进攻之后，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小组，而是领导千百万人的政党。千百万人不能一下子懂得方针的改变，因此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这是不奇怪的。不过必须懂得，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这种历史条件业已消失，对待这个阶级的新条件和新任务要求有新的心理。

我们的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感到后悔。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在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些法令是正确的，它们指出道路，号召人们采取实际措施。我们说“鼓励联合”，我们是发出指令，这些指令应当经过多次试验，以便找到实行这些指令的最终形式。既然说必须自愿，也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实际地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这样做是

很对的。要是他们一听到法令和传单的内容就相信，那倒不好了。假使这样可以改造经济生活，所有这种改造是一钱不值的。首先要证明联合起来好些，要使人们真正联合起来而不散伙，——要证明这样做有好处。农民是这样提问题，我们的法令也是这样提问题。如果我们以前不善于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

我们暂且只是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即战胜了资产阶级。这个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极其困难的半年方才开始，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正在作最后的努力来压倒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们自己已经懂得，这半年过去后，他们的**事情就会绝对无望**。或者他们现在乘我们疲惫不堪来打败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将不止在我国一国获得胜利。在这半年中，粮食危机和运输危机已经加剧，而帝国主义列强又想把几条战线上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最后的艰苦的半年**。必须继续竭尽全力，去与进攻我国的外部敌人作斗争。

但是，说到农村工作的任务时，尽管有各种困难，尽管我们的全部经验是在于直接镇压剥削者，我们应当记住而不要忘记，在农村中对待中农完全是另一种任务。

所有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莫斯科的到过农村的觉悟工人都向我们举出许多例子，说明许多看来是无法解决的误会，许多看来是非常重大的冲突，一当头脑清楚的工人出来说话，就消除或减弱了。这些工人虽然不懂得农村生活，但他们不是照着书本说话，而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说话，不是象指挥官那样发号施令，而是象同志那样说明实际情况，激发农民的那种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感情。这种用同志态度解释问题所达到的结果，是俨然以指挥官或上司自居的成百上千的人所不能达到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你们注意的整个决议的精神。

在这个简短的报告中，我是想说明这个决议的原则方面，这个决议的总的政治意义。我是想证明（我想我已经证明了）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来看，我们的路线没有任何变动，没有任何改变。白卫分子及其帮凶现在和将来都会叫喊我们的路线有了改变。让他们叫喊吧。这影响不了我们。我们要最彻底地发展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转到安排中农生活的任务上去。我们应当同中农和平相处。只有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十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梦想），那末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给予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

农民需要城市工业，没有城市工业，农民是不能生活的，而城市工业是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农民就会感谢我们从城市里供给他们工业品、农具和文化。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不是剥削者，不是地主，而是与他们一样的劳动同志，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些同志，但他们是从实际上重视，只重视这些同志的实际帮助，却拒绝（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命令和自上而下的“训令”。

首先要帮助，然后才会取得信任。如果把这件事情正确地进行下去，如果在县里，乡里，在征粮队里，在任何组织里，我们的每个步骤都很正确，如果根据这个观点来把我们的每个步骤都仔细地加以检查，那我们一定会取得农民的信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应当给农民以帮助，给他们以忠告。这不是

指挥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这样做下去，农民是会完全拥护我们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决议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将决定我们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那我们定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伟大任务。

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是我们学会了的，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与千百万中农搞好关系，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说出。但是我们已经了解这个任务，我们已经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有把握、有决心地说：这个任务我们定会完成，那时社会主义就将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了。（鼓掌多时）

载于1919年4月1日《真理报》

按列宁修改过的速记记录
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170—186页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封锁俄国，把苏维埃共和国看做传染病的策源地，竭力使它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这些夸耀本国制度的“民主性”的人，这样盲目地仇恨苏维埃共和国，竟没有觉察到他们怎样把自己变成了可笑的人物。只要想一想，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拥有全副武装，在军事方面独霸全球，却象害怕烈火那样，害怕从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饥饿的、落后的、据他们说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散播出来的思想传染病！

单是这个矛盾就打开了各国劳动群众的眼睛，帮助我们揭露了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等帝国主义者及其政府的虚伪。

但对我们的帮助不仅在于资本家因仇恨苏维埃而盲目无知，并且在于他们互相争吵，互相掣肘。他们彼此商定了一种进行默然抵制的真正阴谋，他们极端害怕传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真实消息，特别是害怕传播它的正式文件。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机关报《时报》(《Le Temps》)³⁰¹却刊载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消息。

为了这点，我们应向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机关报，法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位领袖表示极崇高的谢意。我们很想给《时报》写一封公函，感谢它这样成功、这样巧妙地帮助了我们。

从《时报》如何根据我们的无线电讯来编成自己的消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个给富人服务的机关报的动机。它想向威尔

逆放出一枝暗箭，刺他一下：看，你是在同什么样的人谈判！这些遵照富人的意旨来舞文弄墨的聪明角色没有觉察到：他们拿布尔什维克来恐吓威尔逊，在劳动群众看来，就是替布尔什维克作广告宣传。再说一遍，我们应向法国百万富翁们的机关报表示极崇高的谢意！

第三国际是在下述国际环境中成立起来的：不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或德国的谢德曼之流、奥地利的伦纳之流这类资本主义的奴才颁布何种禁令，玩弄何种卑鄙手腕，都不能阻碍全世界工人阶级听到关于这个国际的消息并同情这个国际。这种环境是由各处猛烈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这种环境是由劳动群众中间的苏维埃运动造成的，苏维埃运动已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运动了。

第一国际(1864—1872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

第三国际实际上是在1918年创立的，那时，由于多年来特别是战争期间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作了斗争，许多国家都已成立了共产党。在形式上，第三国际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²⁸⁴上成立的。这个国际的特点和任务就是执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遗训，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理想；这个特点马上表现了出来，因为新国际即第三“国际工人协会”²⁸⁵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已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结合起来了。

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

第二国际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压迫的运动的政党的国际联合，现在有了空前巩固的基础：有了几个苏维埃共和国，它们在国际范围内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天才的预见、这个天才的理论已开始成为现实。

这种拉丁词现已译成现代欧洲各国语言，而且译成了世界的各种语言。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人类已在摆脱最后一种奴隶制：资本主义奴隶制或雇佣奴隶制。

人类正在摆脱这种奴隶制，第一次走向真正的自由。

为什么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竟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呢？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使西欧人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除了大多数社会主义领袖受到机会主义习惯和庸人偏见的束缚以外）。

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本能地领会到了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但是为机会主义所腐蚀的“领袖们”还继续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做一般“民主”。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落后和它越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这是否值得惊讶呢？假使历史让我们不通过许多矛盾而实现新式民主，那才会是令人惊讶的。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对现代一般科学有认识的人，如果有人向他提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匀称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匀称。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是不平衡的。

当法国实现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促使全欧洲走向新生活的时候，资本主义比法国发达得多的英国竟成了反革命同盟的首领。而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却英明地预示了未来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东西。

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¹⁸⁷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手段把无产阶级队伍各个击破了。

英国，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起造成了极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标准国家³⁰²。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看，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竟落后了几十年。法国工人阶级一次在1848年，一次在1871年举行了具有非常特殊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反资产阶级的英勇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好象是用尽了。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转到了在经济上比英法都落后的德国。而

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德国在经济上赶过了英法两国的时候，领导世界的模范政党即德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已是一小群十足的恶棍和卖身投靠资本家的最卑鄙的混蛋，是从谢德曼和诺斯克到大卫和列金等等工人出身的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

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

当卡尔·考茨基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因为主张与谢德曼统一、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反对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而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时候，他曾在二十世纪初写了《斯拉夫人和革命》这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了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可能转入斯拉夫人手中的历史条件。

果然如此。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象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制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二十世纪的欧洲说）使得群众的革命攻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十月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马克思在1856年论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³⁰⁹。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第三、无论就工农群

众的先锋队认识西欧社会主义的“新成就”来说，或就群众的革命行动来说，1905年革命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第五、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第六、罢工斗争的长期锻炼和欧洲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使苏维埃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形式易于在深刻而迅速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下产生出来。

以上所述当然是不完备的。但暂时以此为限。

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已在俄国产生。与巴黎公社比起来，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已经是一个不会灭亡的新类型的国家。它现在已经不是孤立的了。

要继续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要把这种工作进行到底，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文化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比重和影响较大的国家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只要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有一切可能赶上俄国。

破产的第二国际正在死去，活活腐烂。它实际上是替国际资产阶级当奴仆。这是真正的黄色国际。它的最大的思想领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颂扬资产阶级民主，把它称为一般“民主”，甚至最愚蠢最粗鲁地称为“纯粹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过时，正如第二国际（当必须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训练工人群众的时候，它曾做过历史上必要的有益的工作）已经过时一样。

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只要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存在，它就不能实现这种政权。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自由来准备力量，以推翻资本和消灭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照例是不能实际享受民主的。

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劳动者、工人和小农。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象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大多数人民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大多数人民的政权。

这个政权压制剥削者及其帮手的“自由”，剥夺他们实行剥削的“自由”、发饥荒财的“自由”、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勾结外国资产阶级来反对本国工农的“自由”。

让考茨基之流去维护这种自由吧。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社会主义的叛徒才做得出来的。

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如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产，最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完全不能了解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完全不能了解它同巴黎公社的关系，完全不能了解它的历史地位及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必然性。

“独立的”（请读作市侩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由报》（«Die Freiheit»）²⁸⁷在1919年2月11日第七十四号上，登载了《告德国革命无产阶级》这篇宣言。

这篇宣言是由党中央和“国民会议”即德国“立宪会议”的党团全体签字发表的。

这篇宣言斥责谢德曼之流力图取消苏维埃，而提议（不要开玩笑吧！）把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结合起来，给予苏维埃一定的国家权利，让它在宪法中占一定的地位。

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联合起来！这是多么简单！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庸人思想！

可惜的是，在俄国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这种思想已经由联合起来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¹²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试验过了。

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严重的阶级冲突发生时，都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一窍不通。

但是要把2月11日发表的这篇极美妙、极滑稽的宣言内所充满的经济政治谬论尽行揭露，就非把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人把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和平结合起来的了不起的庸人思想专门分析一下不可。这一点只好留待另文^①去做。

1919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1919年5月发表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273—280页

^①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5—363页。——编者注

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 代表大会的贺词

(1919年5月6日)

同志们，我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向社会教育代表大会祝贺。当然，你们并不期望我的讲话，会象了解情况和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前一位发言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讲的那样，深入问题的实质。请允许我只讲几句祝贺的话，并谈谈我在人民委员会多少接触到你们直接从事的工作时所稍微观察到和思考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未必找得到一个苏维埃工作部门，能够象社会教育那样，在一年半中就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在这个部门进行工作要比在其他部门容易些。在这里，我们已经排除了种种旧障碍。在这里，比较容易碰到的是，工农群众特别迫切地要求获得知识、自由教育和自由发展，因为如果说依靠群众强大的压力，我们已经容易地清除了摆在他们道路上的外部障碍，摧毁了把我们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并使俄国遭到这次战争造成的最大困苦的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制度，如果说我们容易地摧毁了外部障碍，那末我们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在这里，完全要用另外的方法进行斗争。在这里，只有靠长期的有成效的工作和先进阶层的持久不绝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可是我们常常没有尽到我们的力量。我觉得，在

这些初步措施中，在推广社会教育即自由的、不受旧的范围和俗套限制的、为成年人所欢迎的教育的事业中，我们首先必须同两种障碍作斗争。这两种障碍是我们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那里继承来的，这个社会直到现在还用千万条绳索和链条束缚着我们，把我们拖向后退。

第一个缺点，这就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多，他们往往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做自己在哲学方面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³⁰⁴。（鼓掌）不过在初期这是很自然的，是情有可原的，也不能归罪于广泛的运动；但我希望，我们终于会而且一定会摆脱这种状况。

第二个缺点，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遗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追求知识、摧毁旧东西的时候，不能带来任何起组织作用和有组织的东西。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动员识字者和成立图书部的问题时，我曾作了一些观察，根据这些粗浅的观察我得出结论说，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好的。当然，在贺词中照例是不大讲坏事情的。我希望你们摆脱这种俗套，如果我向你们谈到我所看到的某些不好的现象，请你们不要埋怨我。当我们提出动员识字者的问题时，最引人注意的是，我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它没有立刻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它让现有的力量有发展的自由，而这些现有的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它们的口号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口号，除了有利于高尔察克和旧资产阶级复辟以外，不会有任何好处。看看我们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做的工作吧，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很少，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总任务，就是要懂得必须把无产阶级分子组织起来。问题不在于停

留在纸上的可笑的词藻，而在于现在必须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办法，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会几个不识字的人。我们的法令已对这点做了明文规定³⁰⁵。然而在这方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当我在人民委员会接触到另一个问题即图书问题时，我曾说，人们经常埋怨我们的生产落后，书籍太少，不能出版足够数量的书籍，这都是事实。我现在还说，这都是事实。的确，我们没有燃料，工厂停工，纸张很少，因而我们不能得到书籍。这都是真的，但我们未能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书籍，这也是事实。我们在这方面仍然苦于农民的幼稚和无知；农民夺取了贵族老爷的图书，跑回家中，惟恐有人把图书夺走，因为他还不能意识到，可以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家的东西不是一种令人可恨的东西，它是工人和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这不能怪不开展的农民群众，并且从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完全合理的，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农民只会把图书带回家去，秘密地藏起来，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因为他不懂得俄国的图书可以集合在一起，不了解我们将有足够的书籍来满足识字者的求知欲并使不识字的人识字。现在必须同残余的破坏现象、混乱状态、可笑的本位主义的争吵作斗争。这应当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者来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进行起来。我们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应当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建立许多平行的组织。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革命不解决这项任务，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谬现象，那末这个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至于资产阶级，则只

满足于摧毁旧东西，给农民经济以自由，而农民经济，如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一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

既然我们叫做共产党，我们就应当懂得，只有现在，当我们清除了外部障碍、摧毁了旧制度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才第一次真正地和彻底地提出了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年半的实验之后，我们应当终于走上正确的道路，来战胜那些一直使我们受苦的不文明、愚昧和粗野的现象。（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
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
演说》小册子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299—302页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1919年5月19日在全俄社会教育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大概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谈谈目前形势，但是，请允许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回来回答几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说明着苏维埃革命整个阶段的特点，这些问题最能引起争论，最能引起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们的攻击，最能引起以民主主义者自居并特别喜欢到处责备我们违背民主的人们的怀疑。我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在目前一切宣传和鼓动中，在一切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著作中，几乎经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当然，这种著作同资产阶级一切机关刊物的一味撒谎、诬蔑和谩骂比起来，要稍微高明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稍微高明一点的著作拿来看看，那我认为，关于民主同专政的关系、革命阶级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就是当前一切政治辩论中的最主要的内容。也许你们觉得，说明这些问题有些离开当前的急务，但是我认为，说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总的主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我根本不能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我只从中选几个问题，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

我所指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的过渡的困难的问题。一些以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自居的人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我认为《永远前进报》³⁰⁶和《人民事业报》⁸³那帮著作家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这两家报纸被封闭，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有利于革命的，这两家报纸的代表在攻击中经常采取理论性的批评，它们被我们政权认为是反革命的刊物，它们对我们进行攻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个阵营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那你们就会看到，在许多责难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者们，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但是，他们既没有给你们面包，也没有给你们和平与自由，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违背了民主。”关于违背民主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谈到。我现在来谈这种责难的另一面：“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给的却是连续不断的战争，是特别残酷特别激烈的斗争，是协约国即所有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中一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反对受苦受难的、落后的和疲惫的俄国的战争。”我再说一遍，这些责难，你们会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报纸上看到，你们会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谈话中听到，你们会不断地在每一次庸俗的演说中听到。我请你们考虑的也正是这类责难。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海，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斗争和战争。我们

这样做，是为了把俄国把全人类从帝国主义的宰割下拯救出来，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而举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至于想摆脱这种帝国主义宰割、想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行动引起了所有文明国家对俄国的进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的，尽管它们硬说它们不进行武装干涉。尽管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利孟梭之流硬要人们相信这一点，尽管他们硬说他们不进行武装干涉，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知道，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协约国军舰正封锁着黑海沿岸一带，甚至还向有他们的志愿队进行活动的克里木半岛刻赤一带进行轰击。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给你们。假使志愿队对付不了你们，我们还是不能把克里木半岛上这块地方交出来，不然你们就会控制亚速海，切断我们同邓尼金联系的道路，使我们没有可能支援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开攻势，昨天我们的一艘鱼雷艇就同敌人的四艘鱼雷艇打了一仗。这就是武装干涉，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在这里参加战斗的不是英国的舰队吗？难道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西伯利亚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吗？事实就是这样：整个文明世界现时都在反对俄国。

试问，我们号召劳动者进行革命，答应给他们和平，却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向软弱落后和筋疲力尽的俄国进军，这是我们自相矛盾呢，还是那些无耻地责难我们的人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起码概念相矛盾？问题正在这里。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我们谈的是关于革命阶级、关于人民的革命政策的问题，我请你们拿一位革命家来看看。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

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毫无结果。”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幼稚，也许闭塞无知，不能根据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要不然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做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们，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末，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做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我现在请你们由个别革命家进而看看整个人民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放下刺刀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演讲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句话来说。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放下刺刀就能结束的；倘若有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那就应该可怜这些神经失常的人，跟他们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个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1915年就是这样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是艰苦的流血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

命，它就必然引起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我们处于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情况下，假如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乡下佬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的农民懂得战争和战争不同，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一点革命史。对于愚昧的农民，我们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居而常常登台演讲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称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¹²、道地的社会主义者或是伯尔尼国际²⁸⁶的拥护者，——各种称号多得很多，称号是不值钱的，——如果他责备我们说：“你们许诺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该怎么回答他呢？能不能设想，他象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竟愚昧到连这两种战争都不能区别呢？能不能设想，他连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的战争之间的差别都不了解呢？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现在已被彻底揭穿，在凡尔赛和约³⁰⁷缔结之后，只有根本不善于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出它是双方进行的掠夺性的战争。我们的战争则具有世界规模，因为世界资产阶级懂得，目前进行的坚决的战斗正是反对他们的。能不能设想，还会有一个有知识的人不了解掠夺性的战争和我们的战争之间的差别呢？我们根本不能这样设想。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做什么样的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面前责备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许诺和平，实际上却拖长国内战争，拖

长这个艰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象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惊讶地说：“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们，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们，遗憾得很，你们不想言行一致，也不想知道可以得出一定结论的普通政治常识。你们硬说你们反对高尔察克。我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来说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论、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绪来说吧。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的差别。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进行这种冒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也许是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性、剥削性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十分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坏透了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这些责难的确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愚昧无知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不管进行战争是为的什么，他们都同样受苦。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

维克打仗”，这不会使我感到惊奇。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它带来无限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

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被压迫阶级所进行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在战争中体现着什么样的政策。

二

对我们现时所经历的、必然与革命相联系的这个艰难困苦时期作了估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有斯维亚齐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也在《消息报》⁷⁶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自认为决不能责备他们是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离开了高尔察克，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

看这些先生们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察克叛乱的关系，我看了看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有人等待我们悔悟，有人认为我们将要悔悟。对不起，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国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末，布列斯特和约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国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国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都一样，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想起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我们彼此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我们彼此都一样。”他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基本根源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个别的革命家而是拿个别的庸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你于是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其目的是与他们同伙，来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请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运吧”，（笑声）协议达成了。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其目的在使他们能够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的有知识的人呢？如果真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你们一定会说，这大概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抢劫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抢劫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有知识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一千人中至少有九百九十九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来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诚心讲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从推翻德国资产阶级开始，那当然是可笑的！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条约，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夺性和

强盗性的条约，斥责了它，甚至拒绝立即签订这个和约，指望得到德国工人的帮助。当暴徒把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时，我们说：请把武器和金钱拿去，我们以后再用别的方法同你们算账。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德国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能不能把我们同帝国主义达成的这个协议和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这些称号真是愈来愈响亮）同协约国达成的关于反对本国工人的协议相提并论呢？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这样摆着，现在也是这样摆着的。要知道，现在还侨居欧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响的著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同协约国订有协议。这种协议是不是签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没有签字，聪明人干这些事是会不声不响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们撵出来，发给他们护照，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消息，说今天发表演说的是阿克雪里罗得，明天是萨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齐也夫，后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那就很清楚，这种协议是有的。虽然这是默契，难道这就不是协议吗？难道这种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也和我们的一样吗？表面上是一样的，正如一个人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从表面上看，是和任何类似行为一样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就是说，不管我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是为什么，是我受匪徒袭击，不把手枪交给他们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枪和金钱交给他们以求解脱呢，或者是我明明知道这些匪徒在行劫而想同他们分赃呢。

“当然，我要把这说成是使俄国摆脱暴徒的专政，不用说，我是个民主主义者，因为我拥护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民主制，不用说，我在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不该怀疑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为匪徒们，为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者效劳，那我也是为了民主、立宪会议和人民政权的利益呀，是为

了使各个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为了打倒暴徒、篡夺者、布尔什维克呀！”

当然，目的是极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是不是听说过，判断政策不是根据声明，而是根据实在的阶级内容呢？你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如果你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那你是不是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呢？

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曾顺便指出，当革命的美国人民在十八世纪争取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当他们进行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的革命战争时，争取解放的伟大的美国革命人民曾同当时就在美洲、在美国人民的邻近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美国人民同这些强盗结成联盟，击败了英国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是否有过这样的有知识的人，你们是否见过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的代表（或者叫什么别的名称）直到孟什维克，他们竟敢公开责备美国人民，说他们违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则呢？这样的怪人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他们给自己安上了这些称号，甚至认为他们应该和我们同在一个国际之内，假使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共产国际，不愿参加好的、老的、共同的、统一的伯尔尼国际，那就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在捣乱，问题很清楚，布尔什维克是一些捣乱分子！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你们同威廉达成协议，我们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我们彼此都一样！”

我可以断言：假使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那他们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否认，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厌恶高尔察克叛乱，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不管他们已转到

我们这方面来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不能设想他们不懂得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在全部革命史上常有的被剥削阶级在同剥削者作斗争中被迫达成的协议，一种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主主义者、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来反对他们所说的本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除了象觉悟的革命者对付高尔察克分子那样外，不容许对他们采取任何别的态度。

三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一般对待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那些反对我们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常常用民主来替他们所持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和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就是在欧洲书刊上代表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庸人们也在自己的议论中半自觉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多数人的决定；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就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我们把你们叫做篡夺者和暴徒吧！”

我们对此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党的纲领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拿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的口号来欺骗自己，我们要象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主义者、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主义者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³⁰⁸，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象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外部结构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

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清楚地知道，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帜来反对我们。所以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过的、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近几天，我们很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天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广播。近几天，我有机会收听到法国强盗政府的广播：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照旧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他们把什么叫做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竟把集会自由叫做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你们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

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个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打倒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象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做“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翻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在毕竟没有把冬季消灭、没有把天气改造过来的文明国家里，举行集会是需要集会场所的，而高楼大厦却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高楼大厦，然后再谈自由。

我们说，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649年在英国、1792—1793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做大革命，是因为它不象1848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

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有利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庭，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再去想做一个社会成员而不做一个工作者（这还不会很快实现，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的到来）的时候，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种自由。

我们在进行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用这些童话来自慰慰人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集会自由，——什么能高于这个字眼好于这个字眼呢！没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发展及其觉悟的提高能以想象吗？没有集会自由，人道的基础能以想象吗？我们说，英国和北美合众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它束缚着劳动群众，使他们不能

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将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一开始就很不寻常很“怪诞的”政权。在那些考虑过阶级斗争和稍微具体而明确地想到起义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人看来，只能是这样。资产阶级已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但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被推翻，正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推翻，它现在才以更为狂怒的姿态投入战斗。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事情就告终结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因为资产阶级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蔼可亲地嘲笑过我们；米留可夫嘲笑过，切尔诺夫嘲笑过，新生活派⁷⁸也嘲笑过。他们嘲笑说：“好吧，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请你们组阁吧，你们亲自掌握一两个星期政权看看，——你们会帮我们一个大忙的！”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这样写过，米留可夫在《言论报》⁶³上这样写过，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也这样写过。他们所以嘲笑，是因为他们认为事情并不严重。现在他们看到事情严重了，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自己的护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资产者先生们现在也看到并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所以他们大家都在武装起来。假使你们能够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就可以看出，那里的每个资产者都在武装起来，建立白卫军，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已经发展到他们能不能保持特权来使千百万人处于雇佣奴隶的地位了。现在斗争具有世界规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站在有产阶级一边，欺骗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现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

当劳动者受资本奴役、为资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

候，集会自由是什么呢？这是骗人的东西。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战胜剥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级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把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决定给予这个阶级。

四

谈了自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剥削阶级一个一个地打倒下去。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做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没有特别谈到它，而且不能无止境地重复它，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现代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谎言，是欺骗，因为在那里没有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所有制妨碍着人们享受这种平等。可以立刻废除富人的房屋所有制，可以比较快地剥夺资本和生产工具，但是货币所有制却要保留下来。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

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但是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而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所以我们不能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货币暂时还要保留下来，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³⁰⁹。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而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

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谈不上平等，就不能不加以防备，以免帮助了资产阶级。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食品的私有者和占有者。

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敌人中间引起了最多的责难，在没有经验和缺乏思考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最多的怀疑，同时也最容易把我们同那些想以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分开，他们埋怨我们，说我们不把他们看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把他们叫做资本家的拥护者。也许由于愚昧无知，但他们确实是资本家的拥护者。

就农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

这是事实。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货币和交换，就需要无产阶级多年的稳固统治，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平等的破坏者，你们不仅破坏了同剥削者的平等，——这一点我是要同意的，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说这种话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破坏了‘劳动民主’的平等，你们是罪犯！”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并且肯定地说，你们主张这种平等，你们就是高尔察克的拥护者。”不久以前我在《真理报》¹⁷上看到格尔曼诺夫同志写的一篇漂亮的文章，其中引证了最“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派孟什维克之一舍尔公民的提纲。这个提纲是在我们的一个合作社机关中提出的。这样的提纲真可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员

会里，并在末尾署上：“此即高尔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舍尔公民及其同伙会因此把我叫做诽谤者；或者说得更坏些。可是，我要请那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入门和政治常识的人仔细地分析一下谁是谁非。舍尔公民说：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一般经济政策根本行不通，先要逐渐地然后广泛地实行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

我认为，这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我肯定地说，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读过《资本论》第一章的人，或者只是读过考茨基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人，都一定会认为：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时候，当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闹饥荒的时候，粮食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这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因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

只是谴责高尔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女教师，那是十分愚蠢的。这是庸俗地维护民主，这是蠢笨地责备高尔察克。高尔察克现在正用一切方法进行活动。但是，他在经济上靠什么来支持呢？他靠贸易自由来支持，他为贸易自由而斗争，因此所有的资本家都拥护他。你们说：“我已经离开了高尔察克，我不是高尔察克分子。”这当然使你很光彩，但这并不能证明你有一个能够判断事物的头脑。我们这样回答这些人，丝毫也没有伤害那些认清高尔察克是一个暴徒而离开了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面子。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同高尔察克进行殊死决斗的国家里，继续为“劳动民主的平等”而斗争，为粮食贸易自由而斗争，那也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过他不懂道理，不能自圆其说。

高尔察克(无论他叫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都一样,服装不同,实质则一)是靠占领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区之后,在那里准许粮食贸易自由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来维持的。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名称多得很)这班先生们的这种“自由”和“平等”,那末,在我们这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目前在乌克兰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匪帮,每个匪帮都有一个称号,一个比一个自由,一个比一个民主。

把工农平等奉献给我们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象舍尔公民那样,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认为,许以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虽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个遭到特别厉害的破坏的國家的具体条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硬说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者”经常责备我们,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说,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下贱”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纯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们看书,读书,反复背诵,但是一点也不懂得书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甚至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考茨基甚至现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两天看了一份我们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纸,上面谈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考茨基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读报告)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没有生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

会主义都不能维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怜的德国工人！他们正在同谢德曼和诺斯克作斗争，同刽子手作斗争，竭力推翻仍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的刽子手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权，他们认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俄国的一切资产者说（这曾登载在叶加特林诺达尔报纸上），“就应该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清楚地知道，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主张这样做。应当进行自卫。谢德曼和诺斯克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战争毕竟是战争。德国工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内战时期，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该使工人有饭吃。考茨基却认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费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

哦，聪明绝顶的先生们！但是在一个为帝国主义者所掠夺所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煤、没有原料、没有工具的国家里，你们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发展生产”！我们人民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都在分配残存的几百万普特的煤或石油，我们很苦恼，每个委员只拿到残存的一点物资，感到不够，不得不决定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业，——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但是只有这样做，因为没有煤。煤在顿巴斯，由于德寇的侵犯，煤被毁掉了。请你们看看比利时和波兰，这是个典型现象，到处都呈现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这就是说，失业和饥饿现象还要存在很多年，因为有些被淹的矿井过许多年也是恢复不起来的。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鼓掌）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而外，当然没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

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先生们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象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关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和多数人的意志的市俗的愚蠢的空谈来看，也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就来谈什么和平发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拿法国来说。法国是个战胜国，然而粮食生产也缩减了一半。在英国，我从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人们都说：“我们现在是乞丐了。”而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竟责备共产党人使生产陷于停顿！说这种话的人，尽管再三自称是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我们还要忍受许多年的贫困，许多年的倒退，向野蛮方面的倒退。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倒退，使我们向野蛮方面倒退。如果我们能够拯救劳动者，拯救人类的主要生产力——工人，我们就能挽救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拯救工人，我们就会灭亡；因此，再说一遍，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只是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象一个脑袋里装着引文盒的学者一样，他摆弄引文，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问题，就束手无策，从盒子里

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持工人的生活，拯救工人，而工人会死亡，是因为工厂停工，工厂停工是因为没有燃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不合理，工业同原料产地隔绝。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棉纺织厂需要的原料，要从埃及和美国运来，再近也要从土尔克斯坦运来，当反革命匪帮和英国军队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诺沃茨克的时候，请你们从土尔克斯坦运运看！当铁路无法运输，遭到破坏，陷于停顿而又没有煤的时候，请你们从埃及从美国运运看！

必须拯救工人，虽然他们无法工作。如果我们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就会倒退，退回到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们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有人走来对我们说：“我们主张劳动民主的平等，而你们共产党人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平等”；那我们回答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

你们说，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吧？那让我们来衡量一下，计算一下。拿六十个农民和十个工人来说。六十个农民有余粮。他们衣服褴褛，但是他们有粮食。而十个工人呢，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衣服褴褛，受尽折磨，没有粮食、燃料和原料。工厂停工。怎么样，你们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吗？六十个农民有决定的权利而十个工人应当服从吗？这真是平等、劳动民主的统一和多数人的

决定的伟大原则！

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回答说：“你们是一些小丑，因为你们用一些动听的话来回避和掩盖饥饿的问题。”

请问你们：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工厂停工的国家里，如果农民不把余粮拿出来，挨饿的工人是不是有服从多数农民的决定的权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们有没有甚至用暴力取得这些余粮的权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问题的实质，他们就转弯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国的工业都遭到破坏，而且这种状况将继续好几年，因为烧掉工厂或淹没矿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炸毁车厢、捣毁机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傻瓜，不管他是德国军官或法国军官，做这种事都是很能干的，特别是他有了进行爆炸、射击等等的优良装备的时候；然而恢复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他们是劳动者，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又是私有者。农民几百年来一直认为，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谁以为用一个说服另一个，另一个说服第三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机关，但是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力量，这就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愈坚决地摧毁支持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力量即习惯的力量就表现得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

打破的。我们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下解放了出来，摧毁了束缚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由出卖粮食是“自由”，必须按照固定价格出卖余粮是不自由。农民愤慨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算什么“出卖”；特别是在我们的机构很糟的时候，他们更是这样说，而机构很糟，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都站在苏哈列夫卡³¹⁰那边。显然，这种机构应该依靠那些正在学习、即使是忠诚老实也至少要学几年才学得会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学会，我们的机构还是糟的，有时甚至会有各种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骗子混进来。这种危险威胁着任何一个执政的党，威胁着任何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因为既不能一下子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机构。我们清楚地知道，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还很糟。不久以前，对非农业省份的工人的粮食供应情况做了科学的统计调查。原来他们的一半粮食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是从投机商那里得到的，前一半占他们全部购粮支出的十分之一，后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收集和供给的，当然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收集的。收集这一半粮食是靠战胜了投机商，而不是靠同投机商勾搭，是有利于挨饿的工人，而损害了社会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先生们所夸耀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诸位先生们，你们死守着你们的“平等”吧，而我们则要跟挨饿的工人在一起，把他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不管孟什维克怎样责备我们破坏“平等”，事实却是这样的：我们在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解决了粮食任务的一半。所以我们说，如果六十个农民有余粮，而十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平等”、“劳动者的平等”，而是六十个农民无条件地必须服从十个工人的

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他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些民主主义者听来也许是不堪入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恶毒词句诬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们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读一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读一读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的叙述，去想一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十九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

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

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用血汗挣来粮食，他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出卖粮食这种必需品，谁要没有这种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财产去换它的。饥饿是无情的，为了买到粮食，花一千卢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农民的罪过，因为他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他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货币。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货币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要消灭货币，必须建立亿万人的产品分配组织，——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要不然就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如果

资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收买他们，用恢复自由贸易引诱他们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所有俄国白卫分子的经济纲领就是自由贸易。他们是懂得这一点的，舍尔公民不懂得这一点，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并不因某个政党不懂得它们就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自由贸易。有人竭力欺骗农民说：“照旧生活下去不更好吗？靠自由出卖农业劳动来生活不更好吗？什么比这更公平呢？”自觉的高尔察克分子是这样说的，而且从资本的利益来看，他们是对的。为了恢复俄国资本权力，需要依靠传统，依靠农民的偏见，依靠自由贸易的旧习惯，需要用暴力镇压工人的反抗。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高尔察克分子是对的，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中说得头头是道，懂得从何开头从何结尾，懂得农民的自由贸易和对工人的残杀之间的联系。联系是有的，虽然舍尔公民不了解这种联系。粮食自由贸易是高尔察克分子的经济纲领，枪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如在芬兰）是实现这个纲领的必要手段，因为工人不会白白放弃他们的果实。联系是密切的，而那些一点不懂经济科学和政治的人，那些由于自己市侩的懦怯心理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企图用“平等”、“自由”的空谈使我们忘记这种联系，他们大喊大叫，说我们破坏“劳动民主”内部的平等原则，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公平的”。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

念。这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残余，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在我们看来，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利益。除了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而外，用其他办法是不能打倒资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万农民一下子就巩固地联合起来去反对资本、反对自由贸易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农民十分自由并有高得多的文化，这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其他的经济条件，需要多年的准备。那末，谁来进行这种准备呢？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们可能动摇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他们也可能发牢骚，讲怪话，咒骂无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少数。可以咒骂他们，可以高谈多数，高谈你们劳动民主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高谈纯粹民主。要讲什么都可以。但这些说法只是掩盖一个事实：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饿、工业停顿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转变时期，那些不是按照较公平的价格而是按照“自由的”价格，按照资本主义的和生意人的价格把粮食拿来帮助工人的人，不管他们本人怎样竭力否认，不管他们怎样真心地相信他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实行自己的纲领，他们都是在实行高尔察克分子的纲领。

五

现在我来谈我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失

败和胜利的问题。我曾经向你们提到考茨基，作为老而腐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他责备我们说，根据多数做出的决定才是能够保证和平结局的决定。靠专政做出的决定是一种用军事手段做出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你们不以军事手段赢得胜利，你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因为内战不是俘虏人，它要消灭人。被吓倒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吓唬”我们的。

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事实。我们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国内战争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严重更残酷的战争。在历史上，自古罗马的国内战争起，一直都是如此，因为国际战争总是以有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而告结束，唯有在国内战争中，被压迫阶级才集中全力来彻底消灭压迫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

我要问你们：用革命可能遭到失败来吓唬开始了的革命的“革命家们”有什么用处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不自冒失败危险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在多少有些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是没有观点上的分歧的。当我分析了考茨基所写的这些东西的全部叛卖性之后，我在一年以前写道（这是去年9月的事情）：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的。因为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失败，它也是胜利的。看起来这可能是玩弄字眼，但是为了说明这是

事实，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上的具体例子。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十九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词句蒙蔽了。

我们的革命在一年半内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情，要比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们所做的事情多得不可比拟。

他们支持了两年，后来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击下灭亡了，在全世界的联军的打击下灭亡了，这些反动势力打败了法国革命家，在法国恢复了正统的合法的君主——那个时代的罗曼诺夫，恢复了地主的统治，在数十年中扼杀了法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

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莫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

在一年半中，我们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我们奋斗的目的，为打倒资本统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国革命为本阶级所做的事情多得不可比拟。所以我们说，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人、把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我们的话可以从下列一点得到证明：这次革命建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在全世界工人阶级

中已经取得精神上的胜利，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遭到灭亡，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斗，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和最先进的英国都起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的革命仅仅经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年半的统治，就使它所创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组织成了全世界工人所理解、所熟悉、所欢迎的组织，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绝对必需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前的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因此，我在代表大会开幕的简短贺词中强调了这一基本的、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因此，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³⁰⁴。我现在拿组织常识来反对这些臆造。分配粮食和煤时，要爱惜每一普特煤和每一普特粮食，——这是无产阶级的纪律。这不是农奴主用棍棒来维持的纪律，也不是资本家用饥饿来维持的纪律，而是同志的纪律，工会的纪律。解决了这个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摇摆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农民，那时一定会完全跟我们走。而在此以前，农民不知道，他应该跟着他还不相信但又不能否认他们在实行一种没有剥削的较为公平的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危害国家的罪行）的人走呢，还是跟着那些照旧许以似乎是劳动自由的粮食贸易自由的人走。如果农民看到无产阶级善于建设自己的政权，善于建立秩序（农民需要秩序，希望有秩序，在这一点上农民是对的，虽然农民这种追求秩序的意愿还和许多模糊的东西、许多反动的东西、许多偏见分不开），农民在多次动摇之后，终于会跟工人走的。农民不可能简单地、轻易地、一下子就摆脱旧社会而走向新社会。

他知道，他从旧社会得到“秩序”的代价是劳动者破产，是他们沦为奴隶。他不知道，无产阶级能不能给他秩序。对于闭塞、愚昧、散漫的农民不能要求过高。他不相信任何言论，不相信任何纲领。他不相信言论倒很好，要不然他就摆脱不了各种欺骗。他只相信行动，相信实际经验。要向他证明，你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善于分配粮食和煤，不糟蹋一普特粮食和一普特煤，能够使每一普特余粮和每一普特余煤都不拿去投投机买卖，不为那些苏哈列夫卡的英雄们所利用，而是拿来作公平的分配，供给挨饿的工人，甚至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时候拿来援助他们。一定要证明这一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任务。在没有经济根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但历史注定它是要失败的。但依靠先进阶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秩序和组织的原则，是可以使用暴力的。那时暴力也可能暂时遭到失败，但它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向农民表明：制度是正确的，劳动和粮食的分配是公平的，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是爱惜的；我们工人能够靠同志的工会的纪律来实现这一切；我们用暴力进行斗争，只是为了保护劳动的利益，只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达成协议；我们准备把我们现在所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他们，——如果农民看清了这一切，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会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现在正朝这方面做去。

我有点离开了本题，现在应该回到本题上来。目前在所有国家中，已经不像我们不久以前只是重复而不懂得“义和团”这个名词那样，把“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看做怪诞的字眼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名词由世界各种语言重复着。觉悟

的工人都看到各国资产阶级每天怎样在千百万份报纸上诬蔑苏维埃政权，他们正从这种谩骂中学习。我最近看了几份美国报纸。我看到一个美国牧师的演说，他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些缺德的人，他们实行共妻，他们是强盗，是掠夺者。我也看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回答：他们以五分钱一份推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推销这个不实行“劳动民主的平等”的“专政”的宪法。他们是援引这些破坏劳动民主的统一的“篡夺者”、“强盗”、“暴徒”的宪法中的一条来回答的。这里顺便谈一下，当欢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的时候，纽约一家最大的资本家报纸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到达的那天用斗大的字母登着：“欢迎老夫人到来！”美国社会主义者转载了这条消息说：“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美国工人们，你们是不是因为资本家赞扬她而感到惊讶呢？”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为什么他们要赞扬她呢？因为她反对苏维埃宪法。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你们看，这一条是从这些强盗的宪法中引来的。”他们引来引去总是那一条：凡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苏维埃政权正是由于它公开地讲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新类型的国家组织，它才博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这种新的国家组织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要困难千万倍，但这对于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组织来说，也要有益千万倍。当无产阶级的组织解决了这个任务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获得最后胜利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尽管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发生在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里，但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拉丁词，以前任何一个劳动者听到它时，都不懂得是怎么回事，

不懂得怎样实现它。现在这个词已由拉丁文译成现代的各种语言了，现在我们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政权下，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的组织高于一切；任何一个非劳动者，任何一个剥削者都没有权利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任何虚伪的口号，任何‘自由’、‘平等’之类的偶像，都骗不了我们。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我们已把这一点载入苏维埃宪法，并已博得全世界工人对它的同情。他们知道，不管新制度的诞生多么困难，不管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考验甚至失败是多么严重，但是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人类拖向后退。（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
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
演说》小册子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303—339页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无限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性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赶过我们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占极大的比重（现时匈牙利有八百万人口，三百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领袖，无论是社会沙文主义派或考茨基派的领袖，都死死抱着几十年来较为“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制所养成的纯粹市侩的偏见，根本不懂得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把这些领袖抛弃，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完成自己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使命。这班人完全或部分地相信了资产阶级关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谎言，不善于把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劳动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做“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

这些死死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的盲人，不懂得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有世界

历史意义的转变。他们把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发展史的某些特点同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意义混为一谈。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现在除了苏维埃政权而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种政权是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者拥护的。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他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¹⁵²。

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这些阶层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

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化的威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较不开展的、政治上较不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在这里，象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样，空谈一般“民主”，空谈“统一”或“劳动民主的统一”，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等等，是无济于事的。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巩固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的因循守旧的习气。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阶级斗争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和犹豫动摇，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组织影响，“中立”那些害怕离开资产阶级而很不坚定地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阶层，巩固新的纪律即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巩固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联系，把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用这种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基础去代替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纪律，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饥饿纪律，“自由”雇佣奴隶制的纪律。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

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不仅如此。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一切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所享用，它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冲破过去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统一起来了，你们给世界做出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极高尚极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协约国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镇压。枪毙，这是胆怯者在战争中应享的命运。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忠实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列 宁

1919年5月27日

载于1919年5月29日
《真理报》第115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9卷
第350—354页

注 释

- 1 《远方来信》是列宁1917年3月底至4月初在瑞士得到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息后写的，一共包括五封信。列宁在《远方来信》中规定的原理是著名的《四月提纲》的基础。

《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发表在1917年3月21日和22日《真理报》第14号和第15号上。其余四封信都发表于1924年。——第1页。

- 2 格·叶·拉斯普庭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他早年是个偷马贼，后来装扮成“先知”，招摇撞骗，混入宫廷。在沙皇统治的末期（1914—1916年），笃信宗教的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对拉斯普庭十分宠信，言听计从，把国务弄得异常混乱。拉斯普庭的得势，是沙皇俄国上层统治腐败和没落的明显表现。——第2、88、463页。

- 3 十月党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代表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政党，于1905年沙皇的10月17日（公历30日）诏书颁布后成立。该党的首领是大工业家亚·古契柯夫和大领地所有者米·罗将柯。十月党人在口头上承认10月17日诏书（在这个诏书中，被革命吓坏了的沙皇答应给人民公民权），事实上并不想对沙皇制度实行什么限制，他们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从1906年秋天起，十月党成了执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月党同立宪民主党等反动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同时，妄图通过极端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参加临时政府，积极反对俄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第4页。

- 4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

- 党, 1905年10月成立, 首领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用假民主主义作掩饰, 自称为“人民自由”党, 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他们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胜利后, 立宪民主党人组织过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 被苏维埃政权粉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人民公敌。——第4、36、81、100、109、117、133、195、279、290、295、379、407、495、562、583、611、654页。
- 5 巴塞尔宣言是第二国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通过的一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宣言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备战活动, 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准备战争的掠夺目的, 号召各国社会党人进行坚决的反战斗争。巴塞尔宣言重申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论点(这是列宁和卢森堡提出的), 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 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 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 第二国际的首领在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巴塞尔宣言,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就背弃了宣言, 站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去了。关于巴塞尔宣言, 见本选集第2卷第615—624、675—676页。——第4、90、617页。
- 6 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 组委会分子即由此而来)是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 在1912年孟什维克取消派以及一切反党集团和派别联合举行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改选后停止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6、15、41页。
- 7 和平革新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 成立于1906年, 是由左派十月党人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成的, 其首领是彼·亚·葛伊甸和格·叶·李沃夫等人。列宁称和平革新党是“和平掠夺党”。——第7页。
- 8 劳动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 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

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这个原则就是：用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如果占有的面积超过了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对出让的私有土地规定给予报酬。由地方农民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一起投入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第 8、37、120、333 页。

- 9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为了帮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于 1915 年在俄国成立的。资产阶级为了使工人接受自己的影响，向他们灌输护国主义的情绪，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下面成立了“工人团”，吸引工人代表参加这些团体，以便鼓动工人群众提高军事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孟什维克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策划的这种冒牌的爱国主义的勾当；布尔什维克则宣布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并且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胜利地进行了抵制。——第 8、134 页。

- 10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在《四月提纲》中给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的革命路线和具体计划。列宁根据俄国两次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政治形式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1917 年 4 月 7 日《真理报》发表了《四月提纲》。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莫斯科）、《无产者报》（哈尔科夫）、《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工人报》（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前进报》（乌发）、《巴库工人报》（巴库）、《高加索工人报》（梯弗里斯）等等，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关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的意义，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43—246 页。——第 13 页。

- 11 人民社会党是 1906 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该党提出了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

和的民主要求。人民社会党人拒绝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性的原则，主张以赎买的办法征收地主的土地。列宁称人民社会党人是“市侩机会主义者”、“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人民社会党的首领是阿·瓦·彼舍霍诺夫、维·亚·米雅柯金、尼·费·安年斯基等人。

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社会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投入反革命阵营。——第14、156页。

- 12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它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丁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反革命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社会革命党人不支持农民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主张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

1917年12月，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后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15、20、26、41、109、120、132、176、279、284、295、362、369、374、384、407、419、444、449、496、530、562、578、583、589、607、619、714、726、782、793、815、824页。

- 13 《统一报》（《Единство》）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翼集团的机关报，该报于1917年3—11月在彼得格勒每日出版，后来从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又用别的名称出版。该报由普列汉诺夫主编。《统一报》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党

进行疯狂攻击，仇视十月革命，反对建立苏维埃政权。——第16、30、139、306页。

- 14 《俄罗斯意志报》(«Русская Воля»)是由沙皇内务大臣朴罗托波波夫创办、靠几家大银行资助的资产阶级日报，1916年12月至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疯狂地煽动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称该报为“一家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第17页。

- 15 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和17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1—386页，第4卷第392—393、393—394页，第1卷第228—229页，第3卷第19—22、30页)。——第18页。

- 16 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为首的一个流派。

布朗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革命运动，两次被判死刑，差不多有半生是在监狱中度过。

列宁认为布朗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同时又坚决地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是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第21、29、221、277、689页。

- 17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是斯大林遵照列宁的指示发起创办的，于1912年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

《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它是依靠工人的捐款出版的。它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家。《真理报》仅仅在一年之内，就刊载了一万一千多篇工人通讯。《真理报》的发行量平均每日四万份，个别月份平均每日达六万份。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为真理派。斯大林说：“1912年的《真理报》为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给报纸写文章，给编辑部指示。斯大林在1912年9月逃出纳雷姆流放地以后参加了《真理报》的领导工作。1913年1—2月，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该报编辑。1913年2月，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按照列宁的指示改组了《真理报》编辑部。

《真理报》在创刊后的两年多的时间内，被沙皇政府查封过八次，但是每次被查封后又改用别的名称出版，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

在1914年7月2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真理报》被封闭。二月革命以后，从1917年3月18日起《真理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扩大会议决定斯大林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在1917年4月回到俄国后直接领导了《真理报》。七月事变后，由于列宁转入秘密状态，斯大林担任了报纸的责任编辑。1917年7—10月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真理报》四次更换名称继续出版，用过的名称有：《〈真理〉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自11月9日起又用原名《真理报》出版。——第23、77、111、144、234、439、447、607、649、839页。

18 参看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第24、97页。

19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26、398页。

20 陛下的反对派是英国议会中的用语，用来称呼少数采取反对立场的资产阶级议员，这些议员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王权忠心耿耿，但由于派别或小集团的利益又不拥护政府并反对政府的政策。议会反对派的这种策略，被各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广泛用来欺骗群众。

列宁用这一用语来形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因为这些人只是在口头上伪装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事实上却支持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同它成立协议，就象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沙皇勾勾搭搭一样。——第29页。

- 21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提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这一抛开农民来进行革命的口号，后来成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对这一反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进行了尖锐批判（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316—317页）。——第29页。
- 22 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1—386、324—336页）。——第29页。
- 23 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该书最初用德文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5年俄文版第4卷第167—248页）。——第31页。
- 24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这篇寓言说，厨子看见猫儿瓦西卡在偷吃鸡，便唠唠叨叨地开导它，责骂它。瓦西卡边听边吃，全不理睬。厨子的高论还没发表完，瓦西卡已经把整只鸡吃完了。——第42页。
- 25 见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第46、226、247、475、624、630、638、653、708页。
- 26 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第47、218页。
- 27 马尼洛夫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具有多情善感、痴心妄想的性格。马尼洛夫成了想入非非、游手好闲、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通称。——第53页。
- 28 费边社分子 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维伯和比·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

- 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53、171页。
- 29 工党是英国的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于1900年由工联、费边社等联合而成，最初叫“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名为工党。工党公开执行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的首领们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第53页。
- 30 工人或劳动友谊社(社会民主劳动派)是德国中派的组织，1916年3月由脱离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代表组成。该派是1917年成立的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这个党曾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辩护，并且主张同他们保持统一。——第54页。
- 31 米诺利特或龙格派是1915年成立的法国社会党少数派，是社会改良主义者龙格的拥护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龙格派采取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龙格派口头上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它的敌人。龙格派继续执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的政策，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左翼取得胜利，于是龙格派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一同脱党并归附所谓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又回到第二国际。——第54页。
- 32 英国独立工党于1893年成立。该党的首领是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等人。列宁指出，独立工党“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独立工党于1914年8月13日发表宣言反对战争。之后，在1915年2月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党人同意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议。从那时起，独立党首领以和平主义词句作掩护，推行社

会沙文主义。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左派党员群众的压力下，独立工党的首领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决议。1921年独立党人参加了所谓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他们重新加入了第二国际。——第54、275页。

- 33 美国社会党 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于1911年同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而成立的。英国社会党曾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宣传 and 鼓动，但是该党人数不多，并且脱离群众，因而具有某种宗派主义的性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内出现两派，一个是以海德门为首的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一个是以阿·英克平和费·罗特施坦等人为首的国际主义派。1916年4月该党发生分裂。海德门及其拥护者占少数，他们退出该党。从此国际主义分子成为英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他们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第54页。

- 34 1915年9月5—8日在齐美尔瓦尔得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考茨基主义多数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列宁把左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其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国际主义者的反战立场。

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篇宣言，指出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代表会议谴责了“社会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和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号召欧洲工人展开反对战争的斗争，争取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代表会议还通过对战争牺牲者表示同情的决议，并选出了国际社会党委员会。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使国际主义分子分离出来并使他们团结起来，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没有采取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建立第三国际。

关于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的意义，见列宁《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

集》第 21 卷第 362—367、368—372 页)。——第 55、666 页。

- 35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斯巴达克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1915 年 4 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大部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在它的周围,形成国际派。从 1916 年起,国际派开始出版了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1917 年 4 月,它加入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1918 年 11 月,在德国革命过程中斯巴达克派形成了斯巴达克联盟。十一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人”决裂,于同年 12 月建立德国共产党。

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但是斯巴达克派——德国左派,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没有摆脱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他们发挥了半孟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即直到实行分离,成立独立国家),否认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而崇拜运动的自发性。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选集第 2 卷第 846—860 页和《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8—72 页)等著作,以及斯大林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76—91 页)都对德国左派的错误做了批评。——第 55、676、716、777 页。

- 36 《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不来梅派的机关刊物,1916 年至 1919 年在不来梅每周出版。该杂志同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第 56 页。
- 37 《明日》(*Demain*)是法国的文艺评论性和政治性月刊,1916 年 1 月至 1919 年先后在日内瓦和莫斯科出版。该杂志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宣传齐美尔瓦尔得的纲领。——第 56 页。
- 38 《工联主义者报》(*The Trade-Unionist*)是英国带国际主义倾向的工会报纸,1915 年 11 月至 1916 年 11 月在伦敦出版。——第 56 页。

- 39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76年成立,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美国社会民主党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联合组成的。大多数党员是侨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按其性质来说是宗派主义政党,同无产阶级群众从来没有广泛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党倾向于国际主义。

美国社会党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政党,成立于190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的右翼多数派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并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左翼少数派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左翼少数派于1917年初在波士顿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国际主义者报》。1919年社会党发生分裂,左翼退出社会党,发起建立美国共产党。——第56页。

- 40 论坛派是集聚在《论坛报》周围的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左派集团。1909年,论坛派被开除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组成独立的政党(荷兰社会民主党)。论坛派是荷兰工人运动的左派集团,但不是彻底革命的政党。1918年,论坛派参加了建立荷兰共产党的工作。

《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该报从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第56页。

- 41 列宁把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称为瑞典青年党或左派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党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1917年5月他们组成为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19年在该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1921年该党的革命派组成为瑞典共产党。——第56页。

- 42 紧密派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革命派,是1903年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形成的。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德·布拉哥也夫,后来领导紧密派的是布拉哥也夫的学生格·季米特洛夫、瓦·柯拉罗夫等人。1914年至1918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紧密派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国际。——第57页。

- 43 《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创刊于1896年

- 12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了不彻底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没有同改良派断绝关系。——第57页。
- 44 边疆区委员会和总委员会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国际主义立场。——第57页。
- 45 指《关于修改军事问题决议的建议》。这个决议是由列宁拟定、并以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提交社会民主党组织苏黎世州代表大会的（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91页）。——第57页。
- 46 指《人民呼声报》（《Volkstimme》）。该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0年1月至1933年2月在开姆尼斯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报纸。——第58页。
- 47 《钟声》（《Die Glocke》）是1915年至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格尔方德）出版的杂志。——第58页。
- 48 1916年4月24—30日在昆塔尔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国际主义分子分离出来了，左翼比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更加团结更加有力了。由于列宁的力争，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批评社会和平主义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机会主义活动的决议。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告破产的和被迫害的人民书》。宣言号召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不割地的和平的斗争，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昆塔尔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前进了一步，但是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没有采取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第59页。
- 49 法国社会党是饶勒斯派于1902年建立的改良主义政党。1905年，法国社会党和盖得派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组成统一的社会党。加入这个党的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团体的成员（盖得分子、布朗基分子、饶勒斯分子等）。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的领导权为党内占多数的以

- 饶勒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所掌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它的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它的代表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在1920年12月25—30日的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发生分裂，多数派组成法国共产党，以莱昂·勃鲁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少数派退出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个旧名称。——第59页。
- 50 劳动总联合会(工会总同盟)是全法国的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89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者方面，鼓吹阶级合作和进行“保卫祖国”的宣传。——第59页。
- 51 《青年国际》(《*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915年9月至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对《青年国际》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3—167页。——第59页。
- 52 《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孟什维克的日报，1917年3月20日至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从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的机关报。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抱敌视态度。——第62、290页。
- 53 指孟什维克在1917年4月7日(公历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投票支持临时政府为了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发行的“自由公债”。——第62页。
- 5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5页和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490页)。——第62页。
- 55 这是海涅骂他的应声虫时说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中曾引用过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第64页。
- 5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24—29日(公历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这次代表

会议的有一百三十三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八万党员。这是布尔什维克举行的第一次公开的代表会议，它起着党代表大会的作用。

列宁就代表会议日程的各项主要问题做了报告和重要讲话。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下列决议草案：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草案，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草案，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关于团结一切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草案，关于苏维埃的决议草案，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柏格别尔格的建议的决议草案。

在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发表讲话捍卫列宁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并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列宁和斯大林揭露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加米涅夫和李可夫的投降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立场，无情地批判了皮达可夫，因为他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反对民族自决权，并在战争时期就和布哈林一起采取了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季诺维也夫主张布尔什维克和齐美尔瓦尔得派合作并反对建立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列宁坚决地斥责了他的发言。

四月代表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确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于革命的所有重要问题的路线，引导布尔什维克党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关于四月代表会议的意义，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8—252页。——第67、98、453、651页。

- 57 《士兵真理报》(«Солдатская Правда»)是布尔什维克的日报，1917年4月28日创刊，最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军事局的机关报，从1917年6月1日起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局的机关报。1917年七月事变时，该报被临时政府封闭。1917年7—10月该报先后改名为《工人和士兵报》和《士兵报》。十月革命后，该报以原名复刊，一直出版到1918年3月。——第67页。
- 58 齐美尔瓦尔得第三次代表会议原定於1917年5月31日召开，但以后不止一次地改变日期，最后于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根据俄共(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的决定，布尔

- 什维克出席了这次会议。列宁不同意这个决定，认为布尔什维克参加这次会议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关于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6卷第200—202页。——第68页。
- 59 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是在临时政府四月危机以后于1917年5月5日（公历18日）成立的，内阁名单于5月6日（公历19日）公布。参加联合政府的除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外，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靠近社会革命党的彼列维尔节夫，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人民社会党人彼舍霍诺夫。关于第一届联合政府的成立，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7—248页。——第68、96、122、132、181、528页。
- 60 陆军部长克伦斯基为了对付拒绝进攻的士兵和军官，在1917年5月11日（公历24日）发布了一项命令，规定长官在战时可以对不执行命令的下属使用武力。同时，克伦斯基开始把一些团队解散，把“煽动抗命”的军官和士兵送交法庭审判。——第69页。
- 61 见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第1卷第1篇第1章第24节。——第71页。
- 62 《人道报》（《L'Humanité》）是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的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社会党在1920年12月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后不久，建立了法国共产党，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第75页。
- 63 《言论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906年2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来曾以《我们时代报》等名称出版，到1918年8月停刊。——第77、157、291、295、390、521、836页。
- 64 《土地和自由报》（《Земля и Воля》）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1917年3—10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第79页。
- 65 《日报》（《День》）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派的报纸，1912年在彼得堡由银行出资创办。该报有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1917年2月后完全由他们掌握。1917年11月8日该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

- 后来又用别的名称出版到1918年5月。——第81、139、339页。
- 66 米·伊·捷列申柯 是俄国最大的糖厂主和百万富翁，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第82、100、133、142页。
- 67 亚·伊·柯诺瓦洛夫 是俄国最大的纺织厂主，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进步党的首领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入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先后任工商部长和克伦斯基的副总理。——第83页。
- 68 皇室费 是君主立宪国家从国家预算中拨出的供养君主及其宫廷的费用。——第83页。
- 69 弗·普·利亚霍夫 是沙皇军队中的一个上校，1908年他曾经指挥俄军镇压波斯的资产阶级革命。列宁所说的利亚霍夫政策，是指沙皇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言。——第83、100页。
- 70 瓦·维·叔尔根 是俄国地主和狂热的君主派，他在1917年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85页。
- 71 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1914年7月26日（公历8月8日）的杜马会议上，强烈抗议沙皇俄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1914年11月布尔什维克代表被逮捕，1915年2月被交付法庭并以“叛国”罪名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第91页。
- 72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 于1917年5月4—28日（公历5月17日—6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各省代表和军队代表共一千一百一十五名。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揭露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行为。列宁就土地问题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实行土地国有。但是大会为社会革命党人所把持，这就决定了大会一切决议的性质。代表大会同意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赞成“社会主义者”参加临时政府，主张把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主张在前线发动进攻。代表大会反对立刻把地主土地交给农民，主张土地问题应等待立宪会议来解决。——第93、100页。

- 73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于1917年6月3—24日(公历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一千多名代表。布尔什维克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只有一百零五名代表。占多数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大会议程上有这样几个问题: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战争问题,筹备立宪会议的问题等。列宁在大会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和战争问题发表了演说。布尔什维克对每个根本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他们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危害性,并且要求全部政权由苏维埃掌握。大会的决议表明,大会的立场是支持临时政府的,它赞成临时政府所准备的俄国军队在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第95、295、656页。
- 74 内阁派,或内阁主义、米勒兰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反动内阁而得名。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合作。这里是指参加了俄国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
关于《工人报》,见注52。——第97、144页。
- 7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第98页。
- 76 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该报于1917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4日第132号起,该报改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10月12日第184号起,又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名称出版。整个这段时期内,该报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操纵,激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从1917年11月9日起,《消息报》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由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该报改在莫斯科出版。——第100、132、

291、316、826 页。

77 弗·巴扎罗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离开布尔什维主义，是以马赫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17 年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曾参加《新生活报》的编辑工作，反对十月革命。——第 102、320 页。

78 《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报纸，1917 年 4 月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 年 7 月被克伦斯基政府封闭，同年 9 月起又以《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该报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 年 7 月被封闭。

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集团。这个集团联合了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分子以及半孟什维克派的单个知识分子。——第 102、156、295、346、371、382、390、393、502、546、578、787、836 页。

79 指英国政府发给英国独立工党领袖拉·麦克唐纳出国护照一事。麦克唐纳应孟什维克领袖邀请本来要到俄国访问，后来访问没有实现。——第 102 页。

80 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告全世界人民书》。《告全世界人民书》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在革命群众要求结束战争的压力下被迫在 1917 年 3 月 14 日（公历 27 日）的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次日即在《真理报》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发表。

《告全世界人民书》号召各交战国的劳动者起来争取和平。但是没有揭露战争的侵略性质，也没有提出争取和平的实际措施，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第 103 页。

81 1917 年 5—6 月，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法国和英国军队占领了希腊的许多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斯的北部和中部被俄国军队占领，南部被英国军队占领。所有这些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都得到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支持。——第 104 页。

82 指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联合委员会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声明。声明要求在大会上首先提出临时政府所准备的前线进攻的问题，并指出这次进攻是帝国主义盟

国的巨头指使的，俄国反革命集团打算用这种办法把大权集中到外交界的军人集团和资本家集团手中，以打击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和俄国民主派已争得的阵地。这篇声明向工人阶级、军队和农民发出了国家已处于危急中的警告，号召大会立即回击反革命的进攻。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的建议遭到代表大会的否决。——第104页。

83 《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1917年3月至1918年6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曾屡次更改名称。1918年10月，该报在萨马拉复刊，出了三号；1919年3月又在莫斯科复刊，出了十号。该报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封闭。——第104、210、296、521、579、821页。

84 指1917年7月3—4日(公历16—17日)彼得格勒的游行示威。7月3日(公历16日)，维波尔格区开始出现反对临时政府的自发的游行示威。最先出来的是第一机枪团，接着，别的部队和工人也同他们汇合在一起了。游行示威很可能变成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

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在这个时候采取武装行动，它认为革命危机还没有成熟，军队和外地群众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支持首都的起义。7月3日下午四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军事局的联席会议上，做出了劝阻发动的决定。当时正在开会的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同样的决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分别前往各工厂和各区去劝阻工人。但是，发动仍旧开始了，要阻止已经不可能了。

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局考虑了群众的情绪以后，于7月3日深夜通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定，目的在使游行示威成为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运动。列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他得到消息后，于7月4日(公历17日)早晨来到彼得格勒。参加7月4日游行示威的有五十多万人。游行示威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主要的口号下进行的。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知道并且同意派士官生和军官来镇压举行和平示威的工人和士兵。士官生和军官向群众开了枪。反革命部队也从前线调回来镇压革命运动。

7月4日夜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停止游行示威的

决定。列宁在深夜来到《真理报》编辑部，审阅当天的报纸。列宁离开半小时后，编辑部就被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捣毁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是这次反革命屠杀的参加者和帮凶。在游行示威被镇压后，他们又同资产阶级一起攻击布尔什维克。《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都被临时政府封闭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屠杀开始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革命部队被调离首都，开往前线。

七月事变以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附属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告终。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任务是准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第 107、124、241、278、306、452 页。

85 路·欧·卡芬雅克是法国的一个将军，反动政客。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马克思指出：“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5页）——第 109、235、516、542 页。

86 唐·吉河德是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浪漫夸大、不切实际的典型人物。——第 109 页。

87 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页）。——第 111、179 页。

88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1868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最初是温和自由派的报纸，从1876年起成为反动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喉舌，不仅反对革命运动，而且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运动。从1905年起该报是黑帮分子的机关报之一。列宁把《新时报》叫做卖身求荣的报纸的典型。二月革命以后，该报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

《活的言语报》（《Живое Слово》）是黑帮的黄色报纸，1916年在彼得格勒创刊。该报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第 111 页。

- 89 联络委员会 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3月21日成立的，目的是同临时政府取得联系，“影响”临时政府并“监督”它的活动。实际上联络委员会是在帮助临时政府实行资产阶级政策，竭力阻挠工人群众为争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进行的积极的革命斗争。参加联络委员会的有齐赫泽、斯切克洛夫、苏汉诺夫、菲里波夫斯基和斯柯别列夫（后来又有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1917年5月联络委员会取消了，因为那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已经直接参加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第121、301页。
- 90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和狐狸》。这篇寓言说，一只狐狸看到树上的乌鸦脚着一块乳酪，就用各种美丽的词句赞美乌鸦，诱骗它开口唱歌。乌鸦被狐狸的奉承搞得昏头昏脑，于是张嘴尖叫，乳酪掉了下来，被狐狸叼走了。——第121页。
- 91 全俄民主会议 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会议的目的在于削弱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参加会议的有各小资产阶级政党、主张妥协的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界和部队的代表。
- 民主会议通过了成立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的决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预备议会使国家离开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而走上资产阶级立宪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抵制预备议会，只有投降主义分子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要无产阶级放弃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坚持参加预备议会。布尔什维克揭露了预备议会的叛卖活动，号召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关于民主会议，参看列宁《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和《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34、35—41页）。——第133、280、285、296、656页。
- 92 基特·基特奇（原名齐特·齐梯奇）是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代人受过》中的主角。他是一个富商，是自私自利、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资产阶级典型人物。——第133、312页。
- 93 鲍勃凌斯基 是俄国的贵族世家，这一家的阿·亚·鲍勃凌斯基、安·

阿·鲍勃凌斯基和弗·阿·鲍勃凌斯基都是伯爵和反动政客，又是大地主兼大糖厂主。——第142页。

- 94 《交易所报》(«Биржевка»)即《交易所新闻》(«Бирже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是资产阶级的日报,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交易所报》这个名称后来成了没有原则的和卖身求荣的资产阶级报刊的通称。该报于1917年11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第157页。
- 95 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国债剧增,危及国家。——第160页。
- 96 雅各宾派 又称山岳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列宁说:“1793年的雅各宾派是十八世纪最革命的阶级即城乡贫民的代表。当时,这个阶级已经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用最革命的办法、直到用上断头台的办法制服了本国的君主、地主以及温和的资产者……”(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页)——第166页。
- 97 指彼得格勒苏维埃在1917年8月31日(公历9月13日)、莫斯科苏维埃在1917年9月5日(公历18日)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第169、278页。
- 98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是系统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著作,它透彻地回答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中的历史作用,粉碎了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进攻,同时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荒谬观点。

《国家与革命》一书是列宁1917年8—9月在秘密状态中写成的。列宁在1916年下半年就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国家问题。当时他写了一篇短评《青年国际》(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3—167页),在

这篇短评里他批评了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并表示要写一篇文章详细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的观点。列宁在1917年2月17日给亚·米·柯伦泰的信中谈到，他差不多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材料准备好了。这些材料是用很小的字体写在以《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为标题的蓝皮笔记本里的。收集在笔记本里的材料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摘要，有考茨基、潘涅库克和伯恩斯坦著作的摘录并附有列宁的评语和结论。

《国家与革命》一书按原定计划有七章，最后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没有写，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章的详细提纲（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第25—26页）。关于出版这本书的问题，列宁在给出版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实在来不及写完第七章，或者这本书太厚，那末可以把前六章单独出版，作为第一册……”

在手稿的第一页上，作者用的笔名是：弗·弗·伊万诺夫斯基。列宁预计用这个笔名可以出版这本书，不然就会被临时政府没收。但是这本书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也就不需要再用笔名了。第二版是在1919年出的，列宁在第二章中加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第171页。

9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第175页。

100 氏族组织 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度。氏族组织产生的时期同现代人的类型的最后形成的时期相同。氏族组织的发展经过两个时期：母权制和父权制。父权制解体的时期就是原始社会变成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的时期。“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49—650页）

关于原始公社制度，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965年人民出版社版）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克兰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氏族公社。——第177页。

- 10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第177页。
- 102 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6页)。——第179页。
- 10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168页。——第180页。
- 104 同上,第168页。——第180、630页。
- 105 同上,第169页。——第181、182、630页。
- 106 同上,第170页。——第182页。
- 10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321页。——第184页。
- 108 同上,第223—224页。——第187页。
- 10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161、285—286页。——第183页。
- 110 哥达纲领是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它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要求把国家资助工人生产合作社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并要求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两派在机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合并,并对哥达纲领做了毁灭性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第188页。
- 11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第189页。
- 112 同上,第263、272页。——第190页。
- 113 语出圣经《创世记》。以扫为了一点饼和红豆汤把长子权利卖给弟弟雅各,以后便成为一个典故,比喻“因小失大”。——第192页。
- 11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692页。——第193页。
- 115 同上,第601—602页。——第197页。

- 116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923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以后改为周刊。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許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198页。
- 11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第198页。
- 118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页)。——第200页。
- 119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第201、262、628、704、711页。
- 120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393页。——第202、323、389、685页。
- 12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375页。——第206页。
- 122 同上,第377页。——第208页。
- 123 同上,第375—376页。——第209、214、631页。
- 124 吉伦特派 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和拥护该政府的革命群众。——第217页。
- 12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377页。——第217页。
- 126 同上,第485页。——第220页。
- 127 蒲鲁东主义 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因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比·约·蒲鲁东而得名。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大

所有制,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他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工人依靠这些银行的帮助就能购置自己的生产资料,保证“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不懂得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意义,竭力反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否认国家的必要性。蒲鲁东派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平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第220页。

- 12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4—545页。——第221页。
- 129 同上,第527页。——第221页。
- 130 指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和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60,551—554页)。——第222页。
- 13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56页。——第222、638页。
- 132 同上,第553页。——第223页。
- 133 同上,第553—554页。——第224页。
- 134 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用来代替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因为它摒弃了拉萨尔主义的教条。但是,爱尔福特纲领还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1891年6月恩格斯对这个纲领的草案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第228页。
- 13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第229页。
- 136 同上,第272页。——第229页。
- 137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

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和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在《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中对这一法律做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第230、356页。

- 13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第230页。
- 139 同上,第273—274页。——第231页。
- 140 同上,第275页。——第232页。
- 141 同上,第276—277页。——第234页。
- 14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6页。——第235、669页。
- 143 指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策烈铁里于1917年6月11日(公历24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党团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说。列宁指出:“策烈铁里的演说表明他是露骨的反革命分子,他声音不能用空话,不能用决议来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而是要剥夺他们手中的一切武器。”(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65页)这次会议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决定在6月10日(公历23日)举行示威而召开的。为了对策烈铁里的演说表示抗议,布尔什维克退出了这次会议。——第235、552页。
- 14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0—331页。——第236页。
- 145 同上,第334页。——第237页。
- 146 同上,第335页。——第237页。
- 147 同上,第335—336页。——第239页。

- 148 拉萨尔派是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和信徒。拉萨尔派认为可以用普鲁士反动政府资助工人合作社的办法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他们主张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议会中的和平活动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派，并指出他们“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5页）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对拉萨尔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做了批判。——第240页。

- 14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第240页。

- 15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30日—8月23日举行。代表大会最初在布鲁塞尔开了十三次会。后来因受警察迫害而移至伦敦举行。总共开了三十七次会。列入代表大会日程的共有二十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纲、党的组织（批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二十六个组织的四十三名代表，他们有五十一票表决权（其中八个代表各有二票），另外有十四名代表有发言权。

代表大会由列宁的《火星报》筹备。列宁为筹备代表大会做了巨大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95页）。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了在俄国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巨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通过了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革命纲领。列宁在提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任务的同时，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大会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建党的组织原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和他的战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作用的根本原理：党是工

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有组织的部队，它是由革命理论、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以及革命运动的经验武装起来的。唯有这样高度觉悟而有组织的、团结而集中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党，才能够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夺取政权。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评介，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5—56页。——第241、665页。

- 15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1页。——第244页。
- 152 同上，第21页。——第245、606、620、857页。
- 15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第246、719页。
- 15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第250页。
- 155 同上，第12页。——第251、253、546、580页。
- 156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约，要求不如期还债的安东尼奥割下一磅肉。——第254、636页。
- 157 指十九世纪俄国民粹主义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在1862—1863年写的一部小说《神学校随笔》。——第254、558页。
- 158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举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列入议程的问题有：（1）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利；（2）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等。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是在同巴枯宁派作尖锐的斗争中进行的。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权利的决议。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中说道，无产阶级应当组织自己的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代表大会把妄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家野心家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第260页。
- 15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页。——第260页。

- 160 《曙光》(*Заря*)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1901年至1902年由《火星报》编辑部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四期(三册):第1期在1901年4月出版,第2—3期合刊在1901年12月出版,第4期在1902年8月出版。《曙光》杂志曾刊载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的前四章、《内政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第261页。
- 161 指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七百九十一名代表。俄国代表团由二十三人组成。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考茨基提议的列宁称之为“对机会主义者采取调和态度的”决议。决议对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发生的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事件没有谴责,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把参加内阁说成是不属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职权范围以内的问题。决议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始,而只能认为是与困难环境作斗争时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的手段。”因此机会主义者经常引用这个决议为自己同资产阶级勾结的行为进行辩护。——第262页。
- 162 伯恩施坦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而得名。伯恩施坦在1896—1898年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的文章中和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学说,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争取改良。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政党的支持。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伯恩施坦主义、对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崩得分子、孟什维克。——第263页。
- 163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也是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之一,

1897年至1933年在柏林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列金、大卫、科尔布都是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斯陶宁格是丹麦右派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布兰亭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首领。——第274页。

- 164 饶勒斯派是饶勒斯的拥护者。饶勒斯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右翼改良派的首领,在九十年代同米勒兰一起组织了“独立社会党”。饶勒斯派在要求“自由批评”的伪装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他们在1902年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

王德威尔得是比利时工人党的首领,第二国际的首脑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75页。

- 165 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当时叫意大利工人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期,意大利社会党采取了不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它参加了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得和1916年4月在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倒向占多数的中派。1916年底,它在改良派影响下走上社会和平主义道路。

屠拉梯和特雷维斯是意大利社会党改良主义右翼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中派分子。——第275页。

- 166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是列宁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写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1917年9月15日(公历28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列宁的这封信以及另一封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3页)。加米涅夫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他在会上提出自己的决议案,反对列宁在这两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件中提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斯大林回击了加米涅夫的贩卖性进攻,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加米涅夫的提议,并根据斯大林的建 议,把列宁的信分发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各大组织。——第277页。

- 167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是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

- 1917年5—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代表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敌视十月革命，进行反革命宣传，因此被苏维埃政权查封。——第289、363页。
- 168 《俄罗斯语言报》(«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1917年该报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12月10日被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查封。——第291页。
- 169 1917年6月4日(公历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临时政府的部长、孟什维克策烈铁里在发言中硬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决心要夺取全部政权，列宁当场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驳斥说：“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一样，它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见本卷第98页)——第295页。
- 170 《工人之路报》(«Рабочий Путь»)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1917年9月16日至11月8日代替被临时政府封闭的《真理报》(见注17)出版。——第298、348页。
- 171 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温良的诗人是幸福的》(见《涅克拉索夫作品集》1950年俄文版第18页)。——第300页。
- 172 通体漂亮的太太 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专爱造谣和挑拨是非的典型人物。——第301页。
- 173 布里根杜马是1905年沙皇政府答应成立的咨议性“代议机关”。建立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和杜马选举条例是由内务大臣布里根主持的委员会拟订，并于1905年8月6日(公历19日)颁布的。布尔什维克宣布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旋风刮走了。”(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3页)——第302页。
- 174 《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 Труда»)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9月5日创刊，全俄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该报成了他们的中央机关报；1918年7月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反

苏维埃的叛乱时被查封。——第 303、552 页。

175 《人民意志报》(«Воля Народа»)是社会革命党右翼的机关报,1917 年 4 月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 年 11 月被封闭,以后又用别的名称出版。1918 年 2 月被彻底查封。——第 306 页。

176 套中人 是契诃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因循守旧的典型。——第 323、551、572、579、593、700 页。

177 万第 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万第省曾经发生贵族和僧侣领导的农民反革命暴动。——第 329、343 页。

17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85—586 页。——第 337、343 页。

179 莫尔格林 是亚·谢·格利波也多夫的喜剧《聪明误》中一个奴颜婢膝、逢迎谄媚、假仁假义以求飞黄腾达的典型人物。——第 337 页。

180 格·阿·阿列克辛斯基 是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惯于诽谤。1917 年 7 月,阿列克辛斯基同军事反间谍机关一起编造文件,诬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勾结德国进行间谍活动。

巴·尼·波列维尔节夫 是俄国律师和劳动派分子,在第一届资产阶级联合临时政府中任司法部长。他于 1917 年 7 月公布了阿列克辛斯基同军事反间谍机关一起编造的诬蔑诽谤的陷害性文件。——第 338 页。

181 文中提到的日期:2 月 28 日(公历 3 月 13 日)是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子;9 月 30 日(公历 10 月 13 日)是临时政府预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11 月 28 日(公历 12 月 11 日)是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第 341 页。

182 这句话是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的。

斯莫尔尼学院 是 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列宁在这里领导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于 1917 年 10 月 25—27 日(公历 11 月 7—9 日)在斯莫尔尼学院举行。——第 341 页。

- 183 1917年10月10日(公历23日)俄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讨论了立刻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发言并投票反对列宁提出的立刻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案。托洛茨基在这次会议上没有敢于公开反对武装起义。但是他建议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要开始起义,这就意味着把起义问题拖下去,使临时政府有可能集聚力量来击败起义。中央委员会给这些投降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以十票对二票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该决议成了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指导方针。为了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中央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第345页。
- 184 《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曾在1917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党中央谴责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工贼行为,禁止他们发表任何反对中央的决定以及既定的工作方针的声明。加米涅夫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第346页。
- 185 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在1917年10月12日(公历25日)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指示建立的。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总部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后,军事革命委员会受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委托,把反对反革命和保卫革命秩序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随着苏维埃机关的建立和巩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职能逐渐缩小,它的职能逐步转交到组织起来的人民委员部手里。1917年12月5日(公历18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完全撤销。——第350页。
- 186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晚十时四十五分在斯莫尔尼开幕。在六百四十九名代表中,有三百九十人是布尔什维克。有三百一十八个省和地方的苏维埃选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其中有二百四十一个苏维埃的代表是带着布尔什维克的委托书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大会开幕后就退出大会,他们拒绝承认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和通过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列宁做了

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

具有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政权已经转到苏维埃手中，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并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代表大会选举了由一百零一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有六十二名布尔什维克，二十九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其他人士。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7日（公历11月9日）早晨五时十五分闭幕。——第352、369、374、378、656页。

- 187 宪章运动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争取通过人民宪章的政治运动。人民宪章包括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为保障工人享受此项权利而规定的一系列条件。列宁称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本卷第811页）。英国工商业垄断地位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使得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日益增长，工联领袖不再支持宪章运动，因而宪章运动逐渐衰落。——第356、811页。
- 188 皇族和贵族的土地 是属于沙皇皇族的土地。租有土地 是国家拨给厂主并由他们分配给那些为了得到份地而到工厂做工的农民的土地。长子继承的土地 是世袭地主的大地产，这种大地产一代一代地完整地传给长子或一族之长。——第363页。
- 189 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把持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他们在会议上同布尔什维克党就政府成员问题进行谈判。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政府，其中不仅有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还应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反革命政党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反对这一妄图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主张。——第372页。
- 190 指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根据第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10—25日（公历11月23日—12月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一百一十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四十名布尔什维克、十五名布尔什维克的

同情者(乌克兰人)、五十名社会革命党人的右派和中派以及四十名无党派人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旧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夕曾企图破坏这次会议,但是这个企图没有得逞。

尽管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执行委员会企图分裂代表大会,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现了动摇,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在政权问题上仍然站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立场上。代表大会选出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11月15日(公历28日)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批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工人监督法令的决议。会议通过了在1917年11月25日(公历12月8日)召开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做了三次发言,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土地问题和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的条件观点,这对于代表大会的工作方向和团结代表大会的左翼具有重大意义(参看《列宁全集》第26卷第299—308页)。——第374页。

- 191 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于1917年12月12日(公历25日)开幕。出席大会的有二百七十六名代表。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发言、关于彼得格勒粮食状况的报告、关于工会建设的报告。

列宁向代表大会致贺词。代表大会完全赞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通过对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表示不信任的决议,因为它的政策帮助了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大会选派七十八名代表出席1918年1月5日(公历18日)召开的全国铁路员工代表大会。——第378页。

- 192 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公历12月9—2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由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召开的,为了使拥护它的代表尽量占多数,它采取了各种办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七百九十名有表决权的代表,这些代表的成分是:三百零五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三百五十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九十一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开会的情况极其紧张。特别

- 是在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工作的进程中，意见分歧使代表大会发生分裂。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代表大会并单独举行会议。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继续进行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农民书，告农民书的草稿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345—350页）。——第379页。
- 193 指孟什维克的“左派”集团，即所谓“国际主义者”集团的代表阿维洛夫的声明。他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胡说什么“你们希望用一斧头的打击就解决一切的这种简单方法处理问题，只能破坏信贷制度的脆弱机体，降低卢布的市价，因而我确信，除了彻底崩溃以外你们将一无所得”。——第382页。
- 194 指银行国有化法令和关于检查银行钢制保险箱法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7年12月14日（公历27日）批准了这两个法令，公布在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2号上。——第382页。
- 195 旧亚当即旧人（见圣经《罗马人书》第6章第6节、《以弗所书》、《歌罗西书》等），这里的意思是指古老的心理、古老的习惯等。——第391页。
- 196 见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第398页。
- 197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是列宁1918年1月3日（公历16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略加修改，一致通过了《宣言》。《宣言》载于1918年1月4日（公历17日）《真理报》上。1918年1月5日（公历18日）布尔什维克党团提请立宪会议讨论《宣言》。由于反革命的立宪会议拒绝讨论这个《宣言》，布尔什维克党退出了立宪会议。1月12日（公历25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宣言》。——第404页。
- 198 1917年12月18日（公历31日）列宁把人民委员会承认芬兰独立的决定交给芬兰资产阶级政府首脑斯文胡伍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12月22日（公历1918年1月4日）根据斯大林关于芬兰独立

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1—23页)批准了这一决定,通过了《革命政府关于芬兰独立的宣言》。

1917年12月19日(公历1918年1月1日),苏维埃政府向波斯政府提出关于制定撤退波斯境内俄军总计划的建议。

1917年12月23日(公历1918年1月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写的《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的法令,1917年12月29日(公历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这个法令公布在1917年12月31日(公历1918年1月13日)《真理报》第227号上(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4—25页)。——第405.778页。

199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于1918年1月6日(公历19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审议。会前列宁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法令提纲》(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第48—50页),该提纲曾逐条宣读并获通过;所有条文都被通过未加修改。这个提纲是列宁当天起草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基础。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于1918年1月6日(公历19日)夜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公布在1918年1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号上。——第407页。

200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是列宁在1918年1月8日(公历21日)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干部会议上宣读的。出席这次会议的约有六十多人,赞成列宁提纲的约有四分之一;支持“左派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所谓革命战争观点的约有半数;同意托洛茨基的“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不签订和约”这一意见的约有四分之一。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布哈林所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2月23日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在发表时,列宁给提纲写了前言,标题是《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第409页。

201 乌克兰拉达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1917年4月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大会上成立。十月革命胜利后,拉达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宣布自己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拉达支持顿河的卡列金和其他白卫将军,走上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

由于乌克兰拉达十分敌视苏维埃政权,1917年12月3日(公历16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同时发表告乌克兰人民书。人民委员会委托一个委员会起草上述文件,列宁和斯大林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在起草这些文件的过程中,把向乌克兰拉达提出的最后要求和告乌克兰人民书合并为一个文件,称为《告乌克兰人民书并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

1918年1月,基辅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举行了反对反革命拉达的起义。苏维埃军队开入基辅,拉达被赶出基辅。

关于乌克兰拉达,参看《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7—14、15—17、18—20页。——第415、424页。

- 202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0—18日(公历23—31日)举行。三百一十七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和一百一十个集团军、军和师委员会派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最初有七百零七名代表,其中有布尔什维克四百四十一名。三天后又有一百五十多个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这些代表是1月13日(公历26日)开幕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在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人数不断增加,出席最后一次会议的代表共有一千五百八十七人。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并致闭幕词。代表大会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

1918年1月12日(公历25日)代表大会批准了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月15日(公历28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代表大会同意人民委员会的民族政策。代表大会选出了由三百零六人组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18、656页。

- 203 指全俄制革工人工会同企业主从1917年上半年开始的关于合同问题的谈判。制革工人工会要求增加制革业总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并根据民主原则加以改组。谈判结果是改组制革业委员会和各区委员会,工人在委员会中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列宁签署的关于制革业总委员会

的地方机关必须民主化和严格执行制革业总委员会和各区委员会的命令的电报，于1918年4月初分别拍发给各级苏维埃。——第432页。

- 204 参看马克思1870年2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34页。

- 205 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问题，1917年8月在意大利的都灵爆发了工人反战的总罢工，1918年1月爆发了奥地利工人罢工。奥地利工人罢工是在缔结全面和约和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的口号下进行的。

在罢工斗争过程中，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城市自发地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领袖们利用了苏维埃，镇压了革命的罢工运动。——第434页。

- 206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于1918年2月21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并由人民委员会签署，于2月22日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另外还出了单张。这个法令是列宁鉴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的和平谈判已经破裂和德国帝国主义者已经开始进攻而写的。2月10日，当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领导苏维埃和平代表团的托洛茨基，叛卖性地违背了列宁关于接受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的指示。他在回答德国的最后通牒时宣读了一个声明，声明中说：我们不签订和约，我们在复员军队，我们不进行战争。托洛茨基这种挑拨性的步骤使苏维埃共和国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打击。2月16日，德军统帅部正式通知停止同苏维埃共和国的休战状态，并于2月18日开始了全线军事进攻。德国帝国主义者占领了苏维埃领土上的许多城市，并威胁着彼得格勒。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唤起了革命的人民群众同德国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很快组织起来的年轻的新的红军队伍英勇地击退了德国侵略者的进犯。德国强盗在纳尔瓦和普斯科夫受到了坚决的回击。德国军队对彼得格勒的进攻被阻止住了。——第436页。

- 207 鉴于德军统帅部提出的停止休战状态和从1918年2月18日起恢复战争的声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2月17日晚间的会议上，提议立即开始同德国进行新的谈判，以签订和约。列宁的提议以六票

对五票被否决。

2月18日,德军的进攻开始了。在这一天,党中央委员会重新讨论了同德国缔结和约的问题。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罪恶地坚持继续进行战争的挑拨政策。只是在第二次会议即晚间的会议上,由于列宁的坚决要求和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做了主张签订和约的发言之后,才通过了列宁的提议:给德国政府拍发无线电报,说明俄国同意按照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电报草稿当即由列宁写好,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批准,并于2月18日夜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往柏林(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97页)。——第436页。

- 20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局在1917年和1918年初包括中部工业地区各个党组织,中部工业地区有以下各省:莫斯科省、雅罗斯拉夫里省、特维尔省、科斯特罗马省、弗拉基米尔省、沃龙涅什省、斯摩棱斯克省、下新城省、土拉省、梁赞省、唐波夫省、卡卢加省和奥勒省。在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而斗争的时期,莫斯科区域局暂时被“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奥新斯基、洛莫夫、斯土柯夫、萨普龙诺夫、曼策夫、雅柯夫列娃等人)所控制。在1918年春季以前,莫斯科区域局实际上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的派别组织中心。

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新的媾和条件以后,在莫斯科区域局一小撮人的会议上做出了被列宁称为分裂的和反苏维埃的决议。——第438页。

- 209 指1918年1月21日(公历2月3日)在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对德和约问题的表决。在会议上赞成必须签订和约的有:列宁、斯大林、阿尔乔姆(谢尔盖也夫)和其他等人,反对和帝国主义者进行任何谈判和缔结条约的有:“左派共产主义者”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和斯土柯夫。大多数“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表决时采取骑墙立场:他们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一般地说”有签订和约的可能,但同时又反对立刻和德国签订和约。——第441页。
- 210 指提尔西特和约,该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

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拿破仑第一强迫签订的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1813年的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第443、450、467、489页。

- 211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1918年初由于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反党集团。“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左”的辞句掩饰下,坚持要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同德国作战的罪恶政策。这个集团的首领是: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这些“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头目都是托洛茨基的帮手,当时托洛茨基在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口号下,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执行叛变性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列宁坚决主张签订和约,以便赢得时间,整顿国家经济,建立红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与此相反,他们强迫布尔什维克党接受显然会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受灭亡的政策。列宁把“左派共产主义者”称做“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工具”。“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进行了公开的反党斗争,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派别活动。他们对党乱加诽谤,造谣中伤,竭力分裂党,瓦解党的队伍,以辞去苏维埃和党的职务等等来破坏党,要挟党。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为了争取通过签订和约的决定,以便拯救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在中央内部坚持顽强的斗争,反对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

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决回击了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罪恶活动,痛斥了他们的叛卖和投降的立场。“左派共产主义者”终于被孤立、被击溃了。

《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зм》)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组织的机关报,它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专区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十一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的决定,该报于1918年3月20日停刊。代表会议指出:《共产主义者报》所宣传的政策存在严重的错误,它

根本不能代表共产党彼得格勒组织的政策。代表会议宣布《彼得格勒真理报》代替《共产主义者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第 446、467、673 页。

- 212 见亚·谢·格列波也多夫的喜剧《聪明误》第一幕第四场。——第 449 页。
- 213 1918 年 2 月 24 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通过决议，赞同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决定，认为签订和约是“摆脱目前危机的唯一出路”。同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组织军用列车开往前线”。——第 450 页。
- 214 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于 1918 年 3 月 3 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工厂委员会、工会、区苏维埃、负责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等人。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都赞同签订和约。3 月 4 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了和约问题，结果以十票对七票通过了签订和约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于 1918 年 3 月 4 日夜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代表以外，还有各区的许多工人。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对和约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该决议表明了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并赞成自己的代表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维护党的统一。——第 450 页。

- 215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于 1918 年 3 月 6—8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四十六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五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十七万以上的党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党员总数已不下于三十万人。相当多的一部分党组织由于大会召开的紧急没有来得及选派代表，或者由于苏维埃俄国的一些省份暂时被德国人占领而不可能派代表参加。

这次代表大会是为了最终解决和约问题而召开的一次紧急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做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共产主义者”推举布哈林为报告人发表了自己的提纲。表决结果，代表大会以三十票对十二票（四票弃权）通过了列宁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代表大会谴责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叛卖政策，痛斥了“左

派共产主义者”企图继续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分裂活动的阴谋。“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遭到了失败。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使俄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争取了喘息时间来组织红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18年11月废除了布列斯特条约。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列宁就这些问题做了报告。根据列宁的提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为了最后制定新党纲,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决定把列宁所拟定的草案(《党纲草案草稿》)作为党纲的基础。——第452、475页。

216 指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投降主义立场。他们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在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谈判的时候,违背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关于谈判应当成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的指示,接受了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反革命政党来组织政府的要求(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6—263、282页和本卷第369—373页)。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坚决否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同反革命政党妥协的主张,并宣布他们是破坏革命事业的工贼。——第453页。

217 指1907年11月1日(公历14日)第三届国家杜马开幕时杜马的成员要在效忠沙皇的宣誓书上签字。拒绝签字的代表必须退出杜马。因为退出杜马会失去动员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讲台,所以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杜马的全体代表一起在宣誓书上签了字。——第464页。

218 麦·霍夫曼是德国的将军,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二阶段(1917年12月底至1918年1月28日(公历2月10日))担任德帝国主义的代表。——第467页。

219 大概指的是从1918年2月18日德国开始进攻到2月28日苏维埃代表团到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这段期间的战争。德国侵略者的进攻

一直继续到3月3日和约签订才停止下来。——第469页。

220 芬兰革命是1918年1月中旬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开始的，赫尔辛福斯、维波尔格等许多巨大的中心城市都发生了革命。革命开始以前发生了十一月总政治罢工。这次罢工是在中央革命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17年11月13日发生的，罢工继续了一个星期。1918年1月28日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福斯。1月29日在赫尔辛福斯组织了革命政府——芬兰人民代表委员会（或芬兰人民委员会）。斯文胡伍德资产阶级政府曾向瑞典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求援。这个资产阶级政府在芬兰北部地区得到巩固并组织了富农的白卫军队以后，在德国人、瑞典人和俄国白卫军官的帮助下，于2月开始了向南部的进攻。由于白卫军有登陆的两万名德国远征军的援助，芬兰的工人革命经过三个月的激烈内战以后，到5月便被镇压下去了。——第469页。

221 关于修改党纲的问题是列宁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里提出来的（见本卷第16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召开以前，列宁写了《党纲的理论、政治等部分的修改草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的纲领做了许多修改。根据列宁的提议，代表会议委托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内，即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制定党纲草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7年7月底—8月初）没有解决党纲问题。代表大会确认四月代表会议关于必须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委托中央委员会就党纲问题组织广泛的讨论。1917年夏天和秋天，党内展开了理论上的论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曾经几次讨论过党纲问题，在1917年10月18日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修改党纲专门委员会以迎接原定在1917年秋召开的定期党代表大会。最后，中央委员会在1918年2月6日决定委托以列宁为首的新的委员会来拟定党纲草案。列宁写了《党纲草案草稿》来补充1917年写的《党纲的理论、政治等部分的修改草案》。《草案草稿》曾作为讨论材料分发给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但是大会并没有详细地讨论党纲。代表大会委托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拟定纲领的最后草案，并决定把列宁所拟定的草案作为党纲的基础。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才最后通过了党纲。

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提出来的(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73—74页)。列宁在《四月提纲》里,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的小册子里,以及在1917年的其他许多著作和发言里都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必要性(见本卷第13—18,62—66页,《列宁全集》第24卷第240、124页和本卷第240—241页)。无论在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四月代表会议上,无论是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1917年7月底—8月初)都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直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才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第475、735页。

222 指关于修改党纲的两个文集,一个是列宁编辑并写序言的《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出版(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4—444页);另一个是《修改党纲的材料(弗·米柳亭、符·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弗·斯米尔诺夫论文集)》,1917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社出版。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中批评了莫斯科文集所散播的机会主义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31—158页)。——第476页。

223 《启蒙》(«Пробуждение»)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起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个杂志是根据列宁的指示创办的,它代替了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列宁曾在国外领导《启蒙》杂志,该杂志曾发表列宁的下列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选举的总结》、《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等。

1912年至1913年斯大林住在彼得堡时,直接参加了杂志的工作。《启蒙》杂志发表了斯大林的论文《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启蒙》于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该杂志复刊,但只出了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两篇著作:《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第476页。

224 《斯巴达克》(«Спарта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及莫斯科专区委员会(从第2期起)出版的周刊,1917年6月2

日至11月11日在莫斯科断断续续地出版。——第476页。

- 22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火星报》所提出的党纲。——第476、735、774页。

- 226 见恩格斯在1887年12月15日写的《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7页）。——第477、577、773页。

- 227 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斯代表大会于1912年9月15—21日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决议说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并号召全党“加倍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

国际社会党人巴塞尔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是由于欧洲面临战争的威胁而召开的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着重指出了未来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并号召各国社会党人积极参加反战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的首领无耻地破坏了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对第二国际首领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的批评，见列宁的著作《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本选集第2卷第614—665、666—705页）。——第480页。

- 228 《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和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本卷第530—559页）一文，一并收在1918年5月再版的小册子《当前的主要任务》中，列宁写了下列序言：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两篇报刊上的文章：一篇摘自1918年3月1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另一篇摘自1918年5月9—11日《真理报》。这两篇文章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所表明同一个问题。

作者1918年5月17日于莫斯科。”——第488页。

- 229 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见《涅克拉索夫作品集》1950年俄文版第241页）。——第488页。

- 230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手稿的题目是《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

- 务的提纲》。1918年4月26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了列宁的提纲。中央委员会同意这个提纲，并决定以文章的形式在《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同时出版单行本。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委托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后来列宁把报告的内容写成六条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90—293页）。——第493页。
- 231 米·彼·鲍加也夫斯基在1917年6月至1918年1月担任沙俄将军卡列金的反革命顿河哥萨克军队的副统帅，并从1918年1月初起参加反革命的“顿河政府”，不久被捕，4月被枪决。——第496、551页。
- 232 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1日的决议，规定人民委员领取的最高工资标准每月是五百卢布，相当于工人的平均工资。1918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请求，决定发给高级科学技术专家以较高的工资。——第502页。
- 233 消费合作社组织的法令于1918年4月10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4月11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并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伊·乌里杨诺夫（列宁）签署，公布在1918年4月13日《真理报》第71号和1918年4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5号上。列宁对法令草案做了一些修正，第11、12、13条完全是由列宁写的。——第508页。
- 234 指全俄工会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劳动纪律的条例。这个条例公布在1918年4月《国民经济》杂志第2期上。——第511页。
- 235 指人民委员会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护路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这项法令于1918年3月23日由人民委员会批准，1918年3月26日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杨诺夫（列宁）签署公布。法令草案是由专门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指示拟定的。列宁对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做了修改和补充，并且做了最后的审查。——第519页。
- 236 《前进报》（《Вперед》）是孟什维克的日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该报发行于1917—1918年，1918年4月2日起成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

- 报，1918年4月底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查封。——第521、546、579页。
- 237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第525页。
- 238 《共产主义者》（《Коммунист》）是反党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见注211）的派别机关刊物，于1918年4月20日至6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四期。——第530页。
- 239 诺兹德烈夫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地主，喜欢争吵，招摇撞骗。——第535页。
- 240 见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第2卷第25章。——第537页。
- 241 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5页）。——第548页。
- 242 李伯尔唐恩是孟什维克的首领——李伯尔、唐恩及其拥护者的讽刺性的绰号，自从1917年9月7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1号发表了杰·别德内依的小品文《李伯尔唐恩》之后，这个绰号就叫开了。——第553、662页。
- 243 引自瓦·李·普希金的讽刺短诗（见《普希金全集》1855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50页）。——第555页。
- 244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26日至6月4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一百零四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一百四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绝大多数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占百分之七十）。代表大会是在国内战争已经广泛展开的形势下召开的，召开这次大会是为了解决当时最重要的组织国民经济的方法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列宁的组织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反对集中管理。但是，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代表大会认为必须过渡到进一步实行普遍的国有化，不仅把主要的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而且把私营的大商业企业也实行国有化。代表大会通过了国营企业的管理条例、城乡商品交流的决议

- 和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草案，拟定了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措施。——第 568 页。
- 245 指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反革命部队盘踞的城市和地区。在这些地方，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下，组成了残酷地迫害劳动人民的白卫政府。——第 583 页。
- 246 《给美国工人的信》于 1918 年 12 月在纽约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出版的一个杂志上摘要发表，以后又根据该杂志的样本出过单行本。这封信在美国期刊上转载过多次。——第 586 页。
- 247 1896 年菲律宾人民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大革命，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898 年菲律宾宣布独立，建立了共和国。同年，美帝国主义又以“支持”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为借口，派兵侵占菲律宾，从此菲律宾又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第 587 页。
- 248 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书信》一书的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 年俄文版第 7 卷第 923 页）。——第 592 页。
- 249 《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 年创刊于美国堪萨斯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第 593 页。
- 250 据希腊罗马神话，密纳发女神从雷神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头戴盔帽，身披铠甲，手执宝剑。因此，人们常常借此来比喻某人或某事一开始就完备无缺。——第 597 页。
- 251 列宁是根据 1918 年 11 月 20 日《真理报》引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信的，《真理报》把该信的出处错误地写成《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事实上这封信刊登在 1918 年 10 月 29 日北德维纳省执行委员会报纸《农民和工人思想报》第 75 号上。——第 607 页。
- 252 指 1918 年 11 月 16 日莫斯科人民银行股东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反对银行国有化。——第 614 页。
- 253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部著作是列宁继《国家与革命》之后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它深刻分析了苏维埃民主的实质，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彻底揭穿了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其他首领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面貌。

列宁的这部著作是为批判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而写的。

1918年8月，在柏林出版的考茨基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的一篇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向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列宁在1918年9月20日的《真理报》上读了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写信说：“考茨基的无耻澜言、胡说八道和庸俗不堪的机会主义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于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不作任何斗争呢？”“只要考茨基的小册子（关于布尔什维克、专政等等）一出版，就请务必寄来（我特别需要），此外请替我收集考茨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文章……以及其他文章（如果有的话）。”（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359、360页）

1918年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立即开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还在这部著作写完之前，列宁为了“尽快占领阵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就在10月9日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88—97页），并指示苏维埃共和国驻柏林代表尽速把这篇文章译成外文发表。

1918年11月10日列宁写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同年由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1919年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出版了列宁的这部著作。——第616页。

- 254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从1908年2月出版到1917年1月，一共出过五十八号。创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各号移至国外出版，最初在巴黎，后来在日内瓦。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

《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八十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以及斯大林的大量文章。列宁曾在该报编辑部内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

争。一部分编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取消派采取了调和态度,企图阻挠列宁路线的执行。担任编辑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唐恩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实行怠工,同时在他们小集团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公开为取消主义辩护。

由于列宁毫不调和地反对取消派,马尔托夫和唐恩于1911年6月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自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第616页。

- 255 《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办的一个杂志,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于1915年在日内瓦出版,只出了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列宁在杂志编辑部内进行了反对布哈林—皮达可夫反党集团的斗争,揭穿了该集团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和利用杂志进行派别活动的企图。由于该集团的反党立场,列宁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同该集团断绝关系并停止共同出版杂志。从1916年10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开始出版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616页。

- 256 参看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页)。——第627页。

- 257 见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第627、638页。

- 25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第630、647、718页。

- 259 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的两个政党,产生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

辉格党代表商业和银行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它努力扩大议会的权利,并积极主张扩大殖民地的政策。十九世纪中叶,它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并,成为自由党。

托利党代表大土地贵族和大金融贵族的利益,它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英国国家制度中的保守和腐败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

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这两个政党曾在英国轮流执政。——第 632 页。

260 语出圣经《马可福音》。犹太是出卖耶稣的叛徒，用和耶稣接吻作为告密的暗号。——第 632 页。

261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反动的君主派军阀集团于 1894 年对总参谋部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组织的挑拨性的审判，诬告他进行间谍和叛国活动。军事法庭把德雷福斯判处无期徒刑。但是，由于在法国展开了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共和派同君主派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德雷福斯终于在 1906 年被宣告无罪。——第 632、721 页。

262 指英国资产阶级血腥镇压 1916 年爱尔兰反对英国奴役的起义。列宁在 1916 年写道：“在欧洲……爱尔兰举行的起义，被不敢让爱尔兰人参加普遍义务兵役的‘爱好自由的’英国人用死刑平定下去了。”（见《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348 页）

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东北部分，居民以英国人为主；阿尔斯特的军队曾和英国军队一起镇压爱尔兰人民的起义。——第 632 页。

263 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第 641 页。

264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这篇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有一天，他们一同出去游玩，途中隐士困倦酣睡，熊为了赶走隐士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用一块大石头把朋友的脑袋砸成两半。——第 645 页。

26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2 页。——第 646 页。

266 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用英文发表于 1918 年 1 月 15 日的《纽约晚邮报》上，并在纽约印成单行本。

《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是美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创办于 1801 年。后来该报被约·皮尔庞特·摩根公司收买，成了美国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报刊。现在叫做《纽约邮报》。——第 651 页。

267 彼特鲁什卡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人物。他很爱看书，而

- 且什么书都看,至于书中讲的是什么却不去了解,他感到有趣的就是字母总会拼成字。——第 659 页。
- 268 犹大什克·采洛夫廖夫是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小说《果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一个极端自私、虚伪、残酷、贪婪、愚蠢的地主。——第 661 页。
- 269 积极派是一个孟什维克的极右派集团,他们的纲领就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不应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通过社会改良的道路去争取改善自己的地位。该集团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就反对用“民主”的方法,而积极主张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消灭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因此,他们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科尔尼洛夫、卡列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乌克兰拉达,积极参加捷克白军的叛乱,并同外国干涉者的军队勾结。积极派的代表人物是李伯尔、波特列索夫等人。——第 662 页。
- 270 指 1910 年 9 月 20 日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列宁的《两个世界》(《列宁全集》第 16 卷第 303—311 页)。——第 663 页。
- 271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的简称,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 年至 194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 年起用这个名称)。——第 663 页。
- 272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 年 10 月在莱比锡出版。恩格斯曾在该报上对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经常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进报》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该报在柏林出版到 1933 年。——第 663 页。
- 27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4 页。——第 669 页。
- 274 参看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19—323 页)。——第 680 页。

275 “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是在1918年7月6—7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挑衅地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并举行叛乱之后分裂出来的两个新党。

民粹主义共产党谴责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并在1918年9月的代表会议上成立了自己的党。民粹主义共产党赞成布尔什维克党联合中农的方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参加了各级苏维埃机关，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1月民粹主义共产党宣布解散并和俄共(布)合并。

革命共产党主张同俄共(布)合作，声明支持苏维埃政权。革命共产党是一个成员不多的政党，存在到1920年。1920年9月，该党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准许各党组织吸收前革命共产党的党员加入俄共(布)。——第681页。

276 普·彼·普罗相 是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第686页。

277 贫农委员会 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的法令(《关于组织贫农并供给他们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成立的。根据法令规定，贫农委员会的工作如下：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的粮食机构没收富农和富人手里的余粮。法令还规定在分配粮食和农具时给贫苦农民以各种优待。

贫农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在同富农的斗争中，在重新分配被没收的土地和对工业区和红军的粮食供应上，贫农委员会起了巨大的作用。组织贫农委员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阶段。贫农委员会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巩固，对于把中农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起了重大作用。

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11月)的决议，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的贫农委员会同农村苏维埃实行合并。——第687页。

278 指1918年7月发生的几次富农反革命暴动，这几次暴动都是社会革命党人白卫分子用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金钱并按其指示组织的。——第687页。

279 指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这届政府是由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阿夫

克森齐也夫等人在1917年7月24日(公历8月6日)组成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靠近立宪民主党人的非党人士都参加了这个政府。新组成的政府为立宪民主党人所操纵。——第689页。

- 280 指社会革命党人、农业部长谢·列·马斯洛夫在十月革命前几天向临时政府提出的“关于调整土地关系”和“关于出租的土地”等问题的法令草案，这个草案一部分于1917年10月在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刊上发表。列宁写道：“谢·列·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为了和地主妥协、为了挽救地主而写的‘地主的’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2页)

临时政府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和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行为，逮捕了土地委员会委员。——第689页。

- 281 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8章第3节(c)。——第697页。

- 282 《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于1918年11月9日在柏林创办的日报，最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机关报，同年12月德国共产党成立，该报成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呐喊报》(*Der Weckruf*)是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11日在维也纳出版。1919年1月起曾先后用《社会革命报》、《红旗报》、《奥地利人民呼声报》的名称出版。

德意志奥地利是指1918年11月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第710页。

- 283 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第714页。

- 284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五十二个代表，其中三十四人有表决权，十八人有发言权。大会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在1919年3月4日会议上，列宁就代表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即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做了报告。代表大会没有经过讨论就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并将该提纲转交共产国际执行局，委托执行局设法将其广为传播，同时还批准了列宁对提纲提出的补充决议。

根据列宁的提议，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解散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决议。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共产国际纲领和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号召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和由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五人组成的执行局。——第 715、809 页。

- 285 厂工会委员会是工人选出的组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在英国很多生产部门中就已存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外国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的时期，厂工会委员会曾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第 716 页。
- 286 1919 年 2 月，原来参加第二国际的一些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为了恢复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在伯尔尼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建立了一个联盟，即伯尔尼国际。列宁称伯尔尼国际“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459 页）。——第 717、824 页。
- 287 《自由报》（《Die Freiheit》）是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18 年 11 月至 1922 年 10 月在柏林每日出版。——第 725、814 页。
- 288 《印刷工人报》（《Газета Печатников》）是受孟什维克影响的莫斯科印刷业工会的出版物，于 1918 年 12 月 8 日创刊，1919 年 3 月被查封。——第 729 页。
- 289 指 1918 年 11 月 18 日刊载于《红旗报》第 3 号上的卢森堡的一篇文章《开始》。——第 731 页。
- 290 手稿至此中断。这一摘录经过修改后列入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成为《一般政治方面》这一章的第五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第 1 分册第 533—534 页）。——第 759 页。
- 291 这一补充全文列入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成为《民族关系方面》这一章的第四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第 1 分册第 535—536 页）。——第 761 页。
- 292 党纲草案经济部分的这一条在初稿中是第三条；列宁加以修改后定为

第八条。这一条后来就列为党纲经济部分的第八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43页）。——第767页。

- 293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三百零一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三十一万三千七百六十六个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一百零二人。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党纲，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在讨论纲领时，代表大会驳斥了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关于小商品生产和中农经济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这一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布哈林的这种观点，也就是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否认中农在苏维埃建设中的作用的观点。同时，布哈林抹杀了富农分子从小商品经济中生长出来的事实。代表大会还粉碎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两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他们两人反对把民族自决权条文写进纲领，反对民族平等。

第八次代表大会对中农采取了新路线。这一路线是在列宁的农村工作报告和代表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中确定的。代表大会建议由中立中农的政策进到同中农实行坚固联盟并在这个联盟中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政策。

代表大会就军事问题通过了旨在巩固红军的决议。列宁和斯大林在自己的发言中要求建立具有极严格的铁的纪律的正规红军。他们在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敌视老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干部而对出身于旧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其中有一部分在国内战争时期背叛了苏维埃政权)顶礼膜拜的托洛茨基的反党军事政策。列宁和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击了反对建立正规红军、维护军队中的游击习气残余的所谓“军事反对派”。代表大会摒弃了“军事反对派”的一系列建议，同时给予托洛茨基的背叛路线以毁灭性的打击。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和苏维埃的建设的决议，驳斥了否认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机会主义集团。

代表大会就党的建设问题通过了关于普遍重新登记党员和改善党

- 的社会成分的决议。——第 772、792 页。
- 294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2 章第 5 节。——第 775 页。
- 295 指 1919 年 3 月间斯大林同巴什基里亚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关于成立巴什基里亚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谈判。谈判结果达成了“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巴什基里亚政府关于巴什基里亚实行苏维埃自治的协议”，协议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第 778 页。
- 296 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 成立于 1918 年 11 月 11 日。波兰其他许多城市和工业区也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在企业中真正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展开了反对企业主怠工的斗争，做出了同革命俄国建立关系等等决定。苏维埃在 1919 年夏天被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消灭。——第 781 页。
- 297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发表于 1919 年 3 月 20 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分册第 581—582 页）。——第 782 页。
- 298 农村工作问题组 是在 1919 年 3 月 18 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建立的。该组开过三次会，听取了关于土地政策和农村工作的报告，选举了决议起草委员会。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以及关于农村的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后来都被代表大会批准。——第 792 页。
- 299 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13—316 页）。——第 798 页。
- 300 下新城党组织曾向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声明，《下新城省党的工作手册》中“一般中农”这个词是印刷错误。——第 800 页。
- 301 《时报》（《Le Temps》）是 1861 年至 1942 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该报代表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外交部的正式机关报。——第 808 页。
- 302 参看恩格斯 1858 年 10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8 页）。——第 811 页。

- 303 参看马克思 1856 年 4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4 页)。——第 812 页。
- 304 指波格丹诺夫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散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马赫主义)和反动的文化艺术观点(未来主义)。波格丹诺夫及其同伙否认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企图使苏维埃文化的发展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必须利用文化遗产的卓越成就。列宁坚决反对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组织中散布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俄共(布)中央和全俄无产阶级文化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党团在 1920 年 10 月通过了关于各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归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的决议,这些组织并入了该部,成为该部的一个处。1920 年 12 月 1 日俄共(布)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论无产阶级文化》的信,斥责了“无产阶级文化”组织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派别。“无产阶级文化”组织从 1922 年以后逐渐瓦解。——第 817、852 页。
- 305 指 1918 年 12 月 10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动员有文化的人和组织宣传苏维埃制度》法令。——第 818 页。
- 306 《永远前进报》(«Всегда Вперед!»)是在莫斯科出版的孟什维克报纸,1918 年出了一号,1919 年从 1 月 22 日出版到 2 月 25 日。——第 821 页。
- 307 凡尔赛和约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帝国主义条约。条约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城的凡尔赛宫签字。条约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反对和摧毁苏维埃政权;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 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见《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291 页)。——第 824 页。
- 308 耶·边沁 是英国社会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功利主义理论家。他认为“个人的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的利益”。

利益的总和”。他毫不掩饰地强调有利于资产者的就是有利于社会的，就是道德的。——第 832 页。

309 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46 页)。——第 838 页。

310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现名集体农庄广场)上的市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和粮贩进行黑市活动的中心。从那时起，苏哈列夫卡成了投机倒把的同义语。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苏哈列夫卡市场根据 1920 年 12 月 13 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被封闭。——第 846 页。

人 名 索 引

A

阿布拉莫维奇, 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
(Абрамович, 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1880—1959)——第 372 页。

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 (Adler, Friedrich
1879—1960)——第 57, 87—88, 711—
712 页。

阿德勒, 维克多 (Adler, Victor 1852—
1918)——第 54 页。

阿尔伯特——见艾伯林。

阿夫克森齐也夫, 尼古拉·德米特利也维
奇 (Авксенть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
евич 1878—1943)——第 143, 181,
210, 298, 408, 453, 687, 829 页。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Аксельрød,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
—1928)——第 55, 644, 651—652, 700,
829 页。

阿列克谢也夫, 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
(Алексее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7—1918)——第 286 页。

阿列克辛斯基, 格里哥里·阿列克谢也维
奇 (Алексинский,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
сеевич 生于 1879 年)——第 338 页。

艾伯林, 胡果 (Eberlein, Hugo 1887—
1944) (阿尔伯特 Albert)——第 731
页。

艾伯特, 弗里德里希 (Ebert, Friedrich

1871—1925)——第 710 页。

奥波连斯基, 瓦列利昂·瓦列利昂诺维奇
(Оболенский, 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
анович 1887—1938) (奥新斯基 Осин-
ский)——第 448, 554—555, 728 页。

奥斯特利茨, 弗里德里希 (Austerlitz,
Friedrich 1862—1931)——第 710—
714 页。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 莫伊塞·雅柯夫列维
奇 (Острогорский, Моисей Яковле-
вич 生于 1852 年)——第 709 页。

奥新斯基——见奥波连斯基。

B

巴格拉齐昂, 德米特利·巴甫洛维奇
(Баграцион, 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生
于 1863 年)——第 286 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第 216, 227, 260 页。

巴札罗夫 (Базаров 1874—1939) (真名鲁
德涅夫,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Рудне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第 102, 320—322 页。

白拉克, 威廉 (Bracke, Wilhelm 1842—
1880)——第 226, 242 页。

布里安, 阿里斯蒂德 (Briand, Aristide
1862—1932)——第 312 页。

鲍勃凌斯基, 阿列克塞·亚历山大罗维奇

- (Бобрин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927)——第 142 页。
- 鲍勃凌斯基, 安·阿·(Бобринский, Ан. А.)——第 142 页。
- 鲍勃凌斯基,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也维奇(Бобрин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生于 1868 年)——第 142 页。
- 鲍加也夫斯基, 米特罗范·彼得罗维奇(Богаевский, Митрофан Петрович 1881—1918)——第 496, 500, 524, 551 页。
- 鲍威尔, 奥托(Bauer, Otto 1882—1938)(维贝尔, 海因里希 Weber, Heinrich)——第 683 页。
- 倍倍尔, 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第 90, 225—226, 228, 242—243, 247, 630, 652, 659, 663, 673 页。
- 比索拉蒂, 列奥尼达(Bissolati, Leonida 1857—1920)——第 53, 209 页。
- 彼得一世(Петр I 1672—1725)——第 545 页。
- 彼列维尔节夫, 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Переверзе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第 338 页。
- 彼舍霍诺夫, 阿列克塞·瓦西里也维奇(Пешехонов, 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7—1933)——第 123, 154, 156, 312, 333—334, 389 页。
- 俾斯麦, 奥托(Bismarck, Otto 1815—1898)——第 180, 658 页。
- 边沁, 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第 832 页。
- 别尔纳茨基,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Бернацкий, 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生于 1876 年)——第 140 页。
-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第 394 页。
- 别洛鲁索夫, 阿·斯·(Белоруссов, А. С. 1859—1919)(真名别列夫斯基, 阿列克塞·斯塔尼斯拉沃维奇 Белелуцкий, Алексей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第 515 页。
- 波克罕, 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第 576 页。
- 波克罗夫斯基,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Покр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8—1932)——第 449—450, 552 页。
- 波米亚洛夫斯基,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Помя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1835—1863)——第 254, 558 页。
- 波特列索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Потрес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9—1934)——第 3—4, 9—10, 12, 52, 56, 62, 139, 171, 274, 662 页。
- 伯恩施坦, 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第 207, 214—216, 261—263, 266, 270, 272, 277, 619, 628, 665 页。
- 伯格, 维克多(Berger, Victor 1860—1929)——第 53 页。
- 柏肯盖姆, 亚历山大·莫伊谢也维奇(Беркенгейм, Александр Мойсеевич 1880—1932)——第 298 页。
-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第 29, 626 页。
- 布勃利科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Бубл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生于 1875 年)——第 133, 148 页。
- 布尔德朗, 阿尔伯(Bourderon, Albert 1858—1930)——第 56, 59 页。
- 布卡南, 乔治·威廉(Buchanan, George

- William 1854—1924) ——第7页。
- 布哈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Бухар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 ——第447—449, 478, 548, 550, 552, 557—559, 772—774, 776—779页。
- 布兰亭, 卡尔·亚尔马 (Branting, Karl Hjalmar 1860—1925) ——第53, 209, 274, 725页。
- 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 叶卡特林娜·康斯坦丁诺夫娜 (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 Екате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1844—1934) ——第171, 305, 318, 331, 333—334, 829, 854页。
- 布列什柯夫斯卡娅, 叶·康·——见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
- 布伦坦诺, 路约 (Brentano, Lujo 1844—1931) ——第616页。

C

- 策烈铁里,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也维奇 (Церетели, Ирак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1882—1959) ——第13, 15, 20—21, 26, 29, 32, 34, 41—42, 52, 55—56, 62, 68—69, 110—111, 123—124, 133, 155, 164, 171, 181, 210, 235, 239, 254—255, 274, 279, 295, 309—310, 318, 327, 331, 339, 428, 495, 516, 552—553, 687页。
- 查克斯, 格·德·(Закс, Г. Д. 1832—1937) ——第681页。
- 柴可夫斯基,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Чай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0—1926) ——第298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 ——第526, 592, 822—823页。

D

- 大卫, 爱德华 (David, Eduard 1863—1930) ——第4, 56, 171, 209, 274, 812页。
- 丹东, 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 ——第337, 343—344页。
- 德布兹, 尤金·维克多 (Debs, Eugene Victor 1855—1926) ——第90, 593—594页。
- 德雷福斯, 阿尔弗勒德 (Dreyfus, Alfred 1859—1935) ——第632, 721页。
- 邓尼金, 安东·伊万诺维奇 (Деникин,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1872—1947) ——第822, 841, 848页。
- 都托夫, 亚历山大·伊里奇 (Дут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1864—1921) ——第500, 522, 524, 566页。
- 杜巴索夫 (Дубасов) ——第341页。
- 杜勃罗留波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 ——第526页。
- 杜冈——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65—1919) ——第251页。
- 杜林, 欧根·卡尔 (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 ——第187页。

E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第18, 24, 29—30, 46, 62, 64, 97, 111, 172, 174—175, 177—190, 195—197, 201, 219—243, 247, 253, 255, 258, 260, 262—266, 270, 331。

389, 434, 475, 477, 525, 576—581, 603—604, 620—621, 625, 627—628, 630, 638, 641—642, 647, 652—653, 664—665, 669, 673, 680, 704—705, 707—708, 711, 718, 772, 798, 811, 838 页。

F

- 费奥非拉克托夫, 阿·耶·(Феофилактов, А. Е.)——第 375 页。
弗鲁姆金, 莫伊塞·伊里奇 (Фрумкин, Моисей Ильич 1878—1939) (格尔曼诺夫 Германов)——第 839 页。
弗吕格, 保尔 (Pflüger, Paul 1865—1947)——第 59 页。

G

- 盖得, 茹尔 (Guesde, Jules 1845—1922) (真名巴集尔, 马蒂约 Basile, Mathieu)——第 53, 171, 708 页。
高尔察克,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Колч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3—1920)——第 795, 817, 825—827, 830, 832, 840—841, 848, 851 页。
哥登别尔格, 约瑟夫·彼得罗维奇 (Гольденберг, Иосиф Петрович 1873—1922)——第 16, 18 页。
格尔曼诺夫——见弗鲁姆金。
格格奇柯利, 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 (Гегечкори, Евгений Петрович 生于 1879 年)——第 500—501, 518, 522, 524 页。
格拉贝, 恩斯特·保尔 (Graber, Ernst Paul 生于 1875 年)——第 666 页。
格拉弗, 让 (Grave, Jean 1854—1939)——第 255 页。
格雷利希, 海尔曼 (Greulich, Herman 1842—1925)——第 59 页。

- 格里姆, 罗伯特 (Grimm, Robert 1881—1958)——第 54, 59, 666 页。
格沃兹迭夫, 库兹马·安东诺维奇 (Гвоздев, Кузьма Антонович 生于 1883 年)——第 3—4, 9—10, 12, 310 页。
格耶, 亚历山大 (Ге, Александр 1879—1919)——第 255, 545, 552 页。
龚帕斯, 赛米尔 (Gompers, Samuel 1850—1924)——第 599, 671, 712 页。
古契柯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Гуч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62—1936)——第 3, 6—7, 10—12, 27, 29, 32, 36, 41—42, 69, 125, 291 页。
郭茨, 阿布拉姆·拉法伊洛维奇 (Гоц, Абрам Рафаилович 1882—1940)——第 500, 514, 518, 522, 524 页。
果戈里,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Гого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1852)——第 394 页。
果特, 海尔曼 (Görter, Herman 1864—1927)——第 56 页。

H

- 哈阿兹, 胡果 (Haase, Hugo 1863—1919)——第 54, 56, 667, 672 页。
哈尔特施坦——见列维。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 (Hyndman, Henry Mayers 1842—1921)——第 53, 171 页。
海耳曼, 恩斯特 (Heilmann, Ernst 1881—1940)——第 58 页。
韩德逊, 阿瑟 (Henderson, Arthur 1863—1935)——第 209, 599, 631, 664, 671, 677, 712 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第 175 页。

胡斯曼, 卡米尔 (Huysmans, Camille 1871—1968)——第 58 页。

怀恩科普, 戴维 (Wijnkoop, David 1877—1941)——第 56 页。

霍夫曼, 麦克斯 (Hoffmann, Max 1869—1927)——第 467、470、472 页。

霍格伦, 泽特 (Höglund, Zeth 1884—1956)——第 57 页。

J

基什金,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Кишк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64—1930)——第 297、306、327、495 页。

吉尔波, 昂利 (Guilbeaux, Henri 1885—1938)——第 56 页。

季诺维也夫,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 (Зиновьев,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1883—1936)——第 23、59、346—348、370—371、616—617 页。

加加林, 阿·符·(Гагарин, А. В.)——第 286 页。

加米涅夫, 列甫·波利索维奇 (Каменев, 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1883—1936) (加米涅夫, 尤·Каменев, Ю.)——第 31、33—35、346—348、370—371 页。

加米涅夫, 尤·——见加米涅夫, 列甫·波利索维奇。

加涅茨基 (Ганецкий 1879—1937) (真名菲尔施坦堡, 雅柯夫·斯塔尼斯拉沃维奇 Фюрстенберг, 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第 57 页。

捷列申柯,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Терещенко,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生于 1888 年)——第 82—85、100、104、133、140、142—143、148、157 页。

晋集诺夫,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 (Сензи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生于 1881 年)——第 211 页。

K

卡尔逊, 卡尔 (Carleson, Carl 1865—1929)——第 56 页。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第 109—112、516、542 页。

卡列金,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Каледин,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1861—1918)——第 353、372、425—426、566 页。

卡列林,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Карелин,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91—1938)——第 369、545、552 页。

卡姆柯夫 (Камков 1885—1938) (真名卡茨, 波利斯·达维多维奇 Кац, Борис Давидович)——第 369 页。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第 16、20、47—48、54、58—59、63、172、177、180、194、199、209、215、227—228、236、260—274、375、605、616—709、710—714、727、730、797、812—815、831、840—842、847、850 页。

柯尔涅利逊, 克利斯提安 (Cornelissen, Christian)——第 255 页。

柯列加也夫, 安得列依·卢基奇 (Коллегаев, Андрей Лукич 1887—1937)——第 681 页。

柯诺瓦洛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Конова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75—1948)——第 83—85、297 页。

科尔布, 威廉 (Kolb, Wilhelm 1870—1918)——第 274、665 页。

科尔尼洛夫, 拉甫尔·格奥尔基也维奇

- (Корнилов, 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1870—1918)——第128, 140, 163, 334, 372, 422, 460, 464, 507, 509, 514, 516, 518, 522, 524, 563, 685页。
- 克拉斯诺夫, 彼得·尼古拉也维奇 (Краснов,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9—1947)——第454, 500, 662页。
- 克劳塞维茨, 卡尔 (Clausewitz, Carl 1780—1831)——第71, 74, 537页。
- 克雷连柯,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Крыленко,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5—1938)——第412页。
- 克列孟梭, 若尔日·本扎曼 (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 1841—1929)——第632, 671, 808, 822页。
- 克列姆博夫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纳波利昂诺维奇 (Клембовский, Владислав Наполеонович 1860—1921)——第286页。
- 克虏伯 (Krupp)——第632页。
-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 (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第255, 273页。
- 克伦斯基,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1881—1970)——第3—4, 8—10, 37, 41, 52, 69, 96, 111, 120, 122, 125—126, 140, 142—144, 148, 156—158, 163, 170, 181, 234, 279, 286, 288, 303—305, 324, 326—328, 334, 339, 341, 345, 347, 349, 351, 353, 372, 377, 408, 422, 424, 426, 453—454, 456, 460—461, 464, 495, 497—498, 500, 509, 514, 522, 547, 551—552, 562, 565, 583, 592, 658, 667, 669—670, 685, 687, 701, 731, 815, 823页。
- 库格曼, 路德维希 (Kugelman, Ludwig 1830—1902)——第262页。
- 库斯柯娃, 叶卡特林娜·德米特利也夫娜 (Куско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1869—1958)——第298页。

L

- 拉查理, 康斯坦丁诺 (Lazzari, Constantino 1857—1927)——第57页。
- 拉狄克, 卡尔·别隆加尔道维奇 (Радек, 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85—1939)——第57, 59, 268, 447—448页。
- 拉基特尼科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Ракитник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生于1864年)——第110页。
- 拉萨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第243, 249—251页。
- 拉斯普庭 (Распутин 1872—1916) (真名诺威赫, 格里哥里·叶菲莫维奇 Новых, 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第2, 88, 463页。
- 劳合-乔治, 戴维 (Lloyd George, David 1863—1945)——第808, 822页。
- 累德堡, 格奥尔格 (Ledebour, Georg 1850—1947)——第54, 56页。
- 李伯尔 (Либер 1880—1937) (真名戈德曼, 米哈伊尔·伊萨柯维奇 Гольдман, 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第309, 553, 662页。
-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ebknecht, Karl 1871—1919)——第55—56, 61—62, 87—88, 91, 102, 460, 467, 676—677, 715, 721—722, 842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第228—229页。
- 李赫特, 歌根 (Richter, Eugen 1838—1906)——第663页。
- 李可夫,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 (Р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1—1938)

- 第370页。
- 李特列, 艾米尔 (Littré, Emile 1801—1881)——第706页。
- 李沃夫, 格奥尔基·叶甫盖尼也维奇 (Львов, 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1861—1925)——第3, 7, 11—12, 13, 27, 29, 36, 39, 48页。
- 里季斯 (Lysis) (真名累太叶尔, 欧仁 Letailleur, Eugène)——第75页。
- 利亚霍夫, 弗拉基米尔·普拉东诺维奇 (Лях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латонович 1869—1919)——第83—84页。
- 连施, 保尔 (Lensch, Paul 1873—1926)——第162页。
- 列布申斯基,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 (Рябушинский, 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生于1871年)——第133, 291, 422, 424页。
- 列金, 卡尔 (Legien, Carl 1861—1920)——第56, 171, 209, 211, 274, 812页。
- 列诺得尔, 比埃尔 (Renaudel, Pierre 1871—1935)——第53, 171, 209, 599, 631—632, 664, 671, 677, 712页。
- 列维, 保尔 (Levi, Paul 1883—1930) (哈尔特施坦 Hartstein)——第59页。
- 林德哈根, 卡尔·阿尔伯特 (Lindhagen, Carl Albert 1860—1946)——第56页。
- 龙格, 让·罗朗·弗雷德里克 (Longuet, Jean-Laurent-Frederick 1876—1938)——第16, 54, 631, 664, 666—667, 677, 683页。
- 卢贝尔沙克, 让·德 (Lubersac, Jean de)——第590页。
- 卢那察尔斯基, 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5—1933)——第816页。

- 卢森堡, 罗莎 (Luxemburg, Rosa 1871—1919)——第18, 56—57, 268, 628, 715, 722, 842页。
- 鲁巴诺维奇, 伊里亚·阿多尔佛维奇 (Рубанович, Илья Адольфович 1860—1920)——第171页。
- 鲁萨诺夫, 尼古拉·谢尔盖也维奇 (Русанов,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1859—1939)——第211页。
- 吕勒, 奥托 (Rühle, Otto 1874—1943)——第56页。
- 伦纳, 卡尔 (Rennér, Karl 1870—1950)——第599, 710—714, 809页。
- 罗将柯,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Родзянко, 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59—1924)——第347—349页。
- 罗兰-霍斯特, 亨利埃特 (Roland-Holst, Henriette 1869—1952)——第56页。
- 罗洛维奇 (Ролович) (真名罗霍维奇, 格·亚·罗霍维奇, Г. Я.)——第156页。
- 罗曼诺夫,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Романов,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8—1918)——第9页。
- 罗曼诺夫王朝 (Романовы)——第2, 7, 9, 36页。
- 洛贝尔图斯——见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翰·卡尔 (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第697页。
- 洛利欧, 斐南德 (Loriot, Fernand 1870—1930)——第56页。
- 洛莫夫 (Ломов 1888—1938) (真名奥波科夫, 格奥尔基·伊波利托维奇 Опоков, Георгий Ипполитович)——第448—449页。

M

马尔托夫, 尔·(Мартов, П. 1873—1923)
 (真名策杰尔包姆, 尤利·奥西波维奇
 Цедербаум, 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第 55, 61, 284, 308, 372, 514—516,
 526, 644—645, 648—649 页。

马克拉柯夫, 瓦西里·阿列克谢也维奇
 (Маклаков,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生于 1870 年)——第 100, 291 页。

马克林, 约翰 (Maclean, John 1879—
 1923)——第 56, 102—103 页。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第 18, 24, 29—30, 47, 62, 64, 97,
 172, 174, 176—177, 182, 184, 186—
 196, 198—212, 214—219, 221—222,
 225—227, 231—232, 235, 240, 242—
 246, 249—253, 255—256, 260—267,
 269—273, 277, 281, 323, 336—337, 342
 —344, 389, 398, 434, 484, 516, 548, 550,
 580, 603—604, 605, 618, 620—621, 623
 —628, 630—631, 637—638, 642—643,
 646, 652—653, 660, 664—665, 669,
 673, 675, 680, 697, 703—707, 711, 714,
 718—719, 725, 757, 775, 793, 795, 797
 —798, 810, 812, 815, 832, 838, 840,
 847, 857, 859 页。

马斯洛夫, 彼得·巴甫洛维奇 (Маслов,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1867—1946) ——
 第 680, 682, 686, 694—695, 697 页。

马斯洛夫, 谢明·列昂节也维奇 (Маслов,
 Семен Леонтьевич 生于 1873 年) ——
 第 687, 689, 695 页。

麦克唐纳, 詹姆斯·拉姆赛 (MacDonald,
 James Ramsay 1866—1937) ——第
 16, 54, 102, 664, 666, 677, 683 页。

梅尔黑姆, 阿尔方斯 (Merrheim, Al-

phonse 1881—1925) ——第 56, 59 页。

梅林, 弗兰茨 (Mehring, Franz 1846—
 1919) ——第 198 页。

门格勒, 安东 (Menger, Anton 1841—
 1906) ——第 708 页。

孟德斯鸠, 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 ——第 217 页。

弥勒, 古斯达夫 (Müller, Gustav 1860
 —1921) ——第 59 页。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
 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 ——第 178
 页。

米勒兰, 亚历山大·埃蒂耶纳 (Millerand,
 Alexandre Etienne 1859—1943) ——
 第 261 页。

米留可夫, 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
 (Милю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9—1943) ——第 1, 3, 6—8, 10, 12,
 32, 42, 60—61, 74, 82—83, 100, 104,
 140, 163, 291, 658, 836 页。

米柳亭,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
 (Милютин,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84—1938) ——第 370 页。

明岑堡, 威廉 (Münzenberg, Wilhelm
 1889—1940) ——第 59 页。

莫迪利扬尼, 朱泽培·艾曼努埃勒
 (Modigliani, Giuseppe Emanuele
 1872—1947) ——第 54 页。

穆拉维约夫, 米哈伊尔·阿尔帖米耶维奇
 (Муравьев, 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1880—1918) ——第 686 页。

N

拿破仑第一 (拿破仑·波拿巴) (Napo-
 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
 1821) ——第 126, 167, 237, 443—444,

- 450—451, 470, 490 页。
-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第 126, 193, 542 页。
- 奈恩, 沙尔 (Naine, Charles 1874—1926)——第 666 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罗曼诺夫,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 Романов, 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第 42 页。
- 尼古拉二世 (Николай II 1868—1918) (罗曼诺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Рома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第 6, 25, 36, 42, 81, 83, 86, 88, 99, 116, 119, 125, 463, 562, 565, 578, 851 页。
- 尼基廷, 阿·姆·(Никитин, А. М. 生于 1876 年)——第 310, 327 页。
- 涅尔曼, 土列 (Nerman, Ture 生于 1886 年)——第 56 页。
- 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维萨里昂诺维奇 (Некрасов, Николай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生于 1879 年)——第 140 页。
- 诺勃斯, 恩斯特 (Nobs, Ernst 1886—1957)——第 666 页。
- 诺根, 维克多·巴甫洛维奇 (Ногин, 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1878—1924)——第 370 页。
- 诺斯克, 古斯塔夫 (Noske, Gustav 1868—1946)——第 812, 842 页。

P

- 帕尔钦斯基, 彼得·约基莫维奇 (Пальчинский, Петр Иокимович 死于 1930 年)——第 123, 154—156, 181 页。
- 帕尔乌斯 (Парвус 1869—1924) (真名 格尔方德, 亚历山大·拉札列维奇

- Гельфанд, Александр Лазаревич)——第 58 页。
- 帕宁娜, 索菲娅·弗拉基米罗夫娜 (Панина, Софи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第 117 页。
- 潘涅库克, 安东尼 (Pannekoek, Antoinie 1873—1960)——第 56, 267—270, 272 页。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第 214—216, 226, 260, 262 页。
- 普拉廷, 弗里茨 (Platten, Fritz 1833—1942)——第 60, 731 页。
- 普雷斯曼, 阿德里安 (Pressemane, Adrien 1879—1929)——第 54 页。
- 普利什凯维奇, 弗拉基米尔·米特罗兹诺维奇 (Пуришк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1870—1920)——第 372 页。
-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第 4, 10, 12, 16—18, 20, 30, 47—48, 52—53, 56, 60, 63, 139, 162—164, 171, 201, 209, 215, 260, 274, 305, 331, 333—334, 347, 609, 617, 653, 665, 680, 735 页。
- 普罗柯波维奇, 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Прокопович,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1—1955)——第 140, 310 页。
- 普罗相, 普罗沙·彼尔切维奇 (Прошьян, Проша Перчевич 1883—1918)——第 686 页。

Q

- 齐赫泽, 尼古拉·谢明诺维奇 (Чхеидзе, 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1864—1926)——第 3—4, 9—10, 15—16, 20—21,

26, 29, 32, 34, 41—42, 52, 55—56, 62 页。
 契恒凯里, 阿卡基·伊万诺维奇 (Чхен-кели, Акакий Иванович 1874—1959)——第 3, 9 页。
 切尔诺夫,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 (Черн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6—1952)——第 68—69, 110—111, 117, 123—124, 133, 149, 155, 164, 171, 181, 210—211, 239, 254—255, 274, 279, 306, 309—310, 327, 331, 408, 495, 516, 836 页。

R

饶尔丹尼亚, 诺依·尼古拉也维奇 (Жорданя, Но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0—1953)——第 306 页。
 饶勒斯, 让 (Jaurès, Jean 1859—1914)——第 261 页。

S

萨文柯夫, 波利斯·维克多罗维奇 (Савинков, 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1879—1925)——第 500—501, 518, 662, 685, 829 页。
 塞拉蒂, 札钦托·梅诺蒂 (Serrati, Giacinto Menotti 1872—1926)——第 57 页。
 桑巴, 马赛尔 (Sambat, Marcel 1862—1922)——第 53, 209, 211 页。
 沙杜尔, 雅克 (Sadoul, Jacques 1881—1956)——第 590 页。
 舍尔,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Шер,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84—1940)——第 839—841, 848 页。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第 708 页。

盛加略夫, 安得列依·伊万诺维奇 (Шингарев,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1869—1918)——第 3, 140 页。
 施蒂纳, 麦克斯 (Stirner, Max 1806—1856) (真名施米特, 卡斯巴尔 Schmidt, Kaspar)——第 260 页。
 施米特,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Шмидт,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86—1940)——第 735, 786 页。
 施泰因, 亚·(Штейн, А. 1881—1948) (真名鲁宾施坦, 亚历山大 Рубинштейн, Александр)——第 644, 651—652, 700 页。
 叔尔根, 瓦西里·维塔里也维奇 (Шульгин, Васил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 生于 1878 年)——第 85 页。
 司徒卢威, 彼得·别隆加尔道维奇 (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第 203, 616 页。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第 178 页。
 斯柯别列夫,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 (Скобелев, 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5—1939)——第 52, 84—86, 123—124, 143, 155, 181, 210 页。
 斯米尔诺夫,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 (Смир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7—1937)——第 478 页。
 斯米特, 玛·——见斯米特·法尔克涅尔。
 斯米特·法尔克涅尔, 玛丽亚·娜塔诺夫娜 (Смит-Фалькнер, Мария Натановна 生于 1878 年) (斯米特, 玛·Смит, М.)——第 156 页。
 斯诺顿, 菲力浦 (Snowden, Philip 1864—1937)——第 54 页。
 斯皮里多诺娃,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 (Спиридонова, 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 ровна 1884—1941)——第 284 页。
- 斯皮罗, 符·勃·(Спиро, В. Б.)——第 369 页。
- 斯切克洛夫,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 (Степлов,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3—1941) ——第 15、20—21、26、29、32、34、41—42、52 页。
- 斯陶宁格, 托尔瓦德 (Stauning, Thorvald 1873—1942)——第 53、57、209、274 页。
- 斯特辽姆, 弗雷德里克 (Ström, Fredrik 1880—1948)——第 57 页。
- 斯托柯夫, 伊诺肯齐·尼古拉也维奇 (Стуков, Иннокент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87—1937)——第 448 页。
- 斯托雷平, 彼得·阿尔卡季也维奇 (Столыпин,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1862—1911)——第 7、36、464 页。
- 斯维亚齐茨基,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Свяц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生于 1887 年)——第 826 页。
- 斯文胡伍德, 佩尔·埃文德 (Svinhufvud, Pehr Eyvind 1861—1944) ——第 778 页。
- 索柯里尼柯夫 (Сокольников 1888—1939) (真名勃里利安特, 格里哥里·雅柯夫列维奇 Бриллиант,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第 478 页。
- 索罗金, 皮梯利姆·亚历山大罗维奇 (Сорокин, Питир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9—1968) ——第 607—608、610—611 页。
- Т**
- 泰奥多罗维奇, 伊万·阿多尔佛维奇 (Теодорович, Иван Адольфович 1875—1940)——第 41 页。

- 泰罗,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 (Taylor, Frederick Winslow 1856—1915)——第 511、552—553 页。
- 唐恩, 费·伊·(Дан, Ф. И. 1871—1947) (真名古尔维奇, 费多尔·伊里奇 Гурвич, Федор Ильич)——第 110、309、327、553、662 页。
- 特雷维斯, 克罗狄奥 (Treves, Claudio 1868—1933)——第 54、275 页。
- 特利尔, 格尔桑 (Trier, Gerson 生于 1851 年)——第 57 页。
- 特鲁尔斯特拉, 彼得·叶勒斯 (Troelstra, Pieter Jelles 1860—1930)——第 53 页。
- 梯什卡, 杨 (Tyszka, Jan 1867—1919) (真名约吉希斯, 利奥 Jogiches, Leo)——第 57 页。
- 屠格涅夫, 伊万·谢尔盖也维奇 (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18—1883)——第 526 页。
- 屠拉梯, 菲利浦 (Turati, Filippo 1857—1932)——第 16、54、59、275、666、670—672 页。
- 托洛茨基, 列甫·达威多维奇 (Троцкий,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40)——第 61、326 页。

W

- 王德威尔得, 艾米尔 (Vandervelde, Emile 1866—1938)——第 58、171、209、211、274—275、703—709、712 页。
- 威尔逊, 托马斯·伍德罗 (Wilson, Thomas Woodrow 1856—1924)——第 594、610、780、808—809、822 页。
-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859—1941)——第 6、61、357、361、450、671、827、830 页。
- 威廉斯, 罗素 (Williams, Russell)——

- 第 56 页。
- 维贝尔,海因里希——见鲍威尔。
- 维伯,比阿特里萨(Webb, Beatrice 1858—1943)——第 272, 631 页。
- 维伯,悉尼·詹姆斯(Webb, Sidney James 1859—1947)——第 272, 631 页。
- 维尔霍夫斯基,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Верх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86—1941)——第 350 页。
- 维列萨也夫, 维·(Вересаев, В. 1867—1945)(真名斯米多维奇, 维谦提·维谦提也维奇 Смилович, Викентий Викентьевич)——第 580 页。
- 魏德迈, 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第 198 页。
- 魏特林, 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第 629 页。
- 沃多沃佐夫, 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Водовозов,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4—1933)——第 81—83 页。
- 沃尔斯基, 弗拉基米尔·卡季米罗维奇(Воль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生于 1877 年)——第 826 页。
- 沃伊诺夫, 伊万·阿夫克森齐也维奇(Всинов, Иван Авксентьевич 1884—1917)——第 111 页。

乌里茨基, 莫伊塞·索洛莫诺维奇(Урицкий, 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73—1918)——第 448—449 页。

X

- 希尔奎特, 莫利斯(Hillquit, Morris 1869—1933)——第 54 页。
- 希法亨, 鲁道夫(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第 727, 730, 814—815 页。
- 谢德曼, 菲利浦(Scheidemann, Philipp 1865—1939)——第 4, 53, 56, 60, 162, 171, 209, 211, 274, 526, 599, 631—632, 663—666, 670—671, 676—678, 710—714, 725—726, 731, 809, 812, 815, 842 页。
- 兴登堡, 保尔(Hindenburg, Paul 1847—1934)——第 450 页。

Y

伊苏夫, 约瑟夫·安得列也维奇(Исуй, Иосиф Андреевич 1878—1920)——第 552—553 页。

Z

左拉, 艾米尔(Zola, Emile 1840—1902)——第 580 页。